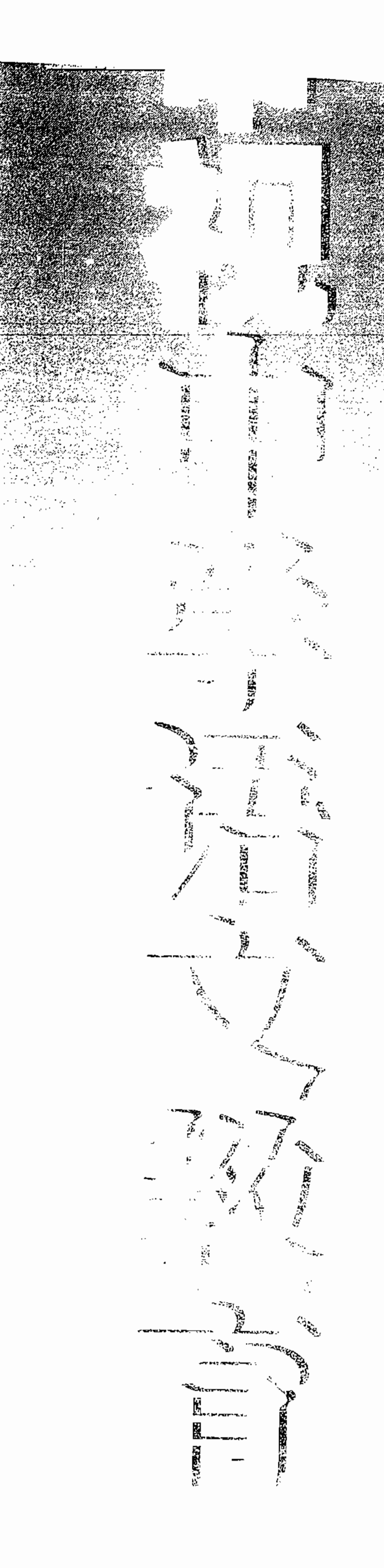


孔庆东 摩罗 余

汕头大学出版社



毛主席语录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选自《毛主席论教育革命》

本书编委会

编者的话：拯救语文

这是一本批判的书，但批判的对象不是老师，批判的方式不是谩骂。

这是一本控诉的书，但控诉的被告不是作家，控诉的结果不是宰杀。

这是一本伤心的书，因为再不伤心我们的孩子将不会说话。

这是一本拯救的书，因为再不拯救，我们的民族将由聋而哑。

悲惨的中学生朋友，我的弟弟妹妹，你们学了12年语文，居然写不好一张字条；你们学过数百篇的课文，居然听不懂一首歌谣；你们呕心沥血背诵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写作特点”、“标准答案”，只不过是为了应付几个小时的高考。假如你考上了中文系，大学老师第一天就会告诉你：“把你从前所学的，全部扔掉！”

可怜的中学语文老师，我从前的同事，我永远的同胞，你们也明知这样的教材不对，这样的教法不好，可是为了让学生考上大学，为了让家长露出微笑，为了能当上“优秀教师”，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指导”……你们只好牙掉了咽下肚硬把老鼠讲成猫。你们在教研室也是愤愤不平，对“标准答

案”热讽冷嘲，可是一走进教室，你们就黑手高悬黑教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对待学生的质疑和不满，你们失去了“人民教师”应有的气度和耐心，你们表现得比山大王还蛮横，比希特勒还粗暴。咱们是不是需要想一想：自己的饭碗和祖国的花朵，究竟哪一个更重要？

陈旧的内容，极左的观念，荒谬的肢解，专制的答案，处处和改革开放的大气候不协调，处处和科教兴国的总目标唱反调。辛辛苦苦的老师，他们已经丧失了独立讲解一篇文章的能力，每周到区里统一备课，就像文革时的早请示，晚汇报；凄凄惨惨的学生，被强迫着弄虚作假，穿靴戴帽，硬说朱自清写《荷塘月色》是因为“四·一二”大屠杀，硬说周朴园的性格是虚伪冷酷残暴；写作文必须“开门见山”，结尾一定要联系四化，形势一片大好。我小的时候拒绝写“批邓”文章，老师还夸我能够独立思考。今天学生写《我的1998》，忘了提“抗洪”二字，便被老师斥责为“傻冒”。

语文课应该给学生情感美的滋养，应该给学生艺术美的熏陶。可是今天的语文课成了艺术的屠宰场，成了情感的死囚牢。少数有个性有才华的学生，受压抑受苦闷，少数有锋芒有见解的老师，招嫉恨招烦恼。语文是我们民族文化的载体，是我们立国立人的依靠。从远古的圣贤，到我们共和国的三代领导，都把语文问题看得十分重要。幸好，举国上下已经意识到当今语文的积弊，四面八方飞来燕山雪片般的声讨。这些声音难免有一点夸张和激愤，那是因为他们要拯救的，是世上最沉重最豪华的“泰坦尼克号”。拯救语文，就是拯救中华文明，就是拯救炎黄子孙圣洁的心灵和智慧的大脑。让我们的弟弟妹妹们，儿女侄孙们，绕过冰山和暗礁，在通畅无边的艺术公海上，自由地选择最适合他们性情的航道。

语文教育的弊端及其背后的教育理念（代序）

——访钱理群教授

是培养人还是培养工具

摩罗： 最近两年社会上对中学语文的关注与批评越来越多，不少报刊都发表了这方面的文章，有的出版社还出版了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著作。因为对中学语文教材及其教学方法的批评，必须以特定的教育理念作为支持。把中学语文作为一个突破口，由此深入下去，全面地考察和检讨中国教育的方方面面，也许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钱理群： 教育方面的问题太值得关注了，也太值得批评了。我觉得1949年以来许多大的失误是比较容易弥补的，但有两个大的失误是很难解决的。一个大的失误就是人口问题，这使我们现在面对如此众多的人口毫无办法；其次就是教育问题，而最近这20年来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问题，教育方向所造成的恶果短期内是看不出来的。教育的问题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也可以分为“软件”和“硬件”两方面。我们的教育失误主要表现在软件上，

而软件上的失误更是一时看不出来的。越是一时看不出来，积累下来的问题就会越多，隐藏着的恶果也就必定越大。开句玩笑说，毛泽东将是为中国历史留下最大问题的人，我的意思是指他在教育问题上的失误。

摩罗：我们姑且说是失误吧。半个世纪以来，这种失误所造成的恶果实在太大了。比如在课程设置上，几十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取消哲学课了。在人类的教育体系中，哲学本来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它是引导人们怎样认识世界、认识人类，怎样跟人类有史以来的文化精神文化财富沟通的知识。可是长期以来我们竟然没有哲学课，从小学到大学，一直用“马列”这么一个具体的学派代替哲学。实际上马列也给我们阉割成了纯粹的意识形态话语，而不是什么哲学。站在讲台上讲马列的，可能一千个中也找不到一个是研究马列的学者。他们跟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还相距遥远，跟作为人类文化精神的最高体现的哲学这门学科就更是遥不可及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没有哲学课，这对我们每个人的精神生活，对这个民族的文化想象力和文化发展，都有致命的影响。一个民族怎么能这么久没有哲学？一个民族的教育怎么能这么久没有哲学课呢？我记得在俄罗斯帝国最严峻的时期，即尼古拉一世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曾经由一个将军来主管教育，停止哲学课达25年，但在25年之后还是恢复了。可我们失去哲学课已经有半个世纪了，到哪一天才能恢复，目前还是一个遥遥无期的事。

我对这个民族的精神状态的评价是非常低调的，我对自己精神状态的评价尤其低调。我们都感到自己的精神资源严重匮乏，有些东西我们觉得是十分宝贵的文化财富，却没法转化为我们的精神资源。我们没有一种基本的价值作为枢纽将它转化过来。我们精神上的这种荒芜状态，当然跟半个世纪以来的严酷历史有

关，但其中有一个紧密相关的因素就是我们的教育中长期没有哲学课。我们因此对世界缺乏基本的认识，完全被一种自我封闭的意识形态训练所窒息。一旦政治及其相关的意识形态出现某种松动，我们立时就会失去信念，感到动摇和空虚。我们没有别的东西来填补这种空虚，即使企图去找点什么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因为我们没有哲学，没有对外部世界和人类文化的基本认识和理解。如果切断了一个民族与哲学的联系，也就是切断了这个民族与整个世界的精神联系。这样的民族多半是要堕入灾难的深渊的。

对于这种危险的精神境遇，我们很难说已经有清楚的认识，但至少有一些隐隐约约的感觉。要想对这一现象进行根本的反思，目前在精神上、学术上、政治上都难以做到。中学语文好像可以说是许多矛盾的交汇点，所以才有许多人将目光投到这上面来。可是，在目前过于功利过于意识形态化的教育理念的限制之下，我们对中学语文的讨论能够深入下去吗？

钱理群：教育上的问题分为两层，一是制度的问题，二是教育理念问题，制度问题在目前显然还没法深入谈下去，这涉及一个靠谁办教育的问题，如北大曾经展开论战，讨论是书记重要还是教授重要。蔡元培的“教授治校”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但至少比现在这种方式要好一些。

摩罗：比完全的政府办学要好，我们现在的学校基本上都是政府机关，大学尤其如此。

钱理群：现在是党委领导一切，教育本身体制化以后，教授与体制也会产生一种新的关系。

在大学里面，培养目标应该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培养要求；一个是作为专门知识分子的培养要求。现代知识分子应有三大基础知识：第一是哲学，第二是数学，第三是

语言，包括中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看一个时期最热烈的学科是什么，一定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某种特点。“五四”时期提出哲学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哲学应是解决对世界的根本性看法的，某种程度上也是解决人的信仰、信念、终极目标和终极关怀的问题。蔡元培就是坚持这种教育思想的。蔡元培在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时，热衷于对中国传统教育进行改革。在全国第一次教育讨论会上，蔡元培明确提出新的教育方针，提出“五育并举”的思想：一是军国民主义教育，大概指今天所说的体育；二是智力教育；三是道德教育。他认为这三者属于教育现象学的问题，明确提出这三者是服从于政治的，或用今天的话说是服从于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的。与此同时，必须还有一个超越性的、关于彼岸世界的教育，为此他提出了世界观教育。他认为这有两层意义：一是消极意义上如何看待物质世界，他告诉学生不要拒绝，不要逃避，也不要执迷于此；二是积极意义上要追求对人格的培养，对彼岸世界的关怀，培养学生超越政治和科学的东西，培养起宗教层面的东西。但他对宗教的作用有所保留，认为宗教容易形成独尊，这与自由理念抵触，因此提倡美育，认为美育是从现实世界向彼岸世界过渡的东西。美育既有普通性又有超越性，因而美育可代替宗教。他提出的前三个教育目标，在有关会议上很快就得到认可，并被会议所通过。第四个关于世界观的教育没有人赞成，它跟德国教育有关，别人根本不懂，自然就否定掉了。第五个目标即“美育”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开始是完全被否定掉了，后来有人提出不把美育作为全国教育的方针，而把它作为中小学教育的方针。再后来，美育被人们缩小成我们今天所讲的音乐、美术。我们今天的教育，实际上是“半截子教育”。蔡元培认为“五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此间既强调了长远的根本性培养，又考虑了现实性需要。因为教育在现实的层面还有建

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这一思想跟鲁迅的“立人”思想相衔接。一方面要建立民族国家，要求每个公民“德智体”发展，另一方面要“立人”，立具有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的人。“德智体”是下半截，世界观是上半截。两相衔接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教育。而我们目前的教育处于被拦腰斩断的状态，上半截的教育被斩下来丢掉了。这世界观的教育从蔡元培提出一直延续到现在都没有得到落实，它一直遭到怀疑和否定。今天更加变本加厉，以前强调政治功利目的，现在加上商业功利目的，这双重的功利性把教育压得残缺不全。

当前研究起来比较复杂的是毛泽东教育思想。毛泽东明确提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转变人的思想，马列课最初的目的也是世界观教育。毛泽东在人们心中是圣人形象。他把伟人分为贤人和圣人。贤人具有具体事功意味，比如秦皇汉武之类。他在《沁园春·雪》词中列举了他们这一类人在事功意义上的成功，并提出要超越这种事功的贤人，要求自己做一个“圣人”。他认为圣人是要影响和改造人的灵魂的，因此他的目标不仅是改造物质世界，更要改造人，要向人性挑战。他在这方面遭到了失败。他把全国变成一所大学校，以转变人的思想为根本，而不局限于“德智体”的那一套。他要改造人的灵魂，这本身就带有专制性。蔡元培提出的要开发人本身所具有的美好的东西，这不是要外加一个什么东西，而是要把一个人内在美好的本质激发出来使它升华、丰富，跟这个世界建立一种更加广泛的联系。人一出生时什么也不懂，意识也很弱，在他们长大的过程中，已经长大的人应该帮助这些没有长大的人跟世界建立广泛的精神联系，将他们内在的美好东西激发出来。人的灵魂美好是生而有的。一个好的导师最大的本事是能把一个学生本身潜在的创造想象力诱发出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教育与被教育者相互诱发创造想象力，最后

是双方都得到升华，我认为这就是比较理想的教育的状态。马列主义是诸多学说中的一种，如果在整个社会的教育体系中，将某一种学说、思想置于独尊的地位，这就落入了蔡元培所极力避免的宗教迷雾之中。洗脑筋和世界观教育是两回事。毛泽东要把学生的思想纳入他所需要的所谓“息封灭资”的洗脑中去。这实际上是一种更为可怕的心理专政。你很难说1949年后不重视思想教育，但这种思想教育与启蒙意义上的世界观教育几乎是背道而驰的。它的结果就是导致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断裂和精神窒息。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失败了，但在另一个意义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摩罗：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是应该把教育理解为一个国家和政府的行政行为，任由其从国家权力和利益出发训练合格的公民，还是应该把教育理解为人类群体对每个个体所施行的文化行为，要求它从人本身出发，在尊重基本人性的前提下，帮助每个个人认识宇宙是怎样的，地球是怎样的，人类文化和人类经验是怎样的，从而使每个个人尽可能成为拥有最丰富的文化资源、最广阔的精神自由的人。我们生活在大自然中，应当跟大自然建立一种认识上的、情感上的联系与交流。我们与每个个人之间、与整个人类之间，也应该建立起这样的联系与交流。我们一成年，我们脑子里就拥有人类的整个一部历史，这个历史激励我们追求我们更加美好的人生，追求更加丰富的精神生活。教育的过程就是把人类的一切经验和文化都教给学生，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功能。这样，学生就可以拥有人类所有的精神资源。在拥有了这样丰富的精神空间之后，一个人才可能按照自己的愿望有选择地设计自我，同时按照自己的愿望为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一个人在精神上的最高尊严就是独立地为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也就是说，给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是自己的事，而不应是由

所谓“教育”规定了一个统一的意义来强加给所有的人。我觉得怎样活才有意义，就选择怎样的活法，只要这种活法不侵害别人，就应当得到尊重。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最高权力就是给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的权利。帮助每一个人最切实最完整地实现这样的权利，这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当然教育还有为一个社会所需要的特定内容，包括作为政权而存在的国家对教育提出的某一部分合理要求，也应受到适当的尊重。比如在目前的人类游戏规则中，要激发公民有足够的爱国心来捍卫自己国家的主权，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只是教育目的中的一小部分，而且次要的一小部分。可是我们的教育目前的基本状态跟我所理解的教育目的是相反的，它尽可能地切断学生跟人类文化和大自然的联系。它只告诉学生在人类所有的思想财富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是好的，其他一切都是坏的，都是对人类精神有损害的。这样一来，我们实际上就切断了学生同人类文化的联系。文革时在这方面走到了极点。文革把人类历史上所有优秀的和不优秀的东西都一刀砍断。最有代表性的口号就是“横扫一切封、资、修的毒草”，“封、资、修”这三个字实际上概括了人类历史上一切经验和文化。这样的切断把我们彻底地抛到了文化的荒漠中。我们今天的教育就是沿着反“封、资、修”的路子走过来的，尽管在“烧书”这一层面已经大有改观，但教育的观念还是老样子。我们的教材仍然不遗余力地告诉你只有一种东西是正确的，其他的都是错误的，而且用一整套考试制度强制你接受并相信这一种东西。学生因此只能拥有最单一的知识、最单一的观念。把受教育者的精神变得非常单一，这实际上就是精神阉割。一个人从走进幼儿园开始就遭受这样无情的阉割，精神生命哪还有发育和发展的余地！我们的精神从一开始就处于这样一种荒芜状态。教育本来应该开发人们的内在潜能，可是我们的教育偏偏从内部窒息了

人们的潜能。

钱理群：教育还有一个功能是启发受教育者进行自我开发。知识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古希腊的命题“认识你自己”，建立一个人学知识结构。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最终还是落到对自我个体生命的认识上来。这两个方面都应注重，不可偏废任何一面。而我们的教育在这两方面都出了大问题。在阉割人类知识上我们走得太远了。即使有极少数知识有幸进入我们的视野，也被我们歪曲得面目全非。比如《项链》，被我们理解为批判资产阶级虚荣心，这就是用意识形态化的讲法来歪曲人家的艺术创造。我们的教育太漠视人类心灵。列宁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是“七分无用三分有用”，这种“用”的观念对我们的教育伤害太大。我们总是错误地认为个人的精神生活是无用的，于是我们的教育无情地压抑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人成为书橱，把人类的心灵变成了某种意识形态观念的“跑马场”。我的讲课总是试图让学生打破时空的界限，和人类历史上的伟人进行精神对话。人打开书就是与遥远时空的人进行精神交流。书本教育的很多好处就是可以打破时空的界限，哪怕现实世界是一片污浊，你都可能通过书本拥有更加浩瀚的时空中的一片光明。高尔基能成为一位巨人，书本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通过读书而进行的交流是很平等的，因为这不是由教育体制背后的强权灌输给我们的。

我们所谈的个体生命指的也是一个个具体的生命个体。一方面是具体的你我他，另一方面也指向所有的个人，还包含博爱的内容，整个人类的生命都与他有关，甚至扩展到非人类、宇宙存在。建立这样的观念，完全靠书本是不可能的，还得靠作为一种文化行为的教育。要给学生建立这样的观念，一是自我开发，充分表现自己的生命力量；二是为人类服务。二者并不矛盾。为人类服务也包含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而具体到近代以来中国是一个

受压迫的落后国家，还要为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服务。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包含有追求个人精神自由的一面。我很赞成蔡元培的观点，要教育学生不要拒绝物质。这方面也有教训，毛泽东要完全把人变成精神的人，出发点本来就不合理，后来当然就要导致荒唐结论和结果。他有一句话是“一个纯粹的人”，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还针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强调人的群体性，企图完全扼杀人的个人性。《纪念白求恩》很重要，是表现毛泽东人学思想的重要文献。他的这种理想讲起来很吸引人，“毫不利己”和“纯粹”，一般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容易接受。而这种纯粹的精神在现实存在中的表现就是“共同理想”，他由此提出要为共产主义这样一种全人类的“共同理想”贡献一切。表面上看这是很美好很纯洁的词汇，但再往下推，为了某个崇高的“共同理想”就可以要求别人牺牲生命，甚至可以强迫你牺牲生命，也就是可以杀人，可以做一切他认为对实现“共同理想”有利的事情，很美好纯洁的东西由此就转化成了很可怕的东西。

摩罗：革命的恐怖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钱理群：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可以做一切事情。这是一个命题，有它的逻辑推理和整套理论。毛泽东还提出“人群是划分为阶级的”，这也是对底层人和知识分子很有诱惑力的一个命题。毛泽东思想有一个特点，每个逻辑前提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他就是这样推理的：在阶级社会里，人群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的利益是由政党的政治理想来代表的、而政党的利益是靠领袖来综合体现的。这样推理下去，为了人的群体利益，每一个个体的人就必须成为党的工具，进而必须成为领袖的工具。毛泽东的命题都是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命题，而每一个命题的实践展开和逻辑结果却都是这样可怕。

摩罗：我们这几代人的思想观念，包括现在刚入高校的学

生，就都是按照毛泽东的理念灌输出来的。

钱理群：而且在当代，我们又面临一个物欲横溢的问题，个人欲望的极度膨胀，对毛泽东的理念构成反讽。其实应当把这些问题揭示出来做理论上的清理。只有揭开曾经导致我们民族精神迷乱的这类的“逻辑迷魂阵”，这个民族才可能有理性的追求。要作理论上的清理，当然很不容易，这涉及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等许多方面的问题。

人文教育和技术教育的关系

摩罗：前面所说的这些教育理念落实到中学语文之中，就是过于强调语文教育的工具性。今年第11期《读书》杂志上，葛兆光先生的一篇文章就谈到这个问题。他是通过比较中国和日本的语文考题来阐述这个问题的。他说：“如果说，日本的‘国语’出题者心目中，标准国语是文学散文所表现出来的美文，那么中国的‘语文’出题者心目中，标准语文是社论体或报纸体那种应用性文字。这里的合理性前提是社论或报道等报纸传媒的权威，而报纸的权威来自政治性权威。”这里的工具性有双重体现，第一重是把语文教育的功能理解为为人们提供在一个生活共同体中共同生活的工具，第二重是通过语文教育把人们训练成为特定的政治权力实体的工具。这正是最让人产生疑问的地方。语文教育究竟仅仅只是要解决工具问题，还是同时要解决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比如解决精神问题，个人精神自由问题，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问题。我们是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还是可以二者兼顾？

钱理群：我觉得比较复杂，因为语文界对语文教育的性质历来有争论。一种是“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一种是“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这两个口号由来已久。前者是针对50年

代特别是1958年以后的一种倾向提出的，因为那个时期语文课被变成了一种变相的政治课。于是有人提出语文课是一门工具课，用以抵制语文课政治化的倾向。还有人提出了语文课不是文学课，1956年曾进行过一次教育改革，当时把语文课本改成文学课本，按照文学史的框架选择经典著作。从《诗经》读起，然后是唐诗宋词，还有鲁迅、曹禺、老舍等等。这样上课似乎跟我们现在提的“人文精神”较接近，现在还有人怀念当时的课本。但这种课本有一个毛病，就是对学生进行了纯粹的文学教育，而相对忽略了语言文字的训练。当时的文学课本很大程度上受苏联影响，而苏联是拼音文字，识字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而中国的汉字是很难学的，如果学生没有基本掌握语言文字的能力的话，文学教育也会落空。于是有人出来强调语文课不是文学课。60年代针对这两种倾向提出了“语文课是一门工具课”，强调要抓住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训练。我们今天语文教育的格局就是那时建立起来的。后来语法越来越多地介入进来，现在发展到了一个极端。尽管最早提出这样的主张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但把语文课定位为工具课的主张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弊端来。这种主张把人文教育排除在语文之外，使语文变成了一门技术性的课程。

但又不能因此否定中小学教育的技术性内容。它是要让学生具备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和阅读写作能力。中学语文教育是有双重性的，既是人文教育，又要对学生进行语言文字能力的训练。它的复杂性还在于汉字难学。另外，中国有两套语言，文言和白话。中小学语文中文言到底占多大的比例？比例占得太小不利于学生掌握文言文，太多了也不合理。大陆教育和台湾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区别。台湾是很注重文言文的，它的许多考题我都不一定能答上来。汉字难学和两套语言的特点决定了中小学语文教育相当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让学生掌握中国语言。我担

心我们忽略了这一点也会走到另一个极端。

当然，目前最主要的弊端是太忽略人文教育的作用。语文教育有其特殊性，许多人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都会发现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往往是语文教育，或者是语文教师。就我而言，决定我一生发展的是语文老师。人文教育不只是语文教育，而语文教育应当占有一个特殊甚至是核心的位置，因为语文的文学性对青少年更富有感染的力量。中学语文教育落实到人文教育上时，就是给人建立一种精神底子。一个人的精神是要有一定的底子的。我个人认为这种精神底子应当是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即给人的生命一种亮色。我在人民大学演讲时讲到这个问题。我收到过人大一个学生的信，他指责我说："我是受你影响较深的人，但现在我觉得你给了我那么多沉重的东西，很容易给人一种虚无感。我们的生活本来就够沉重的，你再给了我们那么多沉重的东西，还有沉重的记忆，你这是害了我！"后来我说给学生一点精神的亮色也应该是中学语文教育所解决的问题。本来就像周作人所说，人生的季节是不能颠倒的。青年时代应该是做梦的季节。别林斯基说过，年轻的时候应该追求做虚幻的东西，不能过早地把人培养成太现实的人，要敢于做梦。在成熟以后，美梦破灭，在破灭中升华，这样就可以达到永恒的精神和谐。他主张人的精神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开始是一种虚幻性的精神和谐，然后是虚幻的破灭，再然后在更高的层面建立一种精神和谐。

鲁迅也曾经认真谈论过少年时期的梦幻问题。我们在鲁迅研究中过于渲染他黑暗和沉重的一面，而实际上鲁迅的生命也有他的亮色，这亮色来源于民间思想的滋养。他童年时受到民间思想的影响，使他有一种亮色、一种基本的信念，以后他才有沉重的一面。我的中学时代是共和国的黄金时代，我也做过很多梦，有很多美的东西，如童话、神话等许多很浪漫的关于彼岸向往的东

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安徒生的《海的女儿》，我对这部作品的理解是为了做人可以牺牲一切，这就是鼓励我们建立一种做人的基本信念。中学教育应当为学生建立一种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亮色。人文教育能给人的生命一种亮色，有了这么一点亮色，当他遇到沉重黑暗的东西时才不至于走向绝对虚无。就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说的那样，“有了这碗酒垫底，什么都能对付”。

中学语文教育在引进人文教育时必须考虑到青少年的年龄特点和心理特征。在青少年时期一定要为对真善美的追求打下底子。这种教育是以后任何时期的教育所无法补偿的。人若缺少这种底子是会有问题的。而现在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结构中都没有这种东西，所以现在年轻的人心中也基本上没有这种东西。现在的学生真是过于懂得现实，过早面对世俗丑恶，过早学会世故，这是很可怕的事。这以后的精神发展是一种季节颠倒，我觉得非常可怕。

摩罗：由于缺乏那样的人文教育，精神上没有打底，在现实的操作中就可以不讲理想，不讲超功利的信念和律令，也就是对自己没有要求。我觉得当下人们最明显的一个精神特征就是对自己没有要求，没有一个东西可以作为依恃。我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我们在精神上一点依赖都没有。没有依赖也就是无赖。一个无赖在精神上是无所畏惧的，在操行上是没有规范也是没有边际的，所以我们可以完全沦为现实利益的奴隶，现实利益需要我们怎么操作，我们就无所顾忌地怎么操作。无论要做出怎样恶劣的事情，都不觉得有什么心理障碍。

钱理群：支配许多人（当然不是全部）的操行的，一个是现实利益，还有一个就是活命哲学。活命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致命的地方，人们常常放弃所有的价值，一心只追求怎样能够活下去。

摩罗：现实利益和活命哲学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追求现实利益是为了活命，活命本身就是一切现实利益中最大的现实利益。中国人精神上的这个缺陷实在太大。教育本来应该帮助每个个人克服精神上的狭窄、软弱与缺陷，可是目前这种过于功利化、工具化的教育，不但无法补救这种缺陷，而且只会强化这种缺陷。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教育的现实状况是极为糟糕的，其中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和祸患。面对这种日渐功利化、工具化的现实，人们既没有清醒的认识，更缺乏回天之力，只有指望少数人从教育的扭曲和窒息中突围出来，思考一点复杂的问题，讲一点具有人文气息的话。但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大多数人都只能遵循古老的活命哲学，在各种肮脏缝隙中卑屈地生存。这种恶劣的生存使每个人都受到严重的伤害，人们一边遭受伤害，一边又丧心病狂地伤害别人。中国人真是一个既极为可怜又极为可怕的群体。

钱理群：由于缺少一种信念，一种追求，一种彼岸关怀，缺乏一种精神砥柱，我们这些人都成了一个个软体动物，确实如你所说，既极为可怜又极为可怕。

人文教育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让学生领略中国语言文字的美。汉字一方面难学，另一方面积淀了很丰富的文化，不仅是一种简单的符号。中国语言文字美的背后是人性美，这是我们长期忽略的。浙江的语文课本里选有对联，还有谜语，很受启发：这些都可以让学生体验中国语言文字的美。我们的教育方法却违反了中国语言文字规律和学生学习的规律。汉语是感悟的文字，传统教育也有优点，就是不要过早地让学生了解意义，让他在朗诵中感悟语言中一种意韵的东西。中国语言文字的美也正好是写作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点。

余杰：中学语文的 12 本教材中，中国以外的作家所写的作

品只占了8%，照理说应当有30%~40%。汉族中心主义和“天朝王国”心态在教材编者的心中十分显著。外国作品中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占了80%左右。

钱理群：这是60年代“息封灭资”的重要产物。教育目的体现在教材选择、教学方法和意义阐释上。

余杰：除高尔基外，20世纪的外国作家一个也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无一人入选。

钱理群：语文教材的编选和我们的学术研究脱节很大，基本停留在60年代的水平。60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有两个背景，一是“息封灭资”，二是受俄国日丹诺夫影响。日丹诺夫有一个理论，即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文学作品具有进步性，可以借鉴。文艺复兴至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是最高峰；而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文学则是完全反动的，这包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作品，当然也包括此后的作品。1958年茅盾写的《夜读偶记》把西方文学分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两种，认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整个是反现实主义的。这一套观念对我们的教育影响极大，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后果。比如我们这一代人对19世纪以前的文学比较熟悉，但对20世纪文学就一无所知了。

摩罗：现在的学术界已经突破了这一套陈腐观念的束缚，可是中学语文从教材编选到教学方法都还深陷在这种过时知识和观念的束缚之中。给人一种印象就是语文教学界的人都是些迂腐的老朽，他们比社会文化的发展滞后几十年，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件荒唐事。据说中学教育中数理化等自然科学教材也存在这种严重滞后问题。这种教育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只会起阻碍作用。为什么不可以把最有思想、最有学问、最有才华的人吸引到中学教育中来呢？为什么不可以让中学生学到最完整、最丰富、最有活力的文化知识呢？这些问题一问起来就觉得太复杂，也太令人焦虑

与悲哀。

余杰：还有一个问题是政治人物的文章选得太多，谁的官大就进语文课本。毛泽东占的比例非常大，周恩来、刘少奇的也进来了。还有邓小平的，江泽民的，等等。

钱理群：这其实也是把语文课简单地当作政治教育课。

余杰：鲁迅文章的选编问题也值得研究，是否应该选这么多，具体选哪些，都应该按照中学生的接受能力重新研究。现在许多中学生都反映学鲁迅很痛苦，不知道在学什么。

钱理群：在大学里许多学生也很厌烦鲁迅，最好的是敬而远之，更多的是有一种逆反心理。中学生自然更会感到受不了。原因大致有两个：他们选的是符合他们政治需要的文章，把鲁迅的作品扭曲后纳入他们阶级斗争的范围，因此特别看重论战性的文章。另一个原因是不考虑中学生理解世界的方式和能力。另外鲁迅作品所占的比例也实在太大。

摩罗：但是在目前的教材结构中，只有鲁迅的作品才是真正丰富的，真正具有文化信息和精神信息的。这些作品给少数出色的老师在夹缝里坚持的人文教育提供了文本依据。如果没有鲁迅的作品，整个中学语文教材就太惨不忍睹了。

钱理群：还有一个解读方法的问题。目前对鲁迅作品的阐释基本上还是依据60年代的很传统的观点。60年代有个提法叫“讲深讲透”。经典性的文学作品是常读常新的，要引导学生不断去读、去体会。教学中应该是有所懂有所不懂，没有必要把每句话都解释清楚。我主张学生读书比如读鲁迅的经典作品是要囫囵吞枣地读。文学作品不必解释得太死，比如曹禺笔下周朴园的性格特征，就被教学界规定为自私的、虚伪的。考试的时候非得照这种说法答题不可，写了别的答案就不给分。文学作品是可以有多种解释的，这正是发挥人的想象力的地方，应当鼓励学生作出

多种解释。我们现在的教学参考书具有一种法律的威严，不允许老师有发挥的余地，只能按照参考书的规定来解释。这些做法恰好违反了文学的规律，当然也违反了教育的规律。本来语言文学课是最有趣味的课。我中学时就觉得语文课非常吸引人，每次上课前我都带着一种进入精神圣地探险的期待。语文课应是一种精神漫游。应该是好玩的有趣的。现在语文课却变得如此乏味。

摩罗：现在中学生一上语文课就怕，不大有人听语文课。最有诗意的课成了最可怕的课。

余杰：语文教材中的文体分类也很糟糕，分为议论文、记叙文、说明文三大块。我认为应当取消说明文这一块。说明文的教学目的表面上是要使学生在实际中广泛运用语言文字，设想很好，但作用恰恰相反。比如叶圣陶《景泰蓝的制作》，非常繁琐，非常枯燥，对提高实用文体的写作能力没有什么帮助。这类文章在教材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摩罗：《景泰蓝的制作》我不知教了多少遍，可我什么也没得到。靠这样的文章学习文学、学习写作、学习科学、学习工艺都是不可能的。它只会打击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觉得语文课枯燥乏味。很多学生甚至觉得语文课是难以忍受的折磨。

余杰：现在对科普文章的选择非常差。

钱理群：可是科普文章还是必须有一些，不能全是文学，还要培养学生对自然科学的兴趣。

学生的地位与尊严

摩罗：老师跟学生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问题。目前这方面的情况很糟糕。教师都是庄严的说教者、指导者，是绝对权威。我们的文化观念和教育体制就规定了老师的这么一个地位。学生很难在教育的意义上成为主体，而只能是被灌输的、被管教的、被

批评的、被指导的状况。中国人的教育过程就是一个以牺牲人的尊严为代价求得功利目标的实现的过程。所谓受教育实际上就是学习怎样接受压抑、怎样接受别人对自己的强制。学校说什么是什么，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学生稍有非议，整个学校制度便压了下来，给他处分，把他开除。当这个教育过程完成的时候，所有那些强制学生接受的东西，都变成了学生自愿遵守的东西。

钱理群：我还是觉得中学语文教育应当提倡学生发表不同的见解。

摩罗：但是现在不行，对什么问题的答案都只能是唯一的。本来也许答这几个字也可以，那几个字也可以，可老师规定了只能用这几个字。这种教育方式非常有利于培养一个人的奴性。规定了这样就只能这样，尽管那样也不损害什么，那以后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就非常自觉地压抑自己、斫伤自己。他一意识到上面要求怎样，尽管另一种做法也行，但他决不做另一种选择。奴性就是要求唯一性，要按照主子的要求去做。我在为《思忆文丛》写书评时曾痛心疾首地说：我们从一开始就学会了人家需要我们说什么就说什么，要求我们不说什么就不说什么，有些东西我们不想说也必须这样说，我们从小就学会了做奴隶。等到我们长大了发现不这样做别人决不放过你，那我们就更加自觉地那样去做。

钱理群：这里就涉及一个写作和说话的态度问题。现在总是培养学生说假话。其实作文本来可以虚构，我们可能训练学生虚构的能力和想象的能力。我们一方面禁止学生虚构，另一方面又培养学生说假话。中学时应该鼓励学习童话，让学生分清真实和虚幻的东西。我们现在是培养学生不说自己的话，专说别人的话。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机制，专门训练学生说假话。今年高考作文多达百分之几的考生说自己的父母都死掉了，他们在这样一个假的背景下再来歌颂那应当歌颂的，突

出那应当突出的。而什么东西是应当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突出的，这全是由教育强加给他的，跟他本人的真实想法和情感一点关系也没有。在我们这一代人受教育的时代，情形就已经是这样，比如陪残疾人过马路，比如捡了一个钱包，等等。这样不仅是带来写作的问题，而且会带来精神上的问题，也就是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对人的培养和对写作的训练是统一的，培养一个人怎样写作，在另一个意义上就是培养一个人怎样做人。说别人说的话就是奴隶，说假话就是奴才。奴隶和奴才应有区别。奴隶是被迫说别人的话，而奴才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故意要照别人的意思说假话，当然也包括做假事、做坏事。在作文中为了得高分这样一个功利的目的可以说假话，那在现实生活中为了更加重要的目的就更加没有操守可言，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这种情况是十分可怕的。

余杰：人们刚开始接受这种训练时，是很不习惯的，甚至有某种痛苦，所以现在中小学生最头疼的事情就是写作文。

摩罗：可是等他们完成了这么一个受教育的过程之后，他们就基本上适应了这种有意说假话的写作，你看那些专写八股文的五花八门的刀笔吏们，他们说起假话来几乎比说真话还要庄严。

钱理群：做奴隶就是土八股，做奴才就是洋八股，他们都是说流氓语言。鲁迅说过：流氓就是没有自己固定的见解，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不断地否定自己，毫无客套可言。这样的流氓在小时候主要用语言化的方式培养产生。引导学生怎样写作，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摩罗：所以我们对于目前中国的中学语文教育，就要放到本世纪下半期这样大的文化背景下来理解。我们大的文化背景是一个流氓文化膨胀的历史时期，中学语文教育承担的重要的功能，就是培养听任流氓语言支配的奴隶和奴才。

钱理群：准确地说是培养未来的“奴隶”和“奴才”。

摩罗：从教育目标来看就是培养奴隶和奴才，那在教学中当然就要体现强制性。我有一位朋友的儿子先是在加拿大读小学，那里的老师从来不在学生的作业本上打叉，学生做得不对老师就在那里打个问号。他回到中国来上学，作业本上老是被打叉，他于是感到太受伤害，给气得老哭，老叫嚷着不肯去学校。我还有一位同学的两个儿子在上海的美国学校读书，我了解他们的作文训练，都是老师就某一方面的问题介绍目前在人类社会流行的各种想法，然后让学生发表自己的想法。老师决不提出一种权威的想法，或者是为意识形态所要求的某种想法来强加给学生。在这样的教育和教学中，老师和学生当然是平等的关系，当然是互相尊重的关系。一个孩子在学校得不到平等和尊重，以后纵使能够得到机会学习平等和尊重，也是永远都学不会的。学校里的强制教育，是社会上的强制关系的体现，同时也巩固着社会上的强制关系。这样的教育实在是不可乐观。

钱理群：中学语文教育的目标主要是培养话语方式，即怎样说话、怎样写作。可是目前我们的写作就是在培养各种各样的八股，包括土八股、洋八股、党八股和革命八股，土八股是模仿和服从。洋八股的特点就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形式上非常华丽，在漂亮的形式下坚强有力，气势磅礴，许多假文章写得好的一个特点就是文字华丽，但它是培养奴隶和奴才的一个模子。而根本问题在于还是培养独立的人，有尊严的人，要让学生学会像人那样说话，像人那样思考问题。人文教育和写作教育都是直接指向培养人引导人的。

摩罗：讲话的方式就是面对世界的方式，你讲话的态度是虚假的，那么你面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也只能是虚假的。一切都是假的却偏要装作是真的，那就是有意玩弄这个世界。我们的时代几

乎都是这种喜剧人物。我把我们这个时代命名为喜剧时代。

钱理群： 话语只是一个中介，它的一面是人的思维，另一面是人的行动。但中小学语文教育主要是控制话语方式的。

摩罗： 看目前社会上中学语文的重视，可不可以把它推到乐观一点的程度，显得大家对这些问题都有所觉醒。比如讲假话的方式，面对世界的虚假态度，是不是社会上已经有很多人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才关注到中学语文这里来。

钱理群： 这很难说。

摩罗： 我知道你会给出一个悲观的回答，其实我也是很悲观的。既然现在有不少人关心中小学语文教育方面的问题，大概就少不了要谈论对它进行改革的问题。你觉得这方面的改革首先要注意哪些问题?

钱理群： 我对整个中国改革的看法是，改革要早，步子要慢，也就是开局要机警，行动要谨慎。不要老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尤其是中小学教育这种涉及到千百万人的后代的问题，更要谨慎。我们的社会有一个特点就是要么不改，要改起来就乱来。有的问题反映一强烈，某个领导一句话就变了过来。语文教育的问题确实很严重，我们是要积极地鼓吹这方面的改革，但在具体操作上是一定要谨慎的。这里面还有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例如语文教育的各种功能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还有教材上的许多具体问题。语文教育是在中国大环境下进行的，改革涉及了许多人的利益问题，许多教育部门印刷大量教学参考资料是赚钱的手段。而这些教参都很糟糕，又对教育起直接的影响。应该把教学部门与教材、教参的经营脱钩。改革也是很复杂的事情，涉及到许多利益的问题。而利益比我们所讲的更起作用。

当然，更加根本的改革恐怕还是教育制度的改革，要从考试下手，因为它是指挥棒。如果搞好了，指挥棒可以指挥另一面。

我觉得同时还要呼吁一下教育科学的研究。你我都不是专门研究教育学和教育问题的，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自身的局限性很大。真正的改革应该有严格的科学研究和科学论证，不是大家脑筋一热就可以决定的。改革是好事，改得不对也许会更加糟糕。至于具体操作上的许多问题，更加不是我们说说就能解决得了的，这一定要作非常严谨的研究和论证。

目　录

第一辑/语　文，我为你流泪！

第二辑/中学语文坑死人

第三辑/为语文号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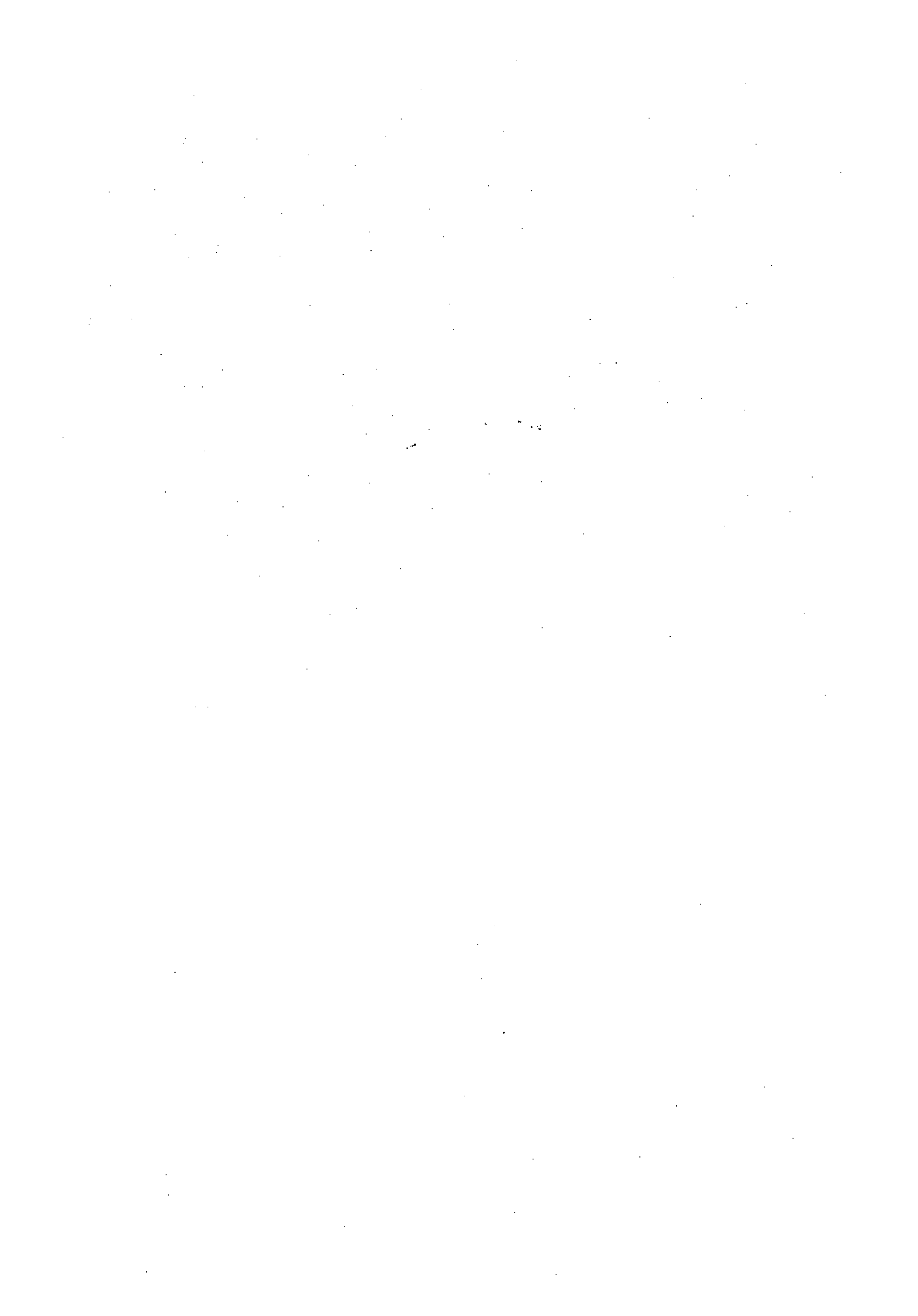
第四辑/只盼着能在人前把话讲

第五辑/语文，民族文化的根

第六辑/救救语文

第一辑

语文，我为你流泪



□ 钱理群

“往那里去?!”

给我的任务是评论高考评卷。

我读了，非常吃力，首先是弄懂题目的要求就费了极大的劲，有的至今也没有弄得太清楚。这两大部分、六大项，三十五小题、十大页，据说有一万五千字的标准化的考题；形成一种无法抗拒的力，要把我的思维强行纳入某一种固定的，不可置疑的，钢性的模式中，进而控制我的心灵；我感到生命的窒息，陷入了莫名的恐惧与痛苦之中。

而且我知道这种“考试”的威力：你（或许还有你的家庭）未来的命运都掌握在它的手中，你必须臣服。记得鲁迅曾提到有一种“山羊”，它能够“率领羊群，悉依它的进止”；在我的感觉中，这种“考试”其实就是更为高明的“带头羊”。于是，眼前幻化出了一幅“漫画”：“山羊”在前面走着，“胡羊们”（千百万的学生，连同他们的老师、家长），就像鲁迅所描写的，“成了长串，挨挨挤挤，浩浩荡荡，凝若柔顺有余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竞奔它们的前程”。鲁迅说：“我看见这种认真的忙迫的情形时，心里总想开口向它们发一句愚不可及的疑问：‘往那里去?!”（《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

这才是要害所在：“往那里去?!”

客观地说，考试本身就是带有一定的引导性的，并且也总是

要遵循一定的规范的，由此造成的某些弊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除非从根本上取消考试。——文革中也真的这么做了，其理由之一就是要根除考试的弊端，结果是造成了更大的危害，这一段历史是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考试之弊时，所不能忽视的，那是一条线，我们的反省不能走向那样的极端。因此，所要讨论与质疑的，不是考试本身，而是考试所要引导的方向，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往那里去”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要追问考题的背后，所暗含的预设的课程标准，培养目标，而这又必然要追问到根本的教育观念上去。人们对目前语文高考的种种不满，包括本文开头所描述的考题给我带来的恐惧与痛苦，说到底，就是因为在这些“教育的原点”上出了问题。我们的反省，不能只停留于不满情绪的宣泄，而应该深入到这些根本问题的冷静的思考与讨论上。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与重大性，这样的讨论必须是民主的，应该让不同的意见充分发表，并展开充分而平等的讨论。

我想在这样的前提下完成交给我的任务——我对高考试卷的评论也算是一家之言吧。

我注意的是考题的两个特点，先看第一部分题目，要求考生判断拼音、写字、词语（包括成语）运用的正确与否，判断句意明确与否，判断文章的排列、表述恰当与否，判断对文章的理解正确、准确与否……等等。这里，可注意之点有二：一是偏向于对考生（教育对象）的判断力、理解力的要求，而要求考生理解、判断的主要是报刊上的文章与科技文章；二是对考生思维能力的要求，主要是思维的正确、明确、准确、恰当与精密，而对正确性、准确性……的理解又是十分机械而刻板的，实际上是按照“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去要求考生。——孤立地看，要求本身似乎并无问题，但如果联系着被排斥、遗忘在外的教育要求，例如想像力、情感力、感悟力、审美力、形象思维的能力，以及

思维 的创造性、批判性（逆向思维）……等等，就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此片面的考试标准，究竟预设着怎样一个语言教育标准与人才培养目标?

这就要说到考题中的作文部分。本来这部分是可以让考生发挥他（她）们的想像力与创造力……的。但我们所看到的题目却是："现今中学生的心理承受力差异较大，有的像鸡蛋壳那样脆弱，有的却很坚韧。那么你是怎样的呢？……写一篇你自己的心理承受力的文章"。很容易就注意到，题目的前提——对现今中学生心理素质的评价是成年人作出的，或者说是社会流行的一种看法，而且也是社会所关注的；却并非考生（教育对象）的自我评价，也未必是他们所关注，感兴趣，真正有话想说、可说的，而且题目本身：《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就已经规定了写作的内容、价值取向。这实际上就是要把考生的思维与写作，纳入到一个早已预设好的，符合社会公共意志与规范的，几乎没有个人意志、想像、创造空间的模式之中，而且是强制性的。一写到这里，我才明白，我面对考卷所产生的压抑感，以至恐惧与痛苦，就是这样产生的。考生是年轻人，当然不会有我这样复杂的，并且是无可奈何的反应，他们有自己的简捷的应付办法，就是瞎编，于是这届考试中就出现了大量的"父母伤亡"的"考验"下"战胜脆弱"的"假话"。我从这孩子们的扭曲的"反抗"中看到了心灵的可怕的扭曲——想想看，随意拿父母的伤亡"做"文章，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

于是，我终于明白，这样的"标准化"的试题，实际上已经规定了所要培养的"人才标准"。这将是怎样的"人才"呢？他们有一种很强的能力，能够正确（无误)、准确（无偏差）地理解"他者"（这"他者"在学校里是老师、校长，在考试中是考官，以后在社会上就是上级、长官）的意图、要求；然后把它化

作自己的意图与要求，如果做不到，也能自觉地压抑自己的不同于“他者”要求的一切想法，然后正确、准确、周密地，甚至是不无机械死板地贯彻执行，所谓一切“照章（规定，社会规范）办事”，作到恰当而有效率，并且能够以明确、准确，逻辑性极强而又简洁的语言文字，作出总结，并及时向“他者”汇报。这样的人才，正是循规蹈矩的标准化、规范化的官员、技术人员与职员。他们能够提供现代国家与公司所要求的效率，其优越性是明显的；但其人格缺陷也同样明显：一无思想，二无个人的创造性，不过是能干的奴隶与机械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是“齿轮与螺丝钉”，而且是国家机器与商业机器的双重“齿轮与螺丝钉”。这里，我们所面对的，正是现代教育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它确实需要培养有能力有效率的专门科学技术人才（包括技术官员）。但同时它又存在着使人工具化、奴隶化的陷阱与危险。今天高考的弊端所暴露的教育危机，并不在于对知识、能力的训练本身，而是我们走向了“科学主义”的极端，一方面知识、能力的训练陷入了繁琐哲学，一方面又忽略、排除了作为教育的根本的对人的心灵、智慧的开发，对人的性情的陶冶，人格与个性的培育，独立、自由精神的养成，甚至有可能走向窒息与控制受教育者的心灵的反面。我们之所以如此尖锐地提出“往那里去?!”的问题，正是出于这样的危机意识。因此，我们有必要提出呼吁：“请解放我们的孩子，连同他们的老师与家长，甚至包括考官们（作为个人，他们十分辛苦，也并无责任），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让我们的教育从科学主义与繁琐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失去了灵魂的教育观念与相应体制中解放出来。

□余 杰

以学生为敌

——致高考语文试卷命题者

我不知道谁是高考语文试卷的命题者，也不知道有关方面是根据怎样的标准来选择命题者的。你们大概都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学者名流吧。或者是某某大学的教授博导，或者是某某研究院的研究员，你们的学识和才华当然比我高得多。但是，我还是斗胆向你们进言：出题时换一种思路吧，别再以学生为敌！

每年高考语文试卷的题目，有大量关于语法的试题。许多语法规则，学术界还没有定论，却堂而皇之地出现在高考语文试题中。连语法专家也争论不休的语法规则，却通过考题来强迫高中学生接受，这是一种学术霸权的体现。1997年高考语文试卷的第3道题，是一道标点题，即使是专门研究标点的行家里手也难以下笔。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专攻语言学的几名博士生对此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意见无法统一。一位中学特级语文教师叹息说："考题出到这样的份上，我们只有举起双手投降了！"连老师都投降了，学生呢？可怜的学生们在考场上把头皮挠破，也回答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可是，出题的专家们可曾考虑到学生们的具体情况？你们只是刚愎自用，想当然地就炮制出令自己洋洋得意也令考生们叫苦连天的考题来。在出题的时候，你们是把学生

当作假想敌来看待的。你们是不会意识到自己在参与一件害人的工作，恰恰相反，你们还为自己的努力而感到自豪，你们似乎在从事着一件造福千秋万代的好事。那么，就活该学生倒霉了——谁叫学生在等级秩序中处于最低的一级呢？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命题者的一个最大的毛病是死不认错。当然啦，你们全是一流的学者，怎么能够认错呢？平时研究的都是些深不可测的问题，出几道给高中生做的高考题，那还不是小菜一碟，手到擒来！怎么会出错呢？

1992年高考语文试卷有一道语句衔接题：“小明爬到床底下，偷偷躲了起来，但后来还是让妈妈给找到了，从床下拉了出来，送到幼儿园里去了。”当年的试卷评价报告承认这道题选句不够典型。然而，没有人公开承认失误——谁出了这道题，难道不是白菜萝卜一样一清二楚吧？更让人不可置信的是，此后每年的《考试说明》都把此题作为典范试题。全国所有参加高考的学生都要认认真真地阅读《考试说明》，阅读这道“典范试题”。错误的知识深深地印到他们的心中。我猜想，撰写《考试说明》的专家中，肯定有此题的命题者。他自己出的题，当然堪称“典范”了。自己的名望、地位是高于一切的，哪里顾得上考虑学生的利益——沉重不过是你们的俘虏而已，想怎么对待就怎么对待。于是，错误被当作真理一年一年地传播着。即使是深味真相的中学语文老师们，也敢怒而不敢言——他们被完全排斥在高考试题之外，他们能够做什么呢？虽然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地工作在中学语文教学第一线，但是命题者们中间是没有他们的身影的，也不考虑他们对命题有什么意见。如此命题的方式和制度，有没有值得改进之处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是至今依然没有看到任何改变。

漏洞百出的高考语文试题，流毒深远。1995年高考语文试卷第13题，是一道文言文阅读题。要求比较“知汝之先君，忠勤之士也”、“母何自勤如是邪”、“以身徇国，继之以死”、“乃是天子报尔先人之徇命也”四句中的“勤”和“徇”字的用法。专家们制定的“标准答案”是：两个“勤”字的意义相同，两个“徇”字的意义也相同。其实，不但两个“勤”字的意义不同，而且两个“徇”字的意义也不同。前一个“勤”字是形容词，勤的对象是国家大事；后一个“勤”字是使动词，勤的对象是家庭琐事。前一个“徇”字是指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但人并未死去；而后一个“徇”字则是献出了生命，人已经死去。稍微有一些古汉语常识的人都会看出差别来，而专家们却偏偏睁着眼睛说瞎话。据说在当年的试卷评价会上，命题者承认这道题“不太严密”，但反映在评价报告上却只字不提。

试卷评价报告上，年年都是“好”字满天飞舞。一位中学语文教师愤怒地指出：“高考题几乎每年都有不少题是错题。有错误本来是难免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命题者承认错误，向考生道歉。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做错了事情要承认，难道我们德高望重的命题者们要用死不认错的方法来维护其尊严吗?”这种恶劣的做法，连起码的做人的道德也不遵守了。你们的学识与你们的人格居然成了反比。考生们被你们玩弄于股掌之上，毫无挣扎的余地，只好认命。1996年高考的作文题要求写艺术评论，有一个省对试卷作了统计分析，有五分之四的学生写偏了题！而评价报告上对此题却给予高度赞赏，仅仅是因为它难倒了五分之四的考生吗？难道让越多的考生答不出来的题就是好题吗？1997年高考语文题，满分150分，不少省市的平均分只有70分。有的15~20分的大题纯属“无效分”，因为几乎没有考生答对！然而，在当年的报告中，依然是“形势一片大好”，报告

纯粹就成了出题者们把酒言欢、歌功颂德的场所。报告写到了这一步，报告的意义还存不存在呢?

题目的稀奇古怪和答案的自相矛盾，揭示出了命题者们这样的一种心态：他们不是想通过命题使中学语文教学再上一个台阶，不是想使学生们对语文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而是把中学教师和学生当作“假想敌”来看待，谁能够难倒考生，就是谁的本事大。在这种心态下出的这类试题，对中学语文教学起了极坏的作用：以它们为指导思想进行的语文教学，是可怕的教学。学生们还能够对这样的语文课感兴趣吗?然而，中学语文教师们又不得不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进行教学，因为高考是“指挥棒”啊!人们衡量一个中学语文教师水平的高低，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教的学生的高考语文成绩的高低。而要让学生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教师就得沉迷到历年的高考语文试题中去，精心研究，反复揣摩。至于题目本身的对错以及学生是否有学习的兴趣，中学语文教师已经没有精力去考虑了。于是“买椟还珠”的故事又上演了。

南京大学中文系程千帆教授在《语文报》上撰文说，如果让自己参加高考，肯定是考不上大学的。特别是做语文试卷，得不了多少分。程老是古典文学研究界的泰山北斗，连程老也这样感叹，想必不是无的放矢吧。著名作家余秋雨在文章中说，自己面对高考作文题，花两三个小时也不能够成篇。而著名作家贾平凹也叹息，如果让他来当语文教师，那么，经过他辅导的学生没有一个能考上大学的!三位先生的话显然不是危言耸听，而都是肺腑之言。

那么，尊敬的高考语文试卷的命题者们，你们有何感想呢?

□ 刘程英　凌永照　贝为任　非　某

大学生的控诉

“反革命的乌鸦”

有许多事情，说起来很可笑，但实质却很可悲。

记得高中时，曾学过鲁迅先生的一篇小说，叫做《药》，小说结尾部分写到夏瑜的母亲上坟时，曾有一个细节描写，说的是坟旁的树上蹲着“一只铁铸般的乌鸦。”在语文课上，讲到这一部分时，我们的老师曾特地停下来问我们乌鸦象征着什么，一时弄得我们全班五十多位同学不知如何做答，最后，还是老师点破迷津，告诉我们，“乌鸦象征着反革命，‘铁铸般的’极言其力量之大。”于是，我们恍然大悟，原来这世上还有“反革命的乌鸦”。

在中国，总有许多事情因为负担了太多自身以外的东西而显得不堪重负，步履维艰，语文教育便是其中的一种。

语文，据王力先生的解释，大致可以理解为“语言文学”，然而，在我们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充斥的国度里，语言却完全背离了其“语言文学”的初衷，而被异化为简单的“用革命的方法分析革命的文章，培养革命的接班人”的意识形态工具。“反革命的乌鸦”只不过是简单的一分为二、非此即彼革命思维的畸形体现，类似的，还有好人永远是机智、勇敢、善良，坏人永远是狡

诈、残忍、虚伪。

语文教育对一个民族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作为大多数人接触语言文学的最初窗口，大而言之，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小而言之，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最初的文学感觉。很难设想，在我们这样一个充斥了无聊的官样文章和粗暴的两分法、两总论，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不惜随意曲解文章的语文课堂上，我们的孩子还能受到多少文学的熏陶，还会留下多少正常的感觉？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在何种程度上还能称得上健康？

许多年前，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文字太难，中国的老百姓学不会，他当时一定不曾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学不会中国的文字，不仅因为其难，还因为有人居心叵测的瞒骗愚。他当然更不会想到自己呕心沥血写下的文字，若干年后竟被肢解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凭空飞出一只“反革命的乌鸦”，这是鲁迅的不幸，亦或也是中国语文教育的不幸，当然更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不幸。

不堪回首的梦魇

某语文课堂上，老师在讲解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

老师问：“同学们，你们知道这开头的‘中华民国十五年’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吗？为什么用‘中华民国十五年’而不用‘一九二六年’呀？”

“……”下面一片静寂，对于这一颇似高深的问题无法作答。

老师环顾四周，对自己的问题很是满意，缓缓地、启发性地说：

“鲁迅先生之所以用‘中华民国十五年’而不用1926年，实则含义深远哪。大家想想，这中华民国本该突出个‘民’字，即

国家的人民性，但这被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国家哪是人民的国家呀。所以说，这‘中华民国十五年’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带有反语的口气……”

下面一群人唰唰唰地埋头作笔记，记下了这段“经典”的话。当时我是肺都气炸了，如果说这样庄重的开头是有些能使整个作品的气氛比较深重还凑和得过去，不过也挺牵强的，真正的解释应是中华民国即以中华民国元年开始纪年的，这是规定！我的老师哟！我可怜的师兄弟们哟！

对此，我早已无话可说，若干年前，我就已尝及什么叫做“予欲无言”了。

所以，用“不堪”与“回首”与“梦魇”二字来形容中学语文一点也不过分！

我虽心有愤懑却仍是不敢去从正面否定它，总是在近乎自虐般地自责，在心中千万遍地怀疑自己：也许是我太不虚心听课了吧？也许是我的笔头太懒了吧？也许是我的耐心与毅力太不够了吧？……可是看着那一串串千奇百怪的事，我又不得不作正常的思考：

一条选择题会很民主很尊重地问你：“下面的答案你认为正确的是……”或“对这句话你是怎么理解的……”偏偏那答案只有唯一的规定的那一个！那还谈什么“我认为”！

归纳课文的中心思想永远是“本文记述了……反映了……揭露了……启发了……”

缺乏悲悯与温柔

我觉得中学语文的课文编写对我们的损害太大了。难得几篇真正写得很美很温馨的文章，给我留下最美最深刻印象的是《故都的秋》和《一碗阳春面》。

尤其是《一碗阳春面》，叙述的是一家人艰难困苦中仍然努力追求一种美好生活的故事，他们对于生活的勇气，以及小饭馆老板的体贴周到，一家人之间相互鼓励努力奋斗的种种温暖，直到现在仍使我感到温暖。如果我们接触的多是这类叙说温馨真情的东西该有多美。而事实上直到我进入大学认真回想才发现，中学语文能给予我们的东西的确太少了。那些文章都那么的枯燥乏味。

阅读资源上的严重匮乏直接导致的是语言能力、写作能力的贫乏，再加上一直以来风行一时的所谓“材料议论文”，到后来我在每次考试写作文时都感到极端的可怕，因为老师告诉我们，只有一个框架。那时还有一个最担心的问题就是“离题”，就是老师给你的这段材料，只能有一个或几个看法，没有对上老师眼里的看法便是“离题”。现在想起来觉得这点尤为可怕，因为我对某一事物持有的看法竟然可能被别人所不允许。

那时不但写作文如此，而且对于课文的理解也往往是被强制持有某种看法的。例如有一篇课文叫《守财奴》，老师就告诉我们作者讽刺了主人公的贪财吝啬，但是现在我想，为什么一个人勤俭甚至到了吝啬的地步就要受这么多的指责，而且我们为什么就不体谅葛朗台 在“吝啬”的背后有着更多的可值同情的辛酸苦楚。同样的例子，是《项链》。老师这么说，我们当然也只能认为女主人公的虚荣是不好的。但后来我们再想想，虚荣心又有谁没有，为什么虚荣心要被我们所鄙夷？而且我们怎么就不想想女主人作为贫家妇女，又有多少为生计奔波、为人世所累的辛酸呢？但那时老师根本没引导我们这么想过，因为那时的考试只需要一个答案，从而使我们不能真正面对作为人的最丰富的东西。这样的教育使我们根本不知道人应当多一些宽容、悲悯、温柔等等。

我们丧失了了解我们自身的任何机会，因此我们在真正须面对这个世界时，也就是我们长大成年以后，我们就一定会不宽容，不悲悯，不温柔。

《人民英雄纪念碑》：压在心上的坟

告别中学生活三年多了。一天和几个师友偶然聊起中学语文教学状况，勾起了我对中学语文教材的回忆，令人遗憾的是，跃入我脑海中的第一篇课文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就相当于《我爱北京天安门》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我们这一代接受过正规中学语文教育的人，谁又能抹去《人民英雄纪念碑》留在心中的烙印呢？我甚至觉得《人民英雄纪念碑》本身就是中学语文教学的一个象征。

然而，《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一篇说明文，中学语文教材中更多的是那种态度鲜明的论说文和情感简单粗糙的抒情叙事文。前一类大多是“我们党的领导同志”，在不同时期的政论和时评，从老毛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刘少奇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到邓小平、江泽民的（篇名我忘了）都有文章或讲话，另外还有吴晗、胡绳、高占祥等各级人物的政论、时评。后一类的则一律是“歌德体”的文章——单是有关周恩来的就有好几篇，如《一件珍贵的衬衫》、《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周总理，你在哪里》。这一类的还有许多著名作家的“经典名作”，如茅盾的《白杨礼赞》、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杨朔的《荔枝蜜》、刘绍棠的《榆钱饭》……这类文章的主题和情感基调都是一致的。我的一个朋友对《一件珍贵的衬衫》一文有个说法：他说，这篇文章所流露出的感情其实和鲁迅先生所讲的一个笑话相同，那就是穷人因得了阔人一句喝骂而感到无上荣光——“这阔佬和我说过话了”，

因而无限珍视这个缘份，四处宣扬阔人的功德和自己的幸运。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文章多是这路货色——刘绍棠的《榆钱饭》一文所抒写的情感就好比是一条一直挨饿的狗，一旦主人给他吃饱了，于是欣喜若狂，忍不住对主人摇头摆尾。

最可怕的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两类构成中学语文教材主体的文章，都是围绕政治在说话，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语言表达的极端化——要么是好，要么是坏；要么是革命，要么是反革命。而维系这种极端化的语言的两极的就是这种话语体系所要弘扬的“斗争精神”。中学语文教材所选的文章，包括应该是文学性很强的小说、散文，都是围绕政治问题，使用极端化的语文在说话，如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叶圣陶的小说《夜》。在这个问题上最典型的是毛泽东的文章。在我的印象中，中学语文教材每一册都选有毛泽东的作品，除了“老三篇”外，还有《改造我们的学习》、《别了，司徒雷登》、《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等多篇，连作为应用文体的消息也选用了毛泽东撰写的《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作为范文我承认毛泽东的政论文是写得很好，但是中学生是否有必要学习这么多政论文？毛泽东毕竟是一个政治家，他的文章都是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为特定的政治目的而写的，他所倡扬的精神是“改造”、“革命”，没有一丝调和的可能。中学语文教材中大多是这种风格的文章。温馨和谐，人与人之间宽容和关爱。

另外，我还想谈谈中学语文教材所选的鲁迅作品。鲁迅是大作家，也是中学语文教材选用作品最多的作家。但是，中学语文教材对鲁迅作品的处理，我很不以为然——《一件小事》给摆到那样高的地位，《阿Q正传》给弄得支离破碎，而且所选的大多是不适合中学生阅读的剑拔弩张的渗着血的文字，再加上教参的“权威”解释，鲁迅给弄得面目全非，成了没有人格意义的文化

符号。——事实上，中学语文教材对鲁迅的解释沿用了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而毛泽东是在三四十年代中日民族战争时期和国共两党军事政治文化斗争时期对鲁迅进行评价的，其评价带有明显的战争文化心理特色，是直接为文化政治斗争服务的，于是鲁迅成了没有一丝杂质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我们的中学语文教材也就全力阐释鲁迅的“革命精神”，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为了忘却的记念》等文章抬到吓人的高度。鲁迅的文章是好文章，但是他的大部分文章并不适合中学生阅读。他的文章都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人事背景，中学生又怎能读懂，何况教材教参还予以曲解和误导！我认为，鲁迅作品适用于中学教材的只是那类为数不多的，洋溢着生活情趣、富于温情的散文，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和〈山海经〉》，以及文学气息浓郁，饱含悲悯和关爱而又不难懂的小说，如《故乡》。现在的中学语文教材对鲁迅作品的处理方式，既是对鲁迅的亵渎，也是对广大童稚心灵的伤害。

我说了这么多，其实只是谈的中学语文教材的选材问题。中学语文教学对教材的依赖性很大，教材对教学几乎起决定作用，而我们的中学语文教材太糟糕——当然，这根源在于现行的中学语文教学指导思想太糟糕。语文，是指语言文字，语言文学。中学语文教学应该以培养学生灵活运用语言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培养学生对真、善、美的人生的热爱为基本任务，而中学语文教材的选材也理应以此为标准。遗憾的是，我们的中学语文教材完全以某一种政治利益为标准，整套语文教材都为富于“斗争”色彩的权利话语所斥，几乎沦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教材了，没有美感，没有温馨，没有和谐，没有生趣，也没有关爱。你说这样的语文教材该会对孩子的心灵造成多么深重的戕害!?

我是从这样的语文教学体制中走过来的，我吸收了这样的语文教材提供的“营养”。我知道由此造成的身心的病苦该有多深。这几年，我努力吸取清新的空气，以求疗救，但十分艰难，因为一种话语体系不仅能影响一个人的生命体悟能力，而且能塑造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事实上，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象征的中学语文教材所建构的话语体系成了压在我心上的一座坟垒，这辈子再也搬不掉。

□ 曾楚风

语文课，为何总让孩子们黯然神伤

庆　学

很难找到合适的话，来形容我们与母语的联系。一句也许就够了，千言万语也许还不够。

今夜，我读到了这一首诗，非常感动。作者是蒙古诗人达·纳察格道尔济。他生于1906年，成名后深受祖国人民的热爱。终于，斯大林下令把他打入监狱，把他的妻子女儿送到苏联。出狱后，他精神失常，1937年7月的一个夜晚，他孤独地死在乌兰巴托的街头。他的长诗《我的祖国》在蒙古传颂。其中最后一段，在一切诗集中都被删除。但每个蒙古人都能记诵：

“蒙古”这个名字久为众人所仰望。
“为了蒙古”是将我们紧紧相连的思想。
从小学会母语是文化命脉绝不可以忘记，
最后要安息于此的生身故土绝不离弃，
这就是生我育我的国土啊，美哉蒙古！

在这一刻，母语所激起的感情波涛，生生不息，冲撞在心间。

每一个中国孩子的青少年时代，都要用大部分时间学习自己的母语——汉语。难以置信的是，这种学习，在今天会成为一件令人厌倦的事情。

我国教育界1997年内完成的一项调查得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果：目前40%的中小学生对于学习的态度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冷漠。在回答“你平时早上上学的心情是”：小学生中“谈不上愉快不愉快”占28%；“不太愉快”占7%；“很不愉快”的占5.1%。

这种回答很让关心儿童的人揪心，也大为困惑。而这种恶劣的情绪，随着年级的升高，变得更加严重。回答“谈不上愉快不愉快”的初三学生更是达到60%；“不愉快”的占12%。

也就是说，上学的路上，不少孩子心情黯淡，步履沉重。

导致学生厌学的“罪魁祸首”之一，是语文课。

批评语文

对中小学语文的批评，20年来从未间断。

1978年3月16日，吕淑湘先生在《人民日报》著文批评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学“少、慢、差、费”；“10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又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

1987年，国家教委委托华东师大组织实施“全国初中三年级语文教学抽样调查”，抽取样本学校572所（分布在15个省、市、自治区），教师2893人，学生49260人，通过水平考试、问卷调查、典型调查、专题调查、开座谈会等方式获得大量数据。通过分析，认为初中三年级学生语文学习存在下列主要问题：

1. 学生阅读和写作的总体成绩均未达到及格线；2. 字的书写应用能力大大低于识别能力；3. 理解能力、灵活运用、综合

运用能力大大弱于记忆能力；4. 写作成绩不理想，最突出的是审题能力较差，内容不充实。

1991年，江苏省某市教研室对小学毕业班语文状况作了一次小范围抽样调查，结果也不能令人满意。该调查发现学生写字姿式大都不正确，最差的班正确率只有5%，好的也只有30%，书写工整率仅达17%，作文病句平均每人4.16个，2500个常用字的回生率高达29.10%。

1995年有人对农村小学作文教学作调查，从小学生习作抽样中发现：同一作文题目，65%学生的习作题材相同，21%的习作内容与已出版的优秀作文基本无异。

1997年，对中小学语文的抨击更加激烈，又一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是年第11期《北京文学》在“世纪观察”栏目中发表了三篇署名文章，认为现行的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学生的桎梏、语文的扭曲、文学的悲哀”，“歪点子一意孤行”，“不止害一个人，而是害了一代人”！随后杂志社又召开“忧思中国语文教育”的研讨会，到会的20多位北京市的中小学语文教师、区语文调研员、师范大学教授、教材审查委员无一例外认为目前中小学语文教学已走进死胡同：“事实上，语文在中小学里所占课时最多，教学双方压力最大，问题最多，但效果最差。”他们普遍担心，“语文教育的误区最终有可能使学生所受的其它学科的教育变得苍白，甚至误入歧途。”

以上有的调查样本较小，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近年来在中小学语文教育领域内的改革也有成效，但这不影响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中小学语文教育问题严重。语文学家在批评它，作家们在批评它，老百姓在批评它，学生们在反抗它，就是国家教育机关领导也不满意。所谓“上下共讨之，全民共讨之”。而其中语文教师的批评尤为激烈。著名的特级教师、有“北魏南钱”之称的钱

梦龙老师就批评现在的语文教学是“束缚人、折磨人、摧残人。”

语文教材：八套半

对现行中小学语文教育批评的重中之重是对教材的批评。长期以来，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材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统天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十分重视学校课程教材的建设。建国初，毛主席指示教育部，要调集一批教育专家，集中力量制定学校的课程计划和课程标准，并编写各门课程的教材。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了“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和“历史教学问题委员会”，组建了以著名教育家叶圣陶为社长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承担编写中小学教材的任务。人教社先后编写了六套中小学教材，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套，分别于1956年、1963年和1980年颁布使用。这些教材在我国教育史上，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近20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这一套统编教材的问题显得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尤其是1986年颁布、实施《义务教育法》之后，基础教育的迅猛发展和现行学校课程教材产生了尖锐矛盾。针对课程教材中存在的问题，我国决定对中小学课程教材进行改革。

一方面人教社对现行教材进行了不断的改造，另一方面，根据国家教委的意见，提倡有实力的地区根据本地区特点自编教材。到目前为止，国内号称有“八套半”9年义务教材。但实际情况是，现在的八套半教材根本无法“各尽所能”。其中的一套（人教社编）占了90%以上的市场分额。“教材自选”一说绝对名不副实。1988年，当时的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就说：“让9亿人读一种书，这种局面危险不危险?”现在看来，这种危险局面依然如故。分析其中的原因，方方面面很复杂，只能另作专文论述了。

现行的人教社的教材底子是1980年编的那一套，年年虽有变化，但变化不大。即使是在教材改革试点的浙江，新教材在教学内容上的更改，总体上也只在10%～20%。

这一套语文教材，目前已成为众矢之的，千夫所指，种种批评之中，最使本刊注目的是部分人士认为教材编写的“不民主”。实际上，这一套影响至大的教材在具体编写中是由极少数人来决定的。那么这些人个人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常常严重影响了教材的质量。目的不明，内容陈旧，方法落后。

根据大纲编写的一套教材由课本、教学参考书和作业本等组成。通过这一系列文本的具体执行来实现教育的目的。一些专家对小学语文教材进行分析后，指出其中问题，集中在三个主要方面：

一、目的不明。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目标是什么？长期以来，分歧明显，争论激烈，这话说出来很像个笑话。12年语文，几千个课时，无数孩子童年、少年时代的美好时光，都砸了进去，还不知道为什么？这种不明确在语文教材上表现得很明显。说白一点，就是做了不该做的事，该做的事没做好。

什么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例如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规定要通过语文教学对小学生“进行初步的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如何进行呢？

人教社五年制第一册看图拼音识字“上中下”几个字，结合小学生生活经验是很好掌握的。可是课文的设计极其复杂，先是一段纯拼音：“小亮在上面，大明在下面，我在中间。我下去了，大明上来了，小亮在哪里？”一位专家听这节课，从哈尔滨听到海南岛，从上海听到兰州，几乎所有的老师都用30～35分钟让小学生表演这个节目，上的上，下的下，不亦乐乎，而写字的时间只有几分钟。这节课的目的是什么？无非是让儿童知道上、

中、下是什么意思，会写。但这一番表演，目的是什么呢？据参考书要求，是要一年级的小学生“了解事物是在发展变化的”，以便受到“辩证唯物主义的启蒙教育”。其荒唐、拙劣，一眼可见。

教科书的编写者为了突出“辩证联系”这一观念，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折磨孩子。这一类情形随处可见。再举一例。人教社六年制语文第十册中有托尔斯泰写的《跳水》一篇课文。说的是一条海船上，一个孩子跟一只猴子玩耍、追逐。猴子爬到桅杆上去，孩子也不甘示弱，爬上桅杆去追猴子。猴子灵巧，爬到桅杆上，把孩子的帽子放到了最高的横木一头，孩子气极了，丢开桅杆，走上横木。突然间，情况变得危在旦夕。只要孩子一失足，就会跌到甲板上，粉身碎骨。这时所有的水手都惊呆了。这时船长——也就是孩子的父亲出来了，手上拿着一枝枪，他本来是要打海鸥的，看见孩子，立即把枪瞄准儿子，喊着：“赶快跳到水里，不然我就开枪了！”小孩跳到水里，水手们把他救了上来。这篇文章写的是父亲对儿子的至爱，那种情急之智，很感人。教参上要求学生理解“事物之间的联系”。《读写例话》中说：从这篇课文可以看到，第一，理解文章的内容要注意事物之间的联系，知道哪些事物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第二，记叙事情的文章，事情在发展，事物之间的联系也在变化，要注意是怎样变化的。——猴子是怎么和小孩发生联系的？于是按照要求，老师不断地引导学生去理解猴子和人之间有什么联系，学生怎么也理解不了，老师就不停地挖掘字句，就这样生拉硬扯，彼此痛苦不堪。一篇好端端的课文，硬是被整得体无完肤，支离破碎。到头来，谁都不明白，学这篇文章是为了什么？这种做法，怎么叫人不厌倦？一位专家说，此情此景，让他看一看就恼火，想一想就生出无限悲哀。这样消磨孩子的美好时光，该谁负责？

该做的事没做好，比如作文。作文是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作文训练分量不少，但品种单一，就是记叙文，内容要求也很严格：写实。以人教社六年制小学语文课本第十二册为例。“基础练习 1”，“写件你听到或看到的表现社会主义新风尚的事”。主题很明确，无法发挥。但小孩子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新风尚”？恐怕成人也难界定哪件事既是“新风尚”，而且又是姓“社”而不姓“资”。情急之下，只有“抄”和“编”两条路可走。“基础训练 2”，写一篇读书笔记：体会文章（《养花》）的思想感情，抓两三点来写。学生不得不又钻入教学大纲的绳索之中，束手就擒。“基础训练 3”，写件你周围发生的事。这件事显然得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而且一定是意义重大。小孩子当然只有去捡钱包、扶盲人过街、为希望工程捐钱了，也不管他真的扶了没有，真的捐了没有。前些年，一位专家在武汉看了一个班的统考作文，50 篇文章令人惊异地一致：扫厕所。洞堵住了，经过一点思想斗争，“我”用手掏了出来。结尾是：我的手虽然脏了，但心里很高兴。如此训练有素地说瞎话，触目惊心。其它如“一个晚上”，“我和××”，“给长辈的一封信”等等一类，多是实题，很容易引诱孩子们去说瞎话，编假故事。现代生活有更广阔的内容，要孩子去反映，作文要走出编写表扬稿的狭窄小巷。这样的作文教孩子说假话，难说有何思想教育意义，更难说能培养健全的人格。

二、内容陈旧。例如有关国外的内容，多半是描写“压迫’、“黑暗”与“贫穷”的，相关教材中一段预习揭示就是，“我们的童年多幸福……”硬是要说明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眼光多么奇怪！这种观念多么遥远。使人几乎难以置信这是 90 年代晚期的课本。六年制小学语文第 11 册中，有三篇外国题材，《月光曲》，写贝多芬为贫穷的盲女演奏；

《小音乐家扬科》，扬科因为热爱音乐而被地主老财毒打致死；《卖火柴的小女孩》更是凄怨得让读者心颤；第12册共有六篇外国作品，除《冬眠》是写动物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描绘了纤夫们充满“诅咒和抗议”的神色，表现的是旧俄国人民“贫穷而痛苦”的生活；《穷人》描写在一个恶劣的天气里，一个贫贱的寡妇死去，留下两个孤儿；《凡卡》是写小凡卡在悲惨生活中想甜蜜的生活；《高尔基的童年》写的是阿辽沙喜欢读书，却困难重重；《小抄写员》是写善良懂事的小孩叙里奥为贫穷的父亲分担忧愁。不是说这些文章不好，而是太单一，与现代相隔太久！不是说不能用这种批判与揭露的文章，只是如果只有这样的文章，就是片面的了。我们要让孩子们通过这些文章面向世界认识世界吗？真实的世界越来越远了。

黄侯兴先生在《批评与质疑》中对中学语文课本提出问题，指出有不少选人的文本与现行政策完全相违背。如秦牧的《土地》，写于1960年，歌颂“我们生活在一个开辟人类新历史的光辉时代”。而事实正相反，作者所讴歌的一切，正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灾难。这样的文章，为什么不能割舍呢？另一篇吴伯箫的《猎户》，写于1962年，主人公是打豹英雄董昆。他打死的金钱豹，今天可是国家保护动物，禁止捕杀的，这件事显然与现行法律不符。60年代写的文章，无可厚非，为什么到了90年代还要选读，作为范文，向中学生宣传这种英雄行为呢？

三、方法落后。指的是教学方法落后，基本上可以形容为一根粉笔教到底，一堂课灌到底，缺乏生动活泼的综合性主题活动。学生学语文是为了分数，得不到享受，没有乐趣。

改革将如何进行

我国的中小学教育有大问题，这是没有争议的，目前有很多

人在研究，有哪些问题，主要问题是什么？我国的中小学教育在下世纪初一定会有大变化，这是没有争议的，目前也有大量人在研究，该朝哪一个方向变？怎么变？

议论纷纷，但有一点是大家的共识，即课程改革是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要重新讨论制定课程标准。目前国家教委正在组织队伍进行大规模调查，深入研究，科学地评价，以期为变革提供一个可靠的依据。二、要重新编选教材。在教材编选问题上，强调的是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百花齐放，真正地做到“一纲多本”，甚至“多纲多本”，同时，又要严格审查，以求更加公正、有效。三、教学形式要改革。四、评价学生的标准或方法要改革。

1998年开始执行一项新政策，国家教委下放权力，要求各省教委自行修订（但要由国家教委审查、备案）中小学课程学习标准，这个新标准将由各地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取消一些不合理要求，降低过高的要求。（近日记者获悉，国家教委已作出决定，从1998年9月1日开始将大幅压减中小学主要课程的内容，以减轻孩子们的课业负担。这次调整的主要内容是：大幅压减小学的语文、数学两门课程和初中的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和化学五门课的教学内容，并降低考核要求。）

新的语文学习标准探讨

新的语文学习标准正在酝酿之中。众多专家提出各种方案，标新立异的地方颇多。此处摘录一项方案提出的小学“听说标准”和“写作标准”的一部分（几项标准分别是识字标准、写字标准、听说标准、阅读标准、写作标准）。这个标准的目的是：既让小学生掌握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语文知识与技能，又要通过语文学习培养健全人格，使其具有良好的现代人素质，大家可以体

会一下，是否有新理念。

听说标准：

高年级（五、六年级）

1. 听话能抓住要点，对重要的内容适当作笔记。

2. 欣赏别人优美有效的口头表达。

3. 了解谈话人的基本观点和说明观点的方法，对谈话人的偏向有初步的觉察力。

4. 对电视、广播等传媒信息主动作出选择。并学习辨别正误、好坏、真假。

5. 能运用事实说明自己的观点，有为自己所说内容观点负责的责任感。

6. 领导或参与小组讨论，注意围绕主题展开讨论，让不同意见都能陈述，最后作出简单的归纳。

7. 以坦诚的态度对待交流，提高说话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学习一点幽默，体会交流带来的收获和愉悦。

8. 就熟悉的主题开展辩论，学习摆事实、讲道理，正确对待不同意见，既不屈从也不固执。阐述不同观点时能注意保持友好气氛。

9. 敢于和陌生人交谈以获取信息、取得支持或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有关的面试中有自信心和一定的应对能力。

10 欣赏优秀戏剧、典范的演讲，学习有准备的当众演讲、讲故事和即席发言。

写作标准：

高年级（五、六年级）

1. 留心观察周围的人和事，对人物的特点，对事件的过程、因果、影响、意义等作出思考，并在作文中记述观察和思考所得。

2. 继续学写记叙文。努力把事件记叙清楚，把观点表述明白。

3. 分清虚构与写实。知道虚构作品（小说、戏剧、童话、寓言等）与写实作品（调查、记录、报道、传记等）的不同要求。尝试大胆想象虚构故事。尝试写调查报告、报道等写实作品，努力核清事实与数字。有为自己所写文字负责的责任感。

4. 就电影、电视、戏剧、广播节目或报刊文章写出自己的感想和评价性意见。

5. 学写简短的说明文。学写简单的议论文。就熟悉的主题探讨有争议的问题，做到有观点有论据。

6. 学习写询问、致谢、委托、协议等实用文。

7. 小组合作编辑班级、学校小报。

8. 学习评价修改自己与他人的文章。

记者的话：大讨论，大参与。让我们一起来讨论中小学语文教育的问题。提出意见，为解决问题贡献力量。帮助我们的下一代，拥有美好的学习时代。这是社会各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次采访得到华中师范大学雷实老师的大力支持，他目前正在参与国家教委有关中小学课程改革方案的设计工作。他希望自己能真正代表大家。因此提出以下观点：

越来越多的人关心中小学语文，讨论中小学语文，但在关心和讨论之外，更应该“重在参与”。传统的中国语文教材在中华文明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而那时许多优秀的语文教材都出自大学问家。因此特别希望当今中国有大专家、大学问家来过问此事，甚至亲手来做一做这件事。“俯首甘为孺子牛”，正是大家风度。

□ 张智乾

无法释怀的记忆

从一次高考阅卷谈起

1998年7月底，作为一名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我有幸参加了北京市语文高考阅卷。我很兴奋，在我眼里，高考阅卷是一件神圣的任务：想想，在这一次考试里，有多少考生的命运将被放在命运天平里，在这人生的奋力一搏中，暗中划定他们前方的道路。我知道，在最后的裁判时，一定有人会失败，从而失去可贵的大学教育的机会——这是暂时无法改变的，虽然我知道，在上帝面前我们的灵魂是平等的，可在高考这独木桥上，我们的肉身却无法平等，大多数人只能被挤落进落榜的苦水里，黯黯地品尝失败的滋味——然而，虽然结果不能平等，我想，我们还是能尽我们之力，做到竞争过程的平等，挑出最优秀的种子，让优秀者不辜负自己的智力与努力……

是的，我将尽力！我严肃地想，踏入阅卷的教室。

我改的是语文卷，于是，我想，考试的目的应该是，挑选出文字功力深，文学敏感性好，语文基础知识丰富的学生。我想，中学语文教育的目的，也在于此，那就是让学生更好地用文字表达自己，懂得欣赏祖国语言的美丽，鉴赏文学的妙处所在，并学会独立作文。我得小心了，我想，说不定在我笔下，就会有几个

未来的钱钟书经过呢！

在以后的7天里，我与北京市一些中学的教师一起，完成了辛苦的批卷任务。在那个炎热的夏季，蝉在教室外拼命地叫着，汗从额头上掉下来，落在考卷上，化为湿湿的一片，坐得太久了，许多人都在叫背痛，可是为了赶进度，还得坚持……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我的心情从激动，到惊讶，到迷惑，最后陷入了一种深深的焦虑，为了我原来想象不到的整个批卷工作的马虎，为了那些一不小心成为马虎的批卷工作牺牲品的无辜的学生，更为了长期以来就埋在我心里，这次因批卷而益发证实的中学语文教育中存在的种种弊端。那天，改完最后一张考卷，在夕阳下走回宿舍，看着面前蜿蜒的路，我的心情万般沉重。

阅卷组组长似乎明白我的心事，笑笑地拍着我的肩头："每年都这样，这是没办法的！行了，小伙子，别庸人自扰了，你改变不了这一切。"

真的这样吗？

我心里掠过一丝黯然。后来我想，诚然，我改变不了这一切，可我应该将它写出来：这7天里我所看到和听到的，以前我自身经历的中学语文教育，以及对此我不乏偏激然而真诚的思考……虽然也许它的效果如一箭之入海，但这是我的责任，我应该这样做！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夕阳下，我走着，感到焦虑，然而已有了一丝轻松。

"人生观这么灰暗，怎么行！"

我们整个批卷组改的都是主观题，标准题为机器改。在改主观题的过程中，老师们的意见很说明一些问题。

在1998年的高考卷中，增加一道很灵活的试题，要求考生

用时间为主语，造出两个比喻句。这需要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是一道比较能看出学生语文内在素养的考题。

在我们组里，时常有老师对学生答题的评价。

“你看这题写的多棒：时间如航船，载我们去胜利的地方！这学生的人生观多积极呀。年轻人就是应该去夺取胜利嘛。”一位老师道。

“是呀是呀。多么积极的人生观。”大家附和。该学生得了个满分。

“时间如金钱，给我们创造物质财富。是呀，这学生是明白应该珍惜时间的。”又一个幸运儿，他也得了个满分。

“是呀是呀。”大家很真诚地附和。

我改我的题。忽然，我的斜对面发出一声惊呼：“啊呀！”我以为怎么回事，抬头看时，她念了起来：

“你看这学生写得：‘时间好比我们手中的沙子，从我们手里漏去，从此不再归回；时间就像一列列车，载着我们，经过无数的人生小站，最后抵达死亡！’瞧瞧这学生，人生观怎么这么灰暗呢！”

“是呀，现在学生，思想不如我们那一代人积极向上了。”一个年长的老师叹道，“死呀死呀，干吗要谈死。一点都不乐观。”

那老师作势欲挥笔，我看这个学生要遭厄运了，忍不住说：“可这学生文笔不错，想象力也不赖呀。”

“人生观这么灰暗，怎么行！”她惊讶而真诚地瞪了我一眼，“思想多不好呀。不行不行！”她的笔落在考卷上，我延项一看，那个“人生观灰暗者”得到了他似乎相配的分数：一个鸭蛋。

作文题，其判卷方法更是如此。

人生观的乐观与否和学生语文水平高低是直接挂钩的么？我

心里涌上一层困惑。何况上面提的那个考生对人生的思考也并非太过离谱。人终归是要死的，他不过将这事实道破而已。而对死亡进行思考，本是应该的。老托尔斯泰说，一个真正的思想家，无论他想什么，都不可能回避死亡这个命题。苏格拉底蔑视那些从来不曾思考过死亡的人，说他们“白活了”。就是鲁迅，在《过客》中，也借老人的口说道，人生的最前方无外是坟——也就是死亡。这个可怜的早熟而坦白的考生因为他的思考失去了弥足珍贵的4分。

后来我想，让托尔斯泰、鲁迅等大作家参加高考，说不定也会因他们的文章“人生观灰暗”而落榜吧？

我又想，其实老师们所谓的“人生观”，也就是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一部分吧？长期以来，在中学语文教育里长期存在的一种思想，那就是以政治思想先进与否作为评判作品优劣最大的标尺。一个文章写得好，但立意与集体主义、与当前政治理念不尽相符，那就不是优秀的作品了。相反，有些文章文笔粗糙，但签上某某领导人的大名，那么照样可以将之捧到天上去：放某些作品的“卫星”，在中学语文中并不罕见。

这样，我们整个的语文教学陷入一种误区：本意在于提高学生语文素质的语文教育，却添进了太多异样的任务，显得不堪重负：它又像政治课，又像革命史，又像历史人物掌故课……而本来最重要的培养语文素养的任务，却反而被挤到一个相对不起眼的角落。

这就像要求一个计算机专家一会儿干农活一会儿炼铁却不让他写作一样不合情理。

于是我回想起我所受的中学语文教育。

记得当时上课时，老师教的最多的是归纳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这篇课文讲的是一个……（通常是革命者或向反革命斗争）

的故事，表达了作者……（通常是某种慷慨激昂的革命豪情）的思想感情，歌颂了……（常为某些新人新事或革命家）或批判了……（常常为旧社会）"；这是最常用的格式。后来我又知道，这是某个统一的教案给的归纳。至于所讲的作品为什么好，好在哪里，表现人物形神毕现，为什么有这种效果，则很少讲。偶有提及，也基本上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一个中学下来，我知道了许多有崇高思想的人，也知道了一些坏蛋，比如"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还知道了人应该有积极的思想，应该有共产主义信念，虽然我在政治课本里已经背过许多了。

我还记得当年我的作文分数不高。我挺委曲，可老师告诉我，我的作文文笔不错，然而立意不高，"太多个人的情感，没有时事问题，没有突出坚持社会主义理想。记住，应该有中心思想，要么赞扬社会新风尚，要么批评腐朽的人生观。最好把党的号召写进作文。"经过此番提示，我诚惶诚恐地依此而行，果然作文成绩大长。可我明明觉得，我写的作文越来越干巴巴，越来越没有真性情，也越来越虚伪。可没关系，我的作文"立意"高，因此分数自然也不低。

后来，我读到鲁迅先生《野草》中的《立论》这篇文章，真是觉得感触良多：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作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说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你瞧！多么……阿！哈哈 Hehe！he，hehehe！”

与鲁迅文中不同的是，鲁迅的 HEHEHEHE”能搪塞过关，但中学作文却没那么好混。你得“旗帜鲜明”地坚持某种政治理念与人生态度，反对课文里所反对的，否则，你的语文成绩别想上去。

你的语文成绩要高分么？好，首先放弃独立思考吧，将观点向我们的课本靠拢，发出和课本同种声调的声音。那个可怜的“人生观灰暗者”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于是，他白白地丢了宝贵的 4 分。

问题在于，用政治来强奸语文教学，操这几根干巴巴的政治教条，来扭扯如此丰富多彩的祖国以及世界文学作品，对中学生的语文素养的危害何其大也！我们知道，一个人在青春期读的书对他的一生的影响极其大，这时的语言素养，将赋予一个人对文学乃至对于这个世界的体会，这种体会将像空气一样包裹着这个人，就仿佛带上一副眼镜，它永远都会隔在一个人和他所看到的一切之间。这时，语文教学担负着一种挑选好文章以供他们阅读，并提供阅读的批评标准的任务。选择哪一类作品来酝酿学生的基本文学语言体验，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学生终身对中国古典和外国文学的感应状况。一般说来，作为一个功课繁重的普通中学生，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自己在汪洋大海中选择好

的作品阅读，这时，语文教育便担负起引路人和配镜师的作用。所谓引路人，就是引导学生找寻最好的作品，将最优秀的作品介绍给学生；所谓配镜师，就是为学生鉴赏作品提供一个方法，将这些作品的诗意和魅力，尽可能动人地揭示出来。一个好的引路人和配镜师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他们对激发学生的艺术潜能，帮助他们形成敏锐而开阔的审美能力有极大的作用。只要你看看一些大作家的传记，你就会知道，几乎每个大作家背后，都有一个好的启蒙老师为他的文学事业引路，而他们也因此终身感激他们的老师。

而在我国，中学老师就承担这个启蒙者的角色，责任更是无比重大的，要知道，这些学生长大成人后，更将进一步影响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文素养和民族精神。

可我们今天的引路，常引向粗糙的政治文本的歧途；我们的配镜，常常配的是以无知偏狭的文学理论教条为镜架，歪曲作品价值的解释为镜片的哈哈镜。我们的课本甚至将一些比《艳阳天》还糟糕的作品，供奉在最醒目的位置，而将沈从文、钱钟书等公认的大家像破抹布一样塞在角落里，甚至提都不提。就是对鲁迅，也是用政治理念进行图解，不是将其《一件小事》抬到吓人的高度，就是将《阿Q正传》、《药》用政治教条解读得面目全非。而这种阅读，对一个学生的负面影响有时是终身难以抹去的。现在有些年轻的评论家，常将一段极其平庸的描写引在文章里，盛赞其“诗性的光辉”，我想，除了他自己个人的素质外，中学时阅读形成的标准也是使其走入误区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这样说来，中学语文教育是不是有些误人子弟？

我在这里不想苛责，而且我要说一声：不要怪老师，语文老师是无辜也是无奈的。他们真心希望学生好，可他们受到大纲、教案、考试的层层束缚，他们无能为力。在改考卷中，我结识了

一批老师，他们是多么真诚、善良、富有教师责任感的一些可敬的人呀！

可是，不苛责不等于保留原样原地踏步，我们整个教学方式应该改变了。首先，语文教育，让太多的政治理念、人生观教育走开。把那些思想教育交给政治课吧，让语文教育回归自身。

新八股教育

在作文卷中，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思维的雷同和创造力的萎缩。

1998年的高考作文题，题目是：拒绝脆弱或我选择的性格，议论文、记叙文皆可。这是一个比较可以发挥想象力的题目，写作的余地相对来说还是挺大的。可是即使这样，学生的作文还是大同小异，很少突出之作，简直可以说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以《拒绝脆弱》写作记叙文的，他们家的父母大都离婚，要不便是一方死去。开头我还颇感动，可后来我惊讶了：这社会怎么回事，离婚率这么高。后来，我读很多了，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所写的离婚大都是编造的，只是为应付作文而虚构。他们一定想，只有出现家庭的重大悲剧，才能显出自己的坚强吧？

这样，在他们的文章里出现了一种矫揉造作的悲伤，他们的悲伤因为没有出自体验而显得格外虚伪。而结尾常常是这样：在他们悲伤的时候，一个外在的力量出现了（常常是老师或年长者），对他们语重心长地教导了一番，他们恍然大悟，于是，情绪发生了快速的转变，拒绝了脆弱，选择了坚强。

这就是他们的套子，先抑后扬。情况发生了，主人公的心情动摇，然后出现了一件事，深深地打动了主人公，灵魂深处闹革命，于是走向积极，走向光明。

这不就是所谓的杨朔的散文风格吗？

相对可以抒发性情的记叙文尚且如此，议论文就更是千篇一律了。开头必然破题，将拒绝脆弱的大旗摆出来，然后举一正一反两个老掉牙的例子说明问题然后总论全文，说明拒绝脆弱对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有莫大好处，你看，人人都坚强了，我们国家不就可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么？看多了这些文章，简直就搞不清每篇之间论述有什么不同了。反正每篇都差不多一个套路，看开头就知道结尾。

与他们内容雷同搭配的，是他们语言的味道的类似：一样地空洞矫情，一样地大口号，一样外强中干……用一句难听的话来概括他们作文的特点，那就是：言语乏味，面目可憎。而这些特点的来源，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思维的简单雷同。

面对放在面前一篇篇雷同的、毫无个性的文章，简直是天皇皇地皇皇，让人觉得这世界毫无生气，生活黯然无光，只想放声大恸。

然而，说句实话，如果作文想拿个好点的分数，你还得这样写。据我观察，大多阅卷老师不欢迎特立独行的文章。文章一旦写得有个性，有特点，首先增加了阅卷的难度；其次，有个性的文章总是似乎令人难以接受。

我不禁想起了每年北大开学新生代表发言：一律怯生生地走上来，细声细气地念稿子，可稿子内容却充满了很做作的豪迈之情，满篇的大词，而且年年如此，他们稿子的内容几乎大同小异。后来我知道，这种发言稿是用中学学来的套路写就的。

也就是所谓的作文速成法。

想当年鲁迅就很反对教人什么劳什子“作文之法”，他说，对这个，他向来是最不信任的。文章乃是努力练出来，再加上多读好的范文，才有可能写出好文章。而那些所谓的“作文之法”却是唬人！

然而，现在的中学语文教育却不乏这种“为文之法”。

回想起老师教给我们的方法，确是简单而实用。记叙文的先抑后扬，主题先行：先有中心思想，依照这个中心思想造个故事，当然要乐观向上，然后结尾要感叹一番；议论文要开篇点题，要夹叙夹议，要起承转合，要联系时事，最后表达自己的意见，最好倡议一下，呼唤一下某种“新”思想……等等。老师向我们保证，按他的方法做，保证得不了低分！

猪呀羊呀都到哪儿去呀，都到老师“为文之法”的套套里！

进套套好呀！题目一来，兵来将挡，水来土湮，只要我把套子一摆，万千雄文还不是就汩汩而出？这就好像计算机的模板，或者复印机，一式几份，任君指定！的确是一劳永逸之法呀！

可是依照这个套套写出的作文，大都是无活力、无生气、无观点的文字垃圾。其实，历来好文字都是打破既定的框框写的。苏东坡曾把写作喻为“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完全出于自然。黄遵宪写诗的原则是“我手写我口”，心里想的，与笔下尽量合为一体。如果将作文当作一次拷贝，那么这种文章将因缺乏独立思考而丧失灵魂，因语言的僵化而得到丑陋，最后什么都不是，而仅仅是一堆写在纸上的无意义的墨迹。

可这种无意义的墨迹不正是中学语文教育所培养、所需要的吗？

举个例子吧。上面提到的造比喻句中，少数想象奇特一点点的比喻，比如将时间比成花朵，比成摊在床上的破旧的床单，而又能自圆其说的造句，一个个被老师们否决，他们的理由是：“太古怪了，怎么想的！”

其实这些“太古怪”的例子，只不过不愿入套，希望句子里留有自己的痕迹而已。然而，在长期要求个性消融在集体性里的中国，这种露出自己的个性的行为本是一种错，即使在语文教育

中。

最好的比喻句应该是千篇一律的：

“时间如流水……”

“时间如金钱……”

这两个句子在所有的考卷中占了极大的分量，起码30%。因此，它是最好的。后来，一看到流水、金钱，老师就给满分。

他们认为，好的作文应该是有套路的，那些固定套路的文章，得分反比一些有真性情的文章高。

然而这些所谓的好的句子、好的作文，虽然在这种语文教育体系里理所当然地拿到了高分，但在我眼里，他们仍然是极其平庸、极其缺乏个性的文字。写出这种文字的人，没有别的，一个文字垃圾的制造者罢了。

倘若仅仅为了应试这样唬弄一番也就罢了。可是，在整个中学语文教育都将这种套套奉为神明，那就可怕了。这将磨灭人的性灵以及创造性，最终影响整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和文学创造力乃至各方面的独立创造精神，将民族中最有活力、最朝气蓬勃的一群驱入庸常、因循、简单模仿、人云亦云的泥潭！要知道，语言是我们感知世界的最直接的方式，语言僵化了，我们感知、我们的创造力也就无可挽回地萎缩了。

而且，长期让中学生写自己都不相信的文章，表达冒充为自己的观点的观点，督促别人信仰自己本来就似信非信的信仰，这不但让学生将写作当成一件苦事，而且不可避免地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学生虚伪的性格。

一百年前，科举制度因其虚伪、束缚创造性等弊端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被抛弃，并遭到后人理直气壮的嘲笑。而今天，我们这种语文教育，这种过分鼓励钻套子，鼓励模仿而摈弃独创性的教学制度，跟我们长期嘲笑、不断反思的明清八股取士

制度岂不是形异神似，异途同归了吗？

这样，中学语文教育岂不是沦为新的八股文教学？

学生写出的东西岂不是化妆了的八股文？

我们总在批评过去，却不批评、改进现在，这岂非将批评的机会留给后人么？

倘真如此，那将是多么地悲哀呀！

中学语文教育，你离当代文学研究有多远？

只要看看中学语文教材与颁发的统一教案，你就会明白，中学语文教育与当代学术研究的距离。

我们的学术研究与中学语文教学脱钩得太远了。他们本应是一对经常往来的亲家，可事实上，他们的情况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中学语文所选的作品，大都还是多年以来的老套路，一以贯之，变化极少。那些在学术界已成公论、定论的命题，在中学语文教育中几乎一点都没有反映出来。比如，中学语文教材里涉及现代文学领域的，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教材沿用的文学史观和对作家的评价，基本上还是沿用王瑶先生 30 年前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的观点。它有两个特点：一是相信文学历史的不断进化，二是强调社会政治因素对文学的决定性影响。王瑶先生是个大师，他对现代文学研究有开天辟地的功劳，他的研究方式也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他的文学史是任何研究现代文学的人所不能漠视的。可是，这种范式产生于 50 年代初，受那个时代的限制，它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比如相对偏左，比如过于用马列主义解释文学现象，以革命和反革命、先进和落后等二元对立的范畴来规范现代文学思潮的论争等等。这在中学语文教材、教案中都有所反映：郭沫若的革命的“文正公”地位、对鲁

迅的共产主义思想的过分夸张、对徐志摩、梁实秋、胡适等作家的不尽公平的评价，以及用阶级论僵硬地解释文学现象的倾向等，都是这种范式带来的负面影响。而这种负面影响在中学语文教育被原封不动地继承。

其实，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学术界已作出了许多成绩，在许多问题上有了突破，但这些突破基本上没有反映到中学语文教育上来。仍然举现代文学的例子吧。我们知道，由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三人联署，在1985年公开发表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长文，成为一个研究现代文学新的范式的宣言。这个新范式的特点，就是以“20世纪”的整体眼光来看待20世纪的整个文学历程，把“近代”、“现代”、“当代”这三个原本是互相隔绝的研究领域，逐渐联成了一体。它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明确地以文化和文学“现代化”作为基本的价值立场，将文学的现代化判定为20世纪中国文学诞生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正在这个立场的支持下，它把“人”、“人性”、“审美”这样的一些观念，置于文学图景的中心。90年代以来，学界开始将20世纪文学看成中国式的现代化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深入的反思。“思想解放”这么多年了，学术界走了这么长的路了，但是在我们的课本里，还不敢公开谈论人性，不敢讲人道主义，不敢谈一个人理应得到的尊严，这些在学术界已经讨论过多少年的话题。文学的现代化、启蒙这些80年代文学研究的关键词，像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被拒绝在中学语文教育的门外。上一段所提到的旧范式的负面影响，本来是可以克服的，可是至今依然照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学语文教育的滞后性及其与学术界不通声气、闭关自守的现状。

在那改卷的7天里，当我与老师们谈起已经过去很久时间的学术研究重要成果时，他们都一副迷惘的样子。新时期以来的一

些大家，他们也所知甚少。他们都是北京中学语文老师中的佼佼者，他们都这样，其他的足可知矣！责怪他们不尽公平：他们要管理学生，要上课，又有一些家内家外的琐事，他们没有太多时间关注学术界、文学界发生的变化。这样，就更需要教材上的改变、教案上解释的革新。

比如，我们的教材中，是不是可以适当选进穆旦的诗、钱钟书、张爱玲的小说？是不是不要把一些自由主义作家、思想家一棒子打死？在选当代文学作品时，能不能删去一些并不优秀的文章，选进新时期以来优秀的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都是我们应该加以思考的。

能不能办这样的中学语文刊物，它能够承担介绍文学研究的成果与最新动态的任务，发挥起一种沟通文学研究与中学语文教育的作用，让老师们在短的时间里迅速了解学术界研究、讨论的种种问题？

要做到这一切，就需要学问家、文学研究专门家怀着“学者的人间情怀”，从象牙塔里走出来，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深入浅出地向中学语文教育界作个介绍。我们长期以来的研究成果，应该奉献在最大多数人们的面前了。这样，我们的研究才能有价值，“墙角的花，当它孤芳自赏时，它的天地就小了。”何况，中学生，这些民族的朝阳，等他们长大了，整个民族的人文精神、人文氛围就在他们中诞生、体现。不应该让他们总泡在滞后几十年的文学理念里了！他们应该读最精粹的作品，他们应该拥有一个至少相对与时代合拍的文学图景。我想，每一个有民族责任感和“人间情怀”的学者，面对这种情况都不会不着急，都会努力想办法去改变这种现状。

北大著名学者钱理群教授很乐意地给大一理科学生讲授国文，人们颇不解：“一个名教授讲相对较浅的大一国文，岂不是

大材小用?”然而，钱先生说：“能够帮这些学生提高人文素养，这对我来说是一件乐事。何况，还可以在如此之多的大学政治课之外，给学生开辟个新的天地。”钱先生还不顾研究的繁忙，与北大的吴晓东先生从一些名篇中挑选出适合中学生阅读的篇目进行评点，编成一本书，以弥补中学教材存在的缺陷。看，这就是一个真正有责任心、热爱我们民族的智士所做的事。不管成效如何，这都是值得尊敬的。因为无论如何，这一步该跨出了！

在学术界与中学语文教育界之间存在的鸿沟之上，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努力，一分分、一寸寸地架设飞越的桥梁。用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给中学语文教学增添新的思想和活力，这对它的改进与发展有不可估量的益处。

最后的题外话

在批卷工作刚开始时，我们这些批卷的人员相视而誓曰：“决不错过一个好的学生。”虽然每个人对“好”的理解不尽相同。

过了几天，我们都面有愧色，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多想我们手下有多少冤死鬼了，我们必须手不停批。

卷子像流水线上的产品，从我们手上飞速经过。我们的脑袋都木了，但还得一字字、一行行地扫过去。是的，扫过去！平均四五分钟我们就得批完一篇作文。

7天后，我们告别时，人人都扪着胸口内疚地说：“造孽，草菅人命，真真草菅人命呀！”我们组的一个老师说：“幸好学生家长不在周围，他们万一知道了改卷是这么回事，他们不急死才怪呢！”“是啊，我女儿明年高考，但愿运气好点，撞上个好的改卷老师，否则真要坏菜了。”另一个判卷老师忧心忡忡地说。

在一旁的我想起当年高考的侥幸过关，手里捏了一把汗：好

险呀，如果碰上改我的卷子的老师当时心头一咕噜，我的作文分数就大打折扣了。在后来的一个月里，我连连作了好几个这样的梦：我坐在高考考场里，拼命写呀写呀……铃声响了，哎呀，我的作文还一个字没写呢。怎么办？怎么办？在一身的冷汗里，我醒来，全身颤栗……

那么多的考卷（将近50000份），那么短的时间（7天），却安排了那么少的判卷老师（只有一百多人）！如果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考试也就罢了，可这是高考，决定考生一生命运的高考！

四五分钟批完一篇作文，批卷的诀窍就是看头看尾扫中间，兼看看学生的字迹工整与否，然后凭一个感觉给分。每天批6个小时，后来脑袋木了，连感觉也迟钝了，就只能大抵上改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给个中不溜的分数，反正出不了问题。进度得保持呀，虽然内疚得要死，可是没办法，真的。

后来一个老师讲："我要和我的学生讲，作文要拿高分，一要字写得好，二要烧高香！"

可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多找几个批卷老师，加强兵力，使得批卷工作可以进行得仔细一点？比如再找一百个老师来阅卷。否则，这些考生里隐藏的一些未来的明珠在这样高速度的判卷中难免有不少被当成鱼目扔掉的！

何况在酷暑难熬、流火一般的夏7月。

问负责人，负责人摇头道："就这么点经费，找不起那么多批卷的人。"

一次这么重要的考试就这样马马虎虎地对付过去了？我真感到愤怒了。为什么不多给点经费？既然每年国家财政的20%可以用来买轿车，为什么不能拿点零头给这么重大的考试批卷工作输输血？这种挑选人才的考试的重要性不讲大家也明白，可却掏不出几个子来多请几个判卷老师，而这笔钱顶多是有些人的一次

公款吃喝。公款吃喝的结果是多便出些大粪，而多请几个判卷老师却可以使诸多考生在命运前得到一次相对公正的审判！

我确实愤怒了。

往开讲，我国中学的教育经费投入是不是也应该多一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相信，许多的学校也面临着与改高考卷一样的尴尬：想提高质量，可是没钱，造成了师资力量、教学设备不够，于是，只能将就了。

全民的教育质量与小轿车数量，孰重孰轻？

我们的教育（当然包括中学语文教育），值得我们时时思考，应引起我们最大的重视！

文章要结尾了。然而提到的那些问题仍然揪着我的心尖。每次想起那些问题，一股痛苦就从心脏里冒出来，随血液流遍全身——是的，还有太多的问题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还有太多的问题等待我们解决：无论是高考阅卷，还是中学语文教育，还是其它许多我们尚未做好的事情……

我们不能再等待了，我们必须踏踏实实地、一步步做去。

那么，请自中学语文教育开始！

□薛　毅

文学教育的悲哀

——一次演讲

作为一个中文系的教师，我总在想我的工作有什么意义，我上的课，我在课堂上滔滔不绝的话语能给在座的各位带来什么。这也应该是诸位要考虑的问题，诸位以后要毕业，师范大学的学生按道理说是要做中学教师的，你们以后在课堂上的滔滔不绝能给中学生带来什么呢？当然，我完全知道，诸位中大多数是不愿当教书匠的（笑），这就使我的工作的意义失去了一大半，我今天的演讲也没有多少作用（笑）。但我不想为此而谴责诸位，不当中学教师有很多理由，除了工资收入问题外，有一个理由不可忽视：在这个岗位上，没有多少自由发挥的余地，也不需要什么文学感悟力、想象力，一本教科书，一本教学参考书，就是一切，你必须按照上面的要求来讲，不能有任何不同，要不然，领导不愿意，学生和家长也不会放心，以后会考、高考出问题了怎么办？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你自己的才能还有机会发挥吗？以前，我总对学生把当中学教师这件事看得太容易而不满，现在看来，他们说得有道理，书上什么都有，碰到生词可以查词典，学生询问课外问题你回答不出也无伤大雅，那还不容易？只要刻板地照搬照抄就行了。但这里面没有趣味，没有生命，没有任何

文学所应该具备的丰富的意味。(台下：大学里不也这样吗?) 我完全同意。有一个诗人李亚伟写了一首诗《中文系》:“中文系是一条洒满钓饵的大河/浅滩边，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正在撒网/网住的鱼儿/上岸就当助教，然后/当屈原的秘书，当李白的随从/然后再去撒网……”我就算是被网住的鱼儿。鱼儿离开了水，没有什么活力了(笑)。客观地说，大学稍好一点，你们的自由度比中学要大，有些鱼儿比较灵活，没有被网住(笑)，但整体上没有大的变化。昨天，我听说一件事，一个学生顶撞了一位领导，她说:“为什么只给我们压力，不给我们魅力?”这话我听了非常难受，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大学课堂上所讲的文学，还有多少文学魅力呢? 几十年来，文学教育变成了这么一种东西，它在使人的心灵变得越来越简单、狭窄，越来越教条、刻板。而我们大家已经非常习惯了，简直就是牢不可破的传统了，大家都自觉不自觉地使它延续下去。本人同样是这种文学教育的产物，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尽管时时在反抗，但个人的力量无法与一种庞大的传统相较量。诸位也在反抗，比如，逃课就是一种反抗，看武侠小说，看言情小说，就不看老师指定的作品，也是一种反抗(笑)。但反抗的效果总不理想。

依照李亚伟的说法，本人就是鲁迅的“随从”和“秘书”，是把“鲁迅存进银行，吃他的利息”的人，但有一些人连当秘书和随从的力气也不愿花，对鲁迅作品的解释简直荒唐透顶。比如对《药》的解释，你们每一位都知道，说它的主题是反省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这贴“药”失效了，因为它脱离群众，所以革命应该另求新药。我在中学里都相信了这种说法。我们还有感受那些细节所包含的震撼力吗? 那黑夜中观看杀头的场面，那滴着血的人血馒头，那阴冷的坟场……本来我们能够感知这一切的，但那种解释却破坏了我们的感觉系统，使我们都患上神经官能症，都

变得麻木了，我们的皮肤成了一层厚厚的铜墙铁壁，丧失感知力了。崔健有一首歌唱道，“我光着膀子我迎着风/跑在那逃出医院的路上/别拦着我我也不要衣裳/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快让我在这雪地里撒点野……”注意，没有感觉是几代人的大病。对《孔乙己》我们仿佛有感觉，老师强调他是科举制度的受害者，一面津津有味地讲述他的可笑行为，课堂气氛很活跃。我们在课堂上与老师一起笑，笑他的“多乎哉，不多也”，笑他又穷又酸，像酒店里的吃客们一样地笑他。但是，鲁迅在这篇小说中，要揭示的就是那些吃客和我们这种人是如何对待一个苦人的。我们没有能力感觉到他人精神上的痛苦，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我们实在冷漠得可以，这篇揭示社会冷漠的小说也无法唤醒我们，反而在小说中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我们和吃客们一起在嘲讽他，挖苦他，欺负他。本来，文学的一种伟大意义就是要使人与人的心靠近一点，一个要饭婆子在雪地里的死亡，某个角落里的婴孩的眼泪，都不应该漠视，“外面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不能将他人的生死拦在窗外，不能将一个人的孤苦无援当作笑话……这是文学的大精神。但是，我们的文学教育往往走在与此相反的道路上，它并不希望我们拥有这种大精神。

我们的文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回到20世纪初，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先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这篇文章确立了20世纪中国的文学教育目的，文学，是用于“新民”的，也就是后来所谓培养“新人”的意思。文学承担

着这么一个巨大的任务。文学的教育目的一旦确立，用这个标准来看文学，就会发现，有许多文学作品是达不到这个要求的，相反，它们还会添乱。在梁启超看来，小说的力量实在太大了，“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只有能用于“新民”的，才是好的、善的文学，才可以被广泛提倡，那些可能会导致亡国灭种的文学，则必须被弃绝。“新民”的目的是什么？是使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使中国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急务”。“新民”必须做到哪些？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排列了许多要求，要有公德，有国家思想，能进取冒险，合群，自尊等等。请注意，梁启超没有为精神自由提供任何空间，在他的“新民”框架中，体验、想象、心灵的丰富性是没有位置的。这和世纪初的王国维、蔡元培的思路完全不同。在他们看来，文学艺术之所以重要在于能给予国民以心灵的慰藉，陶冶人的情感，使人与人能建立起一种非功利的精神联系，拓展人的精神空间。但是，20世纪中国没有选择王国维、蔡元培的思想，那些好像与中国的“第一急务”无关，梁启超的想法却影响了整整一个世纪，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意识形态。一直到现在，把文学与培养“新人”联系在一起，这个思路没有变化，把文学的作用抬得很高，但对文学的要求中又不包含文学性，相反，根本漠视它存在的意义，这一点也没有变化。“第一急务”并不要求人有文学素质，那东西似乎太次要了，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是雕虫小技，是吃饱饭没事干的人做的，但它又不想放弃文学，而要把它紧紧地攥在自己的手中，因为意识形态认为可以通过文学来教育人，所以我们的文学教育不是文学的教育，而是以文学为手段的教育，就是所谓“寓教于乐”。但总是乐不起来（笑）。

对“新人”的设计，聚集了意识形态对人的要求，也主宰着

文学教育如何进行。它不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而是一贴“救亡图存”的药方。在新文化运动中，这两个方面曾经被统一起来，鲁迅就认为“人立而后凡事举”。但后来，意识形态发现人的全面发展会妨碍“救亡图存”目标的实现，“新人”必须是直接为这个目标服务的人。随着历史的发展，对“新人”的构想越来越单一化，渐渐地，性质发生了大变，自由、爱情、个性、独立意志、“特立独行”，这一些都成了“新人”的敌人。你不能我行我素，你不能有欲望，因为这与那个伟大目标无关。你必须努力学习，为那个目标而学习，你必须努力劳动，创造财富，你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你要把一切奉献出来，你的精神和肉体，都不属于你自己，而要由那个目标来支配。最后，对“新人”的要求走向极端，一言以蔽之：听话！你要听我的话，跟着我走，做我的好孩子。我从小学开始，接受的是这样一种“新人”形象：一手拿着语录，表示听话，一手拿着红缨枪、斧子、镰刀，那是劳动和斗争的象征。眼睛警觉地观察四方有没有敌情，凡是贼眉鼠眼的都一定是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凡是有靡靡之音、男男女女的地方都是要提高警惕的。男的没有老婆，女的没有丈夫，这些都可能腐化人的心灵。嘴里吃的是忆苦饭，脚上穿的是草鞋。晚上最好不睡觉，节假日最好不休息。家里有病人最好不要管，工作要紧。洪流中漂来一段烂木头一定得跳河去捞，因为那是国家财产（笑）。这时候的“新人”已经没有任何灵魂和肉体可言了，它是一架机器，一只螺丝钉，一块任什么人搬来搬去的砖头。时间早已证明，这种“新人”的设计和培养是完全失败了的，所培养出来的人根本无法“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看几代知识分子的学养和能力就可以知道，未受或少受这种教育的人比“新人”们不知道高出多少。你们接受的“新人”形象与我的不一样了，不过，听话的要求不会变，只是适度放开而已。

我读过一篇童话，叫做《谁是木偶人》，在木偶剧团里，一个小木偶逃跑了，导演非常气恼，发动人们到处寻找，结果把一个孩子抓来了，因为这孩子非常听话，路口的信号灯坏了，总亮着红灯，他站在路口等了半天，就是不走。导演试一下，果然，他比真的木偶还听话，于是，他加入剧团，成了一个非常受观众欢迎的木偶明星。——我很重视这个童话，我觉得，这个孩子是继潘冬子之后的又一个“典型”。听说也有人想把这童话改编成电影，但有关方面感到，这种片子出来，会引起思想混乱，所以制止了。再怎么着，听话还是要的。听话的具体内容么可以变通一下。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文学，合格的，就是思想性好的，就可以用来教育我们。文学教育感兴趣的就是这种思想性，文学性只是传递它的手段，是外在的，附加的，教师在分析完思想主题之后，才会附加地分析一下它的艺术特征——那是陈年老调，千人一面的东西，什么地方都用得上，叫做语言流畅、结构严谨、刻画细腻、以情动人，还有夹叙夹议（笑），比喻啦，排比啦，象征啦……文学教育教给我们的文学性就是这些，我相信，受过文学教育的99%以上的中国人还是这样理解文学的。那么，思想性就会分析得很好吗？更糟！有一个全国通用的句式，通用于每一篇作品：本文通过什么什么，叙述了什么什么，表达了什么什么，反映了什么什么，揭示了什么什么，赞美了什么什么，抨击了什么什么，完了（笑）。诸位不要笑，请回忆一下诸位在大学里的作业，有的很可能还这样写。反正我总是读到这样的大作（笑）。请不要小看它，文学教育就是采用了这种阐释方式，它非常简单，一学会就，不用费多少脑子，所以它流传得很快，而且战无不胜，不管多么复杂的作品，都可以这样对付，把一切都可以搞得简简单单，明明白白，没有任何问题。你一旦习惯了这种

方式，就会发现其它的阐释都是胡扯蛋，都是不知所云的。前几年，北大的钱理群教授在《语文学习》上引用曹禺最初写的文章重新阐释了《雷雨》，不算复杂，马上，一位中学教师出来反驳，我记得很清楚，他的第一句话是："这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因钱理群教授提出'新看法'而又成了问题"。是啊，《雷雨》中阶级斗争这么明显，还谈"蛮性的遗留"，"宇宙像一口残酷的井"干什么？即便是曹禺说的也不能算。如果要投票表决，我估计99%以上的教师会赞同对钱理群的反驳意见。

文学教育在文学之上，建立了一套顽固、强大的阐释体系。它刻板、教条、贫乏、单一，它把我们与文学的联系隔开了，它取代了文学，在我们这个精神已经极度匮乏的社会里发挥着使其更为匮乏的作用。与它相匹配的是在同一时期创作出的所谓文学作品，那是文学教育的首选作品，我们都很熟悉的所谓当代散文几大家的作品，几首歌颂圣人圣地的诗，几篇忆往昔的小说，这些是文学教育的宝贝。它们的主要意思是，少吃饭，少睡觉，多听话，多干活，游玩时别忘了忆苦思甜，困难时要记住英雄伟人，看看过去，想想现在，展望未来，频繁地叩头表示感谢，天天赞美壮丽伟大。有一篇赞美松树的散文，说松树的根可以派什么用场，说松树的枝可以派什么用场，叶可以派什么用场，然后号召我们大家要向松树学习，不知在座的各位学得如何（笑)？也不知那些编教材的和教书的学得如何，没听说他们集体捐献心脏肝脏（笑)。也许自己没学好，所以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笑)。奉献难道不好吗？奉献是一种很好的行为，但不是唯一的，否则，人就不完整了，人和牛就没有区别了。但文学教育就是要求人们做一头老黄牛，还说那是鲁迅精神。

文学教育还得选择一些其它时代其它地方写的作品，当然，还是用其原来的标准。你我都明白，这一些，比刚才所说的要好

得多，更像文学作品。但色彩并不丰富，因为有许多作品，离标准太远，不应该接触，要读一些所谓“健康”、“向上”的作品，不然会引起思想混乱。在他们所选的作品中，哪怕有一点点异样的声音，也得提示一下，我学《荷塘月色》的时候，老师就说明，这里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情绪，然后分析道，那是当时当地的问题，我们要正确对待，换言之，我们不能有苦闷。学苏轼的《赤壁怀古》，老师就着重批判“人生如梦”一句，调子低沉，过分悲观。人面对时间的流逝、历史的变迁而感慨生命的短暂、江月的永恒，也不行，他们可能在想，要是学生都有“人生如梦”的想法，那我们的建设事业靠谁（笑）？朱自清《温州的踪迹》里面的《绿》一文，那几句把潭水比做姑娘的文字，我们那时是删掉的，可能怕我们浮想联翩，心存邪念，于我们成长不利吧，现在倒是补回来了，可见大有进步。我猜想是删是补，专家们大概要讨论一番。有时怕人家心存邪念，主要是由于自己有了邪念，周作人把这叫做“老流氓的变态心理”（笑），这种心理最好不要存在。问题更严重的是，那套阐释体系也能把经典作品讲偏，讲歪，讲得味同嚼蜡、刻板无趣。仿佛全世界所有的作品都可以用反对封建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同情人民大众诸如此类的大词来概括，再加上阶级局限、消极面，就完事大吉，天衣无缝了。里面就是没有人，没有人的丰富感情，没有对人的处境的体验、同情、理解、悲悯。教师教学生们高高在上，指手画脚，像上帝一样审判芸芸众生。他们说，《项链》是批判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是批判享乐主义腐朽思想。这样一来，那个女主人公简直活该倒霉。这样一来，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大概也都是自作自受。我们无法体会小人物的辛酸处境，无法理解小人物的挣扎和被命运作弄的悲哀，我们连起码的同情心也没有得到培养，那套阐释体系反而摧残了我们本来可能有的同情

心。

（台下递上来一张纸条）这里有一张纸条："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对'新人'的设计和文学阐释体系中都缺乏人道主义?"——很对！我们反了几十年的人道主义，反得连起码的人情味都没有了。没有人情还怎么能理解文学？文学本来能够使人的心灵得到沟通，使我们体会到他人有不幸，有苦恼，有无奈，有希望和绝望，有欲求和矛盾，有奋进和退缩，有欢喜和惆怅，那都是人的生活，人的色彩，人的气息。这些，却被我们的文学教育挤压得踪影全无。在大学讲坛上，说到鲁迅的《在酒楼上》，最可能讲的是吕纬甫如何背叛自己，向封建主义投降。说到《伤逝》，准是批判小资产阶级的恋爱观，仿佛主人公不参加革命就不能谈恋爱。说到老舍的《骆驼祥子》，那就是个人奋斗没出路。你看，所有不符合他们"新人"标准的人，都是倒霉蛋。你听信了这种说教，还能被文学作品所打动吗？你还能有丰富的人生感受吗？……（台下递上纸条）这一张纸条说："在后现代的语境里谈论人道主义，你不感觉到可笑吗？人道主义是一种死亡了的思想。"这样说来是有点可笑，人道主义也从来没活过。很有趣，我们这个社会从前现代一下子变为后现代，人道主义时代被跳过了。以前只要听话，奉献就可以，不要人道，现在据说只要欲望，就怎么都行，也不要人道，所以它还没活，就又死了（笑）。人道主义有两种意思，一种其实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宣称人类是宇宙万物的主人，有权改造一切，征服一切，结果把地球改造了，征服了，也就破坏得差不多了，把人也控制和征服得如此这般，20世纪哲人们对这种思想反思得很厉害。另一种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它不是一种具体系统的思想，我认为它首先是思想的前提，它强调要关怀每个具体的人的命运，人与人应该相爱，不应该互相残杀，一部分人不应该奴役另一部分人，不能把人当

做手段、工具、畜生。90年代中国的“后现代”将士们善于利用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资源来围剿人道主义。所以他们一个劲地宣布死亡的消息，人道主义死了，启蒙主义死了，知识分子死了……当然，惟独他们还活着（笑）。有人说他们的“后现代”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这话说错了，他们太符合实际了，由于他们的努力，前现代终于与后现代接轨了。（台下有人举手，问：“请问，人道主义能解决一切问题吗？为什么说它是思想的前提？”）不，人道主义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它非常脆弱，自身还困境重重，不是连活的权利都还没有吗（笑）？它绝对不可能包打天下。有人可能要问，它这么没用，还要它干什么？是啊，有了它不能解决问题，它好像反而在制造问题，使得人们顾虑重重，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但是没有它，会出大问题。我听说一个事件，60年代初不是反人道主义吗，批人情论、人性论，老师在课堂上也批，结果，造反开始后，一个学校里，学生把一个老师扔进游泳池里，大批学生围在游泳池边上，老师想上岸，学生用脚把他踢回去，老师在水里来回挣扎，半天过后，慢慢地，他沉入水底。没有人救他，甚至也没有叹息，学生们高高兴兴，神采飞扬地观赏着一个活生生的人如何死去，这一天成了革命的盛大节日（持久沉默）。人道主义不是一种思想，它也不是靠思想的灌输可以建立起来的，它是一种情怀，是长久积累起来的一种情怀。思想家有了这种情怀，他的思想才可能对人类有益处。社会有了这种情怀，一种好的思想的实践才有可能不致于走向反面。本来，文学教育是有助于培养这种情怀的。但我们这里好像总对这种情怀不放心，不怕没它会出什么问题，总怕有了它会造成混乱。

这里还有一张纸条：“那种文学教育模式，我们很早就不相信了，教我们的老师真的相信它吗？”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不知道到底还有多少人相信它。但是，你们尽管不相信，还得听课，

复习，参加考试。不要以为你不信就没事了，最多浪费一点时间，千万不要小看话语的力量，你习惯了一种话语表达方式，尽管不信，它还是会占有你的思维。我看，可以试一试，假定现在没有任何压力，请你们写出自己对《祝福》的理解，然后你们自己看看，肯定还会有许多你们自己也不相信的套话、空话、废话。一个学生很悲哀地对我说："都是，我只会这样写，要不然，我就写不出来。"这就是话语的力量。教师也一样，不一定相信，但是被这套话语支配了几十年，习惯了，要不然不知道该怎么讲。于是，不一定相信的仍然在讲，不一定相信的不得不听，这套话语就一直会传播下去，没完没了。它的弊害早在十几年前就有很多人发现了，它与思想学术界发展的差距也有将近 20 年，也就是说，将近 20 年的时间它几乎没有变化，却延续至今。你们将来做了中学教师就敢不那样讲吗？去年有一个毕业生，工作后第一次上公开课，讲解鲁迅的《药》，她告诉我她准备换一套讲法，我很高兴，还回答了几个问题，最后我突然想起，问她："这会不会对你有压力？"因为人家不习惯，会以为她在胡说八道。她略有所思……后来，她就按照原来的教科书的那套讲了。可能她以后会习惯，虽然现在有点厌烦。可能她的学生以后也会问："教我们的老师真的相信它吗？"

（台下：如果您是中学教师，您怎么做？）你是问我敢不敢与现在的文学教育体制对着干。我要说豪言壮语也没意思，说不定到那时没胆量了。我刚才所说可能太悲观。实际上，在现有的体制和你个人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回旋余地的。如果你在许可的范围里，讲一些真正有文学意味的内容，你就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老师，我向你致敬，我希望孩子们都能遇到你这样的好老师。至少，我希望在座的各位以后不要为难孩子，课堂上不要像对付敌人那样对付孩子，课外也不要压制学生的自由发展。我最不能忍

受他们用一些刁钻古怪的题目来为难、作弄孩子们，这一句子有什么深刻含义啦，为什么用这个词不用那个词啦，加点的词有什么作用啦，那个东西象征什么啦……我们每一个都受过这种折磨，你以为此中必定大有深意，冥思苦想，不得而知，其实那个答案，还是套话、空话，或者实在是不着边际的胡话。许多学生，对文学教育所制造的那个“鲁迅”烦得要命，原因就在这里。他们真能把鲁迅当枪使，特别是鲁迅作品中的用词，简直可以把学生整得天昏地转。一个女作家说，她的一篇文章收进了中学课本，可是里面出的思考题，搞得她莫名其妙，她都不知该怎么回答。几个孩子不同意老师对巴金的文章的解释，他们的解释老师又不赞成，孩子们写信给巴金，巴金支持孩子们的观点，但老师还是坚持原来的那一套，因为教学参考书就是这样说的。你看，我们的文学教育体制已经死板、荒唐到这种程度。在这种体制下，如果再碰到一个同样死板的亦步亦趋的老师，孩子们不是活受罪么。教育者们还老是担心学生的课外阅读，担忧学生在课外阅读一些与他们的要求不一样的作品。我最近想明白了一件事：为什么学生们这么喜欢流行文学，喜欢琼瑶、三毛，还有流行歌曲，等等。其中一大原因是，与文学教育控制和阐释下的文学相比，这一些要亲切得多，更有人的气息，更有生命活力。在这种地方，他们可以呼吸到清新的空气，他们从中能找回身体的感觉，懂得人的七情六欲是合理的，他们可以自由地欣赏人的风采，他们可以学会如何表达自己，用另一套话语来表达自己。你去看看他们私下来往的信件，私下传阅的习作，你会发现他们从流行文化中学到的，比文学教育灌输给他们的，要有意思很多。不要轻视流行文化，虽然它为学生们提供的精神空间毕竟有限，但如果下一道圣旨，严禁学生接触流行文化，学生阅读什么全部听从老师的安排，那学生们恐怕会闷死的。教育者们不怕他们会

闷死，而总怕他们没有是非鉴别力，怕他们多读书而中毒。读一点讲爱情的，会不会整天就想着男男女女的事，读一点“悲观”的作品，会不会跳楼自杀，读《红与黑》，会不会变成野心家，读《安娜·卡列尼娜》，会不会穿着黑衣服去卧轨（笑）。现在已经管不住了，所以要“正确引导”。可是又不太会引导，因为教师们这类书看得不多（笑）——这不奇怪，教书先生是用不着看多少书的，只要认真研读教学参考书、会翻词典就行。在座中间肯定有不看书的大学生。有一位大学生在毕业前很坦然地告诉我，他四年里没有认真读过一本书，也不怎么听课，就考试前借人家的笔记背一背，混过四年。他现在正在做中学教师呢。据他说，他的一些同学也是如此。这大概也没什么，至少，他读懂教学参考书的水平是有的。我希望这样一些未来的老师们在未来少干一点活，干得越多，越可怕。

如果你想做好一个文学教师，你不愿完全被现有的文学教育体制所控制，你想给学生的精神发展以真正的帮助，那么我建议你，回到王国维、蔡元培的美育思路中去，理解文学和文学教育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我想引用他们两人的话来说明文学和文学教育的意义，来结束这次演讲。王国维在《教育杂感》中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于物质，二者孰重？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王国维接着说，我国的文学，比不上西方，我国重视文学的程度，也比不上西方，那么，我们的国人在什么地方能得到精神慰藉，中国又没有宗教，艺术又这么匮乏，既然无法找到精神慰藉，那么赌博吸毒就会泛滥，如果不培养国民的精神趣味而禁止赌博吸毒，必然无功而返。而精神趣味，需要千百年的培养，不比物质文明，很快可以从西方引进。王国维说，他搞不懂谈教育

的人为什么不考虑这个问题。蔡元培在1930年答《时代画报》记者问时说："我以为现在的世界，……盲目地崇尚物质，……以至增进贪欲的劣性，从竞争而变成抢夺，我们竟可以说大战的酿成，完全是物质的罪恶。……要知道科学与宗教是根本绝对相反的两件东西。科学崇尚的是物质，宗教注重的是情感。科学愈昌明，宗教愈没落，物质愈发达，情感愈衰颓，人类与人类一天天隔膜起来，而互相残杀。根本是人类制造了机器，而自己反而成了机器的奴隶，受了机器的指挥，不惜仇视同类。我们提倡美育，便是使人类能在音乐、雕塑、图画、文学里又找见他们遗失了的情感。我们每每在听了一支歌，看了一张画、一件雕刻，或者读了一首诗、一篇文章以后，常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四周的空气变得更温柔，眼前的对象会变得更甜蜜，似乎觉到自身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伟大的使命。这种使命不仅仅是使人人要有饭吃，有衣裳穿，有房子住，同时还要使人人能在保持生存以外，还能去享受人生。知道了享受人生的乐趣，同时更知道了人生的可爱，人与人的感情便不期然而然地更加浓厚起来。"

我的演讲就此结束。谢谢诸位（鼓掌）。

□ 童志刚

教育五问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人都关心而且一辈子都不能不关心的，比海湾战争、波黑内乱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甚至股票麻将衣食住行都更加让人牵肠挂肚的问题？这个问题问得好像很复杂，其实回答起来非常简单，因为答案似乎只能有一个，它肯定是教育问题——小时候，我们身在“教育”之中，虽然没有理论，却毕竟感皆身受，自然有不少感慨，有时也难免说三道四议论纷纷，长大成家立业了，当了老师的自不必说，就算没资格教育别人的，也都自己的儿子或女儿还没出世便已经开始为他们的教育问题操心，什么胎教啦学前班啦兴趣课啦之类，一天一个花样，而且估计这心怎么也得操个二三十年。将来老了，更下一代的“祖国的花朵”们含苞待放，你还能不老骥伏枥人老心红地跟着浇水施肥整日忙活？我说吧，教育，这辈子咱们算忙不完了。

于是就有了第二问：操心忙活都算不了什么，问题是这心应该怎么操和操得值不值得？这个问题是怎么提出来的呢？一个根本的原因是，现今这种教育方式是否真的能够把所有或者说绝大部分学生培养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实在值得怀疑。为什么怀疑呢？听别人谈论的问题很多，自己深有体会的毛病也不少。吕叔湘先生 20 年前就曾著文批评我们的中小

学语文教学“少、慢、差、费”：“10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又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如今20年过去了，情况是否有所好转呢？一位著名的特级教师的总结更加惊人，他把现在的语文教学概括为“束缚人、折磨人、摧残人”！就是面对着这样一种过程和结果，我们跟着没日没夜地瞎忙活，除了无力回天的感慨，你倒问问自己：究竟值得不值得？我知道现在许多望子成龙的父亲和母亲们，甚至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心甘情愿地充当“编外教师”，孩子们每天做几个小时的作业，他们就“赔”上几个小时……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就算将来咱们的孩子学习有成，如果他们却又不得不像我们一样为了他们的孩子的学习而牺牲自己事业，如此恶性循环，那么我们今天的牺牲又有什么意义呢？

第三问：我们到底应该教给孩子们什么？现在我们的“应试”教育，几乎使所有的人——学生、老师和家长——都不得不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如何应付考试上面了，很难再有剩余精力去顾及其它，而我们的疑问是：那些考来考去的内容，又有多少是有实际价值的呢？或者说是否可以让它们变得更有价值一些呢？在一次主题为“道德与经典”的座谈会上，著名青年哲学教授郭齐勇先生曾有过一个非常个性化的建议，针对当前社会道德状态不佳和中小学教育忽视操守培养的现实，他提出：除了“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这些故事，是否可以再多增加一些关于传统道德教育方面的内容呢？我忽然想起，“三十六孝”里固然有些糟粕，但又何必要通通砸烂呢？细想一下，对于每个人来说，伦理道德状况的好坏、伦理道德水平的高低，往往决定着他的人生道路的走向和事业的选择；而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伦理道德状态的好坏、伦理道德水平的高低也同样决定着她的命运。所以就有了那句话，教育是立国之本，其实教育也是“立”人之

本。

第四问：究竟谁有资格教育我们的“革命接班人”？现在好像不管什么人都可以编写出版教学辅导材料，在一本名为《小学语文字·词·句》的教学参考资料里，你会看到这样一些字义解释：“壮：强大、伟大”，“少：不够数目”，“扯：两人拉”，“越：叠用”，“吐：说出来”……我就怀疑：恐怕编写者自已都小学没毕业吧？“壮”的本义是“强壮”，与“强大”就有区别，而“伟大”则根本不能列入它的义项；为什么说“少”是“不够数目”呢？如果我们要求这些编写家“少”做点误人子弟的事情，难道是批评他这样的事情做得还“不够数目”吗？照这本书的解释，那么一个人“拉”或者“拉”的人多了就不能叫“扯”吗？而“叠用”说的是“越”字的一种使用方式，怎么会成了它的“字义”了呢？……无怪乎都说现在的学生动手操作的能力差了，他脑袋里如果净被灌进了这样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又怎么可能正常地与社会对话呢？

最后一问：语文课，为何总让孩子们黯然神伤？

第二辑

中学语文坑死人



□王　丽

陷井中的苦恼

我是经一位长者的引荐来中学当代课老师的。那时我刚从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班毕业，在浙江老家曾当过12年中学和师范语文教师的我，最后还是选择了重操旧业，因为我喜欢教师这个职业。

我所教的中学是北京市一所历史悠久的名牌中学，教两个班的语文课。

在课堂上，我鼓励他们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积极展开讨论。然而我很快深深地感到苦恼。

首先是教材的陈旧、落后。在高一第一学期的语文课本中，真正从语文的角度来编选的篇目大约只占一半，其余一半则大体上是从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来考虑的，而且还是五六十年代那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即便是写景抒情的文章也是如此。如第一单元选的三篇散文：《雨中登泰山》、《长江三峡》、《难老泉》，均作于50年末、60年代初。其思想意蕴明显打上那些年代的印记。

记叙文是如此，议论文的情形也许更糟。除了讲领袖和鲁迅作品之外，其余几乎都是一些人云亦云、毫无新意的平庸之作。而更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总共28篇课文中，竟没有一篇是反映当代社会生活、议论精辟、文字精彩的作品。后来，我还

找了高中其他年级的语文教材来看，情形也大同小异。

面对着这样的教材，我常暗自发问，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积累深厚，从古到今，名篇杰作举不胜举，挑出几十篇上百篇适合中学生读的，绝非难事，为什么偏要选一些如此陈旧、平庸的作品塞给学生们呢？

但我别无选择。我只好采取折衷的办法：一方面要考虑到学生应付考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要尽到自己的责任，教学生分辨哪些是真正的名篇杰作，哪些只不过是平平之作。如教第一篇《雨中登泰山》，没有按“教参”的讲法一味说好，而是肯定了文章的可取之处后，又谈了自己的看法：写景有堆砌罗列之嫌，太“死”、太实，缺乏意境和神韵；文章意蕴不深化、不丰富，缺乏让人回味的东西，且全篇找不出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精彩之笔，更谈不上有鲜明的特点。学生们愕然了。他们从小学到初中，从没有听过一位语文教师如此评论一篇课文。在他们的印象中，凡选进课本里的文章都是无可挑剔的。

我没想到教材给我带来的更大的烦恼还在后头。那就是课后练习的编排设计。叫人哭笑不得的是时下流行的单项选择和多项选择题，以《雨中登泰山》一课为例，请看题如下：

下面是课文中的一段话，后面列出四种分析。把最能确切反映作者意图和表达方法的一种选出来。

课文：略

1. 作者运用借代、拟人等修辞方法，表现了松树在逆境中奋斗的自豪感和旺盛的生命力。

2. 作者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方法，表现了松树的千姿百态、各具情趣的自然景色。

3. 作者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方法，表现了松树在逆境中

奋斗的自豪感和旺盛的生命力。

4. 作者运用借代、拟人等修辞方法，表现了松树的千姿百态、各具情趣的自然景色。

这种绕来绕去的习题，让人一见脑袋立刻发胀，哪里是语文练习？分明在挖空心思捉弄人！我耐着性子才把题目看明白。按照课文的意思，我想选第（2）项不会错吧！但翻开“教参”一看答案，却是第（3）项。我冥思苦索，最后总算琢磨出编者的玄机：在编者眼里，这些泰山上的松树原来都是政治生物，都在“逆境”中“奋斗”、自豪！这岂不是分明在教人牵强附会，甚至投机取巧吗？

但我却不能擅自改动答案，我又只能将自己的见解连同“标准答案”一并端给学生。

解答这类题目仍不算是最苦恼人的。要你自己来编写这种形式的题目，那才是痛苦不堪的事。每学期的考试由各校自己出卷。这个任务自然落到各科任课老师头上。我的思维怎么也不能构想这样一种题型：即必须做到供选择的四项答案中有一项是“正确”的，其余三面都是似是而非的，而且在意思表达上只许有一点点细微的区别，存心让学生乍一看一头雾水，须经过一番全神贯注的仔细斟酌比较之后才可能判别出来——当然，结果“正确”与否，只有天知道！这种任务对我的智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真是空前的挑战，我每次都须绞尽脑汁，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一直弄得头胀如斗，才算勉强完成任务。但别的老师一看，总还能挑出不少漏洞。

后来听说，这种题型是在使用计算机改卷之后出现的，目的是追求判分的“准确性”、“科学性”，避免人工改卷难以避免的“随意性”。但似乎没人想到一个常识性的事实：语文课本身就带

有很多模糊性、多义性的东西，大至课文主旨，小至一句话、一个字，都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根本不能用非此即彼这种最简单的判断方式。

在语文教学中，迷信计算机式“判分”的“准确性”、“科学性”，付出的代价是无数少年的生机和灵气！

我的这些苦恼和想法当然不能无保留地向学生们倾诉，我怕的是孩子们若完全按我的想法去学语文，将很难对付那些逼人就范的种种考试。但千虑难免一疏，有次也闹出个小小的“乱子”来。

在高一语文课本中，有朱自清的两篇抒情散文——《绿》和《荷塘月色》。我对朱自清的作品本来比较熟，对他的一些学术著作和有关传记也读过，备课时又翻阅了近年有关朱自清散文的评论文章。当然，我也翻阅了“教参”，但我觉得那上面讲的实在太“死”、太陈腐。我宁愿按自己的意思来讲。

那几节课是我一个学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尽量深入浅出地给学生们讲这两篇作品的意境美、神韵美、语言美，也讲朱自清的人品道德学问与他的作品的关系。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

正是在这种氛围下，我讲到《绿》的寓意时，引用一位评论家的见解并稍加发挥说：在当时正值青春韶华的作者心目中，梅雨潭的“绿”，其实已幻化成、或者说已升华成一种至真至纯至美的象征，它带有鲜明的女性色彩，所以作者称它为“女儿绿”，并连用几个女性的“她”字来称呼它；因此，这篇作品的寓意也可以看成是对理想中的女性美的深情热烈的讴歌。这个见解虽然与教材上讲的大相径庭，但学生们觉得十分新鲜、有意思，于是便牢牢记住了。

偏巧到了期末考试时，区教研室统一出的卷子中就有这样一道题：

这一段文字（反映有关“绿”的那段描写）表达作者什么样的感情？请用简单的语言加以概括。

标准答案是：“表达了作者热爱生命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而我的学生中有好几个都回答是：“表达了作者对理想中的女性美的讴歌。”结果被扣了分。

这件事使我哭笑不得。当然，我不是说“标准答案”的就是错的，但这样的答案就像是一顶帽子，拿来安在随便哪篇写景抒情散文的头上都差不离，因此，这不是帽子又是什么？

不过，还有比帽子更误人子弟的判断题，如：

A. 描写梅雨谭的绿，观察点是梅雨谭。（ ）

（“标准答案”是“梅雨潭边”，因此，这道题是“错”的。）

B. 最后通过想象把梅雨潭的美提高到了神妙的高度。（ ）

（“标准答案”是“把梅雨潭的绿的美……”，因此上题也是“错”的。）

我不知道这样的题目，除了出题者，还有没有第二个人能做“正确”？有人说：现在中学的语文考卷，连大学教授都做不出来。其实，越是大学教授越做不出来，因为它太荒谬了，荒谬得令人匪夷所思。

语文教学的重要环节——作文教学中有令人不可思议的怪招，议论文教学，则完全是公式化、教条化。课文分析是本着“教参”上说的“提问——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条“著名”的公式来教的（教材中选的课文几乎都可以纳入这个套子），初中这样教，高中也这样教，一以贯之。我戏称为“三股文”，比科举时代的“八股文”厉害。

应该说，议论文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有感而发的。而生

活中的种种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恰恰相反，生活中许许多多问题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中，一定的条件下是无法解决的。因此，很多议论文名篇杰作并不打算解决什么问题，只以其议论的精辟引起读者的关注和思考，并以其审美价值给人以美的感受。如果按“三股文”的要求，鲁迅的很多杂文都是不合格的！

我常常想，如果使这些素质很好的北京孩子自觉地多接触、多关心校园外的广阔生活，凭他们敏感的心灵、活跃的思维，他们的写作兴趣和能力一定会有明显的提高。

在高一语文课本第二单元后面有一项写作训练，内容要求学生分小组选择一个合适的问题，制订采访提纲，采访校领导、团干部或老师。我想，何必规定得这么死呢！何不把采访范围扩大到校外，让学生自己选择对象，作一次社会采访。

我的设想立即得到学生的热烈响应。他们投入了空前的热情，在短短两周的课余时间里，两个班八十多名学生分组或单独采访了不同社会层面、十余种职业、近百人次对象。在这些采访对象中，有国有大厂厂长、银行经理、国家体操队教练、球星、大款，也有下岗女工、外来打工仔、小保姆、卖报老人、残疾人、甚至还有地铁乞丐、癌症病人、吸毒者的亲属、离异家庭的孩子……

一个采访报摊老人的女孩在采访中写道：“在我的心目中，卖报是最简单不过的活儿，谁都会干。可是，当我陪老人守了一下午的摊子以后，我才体会到这活儿的艰辛，明白挣钱的不容易。那天是星期六，老人一直守到傍晚，眼看天都擦黑了，买报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可老人还没有收摊的意思。我一问，才知道原来还有一个长期在老人这儿订报的顾客今儿不知为什么还没下班来取报。老人说，既然答应人了，怎么也得等他，要不一会儿人家来了，一看摊子没有了，多窝心呀！这平平淡淡一句话教我

寻思良久，我明白什么叫‘敬业精神’，什么叫‘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什么叫‘平凡中的伟大’！”

我真忍不住要对孩子们说：这才叫作文！学作文原就是与学做人分不开的。

我深深感到，中国的中学语文教育实在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不然。不知还要祸害多少代人。我曾在《中华读书报》上见到；1995年上海华中理工大学对该校3511名新入学的专科、本科、硕士和博士生做了一次中国语文水平测试。测试结果，总平均仅为63.9分；其中，硕士生和博士均不及格。这样的事实难道还不够发人深省吗？记得王蒙先生曾在一次座谈会上说：“现在优秀的人都不当教师了。”若果真如此，中国教育还有什么希望？

□ 彭希曦

母语的遭遇

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掩盖得花团锦簇，天衣无缝。我一背上书包就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妈妈精心打扮我，鼓励我离开她的身边，你该上学了，别的孩子都上学去了。可这不是理由。我从来就没有玩伴，从不参与同龄人的粗野游戏，他们整天打打闹闹，闹得左邻右舍鸡犬不宁。我不喜欢。我紧跟在妈妈身后，形影不离。妈妈生下我，喂养我，我没想过有别的去处。但我还是答应了。我只听妈妈的话。我上学了！多新鲜，我和别人端坐在一间大屋子里（我当时肯定还不懂得“教室”这个词），他们叽叽喳喳，我默默无闻。我们的老师一位干练性感的上海姑娘（我长大后才知道她就是所谓的“知青”），比划着手势，夸张着嘴唇，念出“a”、“o”、“e”，并让我们跟着一起念，教室里笑声一片。这些生长在方言琥珀里的孩子，头一回听到另一种古怪的语言，普通话。想必我也是兴奋莫名地领教这道翻译工序的，它把妈妈和我之间的私语转化成这个国家的标准语，并使之名正言顺。

好吧，我接着往下说。说不清什么缘由，上到五年级，我突然写起了日记，如果一定要追溯我的“写作渊源”，这就勉强算是吧。我的（另一位）语文老师为了表扬我，竟然拿走我的日记本，在课堂上宣读起来，我感到亢奋、得意和恐惧，这就算写作

带给我的最初的激动吧。不妨这么说，我本来成绩优异，又被发现具有写作天赋，理所当然，我被老师们宠幸有加。而这一切都是表面文章，并不意味着我对当时的教育体制（现在恐怕也改观不大）如鱼得水。我仍处于半休眠状态。

初中二年级，我把对数学的憎恶转嫁到我的秃顶数学老师身上，我显得和他势不两立，这局面完全公开化才被我的父亲知晓，他暴跳如雷，要我立即退学，我惊恐不已，赶紧向妈妈求援。结果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照样上学，私下里照样狠读所有能够到手的文学书籍，照样想入非非，并开始写诗。好了，我该把话引上正题了——语文教育。

由于在哪儿都享有“作文写得好”的美名，虽几经转学，无论成绩起伏跌宕，直到高中毕业，我一直被委任语文课代表，此项官职唯一的职能就是收发语文作业本，清闲得等同于无，但也说明老师对你的信任，其次，在虚荣心过于旺盛的少年时代，无论怎么说也是一项莫名其妙的荣誉啊。上数理化，我犹如身陷水深火热自不待说，可语文，我也日渐厌烦了。别急，让我好好想想。首先，一学期一册的语文课本，翻来翻去也没几篇我感兴趣的文章，可别这么说呀，那可都是些万里挑一的范文啊，而且大多已是或将是千古名篇啊，但我不理这一套。现在回想当年，我犹其难以理解的是我可敬的老师们那一整套雷打不动的教学方式，本来还凑合的一篇课文，他们死活要你分段，当时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不爱上语文课，今天我要借此机会表表心声：我敬爱的老师们，你们的做法是低劣的野蛮行为，因为，一篇文章如果成其为文章，那它必定是浑然一体、不可肢解的。我还想说，身为班上的语文课代表，我受苦最多。老师们总以为我能给同学们提供正确答案，而我每次都错得离奇，我傻傻地站着，羞愧难当。我不会分段。

最后，老师显出对我们的智商深感失望的神情，三言两语，简明扼要，英明地把课文分了段我不得不感佩老师着着实实比我聪明百倍，而丝毫没想他（她）不过在对着教学参考书照本宣科。还没完呢，下课还早，你们归纳一下段落大意，再总结一下中心思想，我的教师像个老谋深算的猎手，在高高的讲台上闲庭信步，耐心地等着我们落网就范。年仅15，布罗茨基突然走出了教室，再也没有重返学校。而我牢牢地陷落在桌椅的夹缝中，如坐针毡，时刻准备着夺路而逃，却丝毫不得动弹。我越来越无法忍受他们那种奥妙无穷的狗屁教育。我拼命写诗，并不断寻找我要的书籍。新小说代表人物克洛德·西蒙说他历经动荡、战争、饥饿、疾病和屈辱，然后周游寰宇，年届古稀，也没发现这个世界具有什么意义。而我的老师居然拿出一个段落要我归纳它的大致意思，这还不够，还迫使我给全文一个“中心思想”。我的老师啊，我好容易挣脱你们，我四处漂泊，刚以为有所心得又被新的遭遇击得粉碎，生活纵横交错，无边无际，就像一篇课文，根本无法分段，而我心潮起伏，感慨万千，没有中心思想。

所以，我可以进一步说，我受到的恶劣教育促使我背离了现行的一切，语文课逼迫我逃进了文学。去年春节过后，我从深圳捎来一本新版的《彷徨》；阅读第一篇，《祝福》，竟掉了眼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学课本就有这篇小说，为什么我没留下丁点儿感触记忆？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野蛮的教育方式只能把任何精彩篇章弄得索然寡味，令人望而生厌，最后片甲不留。太可怕了。我找到了多年前激起我本能厌恶的全部缘由。无趣的是他们那套，我没有错！而那些年，我遭受了多少暗无天日的痛苦不安。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学校成了我的牢笼，我沦为它的囚犯。我还记得这么一幕：那位貌似知识分子的语文老师在上面宣讲什么，我就在下面讥讽什么，我周围的同学笑成了一锅

粥，“请不要自作聪明!”知识分子一声令下，我顿时噤若寒蝉。

近日读到一位中国女性所著的《纪德的态度》，一个极易被忽略的细节深深打动了我。少年纪德整日忧伤孤愤，不能自已，一次竟无缘无故扑到母亲怀抱，号啕大哭，连声喊叫着：我与别人不同！我与别人不同！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我身上。我一次次愤然逃学，流离街巷，走投无路又回到妈妈身旁。我和妈妈交流着另一种语言，爱的语言，生活的语言，和学校强行灌输给我的迥然相异。我把妈妈向我传授的语言称作母语，她温暖、简洁、明白易晓，自然通达如同呼吸，为了维护她的纯正，我反感语法规则，废弃了语文课和学校教育，并坚持写作。

□马 拉

我们的语文书

今年开春的时候，我用去年的大美人挂历，给邻居家的小美人女儿包新课本的书包，就顺手翻了翻现在这一茬孩子的语文书，第一课是“我是中国人”；第二课是“我们爱老师”；第三课是“我爱爸爸妈妈”。挺不错的。

我像她这么大，是1970级的新生。进校翻开一年级一册我们的语文书，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上学放学的路上也到处都写着这三句课文的标语；看电影看戏，英雄同志们刑场就义振臂高呼的口号，也是我们语文书上第一二课的课文。敢情他们也读过我们的语文书呀！小学高年级，我们的语文书里有一课好像是讲咱们的老队长王国福小车不倒只管推。老师在黑板上写这篇课文的中心思想，有一句是“阶级敌人利用金钱、美女和糖衣炮弹向他进攻”。虽然当时大家都是穷孩子，但这句话里面的“金钱”谁都懂；至于“阶级敌人”和“糖衣炮弹”，虽然从未见过，但我们都是读“万岁”发蒙的孩子，所以似懂非懂的；只有“美女”是个生词，小小的年纪，这个词对我们来说太奢侈了。有胆大的同学就问了一嗓子，女老师愣了一下，说：“美女就是坏女人。”

中学学古文，老师发下来一份补充教材，有一课是一篇古代

爱国主义杀仗故事，名字叫《冯婉贞毙敌于谢庄》，“敌”还是英国人。在我们那代小崽儿心目中，骑马耍刀“杀仗”要比开枪开炮“打仗”高级多了；而且历史课上老师尽说英国人逼我们吸毒还打我们，一下子碰到语文课上一个中国猎户小丫头打死了英国兵，所以就是最淘气的同学，也把这篇选自清代一个二流作家的三流笔记学得津津有味。

但最精彩的还在打打杀杀，最精彩的是老师在开讲之前没解释任何原因，就是叫我们提笔删掉文中四字“姿容妙曼”，同时也把课文后面“妙曼”的注释也删掉，我们也就过了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删改教材的瘾，想起来当初孔老二删《诗经》，也不过如此吧。但在删掉之前，就像那帮江湖歌星最爱唱的那句“让我再看你一眼”，我把“妙曼”及其注释狠狠地看进眼里，至今未忘。

“妙曼：旧时形容女子姿态美好。”这么说来，这个名叫冯婉贞的女子不就是一个美女吗？中学老师还说，她是一个爱国主义小女英雄。我这人有一个坏毛病，就是记性好，所以一回想起小学老师对美女的注解，我就真不知道谁说得对？我该听谁的？

1980年上大学，我读的是西南师大中文系，学校的风景就像大观园，也是吴宓教过书和遭打折腿被赶走的地方。我们班60个阶级兄妹对付了写作教材中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后，又在光线幽暗的教学楼研究《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前者是50年代《人民日报》一篇早已老掉牙的抢险通讯，后者则是一位著名诗人广为流传的一首抒情诗。

有一年和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籍教师在北碚的小酒馆吃猪耳朵喝酒，谈起这些，老外说：“你们中国的很多东西我们‘老外’永远不懂。在我们那里，不能想象一个抒情诗人，会写一首诗去歌颂我们国务卿基辛格白宫办公室的灯光，而且更不会有人把这

样的诗选进我们大学英文系的写作教材。国务卿也许确实很累，忙得关不了灯，但他不是国家的首席公务员吗？按你们雷锋叔叔常说的一句话，这不是他应该做的吗？这有什么值得一个诗人去歌颂的？”

这位来自旧金山的老嬉皮士年轻时，赶过伍德斯托克摇滚音乐节庙会，跟他们的基辛格一样，他也是周恩来的崇拜者。呷了一口江津老白干，这厮继续猛侃：“你们国家的抒情诗人真不可思议，难道他们无事可干，找不到更好的抒情对象了吗？你们重庆的妇女这么漂亮，都是美女，为什么不去找美女抒情而偏偏去对国务卿抒情呢？既然你已经知道他成天忙得关不了灯，哪有闲工夫读你献给他的诗。”

一谈起我们小学、中学和大学的语文书，不知怎么最后都扯到美女那去了，这真划算。

□ 邹敏水

老病不改

鲁迅先生“暮年”得子，爱得了不得，于是在60多年前的一天，去上海的街头为儿子海婴购买《看图识字》，结果是大不如意：先是那色彩就多么恶浊，但这且不管他。图画多么死板，这且也不管他……跪着放枪的，一脚拖地；站着射箭的，两臂不平……更坏的是连钓竿、风车、布机之类，也和实物有些不同。(《且介亭杂文·看图识字》) 话虽是60多年前说的，用在今天，也未见得不合适，且看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教材中的部分插图：

初一第一册《皇帝的新装》插图：图上的内容是皇帝在大臣、将军、骗子们的吹捧下照镜子的情形。文章内容为“皇帝把他所有的衣服都脱下来了”。图上的皇帝穿着一条短裤，光腚有伤风化，加一条短裤情有可原，但且看其它：

《天上的街市》插图：诗歌里的牛郎织女在天街闲游时“他提着灯笼在走”。图上的牛郎织女提着灯笼骑在牛背上过河。天上一轮明月，不知牛郎织女为何又提着灯笼闲游、过河。

第二册《一面》插图上的阿累光着头，背着帆布袋；鲁迅先生右手拿着烟蒂。文章内容：阿累一进屋“把帆布袋、夹剪、票板放在一个角落的地板上”“蓝磁牌的制帽戴在后脑勺上”；鲁迅先生“左手捏着一支黄色烟嘴”。

《故乡》插图内容：鲁迅和闰土相对。鲁迅，生活中真正的人；闰土，小说虚构的人物。真人和虚构人物不知如何见面？倘《故乡》中的“我”是鲁迅，那小说《孔乙已》中“样子太傻”的小伙计也该是少年鲁迅了，这怎么通！

高一《荷塘月色》中的“我”在院子里乘凉时，心里不宁静，遂“披了大衫”去看荷塘。图上的“我”，穿着长袍，戴着帽子。文章的“我”的穿戴是夏季的穿戴；图上的“我”的穿戴是冬季的穿戴。

其二，插图上的荷叶稀稀疏疏，不是文中所绘“田田”（紧密相连的样子）。文中“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这儿的荷花也算得‘过人头’了”；插图上的荷叶几乎贴近水面，荷花也没有“过人头”。

其三，散文“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只是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图上的流水明显可见。

……

在《看图识字》的结尾处，鲁迅先生写道：

然而我们是忘却了自己曾为孩子时候的情形了，将他们看作一个蠢才，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即时因为时势所趋，只得施一点所谓教育，也以为只要付给蠢才去教就足够。于是，他们长大起来，就真的成了蠢才，和我们一样了。然而我们这些蠢才，却还在变本加厉地愚弄孩子……

□余　杰

“单调”散文

——对中学语文课本所选杨朔散文的反思

杨朔是初中语文课本中所选作品最多的作家之一，计有《香山红叶》、《荔枝蜜》、《茶花赋》、《海市》等四篇。直到今日，杨朔散文仍被数百万中学语文教师作为教授作文的典范，仍被数千万的中学生虔诚地奉为写作的标本。然而，杨朔模式所造成的危害，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的认识：这些产生于六七十年代的新八股，以单调的叙事方式和单调的思维模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损害着刚刚拿起笔的孩子们鲜活的心灵。

记得我在学习初中第一册语文课本中杨朔的《香山红叶》时，老师这样分析：文章以物喻人，用凝聚着“北京最浓的秋色”的香山红叶，喻老向导越到老秋，越红得可爱的精神面貌，从而抒发了作者对社会主义新生活，对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的热爱之情。记游是贯穿全文的一条明线，然而写红叶并不是记游的目的。老师反复讲杨朔的“转弯艺术”，使行文波澜起伏，摇曳多姿；而“卒章显志”，乃全文点睛之笔。我所在的是一所一流的重点中学，授课的是一位一流的语文老师，她讲得声情并茂，听得学生如醉如痴。到了写作文的时候，我们这些西蜀的孩子无缘到香山，笔下的题目便都是《峨嵋山绿叶》、《青城山的竹子》、

《神女峰的松树》，老师夸奖说："大家学得真快！"

杨朔的散文是容易学的，因为它是模式化的。老师像外科大夫一样手拿解剖刀，一下子便将它们分为五个部分：见景——入境——抒情——升华——点题。中学语文教学中最喜欢让学生"分层次"，而杨朔的文章层次最分明，环环相加，似乎一气呵成。

然而，对文学而言，重复、单一、模式化如同一剂致命的毒药。第一次说月亮真美的，是个有欣赏能力的人；第二次说月亮真美的人，是个索然无味的人；第三次说月亮真美的人，则是个迂腐僵化的人。不幸的是，杨朔只会这样写作：用香山红叶来比喻老向导，用茶花来比喻孩子，用蜜蜂来比喻农民，用礁石来比喻老渔夫——他就像黔之驴一样，"技止此耳"。这样的写作是可怕的，尤其是它在被不断地作为最佳的、甚至唯一的写作方式灌输给初学者。

为了深入剖析杨朔散文，我引入杜撰的"单调散文"的概念。这是受文艺理论大师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启发而来的。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提出"复调小说"的理论。他认为，陀氏创作的是一种"多声部性"的小说，是"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现实世界的多元性，要求文学世界也要具有多元性。在陀氏的小说中，平常难以相容的因素，如哲学的对话，冒险的幻想，贵族的宫殿与贫民窟的居民，令人惊讶地结合在一起，它消除了另一些写作方式的壁垒和封闭性。陀氏的小说也没有所谓的"主题"，因为他的每个主人公都有一种"伟大的却没有解决的思想"。思想希望被人听到，被人理解，"恰恰是在不同声音、不同意识相互交往的联接点上，思想才得以产生并开始生活"，所以"思想就其本质上来讲是对话的"。

与巴赫金论述的复调小说恰恰相反，在散文领域，杨朔散文是典型的“单调散文”。一是单调的叙事模式：由物及人、以物喻人。如《荔枝蜜》这篇极受推崇的典范之作，中学语文课本的“预习提示”中这样分析说：“这是一篇富有诗意和哲理的记叙文，文章由荔枝蜜的香甜，联想到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美好，再由蜜蜂辛勤的采花酿蜜，联想到劳动人民为创造新生活而进行的忘我劳动，热情歌颂了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的人们的奉献精神。文章以‘我’对蜜蜂的感情变化为线索组织材料。‘我’对蜜蜂由讨厌到喜欢，又由喜欢到赞叹，再由赞叹到‘梦见自己变成一小蜜蜂’，思想感情得到升华。这个感情变化的过程，是作者对蜜蜂仔细观察和深入认识的过程，更是作者运用联想，由物及人，以事推理，从生活中提炼诗情和揭示哲理的过程。全文一线贯穿，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这样的论述几乎适用于杨朔所有的散文，只需要把蜜蜂改为别的什么东西就行了。这样的写法，中学生很容易领会，但却值得怀疑：真的诗情和哲理，不是僵死的被线索组织起来的材料，而是散文中自由的、动态的有机成分。如果说整篇散文是一泓清泉，那么诗情和哲理应该是清泉中活泼的游鱼。杨朔的散文中，只有一串草绳吊着的死鱼。于是，千姿百态的行文方式消失了，只剩下一种比八股还八股的现代八股——杨朔的叙事模式。

二是单调的思维模式。叙述模式的单调与思维模式的单调是互为因果的。中国古代即有比兴的传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深刻的论述。杨朔的《茶花赋》标以“赋”的名称，显然深受传统思维的影响，《文心·诠赋》曰：“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杨朔所有的文章，都是“赋”的思维方式，如《中学语文备课手册》写道：“《茶花赋》的题旨是：借茶花表达歌颂祖国之意，借茶花抒发热爱祖国之情；笔笔写茶花，处处赞

祖国。"这是一种单线式的思维，虽然作者有意加几个"弯"，反而更加说明了它的"直"，说到底，这种思维方式使审美者和思想者都消失了，只剩下一个绞尽脑汁的"造文者"。"造文"的目的只有一个——歌颂和赞美。这种单调的思维模式，严重地损害了活泼的思维和丰富的心灵。它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风貌是一致的，它既是1949年以后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又是其牺牲品。

其三是单调的抒情方式，中学语文教学给人的印象是：杨朔是个善于抒情的作家。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杨朔所抒的不过是矫揉造作之情罢了。杨朔的《海市》写于饥荒年代，他看到的却是："有一个青年妇女，鬓角上插着一枝野花，倚着锄站在树荫里。她在做什么呢？哦！原来是公社扩音器里播出的全国小麦丰收的好消息。"这种抒情，很难说是从心灵深处流出来的真情实感。姑且不论其真实与否，就其感情的实质来说，则是无深度的，无层次感的。如果说鲁迅《野草》中的感情像一杯苦涩的浓茶，那么杨朔散文的感情则只是一杯没有味道的白开水。

一元化的杨朔散文与一元化的时代相契合，所谓"巧妙的构思"、"丰富的联想"、"精致的结构"，骨子里都是"九九归一"的。杨朔散文丝毫不具备巴赫金所说的"积极性"，即提问、诱发、回答、同意、或提出驳论的对话的积极性。今天的散文刊物上，这样的散文依然成千上万地被批量地制作。鲁迅开创的、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庄子》的散文传统被可耻地背叛了。直到90年代，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的诞生，才标志着中国有了真正的"复调散文"。《我与地坛》仿佛是一个乐队的集体创作，每个音符、每种乐器都在努力张扬自己的见解，竭力显示自己的意识：受苦、悲悯、惶恐、不安、宁静、绝望、原罪以及道德和宗教的探索。我听到了一声接一声的内心的呼号，这是在杨朔散文中绝不可能听到的。史铁生走出了杨朔的阴影，终于汇入鲁迅的

暗流。《我与地坛》的诞生暗示着：当社会意识形态向多元转型时，散文领域也开始了静悄悄地对“革命”的反对。

然而，这还仅仅是一个征兆。杨朔模式依然发挥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在无数宣讲杨朔散文的中学语文课堂上，老师们把这种模式像钉子一样敲打进孩子们的大脑里。孩子们很快学会了像杨朔一样进行写作，在这种写作中，想象的能力、求异的思维、诚实的品质、自然的情感都受到残酷的压抑。写作不再是一种精神的愉悦，而堕落成一种令人痛苦的，枯燥无味的编造。无数有文学天赋的孩子被扼杀在摇篮中，从而终身与文学绝缘。

这一切并不全是杨朔个人的错。然而，杨朔模式至今仍是一场被当作正剧上演的喜剧，一个未被清理的公害。当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写作文是他们人生中最难受的事情之一的时候，我感到一种椎心的创痛。

□ 孙光萱

语文学习“六问”

语文教学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语文教学改革必须伤筋动骨，取得根本性的突破，任何小修小补无济于事。

高耗低效何时了？

当前中学语文教学的情况怎样？可以用四个字加以概括：“高耗低效”。早在1978年，语文教育前辈吕叔湘先生就大声疾呼改变语文教学的“少慢差费”现象，他严肃指出：中小学生学了10年语文，花了2700课时，几乎占了全部课时的1/3，结果仍未过关。从那时以后，又过去了许多年，可是语文教学的情况仍未基本改观，去年在报上见到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在某所高校，一屋子大学生居然不会写“钥匙”二字。对此，连著名红学家周汝昌也不由得痛切陈词：“钥匙之为物，体不甚巨，量不太重，而丢了它就麻烦大了。”

有人也许会说：“高耗低效”总还是有效嘛，总还是在前进嘛！不少语文教师已经对此作出了回答：当前有些地方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几乎走进了死胡同，正在对学生产生严重的“误导”作用。长此以往，不仅提高不了学生的语文能力，还会束缚他们活跃的思维和心灵，严重影响一代人的文化和思想素质！

烦琐习题知多少？

“题海”无边，何处是岸？广大中小学生正日日夜夜在语文的“题海”中挣扎。

近年来语文习题越来越烦琐，越来越苛刻，已经到了连语言学家都难免瞠目结舌的地步。报上披露说考“翁”字有多少义项，解释“灰溜溜”是什么意思。不知情的读者也许以为是极偶然的例子，其实不然，真可以说是到处都有，见怪不怪。高一有篇课文《为了周总理的嘱托》，是记叙农民科学家吴吉昌的动人事迹的，有一本教参就出了这么一道题目 分析下列句子，划出层次：

那些人见吴吉昌不低头，就撤消了他大队长的职务，剥夺了他研究棉花的权利，禁止他下地，强令他每天打扫全村的街道；进而捏造罪证，诬陷他是反革命，对他进行了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

答案是：……低头‖（因果）……职务‖（并列）……权利，‖（并列）……下地，|||（并列）街道；‖（并列）……罪证|||（承接）……革命‖（并列）…迫害。

其实，语文中这几句话并不难，高一学生完全可以读懂，最多把“令人发指”稍作点拨即可，现在这样要求学生答题，究竟是化难为易，指点迷津，还是化易为难，使学生堕入五里雾中？遗憾的是，不少教参编写人员正在源源不断地制造这类题目，好像非此不足以亮出自己的高招绝活，不能起到对学生的威慑作用。有些语文教师也乐此不疲，认为这一来学生就会知道学习语文的厉害，不会再“重理轻文”了。

非此即彼理何在?

按理说，学习那些文质并茂的名家名篇，是最生动活泼和富于创造性的，可是现在不对了，教师讲授时任意肢解，支离破碎，答题时非此即彼，死扣死划，哪里还有乐趣可言？特别是提倡计算机改卷以后，各类是非题、选择题应运而生，使学生疑神疑鬼，唯恐稍一不慎就站到“错”的“非”的那一边去了。其实不少课文有着丰富的意蕴，有些甚至只可以意会，难以言传，考题的答案灵活宽泛，怎么会泾渭分明、非此即彼呢?

孙犁小说《荷花淀》开头有一段出色的景物描写，于是有了这样一道单项选择题——

这番景物描写起到的作用是：①写出优美的情境，②烘托人物的形象，③展示人民对和平劳动的向往，④为故事的展开起到铺垫作用（　　）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四项回答不都有一定的道理吗?为何要独尊其中的一项而贬低其他三项呢？非此即彼的理由何在？如果作家创作时只是为了达到其中的一项作用，那他高超的艺术魅力不就黯然失色了吗?

据说出这类是非题和选择题，要越微妙越好，越难以分辨越好。想想莘莘学子正在对着这些题目发呆，谁能不为他们一洒同情之泪?

知识拼盘有何用?

汉语是我们学生的母语，学习母语就有它自己的特点。表现在知识和能力的关系上，就得弄清楚以下两点：一、不少学生是先在日常生活中积累了大量的语言材料，再上升到理性知识的，说得直白一点，不妨称之为“能力在先，知识在后”。二、能力

重在综合运用，知识要求分门别类。说得透彻一点，就是说我们应该承认知识的系统性和能力的综合性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现实的脱节。

遗憾的是有些教师和教材编写人员不懂得语文知识和能力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不懂得讲授语文知识要贯彻精要、易懂、有用的原则，而是盲目地求多求全，追求什么系统性、科学性，以致不讲比喻则罢，一讲就是明喻、暗喻、借喻、博喻、互喻等一大套；不讲论证则罢，一讲就是归纳论证、排比论证、递进论证、正反论证、因果论证……据说这还不算多，有一本教学指导书竟然列出了十一种论证方法要学生掌握，天哪！即使是精于议论文写作的名家大师也未必会把这些条条框框纳于胸中，又怎能为此要求莘莘学子？长此以往，学生怎能不畏而却步？

既然学习语文重在实践，重在综合运用，那么，讲解语文知识就贵在灵活点拨，随时引导，而不是分门别类（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文艺学等）、面面俱到地向学生灌输，否则，不管用心如何良苦，结果不外乎是托出一个“知识拼盘”而已，对于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毫无帮助。

培养习惯谁来管？

不少人可能是对“一分为二”作了狭隘的理解，常常在“知识”和“能力”二者之间兜圈子，独独忘了培养习惯的重要性。

语文学习中有些要求如单从“知识”角度而言，难度并不大，譬如写文章要句逗分明、段落分明，谁不知道呢？这方面的知识要不了几分钟即可讲完，可是不少人直到中学毕业，写起文章来总是一逗到底，一段到底，只在最后用上一个句号。须知分清句逗和段落，就是训练学生具有严密的层次感和逻辑性的过程，如果平时不养成这方面的习惯，久而久之，必然会削弱学生

缜密的思维能力。叶圣陶先生明确指出："教语文是帮助学生养成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确是一语中的之谈，我们广大教师理应把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抓起来，管起来。

考试办法何时改?

语文教学为什么会问题成堆，积重难返？一个带根本性的原因是"考试"这根指挥棒在起作用，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能不强烈呼吁：迅速改变考试内容和方法，让学生真正学得生动活泼。

□ 冉云飞

岂有此理的教科书

一般说来，无论是传统教育还是现代教育，教材的编写都是必须的。当然解放后粗暴的“五·七干校”的改造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的“再教育”，是勿须什么教材的，集权力量立马就能促成这种大规模的、不容个人选择的非人的“再教育”，用教材那只是书生们的勾当和“素王”们的把戏。不用说，人类挡不住的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如此不正常的状态毕竟应是“青山遮不住”。

在漫长的农业文明社会，加之封建宗法一体化制度的束缚，社会变化缓慢，几百年视若无动。也许从文学的意义上看，宋诗和清诗是有区别的，但从社会学意义上讲，它的区别却是那么微小，倘使不是诗歌研究方面的行家里手，是很难从中看出其区别的“子丑寅卯”来的。反映在我们科举考试的教材上，就更是触目惊心，其变化之缓慢，更甚之于社会其它方面的变化。我们竟然在千多年的科举考试中，用的都是四书五经一类，对四书五经的阐释也用的是朱夫子的阐释，考生们的答案只能在极小的范围内才能有所发挥。有的人不无自豪地宣称我们的考试制度是最早乃至是最好的考试制度，但他们忘了一个普遍的事实，即有好的考试制度（考试制度的积弊已是众所周知）框架，而无好的考试内容——由教材而反映出来的考试命题及其内容——那么就使

"好"的考试制度的弊端更加积重难返，从而促使考试制度的解体。一个宋朝的考生和相隔近千年的清末考生，竟然答着类型和内容都差不多的试题，教材可称变化甚微，真是滑稽而耻辱。由是观之，中国在清代中后期，不遭鸦片战争之类一系列的污辱欺凌，那才是怪事。道理很简单，你固守不变，别人却在剧烈更新，而你见了他们还拿大，怎能让别人克制欺凌你的野心？

迨至近现代社会，我们教材的编写，也沐欧风美雨，急追西方教材的编写方式。由于政府统得不够严，且没有这方面足够人员及编写经验，因此除了一些个人编写的外，早期商务印务馆和中华书局，可以说承当了彼时一大半教材的编写任务。一是他们有编写力量，二是他们能网络编写人才，三是较高的利益驱动。商务、中华两家，加上后起之中正书局、北新书局、开明书店等也参与教材的编写与出版，竞争十分激烈，客观上也促进了教材编写质量的改进。据笔者统计，单是中华书局自创办始（1912年）至1949年止的37年间，所出的小学各科教学法与教学参考书就有100种，小学课本29种（两种数据均未暇细算册数）之多，尤其是教学法与教学参考书（有些不同于今日之教辅）之多，实在惊人。[①] 倘若加上其它书局的教材及教学参考用的书籍，其种类和数目之大，是自不待言的。倘使说解放前的教材编写多是靠市场本身的竞争来调节——虽然政治因素时有干预，但没有解放后那么巨大，而且教材也并不实行全国统一，好像也无一个全国性的教材编写及审定委员会，这当然是因为民国时期多学美国分权教育管理所致——那么解放后，则多是政治方面和教

---

① 数据来源见《中华书局图书总目——1912－1949》P174－188，中华书局1987年3月第一版。至于其它在"中等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乡村教育"、"社会教育及其它"、"民众教育及其它"等栏目下所罗列的教材数目，更是巨大，尚未细算。

材统一的需求，在驱使着教材编写本身，指导着教材编写的思想。至此教材编写完全被支配时代主潮的政治思想所控制，在中小学的语文、历史等及大学的文科教材里，均明显地反映出政治对教育的统帅作用。

我们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教材，这话原来是不错，但实施起来却颇艰难。因为文化的传承绵延，使得旧文化并不能且不应该断然地被汰弃，而且新与旧的交替，并不存在急速变化的刀劈斧削的情状。但新政权代替旧政权后，急欲显出自己在多方面的影响，加之以前的教材确有歌颂旧政权的情况存在，因此组织编写教材，而且借鉴意识形态与己相同的制度所采取的教育政策及相应的措施，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新政权的扫荡性，还不只体现在对旧教材的彻底更换上，而且就连旧文化中如武训这样用乞讨来兴学的义举也遭无情的批判，这是为了根除私学对严酷的意识形态的“抵抗”。教育因此在全国统一的教育目标、统一的教材编写、统一的教学内容、统一的高考方式、统一的分配模式下，得到了空前的统一。这种空前的统一不仅扼杀了教育中活的因素，将私立学校全部铲除干净，教育制度及其相应措施的积弊，也就在今日空前地凸显出来。整体说来，我们教材的变化是空前的慢，但在五六十年代的冷战时期，尽管我们采取的基本上是封闭的治国方式，与世界的交流多是寻求意识形态上的“知己”，其“嘤嘤求偶”，也就仅此而已。但冷战思维的相同点就是，各国均以自己所制造出的炮弹、火箭的精密，甚至原子弹、氢弹的爆炸、人造地球卫星的上天等等来显示自己的实力。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教育自然要作相应的调整，于是培养科学人才和技术专才的模式，就被各国的教育竞相仿效。因而各国教材的深度与广度也超过此前的所有的时期。

由于教材的偏深偏重，学生学习的自信心和积极性受到了相

当的影响，不只是健康受损，而且学习的兴趣锐减，厌学逃学风气增加。在中国虽然由于高压，没有引起民众和学生对此种加重学生学习负担的抗议，但是平生喜欢当老师的毛泽东，发出“减负”的指示，比如他曾猛烈抨击过：“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① 而且主张课程砍掉一半。后来，各国的教学内容急速减轻，以至于像美国这样教育体系完善、制度民主而平稳的国家，也出现了因教材及教学内容“减负”过度而出现的教育滑坡现象。1984 年 10 月第 39 届日内瓦国际教育大会上，美国教育代表团团长罗伯茨就说：由于教学质量下降、鼓励学习的措施少、大学招生要求降低、学习时间短、课程平淡等原因，美国已经出现了“教育荒废”、“教育危机”，“正在培养出越来越多的庸才”②。自然，中国的教育官员对 80 年代初期中国教育的危机，绝不会像罗伯茨那样坦率。不过，他们即便再文过饰非，“文革”对中国教育的破坏，他们还是会因官方较为一致的批判口径，而作出自己温和的批评的。“文革”教育的失误，完全处于非正常状态，固然一方面有我们自己的政治因素对教育的干扰，破坏了既往建立起来的还不太完善的教育体系；另一方面，也有国际上减轻学生学习压力的现实处境。

“文革”的教育一方面受到很大的破坏，另一方面即便在尚有学校教育的地方，学的课本也是集权崇拜的产物。笔者小学时所读的课本，至今犹记“毛主席万岁！”之类的“教导”，“节约

---

① 见《毛主席论教育革命》P65－66，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1968 年翻印。

② 王一兵《从 39 届国际教育大会看世界教育发展的一些趋势》，见《中国教育报》1985 年 2 月 5 日。

一滴水，节约一度电，电灯自来水，用后随手关”本是不错的，但彼时经常饿着肚子上学的我们，觉得完全说的是假话，事实上，我的家乡至今也没实现这个30多年前的“理想”，而节约的用途，更是让我们小学生弄不懂，“节约闹革命，打击帝修反”。成天学的是这些，学习也只是聊胜于无。当然小学时的作业及课程都不多，我至今忆及，也是颇感谢的。因为彼时可以“自由”玩农村的许多游戏，这是我童年除了苦寒家庭的温暖外，唯一能忆及的亮色。但是我也分明感到小学教育所受到的伤害，即过早地在教育中接受强加于自己的莫名其妙的“政治语录”和意识形态侵略，这是我自己一生都遗憾且不能原谅的、无法逃避的“教育”①。但我们至今的教材编写，除了明显的“文革”痕迹被剔除外，像80年代初期都还入选的杨朔的《茶花赋》、茅盾的《白杨礼赞》、夏衍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等文，还在入选教材，这实在使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我们自称进入了现代社会，甚至有许多人在上网，但我们的教材编写确是老牛拖破车，始终停留几十年前的状态，难道我们除上述诸文外，我们找不出更好的入选文章了吗？这未免太不尊重时代的发展，对学生知识更替的新要求了。我们之不尊重时代的要求、学生的个性和智力的发展，不知要到多久才能得到改善。

如果你说古时代的中国人生活在发展缓慢的农业社会，教材的更替新编没必要，或者更替缓慢无所谓的话，面对当今急速变化的社会，知识更新速度如此之快，我们还固守以往那套“放之

---

① 我提及这点，流沙河先生犹忆三四十年代三种小学一册课本第一课的内容，其符合儿童的特性，在今日都并不过时。今日的儿童们也许在幼儿园，或者在小学第一天就已经知道了这些，但愿如此。在我残破不全的小学教育里，它应该被记录下来，作为对自己的纪念。三种小学课本第一册开头分别为：(1)、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2)、天亮了/天亮了/起来/快起来/爸爸早/妈妈早/遇见老师行个礼/遇见同学问声好。(3)、小小猫/叫叫叫/小小狗/跳跳跳。

四海而皆准，置之百世而不移”的教材标准，那就是十足的愚蠢之至。有一个例子足够说明我们在教材编写上的顽固保守。语文老师马文奇从 1957 年开始教书，教了 10 多年后，他开始对不变的教材有点厌倦，同时感到老是这样，不作点改变，自己教起来没有兴趣，对不起学生。于是他打报告给校领导，想讲一点教材之外的文章，得到的答复是讲教材是老师的义务，至于讲其它知识则是绝对不允许的。自然在以后的各种运动中，马文奇的“奇思怪想”就成了他想给学生灌毒草，有反革命阴谋的罪状，最后被送进了监狱。更奇怪的事不在前面，近 30 年后，他重返教坛，讲的还是那本教材，但马文奇还是想在教材之外，再讲点别的文章，但校领导对此充耳不闻，上至教委，下至家长都不答应，因为那样会影响到他们的“命根子”升学率，更堂而皇之的理由是，加重学生的负担。让人辛酸的中国教育故事更不止此，一次马文奇开家长会，其中有一位家长是他 50 年代教的学生，他告诉马文奇说，你当时教我的笔记如果没弄丢的话，现在也还用得上。马文奇无可奈何，一本 50 年代的笔记竟然在 90 年代的考试中还能用得上，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啊！真是使人糊涂。马文奇带着改变教材的遗憾退休了，但他在退休后给孙子改初中语文作业时，发现仍是他当年所用的教材，禁不住老泪纵横。①

马文奇与教材这样“奇怪”的命运，在非中国人看来，简直

---

① 参见黄白兰编著《盲点——中国教育危机报告》P238－240，中国城市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一版。此书无疑是剪刀加浆糊编辑而成的书，我知道该书其中许多资料的来源，但编著引他人文字不标注别人的名字，不给出处。资料的引用，完全不加裁剪，与正文的衔接也是上气不接下气。虽然我引用所看到的这条有关教材的材料，因编著未给出处，不能确定其真实与否，但中国教材陈旧，改编之慢，文中即或有夸张，也还算得上是中国语文教材陈旧的“实录”。但从该书的字号使用的一惯性上，无疑应该是从别处引来的资料。细说于此备存。

如同天方夜谭。其实说白了，对教材的控制，就是一种文化上控制和大一统的表现而已，也带有文化专制的成分；如今加上有的教育出版社尤其是中央级别的教育出版社想用行政手段垄断教材市场，文化专制与行政市场垄断的双重壁垒，使得教材的改革更加困难重重。其实这也是与中央集权的教育行政管理模式一脉相承的，也是与教育是国家的事业的思想相通的。1985 年教育体制改革中就明确了放权的方针，采取中央集权与一定的地方分权管理模式，但现在可以明显的看出，后来的教育体制并没有多大变化。如果我们的教材编写允许在大纲（此大纲规定的范围要比较宽，不要太细太死）范围内，有自行发挥的余地，既便于教育上评价和考试上相对的科学性①，也容易不因全国一套教材而显出教育的呆板无趣。自然教育评价方式和考试办法要灵活多样，没有这两者的变化，教材的多样性是不可能实现，只有统一的高考指挥棒，没有谁愿意讲与考试无关的东西，甚至就是家长和学生本人也不愿意。因而教材的改革无疑是件复杂的事情。但我们不能因为复杂，就不进行教材方面的改革，否则会贻误我们的教育，减弱个体吸收新知识，从而在社会上缺乏竞争力，国家也会因此而丧失他在世界上的综合竞争力，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诚然，对教材的批判不只发生在理论上，实际例证也是不少的，因为我们素来没有尊重学生的传统，只知有让学生听话和学

---

① 教育的主体，行使教育权的，管理教育的，评价教育的，都是人。说到底，教育是一项与人密切相关的行为。或者说自学的教育行为，是人区别于其它动物的一个特征。因此不管对教育的研究到了何处地步，已经取得了很多项“科学”成就，但还是因为其涉及人的因素太多，评价起来颇感困难。这也是至今为止，像教育经济学、教育评价学等在教育系统里颇为科学化的学科，都不能完全解决其非科学化的矛盾的原因。因此在一本专门与正统观念唱反调的书里，教育被否认是一门科学。见理查德·P·伊恩诺《教育是一门科学吗？行不通！》，载菲利普·J·戴维斯、戴维·帕克编《没门》一书 P263－280，田立年、牟婧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 2 月一版。

习的义务，而不知学生有对自己学习的教材，及其一系列的教育发表自己的意见，并通过一定程序而被采纳的权力。比如就有小学生觉得自己的语文如《课间十分钟》、《蛇和庄稼》的故事太幼稚，《陶罐和铁罐》的故事又太多，《田忌赛马》太没意思，他们主张书上应该多些好的童话、寓言、游戏等。而老师则普遍反映教材陈旧和难度偏深，严重脱离时代，自然也就是脱离生活实际，有的课文是老师读书时就有的，都是几十年前的英雄人物，怎么没有今日的？自然也有学生喜欢的课文，如《小狮子爱尔莎》、《小珊迪》、《凡卡》、《绿色的办公室》、《新型坡》、《蝙蝠和雷达》等反映科技进步方面的课文，只是像这样好的课文太少了。由此可见，教材贴近时代，反映新的知识成果，是多么重要[①]。诗歌读者的锐减是诗歌界有目共睹的事实，尽管我们不能由此断定是诗歌质量的滑坡，但已经有人思考到中学语文教材中诗歌入选篇目的陈旧及过分意识形态化的问题了。初中三年课本里有 9 首新诗，只要了解其写作时代，你就会知道，我们的教材老选过去的人事，已成一种传统。郭沫若《天上的街市》（20 年代），田间《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抗战时期），公刘《致黄浦江》（50 年代），贺敬之《回延安》（50 年代）、《桂林山水歌》（50 年代），艾青《给乌兰诺娃》（50 年代），郭小川《青纱帐——甘蔗林》（60 年代）、柯岩《周总理，你在哪里》（70 年代）。让人觉得，这些编教材的人挺鬼的，我不当面否定你们新时代的诗歌，但就是不选你们或少选你们的诗歌（高中课本选有舒婷的《致橡树》、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看你们诗人怎么办，还不是干着急，编教材的权利是我们的，不是你们写诗的人所能掌握

---

① 《假如我编教科书》，《成都商报》1998 年 11 月 12 日。

的。当然我们懂不懂诗也就不重要了，只要我们有权利就成。[①]一位诗人兼校长的杨然气愤地说："我怀疑这个国家在有意冷落现代诗，排斥现代诗，甚至迫害现代诗。"[②]

杨然的激愤里固然有为新时期的诗歌辩护、喊冤的意思，但这样的教材不只是新时期的诗歌要喊冤的问题，更冤的还不在于冷漠了诗歌，比如贺敬之所写的《桂林山水歌》，其诗歌艺术怎样，我们都不去谈他了。就像诗人毛翰所说，贺诗为桂林山水增色不少——"祖国的笑容这么美"，"可惜写作的年头不大对劲"，因为诗歌的落款日期是"1959年7月旧稿，1961年8月整理"，"适逢天灾人祸，连续三年大饥荒，饥殍遍野"。[③] 我十分赞赏毛翰的火眼金睛，但我也有两点不同意思。其一，这样的诗句，以现今的眼光看，说不上对桂林山水增色的问题，这当然是我个人的判断，是私见；其二，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并不是什么天灾而是人祸，甚至很不"自然"，这是有研究者的科学判断为据的，是公论[④]。贺敬之当时写此诗，固然不足为怪，因为诗人成"歌

① 我们的教材里比这更无理、更混帐的事多的是，如巴金解释自己的作品，居然没有教学参考书上的解释权威，如果巴金参加考试，不按教学参考回答，得个零分也属正常。李英群《难倒巴金》，见《南方周末》1998年8月21日。谁让你巴金不去编语文教学参考书呢？教材只认权力，不认真理。谁比巴金本人更了解自己写的文章呢？恐怕只有排斥作者阐释而只注重文本研究的现代派评论家才玩得出来，但编教材与教参的好像并不怎么现代呀！不然编的教材老是过时的"老古董"呢？他们倒是更像古玩店老板呢。

② 杨然《呼吁调整教科书中的诗歌教材》，见《星星诗刊》1999年第一期。该文未刊之前，蒙诗人张新泉兄提供草稿复印件，对他与杨然一并致谢。

③ 毛翰《重编中学语文的新诗篇刻不容缓》，见《南方周末》1998年9月18日转摘自《杂文报》。

④ 参见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方法》1998年第10期。也许有像金辉这样认识的人并不多，但我是服膺科学研究的人，因此哪怕一种观点只有一个人坚持，我仍称之为"公论"，因为真理跟人数的多少没有关系。道理很简单，真正的科学不是哪一个人的私有财产，不管他有多大的权力。关于"三年自然灾害"，我曾作过一些调查，类同于"口述历史"，会在将来披露。也曾撰文《饥饿的历史》，收入拙著《知识分子的鸦片》（将由长春出版社出版），我谨代表在那极不"自然"的三年间饿死的五位亲人，对金辉同志的研究深致谢意。

德派”是“进步”的表现，谁不想“进步”呢？何况这“进步”里有更多的“利益”。诗人粉饰残酷的现实，在饿殍遍野的情况下，还去当“歌德”，这不是有同情心的人应该做的，有伤人道自不必说。但编教材的人选这样的诗，其用意何在？我没看到关于理解该诗的教参材料，但我想绝不会是让学生知道那段人祸的惨痛历史。在今日还去粉饰那样的伤痛，不让我们民族去反思自省灾难的过去，教材编写者未免太不称职，有负地下冤魂，实在是对个体生命的轻贱。这样的教材不只是学了没用，简直是有害。但这样特定时期的诗作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入选中学课本，真是咄咄怪事！我们编教材的人不反思过去的灾难，反而还带着赞赏的心态，去误那些还没有辨别能力的中学生，让他们对国家灾难的过去无从知晓，这难道不是有意割断痛苦的记忆和灾难的历史，将其掩盖和粉饰起来？我们到底要告诉学生一个怎样的过去，这正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教科书的历史问题。

我们教材的编写，一方面仿佛在开古玩店，卖老古董，教材成了“废品收购站”。这并不是说不能选我们古代文化中的精美篇章，而是指在选时人的篇目时，不要为了政治的需要远离我们的生活，而应将那些“假大空”的作品拿下。连作者自己都认为不好的篇什，如艾青的《给乌兰诺娃》自认为写得不好（当然谦虚是不在此列的），可选编者偏偏要将其选上，是否像巴金解释自己作品没有教参书权威一样，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对作者没有起码的尊重。像这种事情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也许你说选择标准有所不同，但作者认为不好的篇什，至少应征询作者的意见，编

选者对健在的时人也未这样做过[1]。我认为教材编选者本人都是我们有缺陷的教育“教育”出来的，因此根本就没想到去尊重他人。对于收时人作品的事情，就拿赵景深、姜亮夫编的初级中学《北新文选》第一册来说[2]，其中52篇文章，时人作品有19篇，翻译外国作品5篇，时人作品补白2篇。须知彼时新文化运动尚未过去太久，能够筛选的篇目有限，加之那时还有军阀在主张“读经”复古，但本册文选都还是选了三分之一还要强，确是十分难得。所选篇什均不受彼时政治的影响，绝无歌功颂德、拍马屁的文章，鲁迅先生当时曾说：“近来出版界很消沉，许多书店都争做教科书生意……”（1931年9月15日致孙用），说不定就是看到《北新文选》的选本样书后的感叹。但就是如此，也未受彼时商业风气的影响而降低选择标准，也是今日编选教材者所望尘莫及的。

我们该编什么样的教材，才能与当今民主自由的人类大趋势相配呢？要实现教材编写的更新，课程设置方面也必须改革，才能完成教材从根本上的革新。那就是说，课程的设置要避免学科的划分过细，学科与学科之间太过孤悬单一，应强调文理渗透，课程的设置有较强的互补性。因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离甚至敌视，使得“我们面临着产生‘两极分化’的危险，一部分人掌握了科学技术知识，愿意运用科学技术方法改善自己的生活；另一部分对科学技术不感兴趣，自暴自弃，认为他们将受科学技

---

① 我曾就此事，询问过流沙河先生，他入选的诗作《就是那只蟋蟀》，亦未征求过他的意见。问入选时给过稿费没有，沙河先生因年月较久，已不能肯定。揆诸情理，服务教育，也可不收稿费。但现在的教育类出版社本身就是赢利大户，何况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权利。若编选者和出版社征求了作者的意见，而作者愿意放弃稿酬，则是另一回事。

② 该书为1931年9月初版。系新文学版本研究专家龚明德兄为作者提供的初版本。

术的摆布，从而忿恨、害怕科学技术”[1]。这也就是身兼作家和科学家双重身份的C·P·斯诺所著《两种文化》的最为切要的价值以及对我们现实生活的警告性意义[2]。不仅如此，还要适应科研、教学、生产一体化和学科之间的横向渗透与综合的大趋势，加大综合性学科与边缘学科在课程设置内部结构中的比重。

的确，课程设置和学科分化，既反映了社会分工对知识和学科细化的要求，也是知识累积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显现。早期的课程中，由于不需要学科分化如此细微，知识总量还足以达到“爆炸”的状态，因此没必要将知识弄得那么“条块分割”。所以20世纪的教育家，尽管在教育思想上各有不同，但从总体上看，对学科及课程的要求，相对来说都是“百科全书式”，不主张学科之间划地为牢，互相阻隔。但20世纪工业革命，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旧式的课程设置和学科划分，不适应当前形势下学校教育的要求。因此课程设置的更加细化，学科之间的分离，乃势所必然。20世纪初期，西方各国学校教育较为繁盛的地区，对课程设置和学科分化的必然性的认识是坚定而迅捷的，就拿废弃科举制度，实行新式教育不久的中国来说，在民国初期，就由于语文知识系统的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国文”一科之设置已很难适应新的语文教学的需要，于是在中学国文教学中，出现了“中国文学史”、“文法要略”、“文字源流”等分支课程。与此同时，“‘文’（此处的“文”指各类文章——引者注）和‘知’（指包括语文知识在内的百科知识——引者注）相互分离了。‘五·四’以后，特别是从1923年到1928年，中学试行分科制和选修制，各校国语、国文科内设置的分支课程就更为繁复。根据语文

① 张碧辉《科学教育与科学进步》P64，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关于C·P·斯诺的思想，在此先略过不谈，我将在《高等教育的彷徨》一章里作更加深入的发挥。

教学法专家阮真的调查统计，当时语文学科所设置的分支课程累计竟达42种、69项之多！”稍后又将“文”和“知”进行了结合，或者是分中有合，合中有分，“把有关的语文基础知识写成系列性短文，或穿插编在课文单元的前后，或作附录集中编排在每册课本之后，供选择使用”。[①]

这种在语文学科内部进行的探索，也反映在其它学科内部之间，更反映在学科与学科之间的重组与分离。20世纪的课程改革，其实是与其它教育改革相配套的。随着社会现代化的急速发展，一方面教育要扩大规模，另一方面教育又必须面对个体，这种双重困惑使得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必须加以改革，才能适应新的发展。二十世纪初期以前，“课堂更多是处在讲授、记诵形式主义的氛围之中，教师约束和极少自发性表现的学生遵从，已成为讽刺‘民主’的陈规旧俗。”[②] 与杜威的其它教育思想的巨大影响一样，杜威的课程设置思想也从各个方面影响了20世纪初期至当代的全部课程发展，比如克伯屈的“教学设计法”被另一学者布鲁巴克认为是杜威问题教学法的“改造”或“变种”。但与杜威的实用主义课程论遥相呼应的是德国奥托的“合科教学”的课程改革，抨击传统教学中灌输教材的方式，主张尊重学生的主体价值而采用自由讨论课题的方式，接着又有塞茨融科学与人文、知识与人格为一体的教学“转轨”说，都对20世纪包括我国民国时期的课程设置和教学，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50年代，我们学苏式教育时，也将其课程要全国统一的模式，不加改造地承袭过来。课程设置中只有必修课而无选修课，自然不利于

① 李杏保、顾黄初著《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P15，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月第一版。

② 见杨启亮著《困惑与抉择——20世纪的新教学论》P89，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

学生特长的发展。直至1981年才在六年制重点中学的高二、高三，每周各增设4小时的选修课。但其中一种分科性选修，即分文理科各有侧重，分科性选修其实就是为了围绕高考指挥棒的文理分科，助长了升学率压倒一切的评价标准。

随着应试教育的弊端日渐显露，旧有课程的积弊也日益制约教育改革的发展，比如中小学的课程设置与教育内容几乎都是为了升学服务，对基础教育的质量和将来人才的培养十分不利。具体表现为重理论、轻应用，重解题、轻动手，重分数、轻创造等。其次中小学课程缺少综合性和弹性，门类多，课时多，加以教材编写难度偏深，加重了学生的负担，给学生减负，不只是降低教材内容的难度，还要改革旧有的课程设置模式。那么要改革课程设置，根据上海市课程改革的经验，就必须解决以下五个方面的关系：其一，处理好升学与就业的关系。课程要以提高学生素质为主；其二，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与发展学生素质的关系；其三，整体提高水平和局部降低难度的关系；其四，继承与改革的关系；其五，课程改革与教育整体改革的关系，要各方面全面改革①。但我们现在的课程改革，由于受制于整体教育改革的不力，除了小部分地区的少数学校，在上级试点下，作为课题研究项目，有所革新外，其它绝大部分地区的绝大部分学校，仍就按兵不动，处于对旧有课程设置的依赖之中。同时，因为旧有的课程是为应试教育服务的，而应试教育中的许多部分已成百足之虫，不易改革，因此大部分学校处于观望之中，加之有升学率和高考这一强有力的指挥棒，因此课程改革也就只好处于改革与不改革的悬而未决的状态。面对课程改革这种棘手的境况，我们认

---

① 参见金一鸣著《教育原理》P291－292，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

为教育学者金一鸣在课程改革方面的思考，是有实质性内容而又有可操作性，特将他所提出的七点意见转述如下：其一，对旧有的课程首先是要采取批判的态度，指陈其不合理不合时宜的地方；其二，教育目的以及学校的性质任务是制约课程改革的主要因素，因此要进行课程改革，就必须将其制约它的因素加以改革，以适应新的课程；其三，课程必须多样化，也就是说要将必修课、选修课和活动课结合起来；其四，过往的课程设置只有或主要只有必修课，必须压缩必修课；其五，开好选修课，就是对压缩必修课这一措施的有力支持；其六，活动课以及课外活动的比重应在课程设置中得到加强；其七，课程改革仰赖整个教育改革和学校的全面改革，因此必须注意改革中的配套性[①]。

教材编写再不进行更新，内容难度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轻，课程设置再不进行改革，所谓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就会流于一句空洞的口号。而这样给学生造成的身心上的伤害，将是巨大而深远的。课程设置不当，最主要之一是忽视常识，“一个个科目被分开教学，教的通常只是一个个小的部分，学生根本不知道所学内容的概貌”。[②] 这就表明，课程设置中的分科教学，既是现代教育言说的起点，也蕴藏着现代教育无法克服的弊端。换言之，分科教学中课程内容设置不当，科目之间缺乏互补与融通，学科之间缺少衔接，知识的学习得不到整体的面貌，就会形成对文化、社会和生活判断上的失真。因此课程设置与科目的搭配，与新教材的编写，既有怎么操作更为合理的技术性问题，也有阔大的精神气象的把握问题。

---

① 参见金一鸣著《教育原理》P295－297，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出版。

② 戈登·德莱顿、珍妮特·沃斯《学习的革命》P125，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8月版。

□郑　贤

《红楼梦》选篇：就是要折磨学生

长期以来脱离社会现实的发展，滞后于社会整体的变革进程特别是它与学术研究的长期不相往来，使得中学语文教育不仅局限在应试教育的圈子中，而且极端保守，看不到学术的发展，固步自封，拒绝接受新的成果而死抱着旧有的观念不放。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整体的语言水平都完全无法令人满意。事实上，现在的学生，无论是刚出校门走上社会的中学生，还是挤过高考独木桥升入大学的大学生，有相当一部分人的人文素质都很差，这一状况非常严重，以致有的大学不得不作出规定，要求大学生必须继续学习语文，考试通过之后才能毕业！这是当代中国教育的笑柄，有的学校却居然把它作为本校的一项荣耀而洋洋自得！

而另外那些有着较好语文能力的人，他们的这些能力并不是从几册中学语文课本中学来，而是“不守规矩”地从课外读物中获得的。相当多的大学生都感到走进大学后，发现在中学所学的关于中国文学——无论是传统的古代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都与他们在大学图书馆里一排排书架上长长的学术著作中读到的完全不一样。学者们十年辛苦得出的研究结果，哪怕是已经成为公认的结论，中学语文课本里都见不到踪影，社会在发展，中学语文课本却仍是昂然地摆出一副多年不变的面孔在那里，俨然绝对正确的神气。

选入中学语文课本里的两个《红楼梦》选篇，就是上述状况再好不过的注脚。

《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最优秀的小说，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它所达到的艺术成就，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第一流的。它不仅吸收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经验，而且融合了整个古典文学的全部艺术成果，《庄子》、《离骚》以及诗词曲赋、戏剧民歌所能达到的艺术效果无一不在这部小说里得到体现。要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了解传统文学的精粹，都不能不读《红楼梦》。

而对于中学教学来说，《红楼梦》以其语言与文学艺术上的高度成就以及深厚的文化内涵而成为不可多得的教学范文。对于正在接受基本文化教育的中学生而言，他要学习母语里最富于表现力的语言；要了解本民族传统文学中的优秀之作，从传统文学里汲取营养；要初步接触悠久深厚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精华部分；要了解本民族的精神内核……这一切都无法绕开《红楼梦》这部小说。如果一个中学生在即将迈进社会，或者继续升入大学深造的时候，竟然还没有读过《红楼梦》，还不知道《红楼梦》为何物，那是中学语文教育的悲剧，也是整个教育的失败。

因此在现行的中学语文课本里，就有了两篇课文是选自《红楼梦》。然而这两个选篇并没有起到准确地介绍这部伟大小说的良好作用，甚至也不能给中学生以良好的语言训练，得到的文学修养几乎没有，只有令人费解的练习题在折磨他们。

这两个选篇，一篇是节选自《红楼梦》第四回的《葫芦僧乱判葫芦案》，收入初中语文课本中；一篇是选自第三回的《林黛玉进贾府》，收入高中语文课本。整个这两篇选文的教学编排最为明显地暴露出中学语文教学最严重的问题所在。《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这篇课文标题的注释说：

《红楼梦》是我国一部最优秀的古典小说。这部小说描写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以及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衰落过程，反映了封建社会残酷的阶级压迫，揭露了封建制度的黑暗和腐朽，以及它必然崩溃、灭亡的历史趋势。但《红楼梦》也掺杂着一些唯心主义的糟粕。

在高中语文课本里，《林黛玉进贾府》的标题下有这样的“预习提示”：

> 《红楼梦》这部不朽的作品，以它丰富的生活内容、深刻的思想意义和高度的艺术成就达到了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史上的高峰。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真实而艺术地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走向衰亡的历史趋势。

这两段话大同小异，都不忘强调这部小说的主题是关于“封建社会残酷的阶级压迫、封建社会走向衰亡的历史趋势”，也都没有忘记捎带上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四大家庭”的衰落也没落下。不要以为这样说，是在全面地介绍《红楼梦》这部“我国最优秀的古典小说”、“这部不朽的作品”，它只是在复述五六十年代在不正常的历史氛围下对《红楼梦》作出的审判，唯恐漏掉一个字。无论是在标题下以注释的形式出现，还是以预习提示的面貌出现，它的目的都只是要求买了课本的学生把这几句干巴巴的话死死地记下来，考试时不能忘了写其中的任何一句关键的话和关键的词语。“封建社会”不能少，“腐朽、崩溃”也不能少，“残酷的阶级压迫”与“走向衰亡的历史趋势”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知识点，当然更是缺一不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是主线，就更不能缺了。倘若只答了其中的一部分，都是不对

的，没有全面地看问题。记住了这些，就完成了对《红楼梦》的了解，不能多也不能少。

这貌似全面的“预习提示”，是对《红楼梦》的阉割。《红楼梦》里确实有如上所述的内容，从某些角度来看，上述说法也有其合理性，可是这不是《红楼梦》的全部，《红楼梦》的主题既不是这么简单，它的内容也决不仅仅是“揭露封建社会的阶级压迫、黑暗与腐败”，也很难说得上真正“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必然走向崩溃、灭亡的历史趋势”。这一点早已有学者指出来：

> 很多人喜欢而且习惯于寻觅小说的“主题”，或依它的题材类型规定小说的性质。对《红楼梦》通常定性为以贾宝玉的爱情悲剧为中心而提示封建社会行将崩溃的小说，说当然亦无不可。但任何一部堪称杰作的小说，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所能概括。“横看成岭侧成峰”，完全有理由把《红楼梦》称作爱情小说，或伦理小说，或社会小说，乃至广义上的历史小说，都无不可……
>
> 有人硬要定它为描写阶级斗争的政治小说，更是大而化之，不着边际。在阶级社会中，有什么人生现象能和阶级斗争脱钩呢？
>
> 还有的人断言，《红楼梦》概括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这种说法相当流行，但无论从小说的形象本身和历史事实来讲，都缺乏必要的根据……
>
> 再从小说形象的本身来说，任何一部小说的艺术意蕴，都应该从小说的形象里，从作家提供给读者的生活场景和所暗示出来的内容中去寻找，艺术欣赏和艺术评价不应离开作品的形象去臆断作家所没有写出来或暗示出来的东西。《红楼梦》描写了贾家由鼎盛到衰颓的过程，在曹雪芹所写的现

存的八十回书里，还没有写出而只是明确地预示了宁、荣两府的终将破灭。根据作家所提供给我们的形象，我们有权说，曹雪芹描绘了一个封建社会大家族在内部和外部的错综矛盾中走向衰颓的历史及其毁灭的必然性。……曹雪芹通过贾家……体现了无数封建大家族实现其命运的典型性，并从这个家庭生活的史诗般的描绘，呈示了这个社会制度的荒谬性质，完成了文学史上的不朽业绩。

但是，家庭只是社会的细胞，个别细胞的萎缩并不意味着整个肌体的死亡……说一个家族毁灭就宣告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从《红楼梦》的形象本身而言，是没有根据的，也不是曹雪芹的艺术思维中本来就有的内容……

学术研究早已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有了巨大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已不再被荒谬时代里可笑的专断的结论所束缚，对《红楼梦》的研究也早已从那个时代的阴影里走了出来。可是在对全国所有的中学生进行教育的语文课本里却对此视而不见，依然方便地照搬几十年前的结论。

无数的“祖国的花朵”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下度过人生中最美好的岁月。《红楼梦》里那么多鲜活的场景、那么多性格各异、活跃于曹雪芹笔下血肉丰满、形象鲜明、有着青年人的悲欢哀乐的人物就这样被课本的编选者一支笔驱逐出中学生的视野之外，在那一双双充满对书本神圣信赖的纯洁目光里，这一切都从不曾存在过，他们只知道葫芦僧做了官判了一个葫芦案；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从“预习提示”里知道了一点点影子，却只记住了“丰年好大雪”的顺口溜，因为这揭露了封建社会的腐败。不知道林黛玉有那么凄美的葬花词，也不知道有那么优美胜过任何都市园林的大观园，读不到曹雪芹描写大观园的那么优美的文章，

而这本该成为他们学写记叙文、学写景物、学刻画人物的最好范文！博大深邃优美动人的一部《红楼梦》被糟蹋得完全失去了本来面目，只剩下几句口号式的控诉，只看见几个人在小心翼翼地揣摩别人的心理活动。

选的篇目既不能反映出《红楼梦》这部巨著的真实面貌，而课文旁的提示和课后的练习又怎样呢？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一文中附有阅读提示，有的提示显得是如此可笑：

正文：	提示：
（门子笑道：）"……这且别说，老爷可知这卖的丫头是谁？"雨村道："我如何晓得？"门子冷笑道："这人还是老爷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芦庙旁住的甄老爷的女儿，小名英莲的。"雨村骇然道："原来是他！听见他自五岁被人拐去，怎么如今才卖呢？"	贾雨村当年曾答应帮恩人寻找女儿，如今知道了她的不幸遭遇，为什么除了"骇然"之外竟无所表示？

这样的阅读提示显得毫无道理，怎样才算是有"所表示"？有一定的标准么？

再看：

正文：	
（贾雨村判完这件案子之后） 此事皆由葫芦庙内沙弥新门子所为，	雨村又恐他对人说出当日贫贱时事来，因此心中大

不乐意；后来到底寻了他一个不是，远远的充发了才罢。

提示：

门子对断案有功，为什么还要远远地充发他？

再没有比这更显得多余的提示了。曹雪芹不是说得清清楚楚吗？——“雨村又恐他对人说出当日贫贱时事来，因此心中大不乐意”。难道这还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要充发他”吗？
再看看课文后面的练习吧：

三、选择通过人物语言正确分析人物性格的一项。

1. 雨村道：“你说的何尝不是。但事关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复，正竭力图报之时，岂可因私枉法，是实不忍为的。”

A. 贾雨村的两句都是真话，反映出贾雨村不敢得罪贾王二府，又害怕皇上降罪的矛盾心理，表现它胆小怕事。

B. 两句都是假话，他信不过门子，又想稳住门子，故意说些冠冕堂皇的话，以便将来嫁祸于门子，表现他口是心非、两面三刀。

C. 前一句是假话，不使“故人”难堪；后一句是真话，表现贾雨村不忍心因私枉法，对不起皇上的起复委用。

D. 前一句是真话，觉得门子的办法正中下怀；后一句是假话，想假装廉明清正，以便为将来枉法脱罪责；表现贾雨村阴险狡诈、老奸巨猾。

左一个“前一句”，右一个“后一句”；一会儿是“真话”，一会儿又是“假话”，再往下，所有的又都倒过来了，听话的学生们在这一道高智商的题目面前傻了眼，心里真是佩服得不得了。

可是他们哪里知道，这不过是把曹雪芹“真”与“假”的说

法套用过来，凑成一个题目，毫无新意！题目要求是要找出“正确”分析人物性格的一项，完全是典型的应试教育的标准试题，看起来似乎是要锻炼学生的思考能力，结果却只是让纯洁的少年学会了如何揣摩他人的心理。

高中课本里选的是林黛玉进贾府的那一段。这本来是《红楼梦》里最脍炙人口的部分之一，本来它的“预习提示”里也说：

“课文以林黛玉进贾府这一事件为中心，以她进贾府第一天的行踪为线索，通过她的目睹、耳闻、心感介绍了贾府一大批重要人物，初步展现了贾府——这一全书典型环境的概貌，拉开了红楼梦故事发展的帷幕。课文虽然是节选，但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已得到体现。黛玉的细心多虑与自尊，宝玉的蔑视功名利禄，凤姐的泼辣和虚伪等等，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作者刻画人物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对众多人物的写法也绝不雷同，写凤姐、宝玉出场的文字尤其脍炙人口，许多细节描写都极为精彩。这些都应在阅读时仔细体会。

这话说得还不错，还有点读文学作品的意思。可是，它后面的练习却完全掉入毫无生趣的、呆板僵化的、应试习题的烂泥坑中：

思考和练习

一、阅读这篇课文，填以下空白：

这篇课文以__________为中心事件。通过__________的所见所闻介绍了______、______、______、等一大批主要人物。作者介绍人物有详有略，详写的人物有__________，略写人物有__________；有实写有虚写，实写的人物有__________，虚写的人物有__________；有单独介绍，有集体介绍。单独介绍的有__________，集体介绍的有__________。

这哪里是在欣赏一部文学作品，这是在折磨中学生，迫使他们死记课文，记住一大堆和他们本不相干的人的名字！只有那些一目十行过目成诵的“好”学生才能在做这样的题目时不被难住。中学生朋友们，要记住，读这篇课文的时候，要用心记下曹雪芹是介绍了谁，详写了谁略写了谁，实写了谁又虚写了谁，而不是去体会他是怎样详写怎样略写这些人的！只有这样你们才能考出好分数，而只有考出好的分数才能上大学！

下面这道习题就更加无聊：

三、仔细体会课文中的人物描写，回答以下问题。

1. 以下的外貌描写各写的是谁？分别表现了每个人怎样的特点？

①面若中秋之月，色若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瞋视而有情。

②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

③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2. 下面四句描写中的 A 和 C 各是谁？你根据什么做出判断？

①A 再四携他上炕，B 方挨 A 坐了。

②C 忙拉了 D 在左边第一张椅子上坐了，D 十分推让。

③虽然未曾见过 E，然我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今日只作远别重逢，亦未为不可。

④我没有那个。想来那玉是一件罕物，岂能人人有的。

尊敬的编者想出这道题目来考学生，目的是要他们学到什

么？是要他们从中学到如何通过人物的外貌描写、行动描写、心理描写来表现人物性格吗？

不是！请看第一小题目：

1. 以下的外貌描写**各写的是谁**？分别**表现了**每个人**怎样的特点**？

请注意，这道题没有像第2道题那样问“你是根据什么判断的？”这样的问题，因为已经先要求你知道**各写的是谁**，知道了**是谁**，就可以**根据他们的身份判断**各自有怎样的特点。至于这些在课堂上聚精会神地听讲的学生是如何能知道写的是**谁**，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死记！硬背！耐心负责的老师会根据课后的习题来预先提醒他的学生这些地方要背，那些地方也是要记住的！

如果这还不能准确无误地说出**表现了**每个人**怎样的特点**，也不用担心，最后会由诲人不倦的老师念一遍教参上的标准答案。

第2小题就不由得令人愤怒了：有谁能仅仅从这里的①和②两句话里分辨出A是谁，C又是谁吗？我们再来读读这两句话：

①A再四携他上炕，B方挨A坐了。

②C忙拉了D在左边第一张椅子上坐了，D十分推让。

这里能仅凭一个“再四携”和“忙拉”就判断出两人分别是谁吗？聪明的出题者是怎么想到这样考我们呢？我们不知道。还是查查书上，看看他们到底是谁：在课本的219页第二段第8行末尾：

“王夫人再四携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

再往后翻，221页第8行中间：

“熙凤忙拉了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让。”

原来“**携**”的是王夫人，而“**忙**”的是王熙凤！我们总算是明白了。可是，慢着！请再看：

“黛玉正不知以何称呼，只见众姊妹都**忙**告诉她道：‘这是琏嫂子。’”（第214页第一段第6行）

“黛玉**忙**陪笑见礼，以‘嫂’呼之。”（第214页第一段第9行）

“这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第214页第一段第17行）

“熙凤又**忙携**黛玉之手，问……”（第215页第一段第1行）

“时贾赦之妻邢氏亦**忙**起身，笑回道……”（第215页第二段第2行）

“黛玉**忙**站起来，一一听了……”（第216页第一段第15行）

“王夫人**忙携**黛玉从后房门由后廊往西，出了角门……”（第220页第二段第2行）

……

这么多的“**忙**”和“**携**”，哪个是哪个呢？如果也同样把这些句子里的人名统统换成英文字母，有谁敢拍着胸膛保证自己能一一分辨出来？

聪明的选编者其实是已经知道，这个题目大有问题，所以才特意问一句“你根据什么做出判断”？他们的意思是说，其实你是不可能根据这仅有的两句话来判断谁是谁的，你要正确回答出来，只有死记，要不就赶快翻书！

接下来的一问可真是苦口婆心、循循善诱了！“哪三句描写中表现了同一个人的同一种心理状态？这是谁的什么样的心理状态？”这样提问法，简直是在诱供。这种作法使我想起了以前反动派审讯我党的地下党员时，常常是这样发问：

“说！你干革命几年了?！×××是怎么和你联络的?!”

我们聪明的同志立刻就明白了敌人是在咋唬他：敌人根本就不能肯定自己是不是我党的党员，也不知道×××是不是地下党。他们是想朦人。这个时候一定不能顺着他们的问话自豪地说自己干革命已经有30年了，×××和我联络的方法是我党的机密不能告诉你。因为这样回答就等于是承认了自己是共党，也把×××暴露了，正好中了敌人的圈套。于是，我们的同志大声说；

“我只是一个教书匠，不是共产党员！我也不认识×××！”

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敌人真愚蠢，我们的同志真英明！

可是我们的高中语文课本里这道练习题却这样问我们的同学了！先按照自己所需要的结果来设计问题，自己先一口咬定：这里面有三句话是表现同一个人的同一种心理状态，揭示你应该朝这个方向去思考——否则就是错的！你按照这个思想去想，得出了正确答案，那说明你真聪明，一下子就明白了我的暗示；答错了，你就笨得不能再笨了，出题的人只有摇头叹息：这些孩子真是！当初我上学的时候是多么……这还不容易吗！

这就是我们的课后练习，这就是我们的语文课本！这就是我们的语文教育！

《红楼梦》遭到如此作践，曹雪芹真是怎么也没想到！在《红楼梦》身上所暴露出来的中学语文教育所存在的问题，亟待得到所有关心中学教育的人们的重视。而对中学阶段而言，即使没有时间读完《红楼梦》这部伟大巨著，也不应只是局限在课本里所选的这两篇，《红楼梦》里有许多精彩的篇章值得欣赏。

□ 李淑章

这书，没法儿教

语文教学的严重问题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我们姑且不说高考指挥棒的问题，也不说各种练习材料泛滥成灾的问题，单就经过国家教育部门审定在全国范围内通用的人教版语文课本来说，虽然成绩不可抹煞，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这里仅以初中第三册语文课本和与之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为例，看看所存在的问题：

《白杨礼赞》课后的练习题。

排比和反问的连用，强调和深化了白杨树的象征意义，仔细阅读第七段，找出四个反问句，看其中的问法有什么变化？意思是怎样加深的？（着重号是笔者加的）

须知，这个题是要初二学生回答的。现在，我们不要求高中生也不要求大学生回答，我们只要求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语文教师，甚至是教语文多年的特级教师和大学教授回答，答案会是怎样的呢？笔者教了40多年语文，对此也百思不得一解：若说“问法有什么变化”，实在看不出来，因为四个句子都是反问形式；若说“怎样加深的”，真不知问题问的是内容还是形式，也不知从哪里下手。无奈，只好查看“教师教学用书”。“答案”揭晓了：

1. 句法的变化如下：（由句法变化，看出它们的同中之异）

难道你就只觉得它只是树。

难道你就不想到……

难道你竟一点也不联想到……

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

2. 意思的加深：

反问句一：让人由树联想些什么。

反问句二：让人由白杨树的朴质、严肃、坚强，联想到有相同特点的北方农民。

反问句三：由白杨树的坚强不屈联想到傲然挺立、守卫家乡的抗日军民。

反问句四：由白杨树枝枝叶叶紧靠团结、力争上游的精神，联想到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精神和意志。

四个反问句由外向内，层层深入。

笔者读后不是豁然开明，而是愈加糊涂了。答案回答了什么？对“句法有什么变化”，答案只告诉我们，加着重号的词语不同；对“怎样加深的”，答案除重复了四个反问句的内容外，只告诉我们八个字，那就是“由外向内，层层深入”。啊！有谁能知道这八个字就能回答“怎样”这个问题呢？这样的练习，怎么能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以及他们的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呢？

同册的《故宫博物院》课后也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练习。这个练习是让学生先独立阅读课文第六段部分文字，然后解答下边的问题。下面是“部分文字”和要求解答的问题：

大殿正中是一个约两米高的朱漆方台，上面安放着金漆雕龙宝座，背后是雕龙屏。方台两旁有6根高大的蟠龙金柱，每根大柱上盘绕着矫健的金龙。仰望殿顶，中央藻井有一条巨大的雕金蟠龙。从龙口里垂下一颗银白色大圆珠，周围环绕着6颗小珠，

龙头、宝珠正对着下面的金銮宝座。

1. 找出方位词。

2. 指出立足点。

3. 指出说明的顺序。

面对这个练习题，笔者自信能够解答正确，可是一看“教师教学用书”的答案，竟大吃一惊。除方位词找对外，其余两题都答“错”了。请看“用书”上的答案：2. 立足点是正中的朱漆方台和雕金蟠龙。3. 空间顺序：①以朱漆方台为立足点，由上向后、向两旁。②以雕金蟠龙为立足点，向周围、向下。

啊呀！这书是没资格教了。

这里。笔者想诚恳地请教专家，包括编写“用书”的专家，究竟什么叫“立足点”?

最新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上说：立足点就是立脚点。它是这样解释“立脚点”的：“①观察或判断事物时所处的地位……②生存或占有的地方……”

显然，练习题所问的“立足点”是指第一义项。1996 年出版的由刘佳主编、由臧克家、仲哲明、陈伯吹、于漪、陶本一、叶辛担任顾问的《初中生作文辞典》第 335 页上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观察事物的时候所站的位置（立足点）是固定的，而观察点可以随目光的转移而变化，如将这些所见依次写下来，能够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受，这便是定点换形观察法。”

显然，这里说的“立足点”同《现代汉语词典》说的是同一个意思。

这样看来，观察课文第六段部分文字所描写的东西，其立足点就应该是“大殿”的地板上。可“用书”的编者却弄出两个立足点来：说立足点是“正中的朱漆方台”不算离奇，因为它的上面还可“立足”，只是故宫的管理人员不让上去而已；更离奇的

是，“雕金蟠龙”怎么能成为立足点（观察者所处的）呢？要知道，“雕金蟠龙”在“殿顶”上啊！

这个问题笔者问过不少位语文教师，他们都说，对“用书”的答案，也觉得别扭，但人家是那么写的，自己也就那么给学生说。

以讹传讹！

这册第173页上讲语法知识中的“祈使句和感叹句”，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

表示请求的祈使句还可以采用疑问句的形式，这样可以把话说得更委婉些，带有商量的口气。如：

(6) 借你的笔给我用一下好吗？

这段话有两个毛病：一是从表达上弄不清“借你的笔给我用一下好吗？”这个句子是祈使句还是疑问句。因为，“祈使句还可以采用疑问句的形式”这种说法有歧义：既然是“疑问句”，为什么还要说“形式”？难道“祈使句”不也是“形式”吗？二是说“借你的笔给我用一下好吗？”这句话是祈使句，是错误的。这是由于编者没弄清祈使句和疑问句的概念。

什么叫疑问句？语法专家黄伯荣写的《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一书中明确写道：“有提问语气、语调的句子都属于疑问句（简称问句）。”而且，他在“四种句子的辨认”一章中，专门列了四节，其中第三节的标题就是“表示祈使的疑问句”。在这一标题下，他举了好多例子，其中举了柳青《铜墙铁壁》中的例子：“同志，你听点话好不好？”可见祈使的内容也可以用疑问句的形式表达。

所以，课本上说“借你的笔给我用一下好吗？”不属祈使句，应属疑问句。本册课本在《句子用途表》中，已把这类句子列入祈使句中。这是明显的错误。

笔者在同一册语文课本中举了这些例子，旨在说明什么问题呢？一是说，仅此一册课本和它的配套“用书”就有这么多问题，那么，六册书中、十二册书中，又有多少问题呢？二是说，如此庄重严肃的教材中尚且如此，那些各行其是的教辅材料和练习题中，又该如何是可想而知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一个问题，亟待解决全国语文教师的语文素质。当然，这个问题太大，解决起来谈何容易！但认真负责地从全国选择和集中素质高的教师和专家编写全国通用的教材、教辅材料和练习题，该不会是太大的问题吧。

教材的规范和更新，各种教辅材料的编写，各级考试考核，权限均在各级教育领导部门手里。这里热切地希望这些部门，能够当仁不让，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同时发动全国各个方面共同努力。首先别在教材及“教参”上出那么多洋相。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提高全国语文教学的质量。

□毛　翰

重编中学语文的新诗篇目刻不容缓

从“关关雎鸠”到“秋风秋雨愁煞人”，三千年诗史掩卷之后，20世纪已是新诗的世纪。不足百年的中国新诗，其成就当然不能与三千年古典诗歌相比，但新诗从草创至今毕竟近乎一个世纪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新诗毕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可以说，时至今日，新诗还走不出给两百块大洋人家也不看的窘境，不是新诗缺乏足以赢得读者的第一流的作品，而是缺乏集中展示佳作的第一流的选本。

而最最重要的选本不是别的，却是中小学语文课本，那是今天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青少年一代人人必读的，发行量犹如天文数字的一种文选！然而，中学语文课本（小学语文课本暂且不论）究竟选了些什么新诗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它的选目：

郭沫若　天上的街市（初中第一册）
贺敬之　桂林山水歌（初中第一册自读）
贺敬之　回延安（初中第二册）
田　间　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初中第二册）
公　刘　致黄浦江（初中第二册）
艾　青　给乌兰诺娃（初中第二册）
臧克家　有的人（初中第四册）
柯　岩　周总理，你在哪里？（初中第五册）

郭小川　青纱帐——甘蔗林（初中第五册　自读）

艾　青　大堰河，我的保姆（高中第四册）

流沙河　就是那一只蟋蟀（高中第四册　自读）

舒　婷　致橡树（高中第四册　自读）

这便是现行中学语文教科书选定的“中国新诗12首”，教科书对于一代代人有很大的教化作用，进入教科书的作品必须是经典作品，只有经典性的作品才能进入教科书，否则就可能误人子弟，这是人所共知的。那么，现行中学语文教科书的这个新诗选目能够代表20世纪中国新诗的成就吗？这个选目中的每一首都具有经典性，都适于灌输给中学生吗？它的每一首让中学生读了，都能使之热爱新诗而不是憎恶新诗吗？我不知道我们的诗人们见到这个篇目会有什么感受？反正我的感受是相当不好：

一、入选的篇目多有不当。《给乌兰诺娃》怕是艾青的最糟糕的诗篇之一了，这一点是作者本人也承认的。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就诗论诗，大体差可，“神姿仙态桂林的山”、“如情似梦漓江的水”，为桂林山水增色不少。可惜写作的年头不大对劲。“啊！桂林的山来漓江的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适逢天灾人祸，连续三年大饥荒，饿殍遍野，“1959年7月，旧稿　1961年8月，整理”，篇末标注得如此明确的写作时间，让语文教师们如何向学生解释其“时代背景”？郭小川的《青纱帐——甘蔗林》写于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头，如今读来，难免有明日黄花之感。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则不如他的成名作并因此而使作者名落右派的《草木篇》。另有几篇虽然不能说它有多大的不是，却也不能说它就是新诗之极品，不值得列入“中国新诗12首”。

二、一些好的、适于推荐给中学生的诗篇未能入选。如刘大白《旧梦之群》（三十六）、何其芳《花环——放在一个小坟上》、

绿原《诗人》、曾卓《我遥望》、余光中《乡愁四韵》等等。

三、严重滞后于新诗发展现状。12首之中，除了最后两首，全是改革开放之前5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国政治、文化生活最不正常的年代中产生的作品。而改革开放后的20年是新诗收获的黄金季节。读《语文学习》1998年第四期，见刘国正先生的一篇短文《关于“市街”改“街市”》，知道郭沫若的那首《天上的街市》入选语文课本是在50年代初。那时，新诗创立还不到40年，佳作有限，《天上的街市》入选倒还情有可原。可是时光又逝去了40多年，到了世纪末，《天上的街市》风光依旧，这就不大说得过去了。作为童话诗，今天已有不少作品超过了《天上的街市》的水平，如改革开放后的《渔人》、《稻草人》、《紫色的海星星》等，都要比它的意境美得多，思想也深刻得多。也许有人要说，后来居上嘛，不足为奇。可是，后来者真的总能跃居于上吗？艺术不是科学，一首真正的好诗，一件绝妙的艺术品，往往是空前绝后的，不可逾越的。屈陶李杜已经过去了一两千年，后来者谁敢夸口自己已经跃居其上了呢？能被“后来居上”的作品，很难说真是什么不朽的作品。郭沫若的让后来者难以跃居其上的作品，是他的《凤凰涅槃》。

我们是否过于注重所选诗作在诗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了？是否过于“意识形态化”了？初唐四杰尽管早于盛唐群贤，有开创之功，要承认其历史地位，但作为一个普及性的唐诗选本，我们却不能偏重于王杨卢骆。我们是否还在一定程度上受着左的思想禁锢，过于强调作品的思想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是老生常谈，用不着多费口舌，我只想说，在语文课堂上讲到新诗，如果教师讲得味同嚼蜡，学生听得哈欠连天，你的思想性，你的教化功能，如何去发挥作用？我们是否过于注重诗外因素，如作者的身份、地位，而对于诗坛的新人新作，又过于沉着、过于冷漠，

忘了“听唱新翻杨柳枝”？我们是否应该明确这样一个原则：教科书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为诗人、诗史服务的；是教科书选诗，不是诗摊派于教科书。

教科书编写者肯定也有自己的难处和苦衷，这个问题原本不该我辈多嘴。但这个问题关系到新诗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年轻一代的诗教和美育，也算得是匹夫有责。我只是真诚地希望，我们的教科书所选，每一篇都是经典作品，不要误人子弟，也不要误我新诗。

□杨 光

现行教材体系的弊端及改革设想

中学语文难教，难学，特别是在高中师生中，厌教、厌学已十分普遍。语文科在学生中没有什么吸引力，根本不能和数、理、化、外语竞争，甚至连政、史、地、生，也比语文更能吸引学生。最近出版的语文课本以及近年来各种关于教法、学法改革，探索的努力，都治标而不能治本，不可能扭转这严峻的形势。彻底改革现行中学生语文教材体系，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中学生学习系统知识有几个基本规律：

一、由浅入深，由低到高，循序渐进，环环相扣，“度”、“位”清楚，互不交叉、包含。

二、所学知识应不断更新，有新鲜感，从而引起学生的好奇心，激起不断学习的欲望。

三、在一定阶段中学习的内容和目的要单一、集中，以强化印象和记忆，突破重点和难点。

四、一定阶段内知识的“量”是具体的，明确的，利于师生的教、学和检验。

现行体系恰好违反了这几条规律，缺乏科学性，“量”、“度”含混重复，“序”、“位”杂乱。知识内容既缺乏新鲜感，又没有显出阶梯性。

先从编排看，从初一到高三，每册课本都无例外的是记叙（散）文、议论文、说明（应用）文、文言文这几个单元、几种文体。有人把这种体系叫做“螺旋式结构”，认为它有不断学习加深，循环往复、逐步深入的特点和优点。其实，任何一门知识都是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的，基础的东西学了以后要经常用到，这正是不断的巩固、加深，如四则运算知识要终身使用，英语的一般现在时在初一后也会不断地在以后年级中用到，但这是否意味着初一讲了一次，初二，初三、高中还要学几次呢？当然不是。设计“螺旋式结构”这种教材体系，实际上是把不断地使用旧知识同不断地讲授、学习这一知识混为一谈了，其实，各种语文知识和理科相比并没有很大难度，根本没有必要反复学习和讲授。而语文能力呢？当然要反复练习、巩固和提高，但这也有时间阶段和质量的限度。以议论文而言，通过一学年的学习和练习，是完全可掌握议论文的一般知识，可以具备一般议论文的写作能力的。

再看知识要点和学习要求。1986年出版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要求“初中一年级，阅读记叙文，能理解文章的意思和记叙的特点”，而到高中一年级，还是要求“阅读能够准确地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初一和高一已没有质的不同，是初中先抢了高中的课，还是高中重复了初中的课？

同样，1982年出版的初二册语文课本46页有这样的单元练习：“记叙真人真事，要根据表达中心思想的需要，从掌握的许多材料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事例，适当地加以组织，写成文章。”同年出版的高中一册123页单元练习也要求以“紧紧围绕

中心选择”的写法写一篇记人或记事的作文等等。这不意味着语文教学在几年中是在原地踏步徘徊吗?

又如“比较复杂的记叙”,虽然在高中一册124页的知识短文中作了一些说明,但若和初中的多数记叙文比较,高中的课文除篇幅较长外,并不能很有力地体现出“比较复杂”的特征来,如初中二册《皇帝的新装》,不仅篇幅长,而且记叙的要素完备,情节富于变化,描写方法复杂;《藤野先生》从时、地、事件、人物、篇幅来看都是“比较复杂”的记叙文等。因此,提出“比较复杂的记叙”并把它作为高中教材的一个重点有无必要?

又如“比较复杂的议论”,以《论雷峰塔的倒掉》《“友邦惊诧”论》《论鲁迅》等文和高中的不少议论文作些比较,就可以看出高中的绝大部分议论文在论点、论据、论证方法等因素上并不比初中难多少,和初中对调也无不可。那么初中生能否接受难度和高中大致相当的议论文?如果初中生能接受,何必高中再学?如果初中不能接受,那为什么不在高中阶段再学呢?初中学深了,高中再学又旧了,一再“炒陈饭”,学生难以激起学习的兴趣。尽管我们从初一到高三反复几十次地给学生讲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讲围绕中心论点选择论据,也只能得到“少、慢、差、费”的后果。

文言文也缺乏知识阶段性。如初二册《扁鹊见蔡桓公》、《论语》六则、《乐羊子妻》、《伤仲永》、《寓言三则》,篇幅虽短,但难度已不亚于高中的多数课文。其中已有意动、使动,“然”字结构、“者”的几种用法,“之”的无实义用法等。而高中五册的《治平篇》、《过小孤山大孤山》等篇,除篇幅稍长外,又比《扁鹊见蔡桓公》深在哪里?再说,每册文言文大都按年代先后排列,实在是对学生不负责任的同时也是不科学的作法,我们能说先秦文言文浅显而明确的就深吗?而且使动、意动、名词活用作

动词、名词作状语等特殊用法都在初中讲过。高中除了再三重复讲授外，还在二、四册后列专文作了较系统介绍，这中间有多少是作了无用功?

这个体系的阶段训练内容和目标也总是综合性的，面面俱到的。重点不突出，目标不单一，训练不集中。每期、每个单元、每一课的练习基本都是面面俱到，无所不包。先是中心、主题，然后是选材、结构，再后是表达方法加修辞，最后是用词炼字。从学一篇课文看是很全面的，可是从一个阶段来看，学生总是四路出击，不能集中时间和精力对某个知识难点和重点作连续的思考和突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如“围绕中心选材”这个知识和能力要点，从初中讲到高中，练到高中，可是高三的学生还是常出问题。为什么学生学勾股定理、氧化还原反应、杠杆原理等就是一次即可牢固掌握，不必再教呢?重要的原因即是这些知识和相应的计算能力是在一个阶段单纯、集中地学习和训练并加以巩固的，同时并不学其他内容。相比之下，“围绕中心选材”的讲解和练习、分析总是和结构、修辞、用语等一起进行而被冲淡了，所以费时费力虽多而效果总是不好。

我们再看《大纲》12 页上对高中一年级的教学要求，共有“阅读能力、写作能力、说话能力、基础知识”四大类共 34 项，而高中一年级两期以每周五节计共有 220 课时，除去复习、考试和各种安排，大约只有 190 课时。这中间要教 60 篇课文（新版书更多），思考与练习 240 道，单元练习 9 个，知识短文 8 篇，两周左右一次大作文。即使加上每周三次的早读，师生们在匆匆赶完这一切时，还有无可能来系统地、有条理地达到这四大类 34 项的教学要求?

这个体系还严重缺乏量度标准，因而缺乏科学的检验尺度，这就使师生教学时心中无数，考的没学，学的没考。如在中学六

年，应学新字多少？新词多少？“能阅读一般的文艺、科技、政治读物”的能力为何没有量化标准来衡量和检验师生们是否达到教和学的效果？又如作文，初三应会使用哪些句式、写出多少字、多大难度的文章？错别字限于多少，语言的不畅通限于什么程度和数量？高中与之相比又具体高在哪里？“浅易的文言文”的“浅易”怎样体现出来？

反观其它科，知识阶梯性强，每课每单元都是新知识、新内容，加上没有很好的课外学与练的条件，缺了一两节就少了一部分知识，还要影响到以后的学习，学生自然不敢小看。而语文缺上十天半月的课有什么影响？而语文科得天独厚的课外学习条件反而促成学生轻视语文、学不好语文，这是很值得研究的。

语文教学正面临危机。现行中学语文教材体系的重大弊端造成了“少、慢、差、费”，厌教厌学的恶果，不彻底改变它，中学语文教学就走不出死胡同！

那又怎么改呢？

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集思广益，笔者认为应照以下几点精神来考虑：

一、知识内容和文体按初、高中划分阶段，一种知识和文体只学一次而不重复，初中不抢高中的戏，高中也不重唱初中的调。

二、减少中学语文课时和篇目。

三、增设《初、高中读写能力分列表》，以利师生检验教、学效果，提高语文检测的量化水平。

四、增加辅助材料，尽量体现出知识的具体化和量化。

五、入选课文应根据“难度系数值表”，从而确定它在教材体系中的“序”和“位”。请看下表。

对这个表必须作一些说明：

中学语文教材体系结构表

年级	文体和单元划分	知识能力的学习和培养	知识短文与附录
初中一年级第一册 每周3课时共有课文26篇	学习记叙文　分三个单元 1. 记人为主的11篇 2. 记事为主的10篇 3. 民间传说和故事5篇	记叙文的知识，记叙文的阅读、写作、修改能力；口头记叙能力、书写能力（包括书法和书写格式）	1. 记叙文的阅读知识 2. 记叙文的写作和修改 3. 标点符号的应用要求 4. 文学常识 5. 词和词组 6. 记叙中几种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 7. 单句（一） 8. 单句（二） 9. 修辞常识 10. 民间传说和故事 11. 怎样使用字典和辞典 13. 谈谈书写的格式 14. 书法常识 附录：1. 词汇表 2. 常用字表 3. 常用句式表
初中二年级第二册 每周3课时共有课文25篇	学习说明文　分四个单元 1. 介绍性说明文9篇 2. 记叙性说明文6篇 3. 文艺性说明文5篇 4. 阐述性说明文5篇	说明文的知识，说明文的阅读写作和修改能力；口头说明能力； 书写能力	1. 说明的对象、方法、顺序和语言 2. 复句 3. 说明文的分类 4. 句群 5. 说明文的写作与修改 6. 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 7. 说明文的科学性和知识性 8. 说明文的趣味性及科学小品文 附录表 1. 词汇表 2. 常用字表 3. 常用句式表 4. 现代汉语语法表
初中三年级第三册 每周3课时共有课文42篇	学习应用文　分四个单元 1. 日常生活类12篇 2. 社会交往类12篇 3. 工作生产学习类9篇 4. 法律契约类9篇	应用文的知识，应用文的读写、修改能力； 几种应用文的口头表达能力； 书写能力；	1. 说明文、应用文及实用文 2. 应用文的语言 3. 应用文的格式 4. 应用文的分类 5. 应用文的变迁 6. 应用文的写作、修改的几个问题 附录表 1. 词汇表 2. 常用字表 3. 初中语文知识要点序列表 4. 初中写作能力分列表 5. 初中阅读能力分列表

续　表

年　级	文体和单元划分	知识能力的学习和培养	知识短文与附录
高中一年级第一册 每周3课时共有课文28篇	学习议论文　分三个单元 1. 立论与驳论类12篇 2. 杂文类10篇 3. 文艺评论类6篇	议论文的知识，议论文的读写、修改能力； 口头议论文论辩能力；	1. 议论文的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 2. 论证的组成和结构 3. 立论和驳论 4. 关于口头演讲和辨论 5. 杂文及其变迁 6. 议论文的语言及雄辩性 7. 不同类别的议论文 8. 关于文艺评论 附录： 1. 词汇表 2. 常用字表 3. 论证方法一览表
高中二年级第二册 每周4课时共有课文38篇	学习文言文　分四个单元 1. 写人记事类10篇 2. 游记类6篇 3. 骈赋类7篇 4. 说理类15篇	文言文的知识，文言文的阅读，鉴赏能力； 文言文的朗读、背诵能力；	1. 文言词类活用 2. 文言句法 3. 文言文的翻译 4. 文言虚词 5. 文言固定结构 6. 古代文化常识（一） 7. 古代文化常识（二） 8. 关于骈赋 9. 古代的游记文 10. 古代的说理文 11. 古代文体的分类 12. 古代文体的演变 13. 文言中的修辞 14. 古代语言的演化 附录： 1. 古代汉语词汇表 2. 古代汉语语法表 3. 著名古籍简介表 4. 介绍几部学习古籍的工具书
高中三年级第三册（上、下册） 上册：37篇四个单元 下册：39篇四个单元	学习文学作品　分八个单元 上： 诗歌 中外新诗一个单元 中国古典诗歌一个单元 散文 写景类　一个单元 叙事类　一个单元 下： 小说中国古典小说一个单元 中国现、当代小说一个单元 外国近、现、当代小说一个单元 戏剧：中外戏剧剧本一单元	文学作品的知识、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能力； 文学作品的朗诵能力； 散文、诗歌的写作能力	1. 关于散文的分类及散文的抒情性 2. 文章的"三分法"与"四分法" 3. 散文的"散"与"不散" 4. 叙事散文与记叙文的联系与区别 5. 我国散文的悠久历史与辉煌成就 6. 关于现代自由诗 7. 诗歌常识 8. 我国古典诗歌的体格和用韵 9. 怎样欣赏古典诗歌 10. 怎样欣赏外国诗歌 11. 我国古典小说的形成与发展 12. 古代白话与现代白话 13. 小说的几个要素 14. 外国小说的形成与发展 15. 外国文学简介 16. 中国现、当代小说概貌 17. 戏剧常识 18. 中外戏剧发展简介 附录 1. 中国现、当代文学 2. 中国古典文学 3. 现代汉语词汇表 4. 现代汉字表 5. 古代汉语词汇表 6. 高中语文知识要点序列表 7. 高中写作能力分列表 8. 高中写作能力分列表

一、按照这个设想来改革，能达到《大纲》的教学要求，它有以下几个优点：

1. 知识体系的逻辑性较强，知识界限较清楚，阶段性强，梯度明显。

2. 学习内容阶段明确，知识要点和能力训练等基本不重复。师生打开课本，每个年级、学期，每个单元都是不同的新内容，自然会大大提高教与学的兴趣；而每种知识和文体只学一次，也可提醒学生勿失良机，这期内容学不好，以后还要受影响。

3. 知识的量度比较具体。学完一年，该掌握多少字、词、句式、篇章结构、文体，师生都心中有数，且检测也很方便。

4. 大量减少课时，初中减去二分之一，高中略三分之一，充分体现语文基础工具课的特点。

二、小学已学过一些记叙文，在此基础上学生完全能步步深入学习和掌握这一文体，故把它放在初一。取消“比较复杂的记叙”。

三、在学习记叙文的基础上初二学说明文也不成问题，取消“比较复杂的说明”。

四、考虑到大部分初中生不能上高中，思辨能力也较弱，故在初三学习应用文而不学议论文。高一学生较之初中是比较适合学习议论文的。

五、学习文言文要有较扎实的现代汉语功底，而初中又同时在学习现代汉语，未及消化熟练，又加文言文，效果自然不好。打好现代汉语基础之后集中学习就会“事半功倍”。

六、从各方面看，高三生学文学是水到渠成的事。初中生大致能掌握情节，但深刻体味其中的人生、社会意义和批判精神，是不能和高中相比的。

文学内容到高三才有，是否不利于学生从小就接受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传统的熏陶，从而导致语文能力发展和知识的缺陷呢？要知道，古人7岁发蒙读私塾，背的大量诗文只是供以后消化的“反刍性知识”，既然从小就读小说和背诗不能取得最佳效果，而教学时间有限，那为什么不照科学规律办事以事半功倍呢？另外制定教材体系必须针对实际，现在初中生是六科并举，负担很重，语文教学只能面对大多数对语文并无特殊兴趣的学生，只要在初中三年中达到了记叙文、说明文和应用文的读写要求就应视为达到了升高中或就业的要求。至少少数学生爱好语文且又有足够时间，那他们是完全可以多读小说和背诗的，甚至在初中就自学完高中课程而参加高中的考试，但这毕竟是少数人。因此，初中不设文学内容并无大害，反而有利于学生集中时间和精力学好更为实际有用的知识。

七、一个学期乃至一学年只学一种文体，会不会单调枯燥而产生厌烦情绪？不会。以最“简单”的应用文而言，它种类繁多、格式各别，语言很讲究，在一年中要了解掌握三、四十种常用文的读写知识并培养成相应写作能力也是不容易的，如书信、日记、小传、通讯、对联等，学几年也未必精通，且内容又是不断更新的，机会只有一次，学生是不会厌烦的。其他如文言文等就更不必说了。

八、大量减少篇目，第一是由于集中学习，很多课文一集中比较就显得重复而无特色。第二是维护课文的典范性。课文始终是典型和范文；是中学语文知识的集中体现和示范，因而贵在精选。典型不必多，课本永远是课本而不是读本，其目的是“举一反三”而不是“览十知一”，只要学生通过它们而掌握了一定知识和阅读的方法技巧，那他就能自由地进行大量的课外阅读，又何必局限于课本呢？

九、适当增加外国的课文和当代的课文。近年来师生反映教材太陈旧，的确，不能认为人选课文只是过去的好，名家的好，进入文学史的好，中国的才好。外国除小说外的篇目太少及当代的东西太少，是不利于学生面向现实及未来的世界，不利于他们兼收并蓄、发展多向思维能力的。

十、根据学习内容要尽量集中单一的原则，设想在每一课前保留现行新教材的阅读提示之类，课后不再设“思考与练习”，待一单元后再做“单元写作和阅读”训练。其中包括单元主体（即重点知识）训练七、八道，单元基础训练两、三道。

第三辑

为语文号脉



□王 岱

不仅仅是应试教育

最近媒体广泛关注语文教学的问题，抨击应试教育。我在反思应试教育之余，想到了一点别的东西。

上学期高一新生写作文《变化》，有近 1/3 的学生写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形势报告，从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计划生育，到国际大环境无所不包。你透过文章看到的不是一张爱思考、有个性、青春、稚气的面孔，而是会议桌前的官员或新闻播音员。即使没有写成形势报告的，大多结尾如同商量好了一样，真可谓不约而同："从这点变化我们看到了在党的领导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引下，祖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一定要……"这种结尾可以说几十年不变制。我问学生真喜欢这样写吗，得到的回答是："不喜欢，不过一直这样写。"为了弄个究竟，我翻看了省城一个在社会上很具影响的小学的三年级学生的作文本，有这样几篇：《长征》、《香港回归》、《精神文明建设》、《庆祝十五大》、《一件好事》、《……记游》。看着这些题目，我感喟良久。一个不到 10 岁的娃娃怎么能载动这么重大意义噢！再仔细看内容和评语，真让人难受。十岁的孩子能写出"沧海桑田"这样的词。问他懂不懂？"不懂，是从班上黑板报上抄来的。"这六篇作文只有游记这篇分数低，老师的评语是：思想不深刻，中心不突出，重写。其它五篇分数高，评语好。"那些篇

都是爸爸从报纸上找来的，当然老师就说好了。”孩子说的不错。这几篇的确都是报纸社论的语言，《一件好事》无非是捡钱包、让座，20年前的我也是这样写的。唯有游记是孩子鲜活雅气的语言和孩子独特的思路。人们一眼就能断定哪是孩子写的，哪是抄报纸上的，而评语竟然这样颠倒，真不知是老师出了毛病，还是别的地方出了问题。

从这本作文，我们就可看出，孩子不说报纸上的话不行，不和属于成人社会的正统保持一致不行。这扼杀了他们的个性，剥夺了他们的独立思考。过去八股取士，不也如此吗？要和正统的儒家保持一致，语要出自《四书》、《五经》毕竟还不是赤裸裸的政治，它是“人之初，性本善”，是哲学，是伦理，其生命毕竟还是长久的。从小就给孩子灌输这些，孩子已经不会说自己的话了。孩子是为了迎合老师，老师是为了迎合中考、高考，那高考又是为了迎合什么呢？

一次高考阅卷，一位已50多岁的老教师对我说“我就看不惯那些写猫了、狗了的，真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调。”听之愕然。这种教育已渗透到人的潜意识，形成了如此情结，教育的“力量”不可谓不大矣。悲夫！

我总觉得，把现行语文教育的弊端完全归罪于应试教育，似乎还不尽然。文革时没有升学这回事，学生不是照样写出“庆九大”、“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新八股吗？这又让人想起大跃进时，上至大诗人郭老下至七八十岁的农村老太太不都写出了分不出你我的口号诗吗？这和高考似乎也没关系。

现在教育的弊端，不仅仅是应试教育的问题，而是一种人文价值、人文底蕴流失的表现，是一种社会政治庸俗化、功利化的集中反映。我记得著名学者王晓明先生讲过这样一句话：“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在精神上越走越窄。”也许现行教育的症结就在此吧！

□吴　玫

无奈的语文课

——复旦大学文科基地采访手记

语文教学的终极目标不是高考

〇吴　玫　《中文自修》杂志特约记者

●陈尚君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这位68届初中毕业生虽说中学、大学加起来才读了两年，如今却在唐代文学研究上多有建树。最近他在国内文坛上引起的一次震动是对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提出质疑。

〇旁听了一整天文科基地班招生考试的口试，发现你们的考题诸如亚洲金融风波的始末、德国古典哲学有哪些代表人物和他们的主要著作、评价一下张爱玲的小说等等，超出了中学教学的范畴，特别是你们的考试方式，是让学生自由发挥并在适当的时候提些考题范畴之内的甚至是考题外的问题，这与我们习惯了中学考试的方式大相径庭。对这种考试方式你们有把握吗？

●我们的考题和考试方式是走出了中学教育的规范，因为我们不仅仅为考试而考试，我们要通过口试寻找出考生中那些有潜力的人。他们必须阅读面广，有读书的感觉，有自己独到的想法，而不是人云亦云。

在出考题的时候我们就没打算考生们能将这些考题回答得尽

善尽美，事实你也看到了，有些考生根本就是答非所问，但是，我们会顺着考生的思路问些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些是与他们的考题密切相关的，有些则是因为考生的回答不尽如人意，我们及时掉转方向，看在别的方面他有无长处。我们觉得采取这样的方式更能选拔到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但是，我们也有向中学教育的规范妥协的时候，比如我们的笔试，就是循规蹈矩地考同学们的阅读理解，因为这毕竟是正规的升学考试。

○我注意到您在提到中学教育的规范时用到了“妥协”这个词。除去小学，初中3年、高中3年，您认为统共6年的中学语文教学对中学生有什么作用?

●主要是写作能力训练，至于文学素养，作用不明显！目前的考试不是用来选拔杰出人才的，而是让中等智质者有一个机会。中学教师为了让尽可能多的学生通过高考，他们也是无奈。长期以来，中学语文老师多少年不变地教学生辨析词义、概括段落大意、总结中心思想，并且有标准答案。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会自由地思维。一位中国现代文学教授曾在他教的那个班里做过这样一件事，他让全班近40名学生说说读了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后的体会，结果答案是千篇一律的。任何事物在不同的人的眼睛里都有不同的看法，更何况是文学作品！现在中学语文教学训练学生的方法，让我们感到痛心的是抑制了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学术研究要求从事研究者追求真理，不依傍权威，这权威包括师长、大人物，或者一时的政治风气。但是，据我对已在复旦就读的两届文科基地班同学的了解，他们非常乖顺。能与老师辩驳的学生才是好学生，眼下这些学生缺乏的就是这种才能和魄力。

○您认为中学语文教学应该做些什么?

●中学语文教学应该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对学生进行文学素养和作文能力的训练。语文教学的终极目标不应该是高考。语文教学不等同于应付高考，把学生训练成高考的机器是一件残忍的事情。

文学素养的高低取决于阅读量的大小，我们所说的文学品位是一种长期积淀的结果，语文老师应该在这方面做学生的引路人。但是，我们又很同情中学语文老师的苦处，所以，我们呼吁高考形式的改革，真正体现向素质教育的转变。

要对他们进行刮骨疗法

他们，指的是已经在复旦读了两年书的95级文科基地班的学生。说这话的是他们年轻的学术导师钱文忠。

年轻的钱文忠也是今年文科基地班面试的考官之一，“要对他们进行刮骨疗法”这句话，就是那天旁听面试时听他说的。那天，这句话他说了不止一遍，所以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于是，采访钱文忠老师就从这句话开始了。

年轻的钱文忠老师有着与他的年龄颇不相称的丰富经历，而他最终舍弃了许多东西选择了教师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这多少与他对中国教育特别是语文教学的独特见解有关。

钱老师曾经在德国呆过几年，在德国他特别关注了一下那里的中学教育。他说，德国的中学在进行母语教学的时候经常做一种练习，这种练习翻译成中文叫做概述。为了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在学生们做概述的时候，教师也成了一名学生，与他们一起做，教师的职责就是将全班同学做的概述综合成一种最好的。他们认为“教师是独立思考的学习者，学生是受指导的独立思考的学习者。”

重提自己在德国的一段往事，钱老师当然是有感而发，有感

于这两年来对95级文科基地班学生的了解。“比如，我给他们上课时提个问题给他们，结果全班同学中没有一个人想过要回答我的问题。他们不是不能回答我的问题，他们那种神态让我一眼就看出他们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回答我的问题，他们就那么理所当然地等着我的现成答案。”这与陈尚君教授对这些学生的看法不约而同。这些学生对老师“喂”给他们的东西连消化一下都不愿意，更不要说去体验一下自己的“胃”是否承受得住老师“喂”的东西了。

怎么回事？只要稍稍与我们周围的儿童接触一下，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很喜欢问为什么，他们看着天空会问我的风筝能不能飞上火星，他们踩着大地会问我使劲儿跺一脚美国能不能听见。为什么？在经过了10多年的学校教育后，知识的积淀反而使他们变得迟钝起来了。

“我总感觉有一个苏拔这样的人物在控制着这一切。”苏拔？这个今天听来有些陌生的人物，是20多年前在我国引起过轰动的美国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中的一个角色，在这部电视剧中，苏拔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只为一个目的：控制人类。

那么钱文忠老师感觉到的那个让学生都变得不愿意思想的苏拔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他说：“我曾经与我那些如今仍然是中学语文教师的同学交流过，他们在上课时竟然拿着教案照本宣科。”

岂止是拿着教案照本宣科！每一个教师的教案在拿进教室前必须符合一个条件：与教学参考资料对照过！因为教师们的教案总是要被人检查。凡是现在正当着中学教师的和曾经当过中学教师的以及了解中学教师这一职业的人，对这一事实已经见怪不怪了，为什么钱老师对此会感到如此惊诧？因为按照他的理解，除了像实验课这样的课程外，语文这样一门需要老师和学生一起最

大程度地发挥自己想象力的课程，不应该太受教案的束缚。

可是，坐在中国的课堂里读小学、初中、高中的孩子们有多少人有这份幸运？因为教师的教案是“程式化”了的，而同学们在考试的时候往答卷上写的必须是那些“程式化”过的东西，那么，他们还要自己的脑袋干什么？

其实，当一个婴儿出生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个性独特的人，我们教育的目的难道就是为了将他们培养成不会自由思考的人吗？教育家吕型伟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学校培养出来的人都是一个样子的，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在自己的专业上已经很有建树的钱文忠老师在过去的两年中除了给95级文科基地班的同学们上课和指导他们做读书笔记外，他每星期还要用大约5个小时的时间跟他们聊天、谈心。他对他的学生们说：“只要你们想和我聊天、谈心，什么时候都可以来找我，哪怕是在寒冬腊月的夜半三更把我从被窝里叫出来。”他这样做无非是想实现他的理想，那就是培养出几个、几十个将来能在学术研究上有所成就的人。然而令他失望的是至今都没有找到一个他想要的那种学生，所以，他几次三番地呼吁要对这些学生进行刮骨疗法，因为一个人的思考方法是在中学里形成的，等到他进入大学后再要求他独立思考，很难，很难！

语文对我们的影响是综合的

虽说已事隔两年多了，但95级文科基地班的同学对自己在口试时回答过的问题却记忆犹新：“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我们的‘们’与英语中的S有什么区别”、“19世纪、20世纪的伟大人物有哪些？请评价其中的一位”、“你知道哪些中国古代思想家并介绍其中的一位”……当然，对自己走进口试考场时的那一刹那间的感觉，就记忆得更清晰了。“我们一下子都懵了。”他们

这样说。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他们找到了自身的缺陷——那便是知识面非常狭窄。毕竟在复旦校园里被熏陶了两年多，如今他们的话语里更多的是对自己的反省："也许是我们中学的语文老师没有很好地引导我们，但主要问题还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中学的有些语文老师是很可怜的。"虽说来自不同的学校，但是，95级文科基地班的同学都这样形容自己的语文老师。

当问起中学语文老师对他们的影响时，毕业于上海中学的王征说，她的语文老师教会他们读课外读物和做读书札记。毕业于向明中学的黄景誉说，她记忆最深的是他们语文老师利用每节课前的几分钟让他们轮番上台说些自己想说的话。毕业于建平中学的吴欣春说，她的语文老师总是尽可能地讲些课本外的东西给他们补"营养"，但是，总是说着说着就刹车道："好了，我现在变得庸俗了，接下去我不得不说些你们要考试的东西。"吴欣春的话说到这里，围在一旁的同学们频频点头。

3年初中、3年高中，老师们不知道花了多少心血向同学们讲了许多他们不得不说的东西，而求知欲最旺盛的同学们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接受了多少他们为应付考试而不得不接受的东西，这些东西对同学到底有多少用处呢？

"除了古文的那种字、词、句的敲打为我们现在阅读古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外，别的就没有什么用了。"95年文科基地班的同学们这样评价他们中学6年的语文学习。

"我们的语文老师在教我们现代文的时候，总喜欢挑选出名家名篇中的某个词，说这个词用在这里是多么多么的好，换了别的任何一个词都不行，他怎么比作家自己都了解自己呢？特别是他们非让我们记住的中心思想，弄得我们好长时间都不能摆脱看事物喜欢单向思维的习惯，中学语文教学对我们的影响是综合的。"这是一些过来人对自己在中学里接受的语文教育的评价，

或许是他们读了两年大学后对曾经给过自己许多东西的中学语文老师批评得过多？那么，我们不妨带着这样的题目“你怎么看你的语文课”到中学校园里去走一遭。

殳俏（市一中学）：语文课给我的感觉非常不好。语文应该是所有学科中思想最活跃、最能让我们发挥想象的课程，现在却把我们禁锢得最厉害。数学题都允许有两种甚至更多的解法，为什么到了语文课上任何问题就只能有一个答案？我们把语文课当成了休息课，老师教得也没劲。名家名篇被弄到一个单元里就变傻了，让我们感觉那根本就是名家留给我们的作文选。我们从语文书上读到的文章观点都是一致的，连个对比都不让我们感觉，哪怕拿出一篇坏文章指导我们去批判也好呀。

董晨晨（市三女中）：语文课实在是太枯燥了，特别是说明文和鲁迅先生的作品。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鲁迅先生的作品最有可能出现在语文试卷上，所以，凡是鲁迅的作品老师都讲得很细很细，我们的笔记也记得很多很多，直把课本的边边角角都用上了还不够，手都酸死了。文学作品被肢解得那么糟，还有什么味道？老师在给我们讲文学常识时我们最开心，但是，老师在讲这些东西时总是有所控制的。

石乐（控江中学）：我的语文天赋都被活埋了，现在的语文课都上得硬梆梆的。在我的脑子里，语文老师的形象是这样的：中年过一点离老年还有一段距离，1/3 的头发是白的，还有 2/3 是黑的，是染黑的。他是一个老头，有点儿胡子碴儿。上课时他总在说“反映的社会是黑暗的”、“女性正在受压迫”，并老是无聊地一个接一个地用形容词。比如，他说“这个人就是这么爽”，隔 3 秒钟他再说“这个人就是这么爽直”，隔 3 秒钟他再说“这个人就是这么直率”。作文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不仅是说明文，连散文都有了框架，有诗为证：开头提出小问题，一线一定要到

底，还要边叙边夹议，结尾点出大道理。

……

这些，就是现在正在就读的中学生眼中的语文课。当然仅是一部分学生，这样一门对学生产生综合影响的课程，竟留给学生如此的印象，不知道语文老师们会作何感想。

他们的语文课是怎么上的

采访敬业中学的陈洁、王晓青和虞翔，是陈尚君教授的建议，因为敬业中学推荐去参加复旦文科基地班考试的这三位女生，不仅全部及第，而且成绩名列全部考生的前茅。“你去看看他们的语文课是怎么上的。”这是陈教授的原话。

“你们的语文课是怎么上的?”陈洁一听到我的提问，就不加思索地向我讲起了她的语文老师王瑞璐。“我们王老师的知识非常渊博，仅读书卡片就有那么多”，她拿手比划着，“有的卡片已经泛黄了。这些卡片中有的是从书中摘录下来的精彩片段，有的是我们王老师的读书心得。从高一起，我们课代表就从王老师那里拿来一些读书卡片隔三差五地往黑板上抄一张。像其他班级的语文老师一样，我们王老师也要求我们练笔，他把我们每 4 个人分成一个小组，每次的练笔就由小组来评判。4 个人中轮流由一个同学当主评，把对练笔的意见写在练笔本上，其他三位同学如果有补充意见可以接着往上写。这样，我们王老师要批阅的就不仅仅是练笔了，还有我们自己写的评语。”

就是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训练中，陈洁学会了读什么书，怎么去读书，她说她如今也做学习笔记，买的就是王老师那样的卡片。陈洁的读书卡片中有的是摘录书中的“华彩乐章”，有的是她读着书时的想法。而王老师那种让同学们自己去评判练笔，并试着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的教学方法，则让同学们在无

意之中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事情。那么，我们就不会对为什么来自敬业中学的三位女生会在这一次口试中脱颖而出感到奇怪了。王晓青和虞翔特别向我介绍了他们高一、高二时的语文老师——年轻的苏老师："她给我们的东西是那么丰富，常常是讲一首唐诗她会交给我们与之相关的另外五六首，教我们《前出师表》还将《后出师表》抄在黑板上指导我们欣赏。特别是在讲莫泊桑的《项链》时，她除了按照教学大纲，还让我们特别关注流淌在作品里的人性美。"在苏老师教她语文之前，王晓青的语文成绩常常是六十多分，如今，她不仅喜欢上了狄金森的诗，还把文学作为自己今后追随的方向。

原以为苏老师是一位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校长黄政民却说苏老师教虞翔他们语文时，才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那么，您不害怕她会影响同学们的考试成绩吗?"三位同学异口同声地插话道："现在，苏老师正领着我们全力以赴地应付考试呢。"一旁的黄校长笑了。

无论如何，敬业中学的语文教学是生气勃勃的，这种气象与语文教师出身的黄校长有密切的关系。仅就学校开设的选修课来看，涉及语文的就有"思维与写作"、"古典文学"、"影视文学"、"散文欣赏"，等等。黄校长反复强调，语文教学应在大纲的指导下进行而不是在考纲的指导下进行，所以，他很赞同王老师、苏老师在不影响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前提下开拓学生视野的教学方法。

令黄校长感到遗憾的是，由于选修课的成绩在升学中不能起一定的参考作用，这多多少少影响了同学们参与的积极性，仅靠现成的语文教材学习语文，与真正的语文学习有着很大的距离。"我们要求教师要为学生着想，多在能力培养上下功夫，让同学们能在今后的发展中有方向、有潜力。"黄政民校长如是说。

□余　杰

阉割外国文学

——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外国文学作品的分析

一个关于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越是拥有自信心的民族，越是敢于面对其他民族创造的文明成果；越是没有自信心的民族，越是不敢面对其他民族创造的文明成果。中国盛唐的文明，就是建立在广取博收基础上的。那是沧海与泰山的气度。唐代以后，中国社会日趋封闭，中国人习惯了以一种傲慢的心理对待外来文化，于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也日趋衰弱。一种文明的生命力，是以它兼容性的强弱为表征的。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开放的姿态更是衡量一种文化是否有生命力的第一条件。可能说，哪个民族的青年一代能够具有“兼容并包”的精神，哪个民族就有希望在下个世纪的激烈竞争中取胜。而这种“世界”的眼光、“世界”的胸襟，是从孩子开始培养的。

中学语文教育是培养青少年文化观念和文化选择的重要环节。中学语文课本必须体现出开放时代中国的开放心态，新一代中国青年必须具备多元的文化选择和健全的文化品位。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现行中学语文课本不仅没有具备起码的“世界文化”的眼光，反而对外国优秀的文化成果抱着一种敌对的态度。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上分析：一是选文的数量，二是

选文的标准，三是对文章进行的分析。从三个方面都能够看出，语文课本的编选者对跟中国文学同样源远流长和丰富多彩的外国文学进行了阉割和改写，把非常片面和狭窄的所谓“最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灌输给孩子们，进而对这些作品作了极其可笑的扭曲。这种教育思路对新一代青年形成正确的文化观念极其不利。

一、外国文学作品选文数量

首先，我们不妨对12本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的外国文学作品进行一番统计。(初中语文课本根据1996年由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与北京市教育局教学研究部编著、由北京出版社与开明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课本，高中语文课本根据由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二室编写的、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课本。)

初中语文课本中，课文一共有182篇，其中外国文学作品19篇，占10%；高中语文课本中，课文一共141篇，其中外国文学作品9篇，占6%。初高中12册课本，总共收范文323篇，其中外国文学作品一共28篇，占总数的9%。具体篇目如下：

初中第一册（共33篇课文，外国文学作品3篇，占9%)：都德《最后一课》、安徒生《皇帝的新装》、莫里兹《七个铜板》。

初中第二册（共36篇课文，外国文学作品5篇，占14%)：吉尔贝·塞斯布隆《干涸的眼睛》、契诃夫《变色龙》、德富芦花《春雨》、《晨霜》、奥斯特洛夫斯基《生命的意义》。

初中第三册（共31篇课文，外国文学作品5篇，占16%)：琳达·里弗斯《眼睛》、伊索寓言《赫耳墨斯和雕像者》、《蚊子和苍蝇》、莫泊桑《我的叔叔于勒》、契诃夫《柔弱的人》。

初中第四册（共32篇课文，外国文学作品4篇，占13%)：雨果《“文明”与“野蛮”》、高尔基《海燕》、布丰《松鼠》、泰格特《窗》。

初中第五册（共 26 篇课文，外国文学作品 1 篇，占 4%）：马克·吐温《竞选州长》。

初中第六册（共 24 篇课文，外国文学作品 1 篇，占 4%）：左拉《铁匠》。

高中第一册（共 28 篇课文，外国文学作品 1 篇，占 4%）：法布尔《蝉》。

高中第二册（共 28 篇课文，外国文学作品 2 篇，占 7%）：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高尔基《时钟》。

高中第三册（共 23 篇课文，外国文学作品 3 篇，占 13%）：巴尔扎克《守财奴》、契诃夫《装在套子里的人》、莫泊桑《项链》。

高中第四册（共 26 篇课文，外国文学作品 2 篇，占 8%）：普希金《致恰达耶夫》、惠特曼《啊，船长，我的船长!》。

高中第五册（共 19 篇课文，外国文学作品 1 篇，占 5%）：欧·亨利《警察与赞美诗》。

高中第六册（共 17 篇课文，外国文学作品无）。

从具体比例上来看，外国文学作品少得可怜。（其中，布丰的《松鼠》、法布尔的《蝉》、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等，能否算是文学作品还值得疑问。《松鼠》与《蝉》是科普文章，而《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则是应用文字。从审美的意义上来看，它们不是严格的“文学”。）按理说，外国文学作品至少应当占课文总数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但是在现行课本中，这一比例远远没有达到。

显然，编者对外国文学是持一种轻视的态度，他们仅仅把外国文学看成是课文里的“点缀”而已。他们对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不是持一种平等的眼光，如果说中国本国的文学作品当成是宴会上的主菜，那么外国文学作品就只能算是一道可有可无的水

果。“天朝大国”的心态显露无遗，我们是“夏”，他们是“夷”，我们的文学是最好的，他们的文学是次一等的，我们选进一两篇就已经是给他们面子了。这种所谓的“民族自豪感”是最要不得的。我们应该让下一代人树立“人类文明”的观念，即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把人类文明史上一切优秀的成果拿来为我所用。仅仅是让中学生学习 20 多篇外国文学作品，无论如何也让人“莫名惊诧”。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总字数大约 5 万上下，按照中学生正常的阅读速度，一天的时间就能够阅读完，然而，这就是他们 6 年学习外国文学的全部。

二、外国文学作品选文标准

从编选方针来看，编选者的思路有更大的问题。中学语文课本中究竟介绍了哪些外国文学作者呢？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们很难想象在公元 1999 年，20 世纪的最后一年，我们的中学生还在学习在这样陈旧的观念左右之下编选出来的课文。看看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我们似乎又回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

如果说选入的 20 多篇外国文学作品，虽然数量少，但如果篇篇都是佳作，那还情有可原，因为编选者毕竟做到了“少而精”。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入选的许多作品在文学意义上远远够不上“好作品”；而只能算是政治意义上的“好作品”。编选的标准并不是文学和美，而完全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编选者认为，凡是暴露西方世界阴暗面的作品就是好作品。这是他们从浩如烟海的外国文学作品里挑选好作品的唯一的标准。只要通过这些作品把“资本主义世界一片漆黑”的真理告诉给孩子们，就达到了编选教材的任务。编政治教材可以用这样的思路，但是编语文教材这样做就让人哭笑不得了。让人遗憾的是，如今统治语

文课本编者头脑的仍然是这样的思路。

就具体编选篇目来看，问题层出不穷。我仅仅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课本中的篇目几乎全部是所谓“现实主义”的作品，而且这个“现实主义”还必须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批判现实主义”。而两千年以来，世界文学潮流此起彼伏，百花齐放，为什么只选其中一种，而回避其它所有流派呢？编者不能以自己的喜好来约束学生的眼界。长此以往，学生只能欣赏“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而拒绝其它文学流派的文学作品，学生心中的“文学”是单一的、偏狭的文学。从时间跨度上来看，仅仅以19世纪为主的有没有问题呢？历史上若干时期的伟大作家为什么就能够一笔勾销呢？就散文而言，蒙田、培根的散文达到了极高的成就，而且文风流畅自然，非常适合中学生阅读，为什么把他们也排斥在外呢？就19世纪文学而言，编选者也只选“批判现实主义”，而对浪漫主义的作家都不屑一顾，更不用说20世纪沸腾的流派了。连歌德、席勒、拜伦这样一大批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都被放在一边，其他人还有什么话说呢？

第二，在编选者心中，作品的内容和题材比作品的文学价值更重要。只要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阴暗面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反之亦然。在12本课本中所选入的外国文学作品里，揭露性的占三分之二以上。其他则是小部分科学小品、寓言、童话、神话等没有多少“阶级性”的作品。通过这些作品，中学生不可能对世界得出正确的认识，更不可能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例如，编选者似乎对契诃夫的特别感兴趣，在课本里一共选入3篇。契诃夫固然重要，但在语文课本有限的篇目之内，仅仅契诃夫一个人就选进三篇，是否有点偏颇？就俄罗斯文学传统来看，仅仅选契诃夫而舍弃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赫尔岑、

柯罗连科等文学巨匠，难道没有问题吗？再者，就契诃夫入选的作品来看，以上三篇是否就是他最好的作品呢？我想，如果稍微对俄罗斯文学有点了解的人，都会有不同看法的。

第三，编选者完全忽略了20世纪世界文学发展的状况。除了高尔基等少数几位生活在本世纪初的大作家以外，我们从以上那些课文里几乎看不到本世纪世界文学的一点影子。本世纪以来，已经有98名伟大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让人惊讶的是，在中学语文课本中，居然没有选入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的作品！

诺贝尔文学奖当然不能完全反映本世纪文学发展的状况，但是却能够反映大致的状况。台湾作家陈映真主编了庞大的《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在序言中他写到："如果对诺贝尔文学奖给予过高、过大的评价是一项错误，那么，对于它做过低或者过小的评价，也是一项错误。事实是，当我们充分理解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和授与背后错综复杂的秘辛，我们反而更能珍贵而不是蔑视这个文学奖。在国际强权的政治压力下，在委员会成员各种历史的、民族的、有关政治、社会、宗教的意识形态的限制下，诺贝尔文学奖固然没有为我们划出一条无可争议的、世界文学主流发展的实线，却也大致划出了一条虚线。"大多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或者在思想启发上，或者对人类和世界所怀抱的理想上，或者在文学表达的技巧上，或者在文学表现的辽阔可能性之探索上，都做出了伟大而令人感激的贡献。

本世纪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杰出作家犹如群星灿烂，最伟大的名字如：显克微支、梅特林克、法朗士、泰戈尔、罗曼·罗兰、叶芝、萧伯纳、托马斯·曼、奥尼尔、赫塞、纪德、福克纳、加缪、萨特、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马尔克斯……正如陈映真所说，"他们各自使他们的民族和国家得到

荣耀，却也在受奖的一刻，成为全世界一切民族和人民共同的财产。”然而，在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里，根本就找不到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和作品，这未免有点匪夷所思吧。

我不知道中学语文课本的编选者们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拒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的作品的。也许是“夜郎自大”的心理在作怪，诺贝尔奖算什么呢？居然不给予我们国家的伟大作家们。你们不给我们诺贝尔奖，我们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选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的作品。如此报复，看你们是否受得了？也许是编选者们根本就不了解世界文学发展的现状，他们以为外面永远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天下，真是“天上一日，世间万年”啊。他们是一批思想僵化，丧失了吸收新知识、新文化、新思想的能力的老人，让老人化石般的思维来左右孩子们灵活的大脑，真是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情。

三、外国文学作品的分析方法

选文数量与选文标准已经有了严重的问题，而问题更大的地方还在于课本与教学参考所规定的阅读和教育方法。好的作品被这套方法讲成、学成坏的作品；不怎么好的作品则被讲成、学成更糟糕的作品。撰写这些所谓“揭示”、“中心思想”、“教学计划”的作者，本人就是毫无文学鉴赏能力和文学品位的人，他们满脑子条条框框，把外国文学作品也当作他们阶级斗争的工具来使用。许多作品被他们分析得“体无完肤”，最后变得“面目全非”。要是这些作品的作者本人看了，一定会啼笑皆非的。

例如，《七个铜板》一文的“提示”说：“这篇小说深刻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贫民的悲惨生活和穷人间的理解与友爱。”《干涸的眼睛》一文的“提示”说：“阅读时，要注意分析作品的深刻内容，认识资产阶级的冷酷的本性、丑恶的灵魂和资本主义社会

的腐朽本质。”

《我的叔叔于勒》一文的“提示”说：“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阅读这篇小说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竞选州长》一文的“提示”说：“作者以夸张的漫画式的笔触，艺术地再现了美国社会中竞选的种种秽事丑闻，揭露了竞选的虚伪性欺骗性，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竞选’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尖锐的批判。这篇小说以独立党候选人‘我’的自白与大量的新闻、匿名信等引文的对照构成完整的故事，用犀利、夸张、含蓄的语言表达了作者对腐败政治的愤怒谴责。”

《守财奴》一文的“提示”说：“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提出：‘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这对我们深刻理解这篇课文的思想内容无疑会有很大的启发。葛朗台的妻子是作者赞扬的好人物，作者认为笃信宗教才不致陷入金钱的泥沼。课文中对葛妻隐忍贤德的描写，意在反衬葛朗台的凶狠丑恶。这虽然有一定的揭露作用，也恰恰反映出作者世界观的局限。”

我不必对这些所谓的“提示”作太多的评论，稍微有点独立思考能力、稍微对世界现状有点了解的人，都会对这些自作聪明的“提示”嗤之以鼻的。这套思维，完完全全是文化大革命的思维。以《守财奴》为例，作者所要表现的是人性的贪婪与愚昧的一面。这是人性共有的弱点，不是某种社会制度专有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有这样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里照样存在。如果社会主

义社会里不存在这类人物，那么我们不就稳稳当当地跨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吗？还说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级。我认为，《守财奴》的作者不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而是暴露人性的弱点，进而寻找对人性的疗救之道。作者最后找到了宗教，宗教能否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当然值得进一步探讨。但是，我们不应当对别人的选择指手划脚，不负责任地随口乱说。自己没有宗教信仰，不能否定别人的宗教信仰。自己怀疑宗教，但不能指责别人对宗教的真诚。随随便便就说这是作家的“局限”，太专制了。

以上这些“掷地有声”的“提示”，试图让孩子们相信，资本主义世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有我们生活在幸福之中；资本主义世界是没有人性的，只有我们的社会是有人性的。这样一套思维居然堂而皇之地被塞进中学语文课本里，真使人莫名惊诧。社会已经进步了几百步远，而课本还落后得让人不可思议，不仅是原地踏步，而且是向后面退步。从最低的要求来看，这套思路就与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大方向背离。在20世纪90年代的最后一年里，再来看这样的提示文字，我不禁“悲从中来”。为谁悲？不仅是为当年受过害的自己悲，而且为所有受害的中学生悲。选文本来就有问题，再加上“提示”与教学参考等把老师往歧路上引导，进入中学生脑海里的就是一锅粥了，一锅烧糊的、与文学无关的“粥”。

我认为，中学语文课本选入外国文学作品，数量至少应该达到80篇，即现在数量的4倍。在篇目的分配上，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国家、各个流派的优秀作家尽量要有所体现而力戒偏颇。在入选标准上，以艺术水准和适合中学生阅读为第一，拿作品本身具有的文学价值来衡量，排除其他的干扰，因为这毕竟是“语文”课本，而不是政治课本。入选的作品，以大家的名作为主，

兼顾不太出名的作家的优秀作品。这样，力求做到给中学生一个比较成系统的世界文学的“版图”，同时使中学生的艺术欣赏能力和审美能力提高到一个相当的水准上。

□ 林贤治

对个性的遗弃

——秦牧的教师和保姆角色

秦牧随和，所以平庸。

作为作家，不能说秦牧缺乏必备的文化修养，问题在于或惮于压力，或出于自觉，他总是力图放弃自己的独立追求和属于内心的可珍贵的一切。虽然他有可能写出哪怕少数几篇精粹的作品，但是，由于使用了大量现成的、流行的、合乎规范的结论或材料，结果仍然要磨掉可能的棱角，贫乏得混杂，中庸得辩证，颟顸得庄重，失却文学应有的崇高的品格。从他成为“专业作家”的那天起，已然步入中年；这个可怕的保守的人生阶段，恰好同一个左倾的、亢进的、病态的历史阶段相叠合。惰性的破坏力是巨大的。等到他小心翼翼而又不免多少有点志得意满地在一个满目荒芜的园地里收获了《花城》等一小批著作之后，不期然遭到空前的洗劫，同众多的写作者一起被迫沉默了 10 年；一旦被获准重新弄笔，却不觉老冉冉其将至了。老人大抵满足现状，不图振作；许多风云人物最后“拉车屁股向后”，是史有明证的。秦牧晚年被尊为“散文大师”而被抬入云端，出版多种选本，主编各类辞书，且索序求稿者不绝于途。其实，无论在思想和技术方面，他都不见得有所增进，然而竟陶陶然耽溺于俗众的包围

中，不惜粗制滥造，八方应付，以创作之丰自娱。

龚自珍诗云：“文格渐卑庸福近。”秦牧明显是一享有“庸福”的作家。由于尚未改革的文艺体制及其他种种关系，同一类型的作家在中国颇不乏人。所谓平庸，并非就一般的文学成就而言；它首先代表的是力图扼杀自我，以求标准化、划一化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宿命地赋有传统的悲剧性质，使一个乃至一代作家的整体性构思，从一开始便被定势在一个既成的、有限的、闭合的格局之内，从而完全断绝了超越的可能。

保留节目：《花城》

50年代中期中国作家队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化：或沉或浮，泾渭分明。具有一定实绩和潜力的作家，一旦被戴上荆冠，便长此沉默了。“放歌”成了另一群作家的特权。在接连的政治运动的考验面前，许多作家都曾经受严格的人格选择和巨大的心理压力，庄子式的逍遥是没有的。

此时，总路线业已制定。人民公社诞生了。“大跃进”的快马在一片虚幻的虹影中盲目驰骤，随即陷入泥沼。遍地高炉群小土群的火光熄灭了，公共食堂炊烟消散，粮食“卫星”及种种凭空发射的卫星一颗接一颗坠落。所有的运动中得以幸存的中国作家全都背过脸去，没有留下哪怕任何一点可信的文字记录。唯有旧日的“彭大将军”，同他有限的几个“盟友”，一道背负起社会主义的沉重的十字架，在云封雾罩的庐山深处，喊出真实的声音。

反右斗争前夕，秦牧曾经发表《地下水喷出了地面》一文；行文虽然太四平八稳了些，但是究竟属于经由自己思考过的“盛世危言”。据说，他几乎为此惹下大祸，只是因为一位大人物出面才得以幸免。灾祸可以使一些生物消亡，同时使一些生物变

异。事实的教训，使秦牧怀有恐惧与侥幸的双重心理是十分可能的。总之以后，一如我们所见，他一直按照历书即所谓“本本”歌颂阳春，全不顾窗外是否阴霾天气。作为写作杂文出身的作家，不种刺而栽花，就并非什么咄咄怪事了。

秦牧著名的散文集《花城》，绝大部分完成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三面红旗”的神话，使这些作品漫溢着明媚的色彩和悦耳的声音，不沾带一点时代的阴影。

代表作《花城》，绘声绘色描写“城市人民公社化”之后的每个春节的盛况。“春来了！春来了!”《花市徜徉录》及《春天的色彩和声音》前后都取同一基调——肤浅的乐观主义，借花信显示太阳和东风的威力，构成永恒的春天的象征。另一入选教科书的名篇《古战场春晓》，礼赞三元里人民公社“和平劳动、熙熙攘攘”的景象。在这里，选择三元里不是偶然的。三元里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反帝斗争的圣地；而在现实中“超英”、“赶美”，以及后来的“反帝反修”，正好视为一种历史的承续与回应。姊妹篇《土地》，电影般渐次摇过许多“大跃进”的镜头，还特意插入《红旗歌谣》作画外音，极力营造一种气氛，以讴歌一种意志，鼓吹一种精神。当时写作的另外一些篇什，如《千斤力士》、《摸鱼老手》、《古董》等等，其实也都一样努力在传播一种时代病——自上而下普遍狂热的、偏执的、浮夸的“左倾幼稚病”而已。

要分析一个作家，有一个简捷的方法，就是分析他习惯使用的语词，或某个时期集中使用的语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语词，在使用中往往失掉了本义，而带上构成当下“语境”的新的因素了。

在集子《花城》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共产主义”。当时，著名的北戴河会议宣称人民公社是“一条过渡到共

产主义的具体途径”；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第一次提出大跃进“开辟了我国能够顺利地从社会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的道路”。新闻媒介纷起效尤，将“社会主义的大跃进”改为“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大跃进”，乃至等同于共产主义。无论是作为社会制度还是道德观念，秦牧对共产主义的认识，都是同大跃进时期的“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种种宣传分不开的。

正当人道主义遭到普遍敌视的时候，《花城》有不少文章赞美了“人”。然而究其实，这与盛行一时的“人是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唯意志论同出一辙。人是什么？为秦牧所美化的当代人，完全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欲求与权力；他们唯有像机器和蜂群一般，盲目追随癫狂的运动。“个人”、“私有”一类观念，在他看来，明确地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而应当予以“消灭”的。因此“群众”、“集体”等语词，在《花城》中同样屡见不鲜。

巴金是一位富于激情的作家。他晚年撰写的《随想录》，获得文化界的盛誉，以致不乏溢美之词。它所以值得珍视，其实并非出于思想的价值，而是人格和史料方面的价值。巴金懂得忏悔。70年代末是一个忏悔的年头，或者虚伪，或者真诚。而巴金是真诚的。出于对真理的最后皈依，他敢于自焚而后涅槃。在酷爱面子自高身价的文化人中间，应当承认，这份真诚今天已属罕见。

回首《三面红旗》，宛转20年过去。当年相随鼓吹的秦牧，当如何看待他的《花城》？他是否认为有必要对过去的年代连同自己的思想做一批判与清理的功夫呢？秦牧说：“我对《花城》是比较偏爱的。”他以《花城》的印数在散文书籍中占有较高的纪录而自诩为“保留节目”，主动要求重版，说：“我以为花城出版社出版《花城》杂志外，也重版一本叫做《花城》的散文集，是不无意义和颇饶趣味的。”

生活：失去血与水之后

中国文学由来缺乏现实主义，这种现象，即使建国以后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柳青对《创业史》的创作和改写，就是文学的真实性一再受到挑战的显例。为秦牧所服膺的“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两结合”之说，其实是取消现实主义的一个代偿品。两“结合”的产物之一《红旗歌谣》，本质上是粉饰太平的伪民歌。至于后来的“三突出”及种种“样板”，则更不待言了。因此，对于70年代末出现的“伤痕文学”，即使是粗坯，从文学发展史的眼光看来，是仍当给予高度的评价的。事实上，作为一种文学精神，现实主义并没有能够维持多久；文坛的命运，应了鲁迅当年的两句诗：“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一批中青年作家刚刚冲杀出来，尘埃落定，便开始抢占交椅；穿洋服，换马褂，竟相以雅趣为时尚，嘲弄庄严，祝福轻松。另有一批后起之秀，旗帜乃是“先锋”。他们或许不无时代苦闷的某种体验，却做着以神话和历史替换现实的“实验”，标榜形式，玩弄语言，灵魂苍白，面目雷同。“阅历名扬万态更，原非感慨为苍生。”何况既无“阅历”，更无“感慨”！

文学由来以对人的终极关怀作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人既包括自我，自然也包括同类。可是，我们的文学发展到后来，竟然变得公开敌视思想，漠视公众命运，与艰难的时代变革相脱节。如此睥睨一切而故作高妙的名士气和才子气，如果不给打掉，不管如何的高调子，且从关里唱到关外，文学都只有完结了事。

现实主义是同现实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概念。何谓生活？一种正统的理论，用的是黑格尔式的主客二分法，将生活看作是外在于创作主体的自然生成物，因此可以冷静地加以观察、分析、研究，可以从外部“深入”下去，如同潜水、打桩，做各种物理

运动一样。现代才子们因为要高扬“主体意识”，所以见到“生活”的字眼便蹙额、摇头、翻白眼，他们把个人有限的生命活动看作是“生活”的全体，以个人生活拒斥社会生活。其实，这与他们扬言背叛的传统思维是一致的，各走极端而已。古时候，犹太圣人吉列里曾经为人类拟定了一个关于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公式，“如果我不为自己”，他说，“那么，谁会为我呢？但如果我只为自己，那么，我生存有什么意义”这个公式的任何一半都不是合理的生活态度，无法构成完整的生活。生活，在这里是直接同某种价值观连在一起的。所谓生活，乃是从英雄先知到芸芸众生的命运的衍生过程；真正的作家，必定置身其中，而始终未曾放弃激情的参与。生活是一种实存，也可以视为一种关系，它动态地存在我与你、我与他的往返之中。

秦牧传授创作秘诀时，多次强调“三要素”，即思想、生活、技巧的“辩证统一”。对于生活的简单化理解，可以说，他比那些正统的“深入生活”论者走得更远。在他这里，生活变成了生活知识，它不再是复杂的、有机的、沉重的整体，而是零碎的、分散的，可以“掇英”和“拾贝”般地加以采摘的东西。

由于忽视和回避作家的个人阅历、生存状态、不可重复的生命体验，所谓生活，最后就剩下“客观”的伪生活和通用的生活知识、常识了。秦牧恰恰依凭了这些，所以，集中的文字，除了习见的史事，大多填塞了一些通俗故事、统计数字以及种种辗转抄得的汇报材料。《千姿多采的生活繁花》、《娓娓深谈情趣多》等，即以故事连缀成篇；有的故事其实意义不大，解颐而已。《在探索学问的道路上》罗列数字说：我们只要想一想，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全国少数民族的数目（55个），党的‘一大’代表人数（13人），长江长度（6300公里），珠穆朗玛峰（8848米），都和解放初期我们所知道的颇有出入以至差异颇大……”说到中国

之大，《寄北方》有一段云："从黑龙江到广东，直线数下来，一共是8个省。中国最南和最北省份之间，隔了6个省。多么遥远的距离啊！我问过一个铁路上的朋友，从满洲里到深圳，空间有多远呢？他说有4794公里。哎呀！差一丁点儿不就是1万华里了么！真是万里迢迢'啦，现在的火车的速度是超过'一日千里'的，但是火车不断奔驰，也得跑72小时有多，才能跑完这段距离呢！"可以看出，这里有些数字并无用处，演绎起来纯属多余。可是，恰恰是这些，构成了秦牧所称的"学问"和"知识库藏"。

秦牧不是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既缺乏文化厚度，又缺乏切入的深度，是比较典型的"十万个为什么"式的作家。但是，无论前者还是后者，他们自以为宝贝的都是知识，是干瘪的理性、训诫、逻辑的织物。于是把千万人的生命实践活动变为毫无生气的素材，把个人烧在那里面的生痛的热情，化作旁观者冷漠、轻巧的说教。前些年，有人提倡"作家学者化"。"化"到半生不熟犹可，倘真的彻头彻尾化成了"学者"，恐怕文学所需的一点热血和水分，将要被蜕化的知识至上主义者榨得干干净净。鲁迅毕生憎恶"学者"，不是没有原由的。

思想：教师和保姆

秦牧把"思想"置于"三要素"首位，看似十分重视，其实不然。我国是一个以儒教立国的国家，由来重视意识形态，即所谓"教化"；加以秦牧大批量生产作品的时候，又值"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时代，因此不是会忘记"思想"所占的地位的。

对于文学创作，他多次宣称：必须"让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来统帅各种各样的主题"；"以辩证法来指导我们的艺术活动"。根

据秦牧本人早先对"共产主义"一词的使用，那么，他所谓的"思想体系"至少包括了对大跃进时期那种把"个人"抽空和削平的过左作法的认同；及至1978年的"新时期"，他对这一体系的理解，侧重点在于"无产阶级对一切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其时，"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极左口号仍在延用；秦牧一如"文革"前一样习惯顺流而下，已经完全失去选择的能力了。当我们以几代人的痛苦经历，透彻了解了"共产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在几十年间被蒙覆于左倾思想路线之下的实际内容，便不能不对秦牧盲目追随的态度表示遗憾。

谈到具体的创作，秦牧认为，一篇文章只能有一个思想，一个主题；而且，作者必须"深刻理解"作品符合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中的什么部分，占有什么位置。其实，我们知道，文章同样可以像某些乐曲那样，有思想而无"中心"，甚至有情绪而无思想；写作时常常有非理性成分的介入，即所谓"迷狂"；一旦介入，作家也就无法像烹调师那样按照某一道菜谱精确配料了。秦牧的说法，是脱离文学创作的实际的。

至于以辩证法，或称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创作的指导原则，此说由来已久。20年代后期，苏联"拉普"曾经提出"为文学和艺术中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而斗争"的口号，认为文学家必须首先研究马列主义哲学，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从共产主义高等学校毕业，然后方可言创作。这一貌似激进的主张传到中国来，一度为左翼作家介绍和使用过；但是，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也都很快被抛弃了。连辩证唯物主义本身，是否如斯大林所认为的那样，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至今还是学术上的悬案。何况，辩证法在中国，由于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传统思想的浸淫与同化，又往往化为中庸、折中，成为相对主义、滑头主义、机会主义的代名词。毛泽东曾经说，鲁迅晚年的杂文最全

面，最有辩证法。其实，鲁迅的杂文倒常常表现为“片面的深刻”，前后一贯是极为偏激的。对于这偏激，鲁迅本人并不讳言，且表示十分喜爱。

在神圣面前，在潮流面前，多少人成了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秦牧认为，只要有了一个伟大的头脑，就可以代替亿万人连同自己在内进行思考；只要存在一个既定的思想体系，当然也就无所不包，足够“放诸四海而皆准”，无须乎在各个不同学科与专业范围内进行具体的探索。1978年，秦牧援引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来告诫作家说：要使文艺成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其时，国内已有人考证说，此系列宁针对出版业而言，“文学”应译为“出版物”。但是，即使是出版物罢，也当不限于齿轮和螺丝钉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家，秦牧失去了应有的使命感。他不是由别人，恰恰由自己剥夺了独立思考的权力，而且有意无意间也剥夺了别人的思考；把昨天的真理当成今天的真理，把本本的真理当成生活的真理向人们宣谕。

什么是思想？思想是世界上最具私人性质的东西，是来源于现实生活与斗争的最明朗同时也最精微的个人提取物。唯有经受生活和斗争的孕育，思想才富有活力；也唯有经由自己的思索与自愿的接受，思想才是真实可靠的。否则，不是枯死的根株，便是复制的赝品。一种思想，当它产生之后，丝毫也不能使生命为之激荡起来，还算什么思想！

长时期以来，由于强调“舆论一律”，便容易窒息一代作家的独立思想；至于个人情感，也因为过分地宣传“阶级感情”而往往在创作中被视为“人性论”、“小资产阶级情调”，遭到可怕的歧视和排斥。这样，如法国伦理哲学家居友所说的“智力生殖”和“情感生殖”的能力必将丧失殆尽。恰恰是这样两种生殖

力，才成为我们常说的“生命力”。做为一个作家，秦牧是缺乏生命力的。他不是生殖的，扩张的，也即创造的；而是寄生的，凑合的，萎缩的，反刍本本和他人的。所谓“微言大义”，不管怎样的谈天说地，论古道今，最后他总是要说出一些众人皆知的道理来。比如从花市联想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从标灯归结到“应该辨认和遵循正确的航线”；从渔猎能手的经验上升到如何“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从老人射击和演唱抽象到“共产主义是人类的青春”等等。其中，有不少思想显得陈腐和保守。1959 年写的《中国红场的旗帜》照搬口号说：“知识分子应该工农化，工农应该知识化。”直到 1979 年，在谈到传记写作时，仍强调改造知识分子的必要性。还有个人崇拜，其中也不时有自然流露的痕迹。

文学是作家创痛时的呻吟，愤懑时的呐喊，是永远无法安宁的诉说。目前一些专栏作家，仿古之雅士作神定气闲状，故意弄出一点没有贵族血统的“贵族气”来，着实俗不可耐。秦牧的文字，没有这种卑贱的高雅，表面看来是平易的。但是，他虽然没有刘白羽式的高屋建瓴、呵斥八极的英雄气概，由于乐于充当教师和保姆，因此却也就处处从平易中生出不平易来，像如下面文字，他的文集中便很不少：“事情告诉人们：增产固然是重要的，计划生育也丝毫马虎不得。我们一定得步步为营，高瞻远瞩地来处理我们的一切事情，才能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在这里，作者完全是一个政治教导员，政策讲解员的角色了。

由于思想是属于本本和他人的，而且创作也被认为是完全“利他”的，“个人”自然要从中脱逸出来。创作作为一种道德现象，其实这是不负责任的。一个不懂得创造的作家，同样不懂得负责和忏悔。所以，我们呼唤文学，也就是呼唤作家的良知。只有具备了作家的良知，才可能产生艺术的闯将，产生脱离了各种

形式主义泥沼而卓然独立的、坚实的、博大的文学来。

艺术：个性的遗弃

秦牧像所有的文艺宣传家一样，说我们的文学领域如何“海阔天空”，应当拥有“千姿百态的艺术风格”。但是，他个人的文字是相当公式化的，虽则表面使用的材料很驳杂。

他的散文结构大体分属三个类型。最常见的是排比类书，平面罗列，相当于古代的所谓“赋”法。“赋者，敷也。”这种铺陈手段多用于外部的装点与堆砌，讲究排场，意在炫耀。汉代拍马文人制作的大赋，如《子虚》、《上林》便如此，其致命处在于忽视内在的生命。所以，这种东西最适宜“做”，往往一经产生，就显出刻板、僵化和死相来。在当代作家中，刘白羽喜排比，贺敬之喜对偶，郭小川喜长句，其实都同“赋”有很深的血缘关系。其次，结合比法，逶迤道来，逐步教训，如有名的《花城》；或者在结尾处宣明题旨，如《在仙人掌丛生的地方》等。饶有意味的是，同样年代里产生的一批作品，如陶铸的《松树的风格》、杨朔的《荔枝蜜》之类，竟都是同样的结构的，有如《西游记》中孙悟空大战二郎神，化为庙宇却因藏不住尾巴，故而必得在背后翘一根旗杆一样。还有少数篇章，结构近似环形。因为必有一个中心思想需要阐明，“天无二日”，故环拱之。所谓“形散而神不散”，是典型的中国美学。从应制诗到八股文的“起承转合”，只是把这种美学在文字应用中推向极致而已。杨朔多取这一套路，秦牧文中却不多见。

当一个国家的元首尚且可能冤死狱中而无人闻问，可想而知，一个普通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等基本权力，虽然已经成为宪法上庄严的言辞，也只能是美丽的幻影。在左的思想路线长期肆虐之下，中国当代文学基本上没有流派可

言。但是，当我们谈说某一个作家的时候，却可以同时列举出成打成打同一模型的作家；即如阅读某一个作品的时候，往往似曾相识，因而想及另外许许多多同形同构的作品一样。此中原因，只能有一个解释，即是一代作家思想贫乏和个性贫弱的表现。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演说“反对党八股”，而“八股”仍未绝迹，甚至在后来一段时期有愈演愈烈之势者，原因盖出于八股式社会程序也，非关文辞也。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可谓“礼崩乐坏”，个人性的要求随着“天赋人权”和“个性解放”口号的提出，得到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普遍认同。然而，20 年代中期开始，便基本上结束了思想界短暂的无序状态；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宣扬和工农运动的高涨，社会渐渐呈现出因强化阶级和集团力量的统一的秩序来。由社会环境培养对集体的依赖性，培养一种从众心理、媚俗心理，可以说源远流长；更无须说此后的“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的年代了。然而，文学从本质上说是反集体的。即使从文学信仰上来说是在为人类而写作的作家，也必须通过个人的叙述方式来进行。

个性化语言也即所谓“个人笔调”的确立，是一个作家得以区别于群体的成熟的标志。可是，在个性普遍遭到夷刈，幸存者又自觉地逃避个性的时代，一个作家的成熟几乎是不可能的。

秦牧的语言，单调又芜杂，并没有形成个人的叙述风格。他仅仅使语言成为表意的工具，无视它的文学目的性，从而把艺术散文下降到一般文章的水平。30 年代左联提出的“文艺的大众化”，只能视作一个权宜的口号，一个表面上更适合政治和道德要求的口号，而不应当成为文学创作的常规。理由很简单：每一个人，作为精神实体都在努力把自己同“大众”分开；而作家，不过通过他的“文学”率先回到人类文明史上的这个位置来罢

了。鲁迅与瞿秋白的一次关于翻译的通信是带有启示性质的。谈及语言，明显地，瞿秋白偏重“大众”，鲁迅偏重“个人”。在表示有关“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态度时，鲁迅也是反对一味迎合大众的。所以，他自己的书面语言，也就坚持着文白夹杂、弯弯曲曲的个人风格。

同托尔斯泰写作普及小册子的例子不同，秦牧的语言使用是惯常的，一贯的，并非有意俯就。他对于大众的、日常的、流行的用语，不作提炼便加使用，往往破坏了文学语言的纯洁性。如：“当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摆得正确的时候，这样的个人必定是崇高的、快乐的、幸福的。”“谁都知道肩挑是落后的，我们正大搞‘四化’来逐步加以消灭。”他喜欢使用成语或整齐的短语，读来毫无新意。如：“这红色的土地上繁茂苍翠，竞妍斗丽的草木花卉呵”；“人间事象，色彩纷纭，五花八门，林林总总”之类。他还经常使用为他自己所反对的社论语言，如“当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在广大群众朝气蓬勃、斗志昂扬，高举着红旗在前进的时候，由于整个过渡时期都是存在阶级斗争的，在我们周围，我们也还能看到残余的剥削阶级阴魂不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党组织的谆谆教导，使他们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和国家主人翁的精神”；“必然能够使祖国的大地，绽开更多的社会主义之花，结出更多的无产阶级之果。”他的文字，往往因此弄得很冗赘，很生硬，很别扭。比如：“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决心使人产生了毅力和智慧”；“以后世世代代的人们面对它们，是一定还要更加大受震撼、掀动感情的浪花的”；“这个诗画专栏……将进一步增强已经有了觉悟的广大劳动者对于平凡劳动的自豪感；它将吊销某些人心窝里面把各种劳动随意乱称一场、妄分贵贱的那把非法的私秤；它也可以医治一下某些自寻烦恼的人精神上的弯曲了的脊

梁!”更有甚者，如：“我写这篇东西，寓意在哪里呢?是鼓励人们‘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考究吃喝么?不，要真是那样，那大抵就是一篇‘毒草’了。……我写这篇东西，并不想具体劝人吃某一样东西，……不，要是劝人那样做，那就太愚蠢了。……我只想借这些事例，说明……这篇小文，如果说有什么寓意的话，那就是……”这样的文字，刻薄一点说，简直是存心作弄读者了。

很可能从谢德林的小品《鬣狗》获得灵感写成的《鬣狗的风格》，或许可以说是秦牧创作中较为精警的一篇了，后面也拖着大节大节旨在图解和说教的文字。仅举两例：在“万恶的‘四人帮’横行中国的日子里，鬣狗式的人物，科学地说，实事求是、毫不夸张地说，是着实出现了一批的。”“什么叫资产阶级思想?你们这一套，就是不折不扣的丑恶的资产阶级思想淋漓尽致的体验!”

1979年，秦牧对于文学创作有这样一段总结：“我常常觉得，我们所以能够迈开脚步，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走这么一段距离，即使只有一丁点成绩吧，固然是党的培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同时，和广大群众的激励、鼓舞、教育和鞭策，也是分不开的。”

语言分析学家认为，“社会权势”对话语，包括文学话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作为“符号名流”的作家，却有能力对抗“思维控制”。他们可以通过对语言的自由选择与独立创造，反过来作用于权势，推动社会意识的再生。然而秦牧，从以上程式化的语言可以看出，他明显忽略了文学的特殊属性，放弃了作为一个作家的特殊使命与要求。

几年前，理论界一度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有人响应，有人讥评。实际上，我们所见的文学史，尤其当代文学史著

作，整个框架迄今并无大的变动，因此重写无疑是必要的。其实，写即重写，评论本身便是一个不断否定和修正的过程。不但文学史、政治史、经济史、哲学史，其他的艺术史和文化史，都一样有重写的必要。历史只有在不断的怀疑、探索、发掘中逐步接近真实。

50年代末期，社会上贱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已成风气；加以五四文学传统中断多年，小品文的许多样式已经失传。这样，几乎以“知识小品”亮相的秦牧，开始便给文坛一种新鲜的刺激，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样一个甘于追随时代谬误的作家，一个惮于表现社会真实和内心真实的作家，一个思想贫乏而语言平庸的作家，居然借了历史的某种情势赫然成了大家，除了说明中国文学的贫困，还能说明什么呢？

一个统一有序的社会，必然要成批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作家，其实是平庸的作家；而且，必然要从中推举出某位代表人物，极力树作优秀的典型，以期群体仿效，免得标新立异。制造优秀，是政治手段在文学方面的运用，是政治入侵文学的众多现象之一。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有两个死结：一是降低了标准，一是放大了成就。这两个死结是有联系的。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30年代的“左联”，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包括近10年的文学，这几个历史阶段的文学成就明显是被放大了的。放大成就，即意味着降低对作家和作品的要求。实际上，艺术创作的个人性和人民性，便长期遭到漠视。今天，在文学的旗帜上，让我们再来书写一遍：作家的尊严与文学的尊严！

当人们以十二分的虔诚纪念一位“大师”的时候，我写下了“大师”的平庸，并以此纪念一代贫困的历史。

□ 李阳泉

想象力是怎样被阉割掉的

各位先不要害怕，我这决不是论文。不是像《曹雪芹的舅舅是河南还是河北人》、《康有为的阶级划分》一样严肃而大有意义的文章。我只是在寻找一把能够阉割掉想象力的剪刀，然后把他卖给废品收购站或是干脆做抛弃处理。

是的，我仅仅在为完成一个动作而努力着。也只能如此。

我的寻找开始于一年前的那次教育实习。当时我面临的是一个被认为“综合素质极高的班级”，班主任介绍说，这是他们年级成绩最好、最听话的一群学生。我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目光几乎是齐刷刷地看着我，然后是训练有素地一同起立，并问了一声“老师好！”然后一起坐下，眼睛转向了课本。

我当时就惊呆了！很机械地回答“同学们好！”

最好玩的是上课的时候，每当我提问，大家总是一起把手举起来，可当我叫他们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却不是人人都能回答正确。有一次，我问了一个问题，要求“会回答的同学请把手举起来”，结果出乎我预料的，大家把手都举了起来，而我在连续叫了几个同学之后，竟没有一个人能把问题回答正确。我当时就想发火，可后来想了想，还是忍住了，下课之后，我找了一个同学问为什么，他回答我说：“你难道不知道规矩？”“规矩？我……我不知道。”“嗨，其实很简单，我们班早就约定俗成了，老

师提问时，会的举右手，不会的举左手。”

听了这位学生的“规矩”，我有一种贾雨村才上任的感觉。于是下一次上课，我再也不乱叫人回答问题了。可是那时候，我就开始想了，这些学生们为什么会和老师达成这种默契？为什么在一个新的老师出现的时候，他们还不能及时改正过来？这看来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对了，是习惯！

这样一来，我对“习惯”有了很大的兴趣。我开始寻找同学们还有什么习惯。很快，我有了一次检验同学们作文水平的机会。为了给他们更广阔的想象空间，我留给大家的是一篇填空作文《我最××的一件事》。留完了之后，我激动了好半天，我想象着同学们会交来各式各样的故事，我又可以满足一次追求童真的快乐。可谁知道，就像是见了鬼一样，同学们设计的作文几乎是千篇一律的《我最难忘的一件事》。而且尤其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有大约60%的同学都写成了在校园里发生的和老师之间的故事，无非是自己犯了某种错误，被老师批评了，在老师的“苦口婆心”之中认识到了自己不对，改正了错误，并被老师的爱心而感动。

我又一次被惊呆了。

还是那个同学为我揭开了谜底：几个月以前，他们曾经写过这样一篇作文，老师在课堂上讲解时举例说出了上述故事情节，说这样写有理有情，能够打动人。于是大家就都这样写了。

“这是很危险的！”我说，“如果高考时大家都这样写，不成了雷同卷了？”

“是呵，我就觉得老师的教学存在很大问题，因此，我就不按照她讲的去做，可是她每次都给我把成绩打得特别低。这次是因为您来了，我怕给您留下一个坏印象，因此把上次她让我重写的文章交了上来，可是我自己又写了一篇，是写给我自己的。”

“我可以看一看吗?”

“可以，你……您看吧。”

他的文章题目是《我最讨厌的一件事》，从文中很自然地看到，他所讨厌的一件事是：上语文课……讨厌死了，这些僵化的课文，我是中国人，为什么学习语文会费这么大力气，为什么必须得按照老师说的去写，那一定是真理吗?见她的鬼去吧，我真想把语文课本扔进火炉里，烧成灰，然后为它拍照……

我看着看着，“噗哧”一声笑了，然后请求他把这篇作文送给我做个纪念，他很慷慨地答应了，分手时说，“千万别让董老师知道。”我向他保证。

学生听老师的话是天经地义的，语文老师作为知识的传授者和思想教育工作者，对学生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学生的许多习惯也往往来自于语文老师的潜移默化。可是，这些习惯一定是对学生有利的吗?

我问过我实习班级的董老师，除了学习功课以外，同学们是否还有什么别的活动。她回答说，升旗、做操、运动会。还有吗?怎么，这些还不行?你知道我们的教学任务有多重?你也是在中学过来的人，你难道不知道上学就得有各种各样的考试吗?你不把学生管得紧一些行吗?

“管得紧一些”，多么名正言顺的管理方针!

忽地想起了我小时候的一件事。有一天升完国旗之后，老师让每一个同学写一篇日记，表达一下升旗时的真实感受。我很高兴地进行了写作，可后来，那篇日记却被老师当做“浅薄”和“无法无天”的范本在课堂上进行了批判。我至今依然记得那些刺耳的句子：“怎么能在升国旗的时候看到一只鸟儿飞过天空?即使看到了，也不能这样写!国旗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红色象征着革命的胜利，这些东西你不写，偏要写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当时流泪了，老师以为我认识到了错误，就没再说什么。可她哪里知道，在她批评的时候，我是气哭的！

以至于今天想起来，我依然不知道一只鸟儿飞过国旗有什么不对，一个孩子记录下这点事情是无法无天。

记得《文汇读书周报》曾经作了一项统计：上海几家名牌少儿文学杂志的发行量不尽如人意。《少年文艺》、《儿童时代》已从 80 年代的百万份降至目前的 10 万份，大型文学刊物《巨人》目前仅发行 6000 份。据对五、六年级学生的调查表明：68%的人至今没有读过一本文学名著，80%的人至今不知文学专刊《巨人》，50%的人只听说过《少年文艺》，却没有读过。也就是说，我们的少年读者在远离文学名著和期刊，这不能不令人担忧。整天围绕着课本、练习转来转去，学生真的可以说是大忙人了。而教师的工作也是单一得不得了，只知道拼命给孩子的脑袋里硬塞一些别人的现成的思想。长此以往，孩子的辨识能力、独立判断和思考的能力都被搁置了。尤其悲哀的，学生的想象力也根本无法展开了。

著名哲学家罗素说过：“被动地接受老师的智慧，对于大多数男女学生都是容易做到的。因为这样无需他们去努力独立思考……然而被动接受的习惯对一个人的未来生活却是灾难的。”

著名教育家赫尔岑也曾经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可是，我们的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为什么还是这样执迷不悟？一面拿着刀子阉割着学生的想象力，一方面还在口口声声说什么教书育人！一个人，如果没有了想象力，那该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对一切事物都充满好奇的孩子们是最富有想象力的一代，可是，我们的教育却在义无反顾地抵制着，一层一层地剥蚀着……

这样下去，再过 20 年，我们的国家将不再有真正的文学，

没受过现行语文教育的一代人已经死得差不多了，受过现行语文教育的人，他们的思想早已不再适合从事文学创作；再过 20 年，我们的国家也将不再有震惊世界的创造，经历了现行语文教育的摧残，人们的大脑只适合去记忆了，或者在记忆的基础之上死钻牛角尖。呜呼！我们悲哀的民族啊，你离没有灵气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 张大林　王　刚　汪　琳

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根源

——大陆、台湾两种语文课本之比较

“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喊了多年，迟迟不能减轻反而越来越重的症结在哪里呢？在教科书。近10多年来，语文课本变动频繁，但由于基本体系没变，旧框框冲不破，增的多减的少，结果是分类越改越细，课文越改越多，课本越改越厚，书价越改越高，学生负担越改越重。

现将大陆、台湾中学同年级语文课本和同一篇课文进行比较，从中不难发现一些问题。当然，两种课本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台湾课本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在减轻学生负担方面，却很值得我们借鉴。为了便于比较，列表如下：

从图表中的内容可以分析出下面几个问题：

1. 大陆本，篇目占优势，相当于台湾本的2.4倍。篇目多，知识容量大，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以及应用文一概俱全，写诗、写小说（小小说）、编剧本等知识一项不漏，几乎成了一本“小百科”。相比之下，台湾本显得非常逊色，文章体裁不全，知识松散脱漏，是一本“小儿科”。

2. 大陆本，字数占绝对优势，相当于台湾本的4.4倍。

课本 内容 分类	大陆初中语文（第五册）	台湾初中语文（第五册）
字数	22万字	5万字
页数	32开本，344页，包括插图和说明	16开本，96页，包括插图
篇目	具体篇目：略 课文24篇，8个单元。 参考阅读文5篇，知识短文5篇，写作训练、听说训练和语法10篇。其中4篇课文是多则，如果以篇、首为单位实际上是11篇，趣味小知识12篇。共67篇（还不算省编补充教材）	具体篇目：略 课文20篇，不分单元。语文常识3篇，练习3篇。其中2篇《词选》是两则，如果以首为单位实际是4首。共28篇。
插图	彩色插页4幅，黑白插图12幅，约9页，占课本版面的2.7%	彩色插图27幅约17页，占课本版面的18.7%

3. 台湾本，插图占优势。相当于大陆本的1.6倍，所占页数相当于大陆本的7倍。插图适量能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引起学生学习兴趣，调解课堂气氛，调动学习积极性，增强联想力和想象力。

4. 大陆中学和台湾中学每学期教学时数基本相近，台湾中学生4课时学完的内容，大陆中学生必须用1课时学完。在大陆中学语文课本分量过重，教师要想完成教学任务，只好搞“填鸭式”教学，超出量力性原则，学生会产生厌学情绪。

5. 两种本子自读课文或选读课文都偏难。大陆本自读课文6篇，共占44页，约1.8万余字。现举二例：(1)《〈打渔杀家〉选场》，有唱词，有科白，有京戏术语西皮倒板、西皮摇板和摇板，又是《水浒》戏，相关知识很多，即使给科班出身的京戏演员说戏，一个课时能说几句？让毫无京戏知识的初中生课外阅读或自读，不是有点开玩笑了吗？(2) 郭小川的《青纱帐——甘蔗

林》一诗，12 节，48 行，气势雄浑，意境深远，句式整齐，语言优美，知识比教读课文丰富得多，一课时能解决多少问题？台湾本选读课有①《詹天佑》，②《与宋元思书》（大陆本选入高中语文第一册，题目为《与朱元思书》），③《幽梦影选》。他们课堂时间充裕，处理也许会好些。

6. 各地市教研室出统考题，很少考虑教读课和自读课。一旦从自读课中命了考题，学生埋怨，家长不满，学校领导批评责难，叫语文教师怎么干？

7. 大陆本对一些知识要求过高，“说明”中写道：“第 4 单元介绍有关读书的知识。让学生了解图书并学会使用图书馆，是培养自学能力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学生终身受用不尽。”第 4 单元没有教读课，只有两篇自读课《我的“长生果”》、《自读的好帮手——工具书》，还有两篇参考阅读文。授课时间只有 2 课时，初步了解都很困难，怎么能达到“终身受用不尽”的高度呢？此外如《文学作品的鉴赏》（叶圣陶）、《谈谈戏剧文学》等“附录”文章，老师不讲学生不懂，教师要讲又没有时间和精力，徒给师生增加烦恼。台湾本“语文常识”只限于文法、修辞，好教又好学。

大陆本、台湾本选入的课文，有很多是相同的，如：

西江月·夜行黄纱道中　辛弃疾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头忽见。

1. 这首词，两种课本在题解、作者、注释、练习等方面，内容基本相近，观点基本一致，字数相差无几。按每学期授课时间 18 周，每周 5 节语文课计算，教读此文，大陆学校有 20 分钟时间，台湾学校有 100 分钟时间。

2. 大陆本对讲授范围作了明确规定，课前“阅读提示”中写道：“学习这五首诗词（其余四首为《观沧海》、《春夜喜雨》、《书湖阴先生壁》、《如梦令》），在准确理解语句的基础上，要适当结合作者写作时的生活背景，着重领会他们怎样通过融情于景，创造出一种意境来表达自己的胸襟、情怀或生活情趣。在语言运用的技巧上，古人很讲究炼字、炼句，其实也就是炼意，要抓住这点来体味作者遣词造句的妙处。”课后练习要求：背诵、默写这五首诗词。为了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有人提出“向课堂45分钟要质量”的口号，他们的好心和善意可以理解，只不过是好心人的一种良好意愿而已。课本如此繁重，时间如此紧迫，这个口号不可能实现，也根本实现不了。只有加重课后负担才能完成任务。

3. 一些人提倡预习。在各类级别各种形式的公开课、观摩课中，事先都要求学生充分预习，让学生自己动手，查阅有关资料，理解课文内容，朗读或背诵课文。其实这样的预习更耗时费神。偶尔作次观摩课演演“戏”还可以行得通，篇篇如此，更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提倡预习不是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好办法。

4. 教读《西江月》这一类的短诗词，传授知识、开拓思路、理解内容、讨论问题，20分钟时间勉强够用，可是必要的复习、检查、巩固等环节，课堂没有时间进行。台湾中学课堂时间充足，一切问题都可以在课内解决；大陆中学要想完成教学任务，提高教学质量，只能占用课外时间。使用这样的课本，不可能减轻学生的负担。

5. 插图，属于直观教学，是培养学生形象思维的最好方法。

不同的是大陆本插图是一幅黑白标准像，从头巾和衣服上分析，是一位宋朝平民百姓。印在辛弃疾名字旁是辛弃疾，说他是

苏轼、姜夔也必然有人相信。

台湾本插图是一幅水彩画，采用写意手法，勾勒出《西江月》中表现的景观：明月、惊鹊、高天、远山、社林、茅店、小溪、木桥和人物，与词的内容紧密结合，诗情画意融为一体，读诗赏画，记忆深刻。

为了真正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中学语文课本的编写必须进行一次彻底改革。打破旧框框，建立新体系，闯出新路子。不要贪大求全，不要过分强调知识系统化，不要担心知识出现漏洞，不要脱离学生年龄特征，不要搞编完的课本去强行安排每篇课文的授课时数。初中语文课本字数控制在10万字之内，时间安排充裕一些，将预习、教读、练习、写作等内容都做出妥善安排。课文力争图文并茂，字体要大些，纸张质量要好些。这样的教材一定会受到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

□摩　罗

寓言与愚言

从上海市的小学语文课本中，我读到两则很有意思的寓言。一则寓言说，一只鹿很喜欢自己的角，而不喜欢那瘦长的四条腿。当它遇见老虎时，正是漂亮的角防碍了它在森林里的逃窜，幸好那四条腿又机灵又有力，才得以逃脱虎口。

另一则寓言说，一只公鸡很为自己美丽的羽毛而骄傲，它想与动物界的同伴们谈谈羽毛的美丽，可老牛谆谆告诫说；美丽有什么用呢？要为大家做好事才是有用的。于是，公鸡赶紧夹起尾巴，恪守打鸣之职。

我原先很羡慕上海的中小学生，可读到这两则寓言后，我对他们有点怜悯——他们在中国最好的学习条件下，所学的竟是这种愚蠢的东西。这两则寓言的功利主义倾向，正好表现了小农和小市民的狭窄浅薄的人生观和文化观。如果是村巷父母这样教育子女，此种教育恰与他们卑屈的地位、贫弱的能力、苍白的想象相谐和。他们唯有这样地实在、这样的功利，才能在重重压力下获得起码的生存条件。对于作为精神现象而存在的诸如文化的、审美的、心灵的东西，他们难免比较隔膜，比较漠视，有时也许还带有一点敌意。从集团心理而言，小农和小市民集团都深怀着非文化、非审美、非心灵的心理倾向。

教育正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教育的全称是“文化教育”。所

谓文化，乃是从整体上考虑人类的生存质量，鼓励人类通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生产，培植起远大辉煌的文化理想，永不止息地开拓最广泛的幸福和最广大的精神自由。教育虽也有功利的、技术的层面，但从根本目的看，教育主要是对人类心智的开发、个性的培养、理想的构建。所以，它的最大的“功利”性就在于将人类从物质的囚禁与权力的奴役中、从非尊严、非自由、非心灵的卑屈境遇中解放出来。教育本身即应是文化的、审美的、心灵的。

可这两则寓言却在那些业已被功利主义等等不良观念所压垮的小小心灵上，再压上如此沉重的功利之思，而且是以多少含有一点神圣意味的教育的名义。它们的“功利”所在，就是将儿童内心向往美、向往文化、向往自由、向往超越与升华的天性尽情扼杀、尽数剿灭，从而让他们成为会干活的工具，会吃喝拉撒的动物。经过十几年这样的教育，再加上紧接而来的若干年社会训练，他们就真的会成为没有文化的、没有精神追求的、没有神圣想象的、没有尊严意识与自由意识的一代愚民。这样的愚民当然只能是非文化的、非审美的、非心灵的。而制造一代愚民的教育，则是反文化的、反审美的、反心灵的。致力于此种教育功能的此类寓言，则只能是培训愚民的愚言。

如果仅仅只有这么两则愚言，也许还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幸这两则愚言正好代表了一种倾向，这就让人不寒而栗。本来，在社会沉溺于功利、昏醉于虚华时，教育正是坚持精神理想和健康人性的中流砥柱。不幸我们的教育却率先成为了某种不良倾向的合谋与先导。上海人向以精明著称于世，其功利主义倾向已有压倒一切之威势，倘若再世世代代这样“教育”下去，他们除了成为唯利是图的机器和工具，还能成为什么别的形象呢？这样的教育和这样的观念成为一国之风气，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好的前途可

谈呢?

上帝曾经对一个愚顽的族群痛心地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情你们都不相信，当我对你们说天上的事情，你们怎么会相信呢?

我们的生活正是深陷于“地上的”泥潭中，我们的精神又被这“地上的”愚言窒息太久。真该让那些对人类文化有着整体性的领悟，真正禀承着全人类最优秀的精神遗产的人来从事教育——让教育成为真正的文化教育。

□蒋　泥

评1995年第二版高中语文第六册

一、初、高中第六册之比较

两书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和外国文学，从中你可以看出编者的大而化之。今天，小说已成为文学最重要的部分，其表现方法各式各样，其思想内容包罗万象，我们有什么理由忽略不计？外国文学更是打开学生思路的通天大道，如果缺少世界一流作品，人们锁着大门，看见一个诺大的院子会心骄志得、自以为是，不知道自家的庭院即使再大，也代表不了整个世界！没有比较，就找不到差距，缺少参照，时日越久国内的某些“伟大”作家就越不知黑白好歹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则是它造成了思想、表现技巧的单调、苍白，使后人之精神日益封闭、萎缩，以无知而傲世，麻木乐观，乱开空头支票。

更奇怪的是二者所选论文几乎全是这三个人：鲁迅、马南邨、毛泽东。风格之单一、内容之相近，让人吃惊！

鲁迅之文章为《“友邦惊诧”论》、《论雷峰塔的倒掉》（初中）、《文学和出汗》、《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高中）。

《“友邦惊诧”论》讽刺的是国民党和当时的“国联”。现在“南京政府”早已垮台，日本人早已赶出中国，“国联”也已成为一件“古董”，选此文为教材想达到什么目的呢？它是鲁迅所写？

让学生学会“仇恨”？让学生了解历史？历史自有历史课传授，语文课有必要选这种文章吗？我们真能憎恨那一代人的政府吗？学生请愿之类的事60年前发生过，60年后不也有吗？难道是历史未去，现在可鉴？

《论雷峰塔的倒掉》据“提示”说抨击了封建道德礼教和封建复古主义。其实你何必向这方面歪想呢？传统中也有好东西，过去妄想铲除一切传统已使我们丧尽了建设的根基，于是现在有识之士都明白应该复兴良好的传统，让它发挥其基础之功用，从传统中寻求发展现代性的生长点，这种复兴和当时一些人所努力谋求的有何不同？难道这该诅咒痛骂？今天我们拥有了更多的理性、更平和的外在环境，对七十多年前知识分子提倡的“整理国故”、“保存国粹”实该有一个全面的分析和认识。如果说当时的鲁迅抨击这些做法尚情有可原，意识到了它的负面作用，那么今人除了见其负面以外亦该认识它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在一个统一和平的环境中才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今日之环境已远远不是鲁迅当时的环境，但我们为何对“整理国故”等等仍不能正确对待呢？这种导向对今天的学生来说价值何在呢？难道反传统还嫌不够，还该全盘、彻底、轰轰烈烈地反？“文革”时不是这样做过吗？结果呢？好的全反掉了，剩下的恰恰是传统中最恶劣的部分，并将恶劣发展得登峰造极！

《文学和出汗》批驳的是梁实秋的“永久不变的人性”。凭良心讲，梁实秋的说法也有立得住的一面。人类的爱情、友谊、责任感、不甘平庸的上进心等都是“永久不变的”，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也不会有太大变化。本文写于1927年，其时鲁迅仍然信仰达尔文的进化论，因此视点着重于人性中变化的一面。现在稍有思想的人都不会再麻木乐观，起码对“进化论”抱着怀疑态度。所以人性中有其变和不变的成分。比如衣食男女永远不

变，不论“进化”到什么程度。梁实秋所说的正是这种“不变”的一面，认为写“变”的一面十分无益而有害，只有写“不变”的一面，作品才能流传久远。这本属正常的学术分歧，但教科书却将它拔高到意识形态的高度，从而将梁氏一棒打死，显然又是误导！我倒十分肯定梁实秋的看法，而认为鲁迅最大的缺点之一就在于写“变”的一面过多，受特定时代情境束缚过多，从而影响了其作品的长远性价值。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此文主要针对当时一种错误看法进行辨别。那环境既已过去，则此文除了几句概括中国历史的话以外，全已“过时”。

可见两本书所选鲁迅杂文基本上是同一格调，同一语气，同一指向，内容重复，局限性极大、火药味太浓，缺少平和气、宽容心，不利于初、高中学生形成健全的心理，缺少动态的日常生活性，距离当今时代较远，重复选择，意义不大。这种现象不仅限于两册教科书，推而广之，整个初、高中阶段选择鲁迅之论文、小说都存在这一缺陷。这些文章都是鲁迅文章中质量不太好的文章。

而且初三、高三本属两个层次，我们的编者在选取范文时似乎无视这种分别，以至于初三的几篇论文可以和高三的对调，没有体现一种“进化”意识，似乎高三学生所学的内容可以和初三学生处于同一档次，连范文作者都可以不变！我无法理解编者的用意。难道中国就这么几位作家?

两本书的附录更成问题：初中第六册是“中国现代文学”，高中第六册是“我国的现代文学”。二者的主要内容完全相同。这再一次让人惊叹！据统计，全世界有三个国家各类书的信息量最低，这就是朝鲜、越南、中国。中国最突出的问题在哲学书上，而一本书的信息量若超不过16%，便是废书。现在我所见

的两个大体一样内容的附录当然亦可以叫它们“废文”！为什么这种费纸费工的废文章能挤身教科书中呢？为什么初中的入选文章以“左倾”作家居多，到高中还是如此重复呢？为什么我们每册书必须批国民党“反动”政治和“反动”文人为主呢？除此以外世界就没有值得关心的人物、事情了？就“我们”伟大，别人全是混帐王八蛋了？除了你们认为的那点子狭隘的、叫唤不息的“爱国主义”以外，你们还想让中国学生学些什么？这样的文章能不令人厌烦？

二、厚“古”薄“今”

本教材无一与现代生活相关。现代的高科技社会似乎离我们特别遥远，从书中了解不到一点属于当代社会的信息。都说我们已处于“信息爆炸”的社会，可是不论外面如何天翻地覆，我们的学生仍被扔在井底坐井观天。凭这样的课本能培养什么博学通才？它们对帮助学生形成独立的思想意识有什么作用？没有这种独立，所谓的“四有”人才会成为什么样的货色？

“古”得有水平倒也罢了，现在我们偏偏看不到这种水平。试看周立波的《娘子关前》。这是一篇较长的记叙文，写的是“在日寇盘踞的娘子关前行军时的见闻和感受，控诉了日寇烧杀洗劫的滔天罪行”。如果仅仅是这些内容本文大概还不能被编者瞧来顺眼，关键一条还在于它“表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为‘还我河山’而战的决心、力量和气概，也表达了作者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这样的主题我们已耳熟能详。

紧接着是柯岩的《汉堡港的变奏》。记叙我国远洋货轮在德国汉堡港面对外国人的傲慢、偏见时，克服种种困难，胜利完成高难度装船任务的经过。最终赢得外国人赞扬、敬佩，“为祖国争了荣誉”，“唱出了一曲中国人民的高亢的正气歌”。这样的说

法再一次令我困惑！我们的强大如此不容易获得吗？非得外国人赞扬、敬佩，我们才下得了台阶、面上发光吗？假如即使你做好了，外国人也不动声色、无动于衷呢？难道这些人全去跳河？万一失败了就说明中国人没志气、没能力，丢了祖国的脸？以他人之态度、看法左右自己的有无尊严、志气，岂不是奴性哲学荒谬透顶？何况就这些人，他们的能力、水平岂能代表整个中国？硬拿一桩小事上纲上线岂不是“文革”时的余绪——区别仅在于，那时是抹黑现在是贴金，本质上有什么分别呢？难道选中它的目的仅止于此——炫耀一下我们的“伟大”，打击一下外国人的“骄气”？

可见，这些文章都是在宣传一些似是而非或老掉牙的货色。我们要历史里已反复讲、天天讲，还嫌不够不足，硬弄到中学语文课本里灌，成就的就是榆木一样的大脑了！能怨我们出不了“天才”，出不了诺贝尔奖得主？为什么其他时代多选诉苦哭穷的文章，来“抨击”谁、“揭露”谁，独独 1949 年以后，穷没有了，反而全在“讴歌”、“颂唱”？“大跃进”怎么解释？“三年自然灾害”呢？“文革”呢？通货膨胀呢？官倒呢？国有资产流失呢？腐败呢？“下岗”呢？“农民问题”呢？

看来这些讴歌、颂歌是廉价的，老百姓已麻木，学生也已麻木。每个时代都有光明和阴暗面，把真实的世界告诉后代才是功德无量的事。编者不能过于偏颇、以偏概全，否则把别人的子孙卖了不说，连自家的子孙都卖，那时自己打嘴巴都来不及的！

三、如何出作文题目？

好的作文题目不仅能启发学生思维，而且培养性灵，充满人情味，使他们感到有话可谈，谈得具体感人、有血有肉。

中学语文课本中有些作文题目似乎存心和学生作对，好像作

报告，尽出宏观性的大论题。

例如：《当代青年是大有希望的》。这种题目一看就可感觉出它的老气横秋。拿它来鼓舞小辈也许还行，但是用它来做文章，由一帮十几岁的中学生做文章就显得空洞无聊了！出题者是想肯定这一论点呢，还是自己怀疑得由少年人证明其真呢？假如有人偏偏不以为然、而且理由十足，那么他们不就不该肯定而要否定吗？可是你的结论已经肯定，叫他们怎么否定嘛！这时候只有顺着你的思路胡编一通了？如此，一个人不就学会了不诚实，渐渐的我们全变得虚伪起来？况且“当代青年是大有希望的”，这样的题目有什么好做？做它的目的是什么？难道全社会已不认为当代青年有希望，现在得纠正社会偏见？可是就我所知，社会并没有认为当代青年没希望啊，那么你的用意何在？

又如：《“铺路石”精神赞》。编者的用意我揣想可能是说：你们学生要谦虚，要甘于默默无闻，像“铺路石”一样结为一体，实现自身的“价值”；一个人只有置身群体之中，成为大路之基的石头之一，才有用。这样的思维有多僵化！他们只想让学生成为“螺丝钉”式的工具，不认为每个人以自身为目的，只有将个人立好了，才能真正为社会贡献价值。“铺路石”是什么东西呢？它被水泥、黄沙沾住了，一辈子凝定在那里，永不流动，永无声息，永远不再需要上进，即使明明能变成“黄金”的石头，也因为懒惰、自甘平庸而不去改变了！但是，现代社会要求人才高速流动，到最能发挥自身价值的地方尽情释放能量，形成最优化的组合，给人类带来尽可能大、尽可能好的福利，能成白银的不要做青铜，能成青铜的不要做黑铁……不断提高，以求进步。所以现代人才是一个立体、动态的概念，早已不能用“铺路石”这样静止、平面的概念来指代。而编者却要让学生和他一样僵化，并且明言要求学生来齐声赞美这种“精神”，有异议有保

留则没法完成作文任务！这种定性化的题目使学生可供选择的余地完全没有，还得沿着指定的思路去胡编滥造，写一些娇情的、华而不实的、海市蜃楼式的烂作文，你能怪学生想象力单一苍白吗？你能怪学生无病呻吟吗？

看看今天的一些“作家”吧，他们的文章不一定比学生的“作文”高明多少。如果每个字含一两水分，那么你能将他们的文章挤成咆哮奔流的大河！今天的“作家”不就是几年、十几年前的学生吗？从那时开始，他们就学会了写文章羼水，否则老师不高兴、“读者”不高兴——在一个人人习惯于羼水的社会，你不适应就是有病！不过，一般情况下人们发现不了哪个作家羼水哪个作家“有病”。为什么？因为在我们这里时兴写文章要源于现实而高于现实，要体现一种乐观的理想化的精神。而所谓“高于”、所谓“理想化”在不少情况下也就成了“有水分”的同义词。可见，我们是明目张胆地叫人羼水，连老舍、巴金、王蒙、路遥、邵燕祥、柯岩、茅盾、郭沫若、冯友兰……都曾自觉不自觉地干过，编者当然无需自责了！

再如《严于解剖自己》。出这种作文题目的编者一定参加过无数次“政治学习”，所以才洋洋自得，叫学生从小就学会“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便走上社会之后能够适应“政治斗争”需要。不解剖自己行吗？60年代初期，郭沫若先生在北京曾带领数万名知识分子游行示威，队伍前面打着横幅标语，上面写着：向党交心。从此全国上下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交心运动。不知多少人在这场交心运动中吃尽苦头、惨遭不幸！这样的历史似乎过去了，因此人们全忘了。交心的理由是什么呢？我可以从高中第六册作文示例《严于解剖自己》中找到：第一，要不断进步，必须无情地“解剖我自己”；第二，要了解自己“病”在哪里，这样才能看准了下刀；第三，光有自知之明还不够，看到“病”在何

处以后，还要勇于自我批评，而自我批评就是为自己开刀去“病”；第四，自我批评的勇气来源于对真理的追求和崇高的信念，而只有这样才是掌握了开刀的规律，真正去“病”。补充一下：自我批评练熟了，才知道怎样批评别人；看清了自己的“病”，才知道别人自我批评得真不真、深不深。60年代初“向党交心”就是用的这套逻辑、这种方法。

某位长官将一大批“右派”召集在一起，说道：今天大家向党交心，进行自我解剖，这是向人民靠拢的表现，我们决不借此整人，大家尽管放心，越是向党交心交得彻底，越表明你的思想改造得有进步；交不到水平的，大家不通过，你就没有过关，得继续交心，而且这时你已构成对抗运动的罪行，对党不老实，后果自负。结果许多老实蛋果真竹筒倒豆子，和盘托出。他们说大跃进、炼钢铁饿死人了等等，为此心里对党不满，这说明自己仍然没有一颗红心，现在将这将这颗黑心交出来云云。最后这些讲了大实话的人全被定为“借这次交心运动继续向党进攻，向人民示威”，于是罪加一等。那些会说话的人则讲些大而无当、漫无边际的事情，然后自我悔过一番，复请大家帮助“解剖”，居然“过关”！可见，所谓“严于解剖自己”在现实社会中是没有一点好处的，真正实践时也尽在说假话。中国人早已习惯的说假话，就是从这种强迫自我“解剖”时开始的。现在我们非但不警觉，反而继续在维护这种虚伪的“解剖”，而且从中学时就开始学习说谎说骗说玄，真叫人痛心疾首！

由此可见，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不仅内容陈旧、远远落后于时代，而且有不少片面、狭隘、有害的东西，严重地危及到一代青年的茁壮成长！即使在小小的作文题目、示例上，也存在不少问题。

四、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这是该教材第一课，写于1963年。“提示”里说此文是一篇哲学论文，“阐述的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有关实践的观点、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和认识之间的关系。今天看来，它虽是一篇“哲学论文”，其中仍含有相当重的火药味，带有不小的鼓动性，留下那个特定年月的时代烙印。我宁可把它定性为“政治报告”。

而且就算我们如文中所希望的已经建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了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进而在全人类实现了共产主义社会理想，这以后人们还需要奋斗吗？他们为什么而奋斗？当一切都进入“自由王国”、一切平等、“按需分配”以后，人不是无所事事了？富人无聊以后你知道他们想的是什么吗？他们想着堕落！

如果说一切“真理”都来自实践，通过实践而得，那么如何解释同样的实践，为什么有人得到甲，有人得到乙，有人得到丙？结论不同是因为加入了人的大脑、人的情感等。既然人的大脑、情感参与其事，那么为什么不说一切“真理”来自实践和实践者的心理、意识、无意识等等的……，而单说来自“实践”呢？有人会说，真理是客观的，它在无穷远的未来，我们只能在实践中无限逼近它，却永远和它差着一截！这就如同说，你不是人，因为200年以后你会变成灰、变成烟、变成土、变成某种元素，所以地球上从来就没有人——在遥远的未来，地球、太阳都“死”了，你还算“人”吗？我不知道如此定义“真理”价值何在！无穷远的未来连人类也可能不存在了，还有什么“真理”啊？况且人之为人的意义何在？难道意义仅在于为了实现某某主

义？假定实现以后，人之为人的意义又何在呢？

没有信仰人是活不下去、活不实在、活不安心的，一个人可以信仰某某主义，但不能也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来信仰它。因为人的信仰不是向外，而是向内的。从严格意义上讲“实现某某主义”不是信仰，因为如果把它作为信仰、人类唯一的信仰，那么实现主义以后人们信仰什么就缺空了——不可知了。可见，人的正确思想有时不必通过实践得到，只要用一点逻辑推理就可以明白了。因而毛泽东所说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段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是片面的或者是说了等于没说的，它和“你不是人”一样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如果它不是“一篇哲学论文”，而是我说的“政治报告”，那么编者选它作为教本范文我无话可说。现在既然将它拔高成“哲学”，那么已完全属于学术，我亦当有权从学术的角度加以争鸣，作为讨论，读者不一定要同意我的一己之见。

五、附录：《我国的古代文学》

本文介绍中国古代文学。重点介绍反映古代人“在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和作者。比如中学课本中所选的《伐檀》、《硕鼠》、《石壕吏》、《卖炭翁》、《窦娥冤》。这样的选本文确实含有一定的误导性。就说《诗经》吧，为什么偏偏选了同一主题的《伐檀》、《硕鼠》呢？有一篇足以达到让学生认识当时黑暗现实、珍惜今天的目的，为什么再加一篇来折腾人呢？那么丰富多彩的《诗经》为什么不各选一种，使学生了解更全面一点《诗经》的风貌呢？过去并非一团漆黑，今天远未光明遍地，用一些选本来有意制造这种幻觉果能有效吗？真是自欺欺人的行

为！

其实除开《伐檀》和《硕鼠》，《诗经》也写了当时生活中美好的一面，比如它的起首诗就写了爱情："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关雎》）读来有多趣味盎然，滋生灵气啊！这不是远较咬牙切齿的文章痛快吗？《诗经》的第二首诗是《葛覃》，写的是一个女子要回娘家，她看见：长长的葛藤在山沟沟里延伸，叶儿密密层层，黄雀飞飞成群，聚集在灌木林，叽叽呱呱不停。这女子：洗洗我的内衣，洗洗我的外褂。该洗的是啥？甭洗的是啥？我就要回家看我爹妈。（余冠英译）大家看写得多清新扑鼻！这样的文章才符合中学生的心理特征，让他们发生兴趣，越学越想学，越学越有滋味。越学越有精神，越学越不发困！但是翻开几本中学教材，你找不到一首这样的诗，除了编者自作主张删去了一部分的《荷塘月色》等一两篇以外，你找不到一首这样清新的散文！重心全放在反映当时如何有剥削、有压迫、有斗争、有反抗上——编者除了懂点半通不通的"政治"以外，还懂什么？这些人能编书吗？懂得青少年的心理——兴趣爱好之所在吗？

《中国古代文学》大写特写的恰恰正是这些生冷的东西！它说《水浒传》写的是"人民对残暴腐朽的封建统治的反抗和勇敢机智的斗争"，所选《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当然是"斗争"的最好事例了！《红楼梦》"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社会末期的腐朽和封建礼教的虚伪"，所选《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林黛玉进贾府》前者见其"腐朽"，后者见其"虚伪"。

从古到今，不！从古到清、到民国，作家写的全是某某"腐朽"、某某"虚伪"、某某"反动"，由此再推断说这社会已没落、无救，必然灭亡。灭亡以后？还不是在"封建社会"，还不是在继续"礼教"，那么你为什么说它们"必然灭亡"呢？两千多年

了，照你说早已亡过千百次了，为什么还在“亡”呢？既然还要“亡”，那就说明你看错了，“腐朽”、“虚伪”是强健的、有生命力的东西，决不是说亡就亡的，你带色的眼睛出了问题，今后不能再这样妄下断论了！

一部《红楼梦》上天入地，打通三界，融汇各家，叹尽富贵无常、人生无常、生命无常，既有形而下的生活具象，又有形而上的诗意超拔，错综复杂，混沌无穷，包罗万象，岂是简简单单的几个词能够涵盖得了的？编者头脑简单，使学生跟着简单，后患无穷！而且一旦具备这样简单化的思维以后，他们什么大事都干不成，因为大事全是复杂的、无从下手的，简单的人安能对付清楚？中国落后，很大一部分责任不能不归咎在这方面——文学有选本，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美学、政治学、经济学……一切都简单、绝对、武断、似是而非，以至于至今无法清除，仍在充当主流思想，像柏杨所说酱缸，腌出一批批发咸、发酸、发辣、发臭、发苦、发甜、发麻、发木的脑瓜！

说到唐代时，本文只提了三位“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然后作了表面化的点评。“李白的诗，嘲弄庸俗世态，反抗权贵，充满了追求理想的浪漫主义精神。他歌颂祖国壮丽的河山，歌颂自由生活，对于社会现象的不合理和自己才能的不得施展，表现出强烈的愤慨。杜甫生活饱经忧患，比较接近人民，他的诗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生活的痛苦……他的诗富于现实主义精神，发扬了《诗经》、《离骚》、乐府的优良传统，给后来的诗人开辟了宽广的道路。李杜以后的大诗人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诗而作’。他写了 10 首《秦中吟》和 50 首‘新乐府’，意在揭露当时政治的黑暗。”

我真不愿意将这些话抄出来。因为这些说法过于千篇一律，窒息灵魂，看多了叫人头疼。它既没有评出作者性灵的深度、力

度，也没有讲清诗人作品的艺术性、文学性——难道“大诗人”、好诗人全以“反抗”、“歌颂”、“现实性”、“揭露”闻名于世的？我倒在想，唐朝出这么多“反抗”、“揭露”者而未受到当权者迫害，对文人来说是一桩幸事，同时还说明当时文化发达、社会相对宽松、自由，不那么太“黑暗”呢！直到今天，我们大体也才争取到了这么一步，你有什么资格来谴责一千两百年前的古人呢？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名词来标贴一个大作家不等于盲人摸象一样简单、片面、不知所云吗？他们是大诗人，但“大”体现在哪里呢？其间有什么区别和传承关系呢？诗人的诗有什么独到的文学特性呢？文章一字无及！真正本质的东西、锻炼学生美感、艺术细胞的评论一点看不见，相反作者从水中寻血痕、从蛋里找骨刺，我不清楚他这样胡乱挑剔的目的是什么。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作者想证明：过去太黑，只有现在才亮堂起来了；过去的人当不了主人，只有现在才“主人”起来了；即使现在有一些污迹，也是历史带来的、外国传来的。他们从来不想反省自己、当代，于是完全符合钱穆对这些人的评价：“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将我们自身种种罪恶和弱点，一切诿却与人”，自以为自己“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国史大纲》）

人性复杂、社会复杂，复杂的人对复杂的社会所持的态度当然也是复杂的，有时甚至前后矛盾。

钱钟书在《谈艺录》里说：诗分唐宋，唐诗多以丰神情韵见长，宋诗多以筋骨思想取胜。在人的一生中，少年时才气发扬，所写诗文近于唐体之风格；晚岁时思虑深沉，于是诗文又染上宋调。个人如此，历史亦如此：古人写的诗真朴自然者居多，因为当时他们的情感、思想、心理不太复杂，类似于唐体；今人写的诗刻露见心思，又近乎宋调。从人的性格来说，外倾兴奋型的人

所写之诗文类于唐体，内倾沉潜型的人所写之诗文同于宋调。李白性格外倾，诗乃奔放飘逸；杜甫性格内向，诗乃沉浑厚实。当然对于大诗人来说这种区别只是大概的，不可能一概而论。比如杜甫的诗兼备众妙，人人只要学到其一方面就是足称名家。陈后山学得了他的细筋健骨、瘦硬通神；陆放翁学得了逸丽，但苍浑不足；其他人能放不能敛，学了杜甫单方面的一半……杜甫诗的内容更是丰富多彩。如赏乐之诗：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赠花卿》）此诗文笔飘逸，尤以“半入江风半入云”一句为奇。从中你哪里看见有一点“现实主义精神”反映了动乱、痛苦呢？

一首不足训，试看另外几首明白如话的小诗：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江畔独步寻花》）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绝句》）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水槛遣心》）

此外老杜还有快心快意的“喜”诗，如《春夜喜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客至》等。另外咏史的《蜀相》、怀古的《咏怀古迹》，等等涉及到方方面面，时而奔放时而敛思。

何况“文章憎命达”，“少陵失意诗偏老，子厚因迁笔更雄”。杜甫自己也说“愁及本凭诗遣兴”，一把辛酸泪可以化为满纸荒唐言。可见即使受一些战乱、受一点打击，处于困窘之境，又何必非要说诗人和社会作对不可呢？

高中语文第六册所选李白的诗是《梦游天姥吟留别》，编者在“提示”中说：它反映作者政治上的不得意和对权贵的不妥协

态度，同时也反映了消极的避世思想。

何等简单的评价！它和将杜甫、白居易简单地各归一位同样片面、有害。除开这些编者似乎已经想不出其它词语来评价古代或现当代、外国文学家了。这是 1949 年以后中国评论界、思想界、文化界共同的悲哀！

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诗人所处的“穷困之境”，我们可以借《管锥编》里的一个说法来说明：“轗轲可激思力，牢骚必吐胸臆；穷士强颜自慰，进而谓已之不遇正缘多才，语好词工乃愁基穷本，文章觑天巧而抉人情，足以致灭仇而招人祸。”这是的确之论！编者岂能明白呢？

古代的读书人尚能在阅读别人忧困之作时“自本身之阅历着眼，于切已之情景会心，旷代相知，高举有契”；今天我们的编书人却已没有“心”，不去用心体会，所以自以为“旷代相知”，但一落笔就胡说乱道了！这种胡说充满了大、中、小学的几乎所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里，在这样的环境中念书、上学能不“贫血”得面孔发白？

我悲哀，为我们的时代悲哀！

我无言，为大家的沉默无言！

□蒋 泥

评1996年第二版初中语文第六册

一、何为“九年义务教育”?

该书是“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令人费解的是什么叫“义务教育”? 1994年中国有1900万人小学毕业，但初中招生仅为1645万，且不说小学一亿多孩子里辍学率为1.85%，单说我们的升学率，为什么不是100%? 那200多万进不了初中大门的孩子怎么办? 国家在这方面尽了“义务”了吗? 如果说我们还穷，不能全部招生，那么你抬头就用“义务教育”到底想给人什么样的错觉? 我们有法律制裁那些贫穷家长，说他们目光短浅，不让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但是86.5%的人为的升学率又阻住了一大批学生的上进之道，这不是更短浅、更该接受法律制裁吗? 况且，你只说不做，言不及实，空讲什么“义务教育”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二、语文课入选内容的标准是什么?

该书前言已将入选标准交代得再清楚不过：它要能够使学生“激发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培养社会主义的道德品质和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所以入选现代文限定为如下一些内容：一类是宣传党的优良传统；一类是帮中国共产党讲“敌人”的坏话，而

她的“敌人”是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因此得骂臭。如此强烈的火药味，距离当代的“和平环境”有多遥远！学生能从中获得什么样“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呢？难怪许多学生读着它要头脑昏昏！

世界如此广阔，人的心灵如此丰富，学生的好奇心如此强烈，但是我们提供出来的东西却如此陕隘、陈旧、片面、僵化，它窒息的不仅是学生的想象力、思想，而且是活鲜鲜的灵魂、灵气！靠这些东西岂能不贫血？又岂能培养世界一流的艺术家、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要知道所有这些“家”都是眼界开阔心胸开朗的人啊！这需要多姿多彩的外部世界来涵养，语文课更是向学生展开世界多样性、丰繁性的窗口。在此前提下再提供真正的“美文”，抓住学生的感官，滋养它、培护它、升华它，使之如看山观海，生美不胜收之效。

三、面面俱到的可行性

该书以“阅读为基础，写作为体系，读写有机结合，兼顾听说”。编者希望穷尽一切门类，这种大而无当的做法可行不可行？

中考、高考竞争激烈，所谓“讲演”课、表演课、辩论课有多少人感兴趣？难道编书人生活在真空里，在如此大的竞争压力之下，企图让学生“全面”受锻炼，这现实吗？除了进一步加大压力以外，我相信毫无意义。况且这些课安排在第六册，学生做题尚来不及，又哪里有功夫辩说呢？也许我们的想法很好，希望孩子们都成为“全才”，但是样样会、样样都不精的现象难道还少吗？你想教学生学会讲演、表演、辩论，写散文、小说、论文、说明文、剧本、应用文、学术论文……其心不小，却没有时间领学生在其中任一门类里仔细体会、鉴赏、模仿，蜻蜓点水、浮光掠影，浅尝辄止，结果既未培养出学生的独立鉴赏力，亦未

让学生学会基本的写作方法，反倒学了一些花本事，流之于表面化的卖弄。

我们真正要学的是内部精义，不是表面的形式，因为形式易学，精义难于把握。尤其是不把功夫做实，就谈不上有自己独立的理解力、判断力。贪多勿得，形式学了一大堆，一个个却是烂泥，捏不拢、竖不起。

有人曾经比较过台湾和大陆的初中语文教科书，感到台湾的少而精，因此有充裕的时间讲授，老师和学生可以为一首小诗讲解赏玩几天，仔细品出诗的意境、风骨、微妙精神，真正得其灵机奥义、真韵美味。大陆的却多而全，老师满堂灌尚来不及，遑论赏析细微；一首诗几小时就打发了，而所教的内容却是最流水账的作者生平、时代环境、字词解释、中心思想。他们不能把它当成艺术来看来品，学生所得除了一些漠不相关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在《辞海》里全查得到——以外，什么也没有学着。难道这还不能说明我们的过于“贪婪”贻害无穷?

“中国现代文学”怎么写?

本书附录为“中国现代文学”。文中把“现代文学”定义为白话文形式，“宣传科学和民主的思想”。这样的定义有多狭隘!不仅如此，文中提到的作家全是“左翼”范围内的，从 1919 年至 1949 年，我们似乎就这么几位作家，而所有作家的“成就”大小又以对党的亲疏程度来标志。它的用意十分明显：凡是帮助我党讲过好话、说过我党之敌不好的作家全在“中国现代文学”范围之中。否则就算不了作家!——政治决定一切的时代早已过去，但这种思维方式至今仍在。好的是历史会自动筛选出真正的作家，而淘汰空头的作家。于是我们才知道中国的优秀诗人还有徐志摩、冯志、朱湘；杰出的小说家还有钱钟书、林语堂、张爱

玲、沈从文、张恨水、李颉人；卓越的散文家还有周作人、梁实秋、王了一、丰子恺、梁遇春、胡适……虽然其中许多人压根儿就没有“宣传科学和民主的思想”，但是谁也不能说他们不是中国作家。他们中的许多人成就不一定小于鲁迅，有的比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丁玲更优秀，而文中的何其芳等人和他们已无法比拟，根本不在一个档次。可是编者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对这些人一概不提，他们只想指一条很窄的胡同，对学生说这就是马路。如此大胆，害了子孙，害了中国健康的文化建设大业。有什么比这个更叫人可咒的呢？

五、文章分析

1. 赵树理的《老杨同志》。本文写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在抗日根据地如何开展工作。如果没有提示，今天的人已读不懂，因为其中有不少“疙瘩”。比如县农会主席是什么样的官儿？“区”相当于今天的哪一级组织？“村公所”是什么样的“所”？它有哪些职能？村长和农民下棋娱乐难道要不得？这不是“与民同乐”吗？今天（20世纪90年代）的村长代表的是一级组织，有了“官”的身份，普通农民和他不在一个级别，平时他理都不理，文中却居然在一起下棋，不是挺好吗？有人吃烙饼、有人喝稀饭，这在今天已很正常，难道你想让他们平均一下，全吃稀饭或烙饼？用今人的眼光看，别人吃饼你吃糠，这只是说明别人勤快你懒散，有什么稀奇？哪里能因说出这一事实而招惹大祸？县官儿非得帮农民扬谷子才算好官、才显出自己的“特别”？如果不了解当时的背景，学生肯定说不出所以然。而且对城里的孩子来说，他们不清楚“谷子”指什么，“窑”是什么。“窑顶”有一个打谷场，它是什么样子？如果不交代，一般人全会糊涂。如此费解、落后于时代的内容却用来做全国通用教材是不是不伦不

类?

我记得上海有位学生，一辈子没见过“瓦”，所以对“青青的瓦”不明白。赵树理的《老杨同志》有过之而不及。凭这种文章，谁要能读出感情、兴趣、思想来，那才是不正常、发疯。你能怪孩子们学语文乏困?比较而言，吴伯箫的《菜园小记》倒是写出了勃勃的生气，没有“疙瘩”，只不过没必要上升到像提示中所说的“艰苦奋斗”、“以苦为乐”的“革命”高度。为啥?因为今天不少农民比当时的延安军民还要苦还要累，他们种地种不出吴伯箫式的诗情画意。幸好这是作家的回忆文章，事隔十几年，苦也不苦了，烦也不烦了。

2. 朱述新的《看山人》。中国那么多好散文，我不懂为什么要选这么一篇很一般、像流水一样的文章。也许选拔文章的标准不看艺术性，只重思想性。那就看看是什么样的思想吧。本文“提示”里说，作者“描写了看山人那有趣而感人的爱山事迹，歌颂了他以山为家，把一生的精力和全部心血无私奉献给青山的崇高品格”。对一个看守山林、终日和大山为伍的人我们到底应如何认识?是的，他们远离城市，交通闭塞，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但那是他的岗位、他的职业，不干他拿不上工资，养活不了自己。多少比他更艰苦的人也在默默地干，被迫无奈、无可选择地干。何况他年岁已大，一生干的是护林工作。干好了是他克尽本分，干不好是他渎职失职。很平常、极普通的一桩事却被拔高到“无私奉献”的高度，不清楚是编者另有法眼，还是作者别有用心。在这方面中国人吃的苦还少吗?为什么一直不敢正视凡俗之人的真心，硬要编一些假大空的“精神”来蒙骗子孙?当他们被成年人误导之后，起先还迷信一段时间，后来呢?他们发现自己被骗了，而这种社会只有说骗才能吃得开，于是跟着说谎。我们吃“浮夸风”的苦已经吃得太多了，现在还不警觉，还

在妄想什么“无私”奉献！

其实这种“思想”嘴脸早已为世人识破，这种极端的道德理想主义只能产生于“文革”那样的极权环境中。

真正的现代人应是“自利”的，这种“自利”以不妨碍他人“自利”、不触犯法律作为限度，在此限度内他们充分发掘自身潜力，因而既能保护自身权利不容外人侵犯，不至被外界剥夺“人权”，又能自给自足，不仰靠外人援助，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为社会贡献微薄之力。所谓的“无私奉献”呢？它要求你毫无私权私利，一切为别人、为“社会”，因此当它需要你的灵魂时也可以堂而皇之地侵犯、剥夺。生活在这种环境下，你如何自立？如何成为现代人？如何开创一个“现代”社会？

该文鼓吹的是一种“理想”，而非真正写了现实，它内含的所谓“思想”是陈旧的、有害的、反现代精神的。拿它作范文只会教人学习说胡话、谈玄想，要不得。

3. 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寻求救国真理的道路》。文中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在这里毛泽东强调了“走俄国人的路”的重要性。但这个路在20世纪最后10年遇到了困难、——“苏联”解体了，给中国送来“无产阶级宇宙观”的“俄国”再也不存在了，今天它们所走的是毛泽东在该文中所言的不通的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环境变了，时代变了，形势变了，当时尚能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在和平建设时期却面临挑

战。这时如果再把“走俄国人的路”这样的文章编进教科书，化为后人的指导思想，那岂不荒谬。

随着封存了50年后的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的问世发表，随着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的译介，随着“白银时代”俄罗斯作家作品大量涌入中国境内，也随着“资本主义”以后的俄国政府公开原苏联政府的保密文件，今天我们已看到了当时“革命”的不人道和空幻狂热性，以及大独裁者斯大林的内心真相，进而明白了“俄国人的路”之所以走不通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自己思想内部的深刻危机。因此，即使不从中国自身稳定着眼，单从问题本身来看“走俄国人的路”今天都应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何况“革命”时期适合运用的理论、思想，在和平年代并不能适用，如果把对待敌人时的策略、措施用于对待自己治理的人民，则随时有可能再次引发“阶级斗争扩大化”。

现在我们已在建设自己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革早已明朗化，只有政治、经济体制都合乎市场经济的良性、健康运行时，二者才是互相适合的，不存在一者阻碍他者发展的问题，而是彼此共讲。政治、经济的根本改革又必然引起整个社会的深刻变化，所以写于1949年的《中国人民寻求救国真理的道路》用作今天的中学教材已经过时。

4. 左拉的《铁匠》。这篇散文的素材本来枯燥无味，但是张英伦的译笔较为完美地传达了左拉写实之本领的高超，使我这样的“成年人”读来痛快，其描写功力之精致、传神非大手笔难以做到。问题主要不在它描写的优劣，而在于它是该书唯一一篇“外国文学”，并且是自然主义鼻祖左拉的，写的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铁匠，古今中外的铁匠都可以用它来代表。所以名为“外国文学”，实际上仍可说是延伸化的中国文学，只不过描写技巧上

更见圆熟逼真罢了。由此可见选文风格的单一性。况且中学生学之有益吗？我看难说。

左拉的自然主义风格以密集的细节化的感性意象为特征，从中你能体会到作家感性的发达和捕捉力的敏锐、细腻，而且同样一个人动作不同描写的微细之别亦纤毫毕见。例如铁匠“脑门方方的，一簇乱蓬蓬浓黑的头发下面，一双孩子气的蓝色大眼睛，钢一样明亮。他额骨宽大，发出笑声和喘息声来，就像他那巨大的风箱在狂欢和呼啸；当他以力气十足的姿态抡起臂膀时，他简直不像是年过五旬的人……他敞开怀，露出宽厚的胸脯，每呼吸一下，肋部便显现出久经锻炼的钢筋铁骨般的肋条。他身子向前一倾，猛地一下，把铁锤抡下来，就这样，片刻不停地、灵便而持续地晃动着身体，肌肉紧张而有力地伸展收缩……在午后酷热的当儿，他是多么壮美矫健！他上身直裸到腰间，肌肉突出而坚硬，犹如米开朗琪罗创作的力感极强的巨大雕像。在他身上，我发现了我们的艺术家所熬费苦心地在希腊死人的肉体上寻找的现代雕塑的线条。”通篇几乎全是这种细到微末的激情描写。这种描写可能对莫言那样“感觉爆炸”型的天才们来说十分有助，起码可以帮助他们训练感觉细胞，使之对外物更具捕获力。但就其内容本身而言，描写弄到了这种地步已有琐碎、夸张、过于铺垫之嫌，而且这种“感觉”没有像莫言的那样淌动，诗意地流下来一泻千里，而是一堆一堆地、固态化在散在前后各处，孩子们读这些文字一定觉得左拉有毛病，因为文章没必要做到如此繁琐的地步；中学生从中学到大概亦仅是“钻牛角尖”——一个动作、表情非要写它几百几千字不可，并且误以为如果不这样文章就写得不见功力。于是在细部过于流连而忽视了其余。何况如此大段大段的纯描写不符合学生的阅读心理，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尚在幼稚阶段的中学生能读出“美”读出趣吗？我想绝大多数要

昏昏欲睡的！

上面那几段还有一定的可读性，下面我举一段读来特感累赘的文字：“一天黄昏，旅途上我错过了村子，远远望见一个铁匠铺，火光熊熊，孤零零地坐落在两条大路交叉点的路旁。从敞开的大门里射出来的火光是那么灿烂辉煌，宛如十字路口燃起一堆篝火；对面沿溪边的一行白杨树，也像火把一样冒着青烟。在黄昏的微晖中，铁锤有节奏的响声传得很远很远，如同某个铁骑兵团由远而近驰骋而来。过了一会儿，我就在那敞开的门前，在强烈的火光里，在震耳欲聋的响声里，在滚雷般的震动里，停了下来。”这是左拉第一次发现铁匠铺向它走过去时的一段描写，文中连二连三地写了“火光”、“响声”，真让我受不了，更别说中学生了！写铁匠举起绰号叫“小姐”的二十五斤重的铁锤时则说：“铁锤按照一个有规则的圆圈环转，迸起点点火星，留下条条光尾。铁匠就这样挥舞着‘小姐’而他的儿子，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则用钳子夹住烧红的铁块，从另一面敲打，发出轻微的响声，被老头手里那‘姑娘’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舞蹈的声音所淹没。笃，笃——，笃，笃——，犹如母亲庄严的声音，在鼓励婴儿咿呀学语。‘小姐’不停地舞蹈，抖动着裙衣上的钻石，她每次跳落在铁砧上，便地犁铧上留下一个脚印。”这一小节最能体现左拉本人的风格——他可以为描写一个橱窗里的摆设写几千上万字，在这儿抡铁锤就可以写上四百字。写一个社会事件岂不要几千万字？如此费神费墨费纸张意义何在？逞一下自己的才能？人的才能应是多方面的，左拉的才能却似乎很短很窄，而且作家几乎没有自己的思想见识，他将铁匠完全理想化了，只写了人性的单方面。他说，之所以要写铁匠是因为“在我心目中，他就是因劳动而变得伟大的英雄，是我们时代的不知疲倦的儿子，是他，在烈火中用铁材锻造明天的社会。他以铁锤为乐，当要开

心的时候，他就抡起‘小姐’，全力以赴地敲打。于是在他周围在玫瑰色的炉火的光辉里，响起一片雷鸣。我似乎听到了劳动着的人民的声息。”

左拉如此把“劳动人民”拔高无非是要像一些当代中国作家那样来说明自己“崇高”，不歧视劳动，不歧视劳动人民。但这样做太矫情做作，因为人若是不劳动一者没饭吃，二者太无聊，不劳动铁匠岂不是喝西北风”他真的“以铁锤为乐”吗？或者说他是迫不得已地安于命运安排，不得不“以铁锤为乐”？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我更愿相信后者。左拉不是体力劳动者这才让铁匠的劳作、辛苦充满玫瑰色。如此单调、枯燥的活儿真有如许多的诗意吗？倘若真是，铁匠何以拿作者开心，天还没亮，就将左拉从床板上敲醒——锤声“震动着天花板，像是硬要把我从床上拉起来”，“能够五点钟就把我从床上吵起来，这在他是件开心的事”。这有什么可开心的呢？除非铁匠太无聊，平时没有乐子，这才弄些恶作剧。左拉体会不到这一层，或者说他不愿告诉读者真实的的社会人性，这才刻意美化一切。最后他安上一条光明的尾巴：“就在这里，在这铁匠铺里，在无数耕犁中间，我治好了懒惰和多疑的毛病。”人的惰性若真如此易改，社会也就不会有如此多的堕落、犯罪了！作者不仅美化铁匠、美化简单呆板的体力劳动、美化头脑简单的人们的无聊，还要自我美化一番，真可谓虚伪透顶。

本文“提示”却说它“赞美了劳动者的壮美、豪迈和伟大，歌颂了劳动的价值”。劳动诚然价值不菲，但是劳动者的心理动机要不要这样拔高、不切实际地理想化呢？假如让左拉也抡它半年铁锤，而且在荒僻之地，像文中的铁匠那样，他还“赞美”“歌颂”得起来吗？

知识分子容易滋长“呆气”，把什么事都想得天花乱坠。这

一点对“感觉型”的人尤然。左拉如此，莫言如此，巴金等人也不免。所以“感觉型”的人谈“思想”，上升到“理性”，个个漏汤了，现出自身先天的不足来了——他们的思想简直是要不得的。看来，即使“天才”也不能双全。

照这样看，远远不是“天才”的编书人也就应该谅解了。——在这里，我主要不是说编书人如何如何不好，而是说他们所编的东西“纰漏”百出，学这种东西人会越学越傻，越学越不对劲。谁都希望自己或自己的儿女越学越聪明。而要想生出这种效果，所选文章就应该以风趣、有卓见、感情细腻、富含灵气和智慧、风格各异、既少又精为主，不要动不动就搞一篇类似说教的“政治色彩”太浓的东西。中国文学应该这样选，外国文学同样应该这样选。

而且，左拉自然主义的不足早已为后人指出，它是19世纪欧洲文学史上的“畸形儿”，过分的精雕细刻乃至夸大其辞恐怕正合我们这个产生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国土上的人们的口味，之尾的感情思想的升华即那条光明的尾巴又恰好与一些“作秀”的中国作家相像——多少年来，我们都在强迫自己写文章留一条光明的尾巴，以便将自己翘举蓝天，会遇白云，接见太阳。这种一厢情愿的浪漫在尚未成熟、尚无辨识力的学生眼里是瞧不出来的，他们对编书人十足放心，以为自己不会上当受“骗”，谁料到会学习这种货色呢?

这使我们联想起大人们吓唬小孩子的办法：大人脸一沉，语气一重，孩子就吓哭了，以为大人这下可认真严肃了，没法子应付来临的“大祸”了。小孩看不明大人在佯装，指责的话中大多毫无道理，别的成人却能一眼看清其中伪装的成分，能体会到不这样不足以吓住孩子，让孩子按大人的意愿去想去做。现在我们的编书人正是这种“吓唬”学生的大人，他们不觉得这里边有哪

些谬误，结果在许多情况下将学生引到“呆”、“傻”的路子上去了。我相信他们不想这样，他们是想让学生学些好东西，培养真实实学，但心愿是一码事，做到了没有是另一码事，我所批评的主要是后一方面。

罗素在谈到教育的目的时讲道：教育应当致力于培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鉴赏能力，以便促进人们自由无畏的求知勇气和求知过程中慎重的科学态度，培养人们的同情心和创造精神，从而逐渐消除贪婪、虚荣、好权、专断、盲从、狂热、恐惧、嫉妒、仇恨等导向专制政治的精神品性。只有这种人才会创造和保护美好的世界。

的确如此。单纯将学生的脑子里塞满各种知识，甚至读博士、出国留洋，不自立会成为成博学的冬烘，受教育虽多，可他们对待人生、社会、历史的态度却完全是错误的。我们的编者恰恰有点“冬烘”气！

西方那么多充满智慧和独立精神的优秀散文，何必选一个毫无独立意识的左拉的《铁匠》呢？它对培养学生的独立见识或鉴别力非但起不到好作用，反而将个体陷没在群体之中，整个儿思想经不住推敲！

若说欧洲或法国没有更好的散文，我则不信。齐奥诺的《特别埃夫之秋》写出了纯自然的景美；居里夫人的《我的信念》写出了做人、做事的相通精神；高兰特的《最后一次的炉火》写出了飘逸的情，充满诗意，散发灵气；其他法国散文如萨特的、普鲁斯特的、纪德的、波娃的……作家们不仅写了更好的散文，而且他们的精神属于现代，与左拉完全不一样。

法朗士曾在隽永散文《文学中的疯子》里用一则寓言讽刺了那些片面或自以为是的人，尤其适合中国式的选本文化现象。

寓言写道：一天，一个平面镜在公园里遇到一个凸面镜。平

面镜说：像你这样表现自然，我看实在太不像样。你简直是个疯子，把所有人的形状都变成大肚子、小脚丫、小脑袋，直线也让你弄成了曲线。凸面镜不服气地说：你才歪曲了自然。你这扁平的家伙一定想象所有的树都是笔直的，一切你身外的东西都像你一样平整。树干是弯曲的，这才是真实。你不过是只骗人的镜子罢了。平面镜说：我没骗过任何人，正是你，我的凸面伙伴，才把人和动物都歪曲漫画化了。它们争吵得越来越凶。这时几何学家达朗贝尔恰巧路过，他对镜子们说：我的朋友，你们俩都有理，又都有错。你们各自根据不同的光学原理反射物体。你们映出的形象都具有几何学的准确性。这些形象不论哪一个都是完美无缺的。一个凹面镜也能映照出第三种截然不同的形象，但也是完美的。至于自然本身，任何人都无法得知它真正的形态，因此只有在反射它的镜子中，它才具有形象。所以镜子先生们，还是不要把对方看成疯子，因为你们对事物的反映是有差别的。

我们的编者正是这样的凸面镜，自己的口味是大肚子，真正的文学是小脚丫、小脑袋，看看这面镜子学生已经不知道这世上什么是好文章，什么是次品、不入流了！

洛扎诺夫在《自己的角落》里谈及教育时说，我们不应当只注意教什么，还要懂得不教什么，习得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保持什么才最重要；哪里的个性没有得到保存，受到压抑或被忽视，哪里的教育就完全不能实施。

今天人人在都高呼“素质教育”，但在中考、高考压力有增无减的情况下，这种口号的意义究竟多大呢？最终的结果恐怕是课程越开越多，学生的压力越来越重！倘若扩大进来的全是左拉式的矫情的内容，对提高学生素质有何益处？所以我认为编者目前最应该重视的是：不教什么？明白了这一点，他们才会清楚，像左拉这样的文章是不能入选到中学课本里来的，应收的是其他

更出色的外国文学作品；应该以“保持个性”为中心来组选范文，因为它“是人及其创造中最可珍贵的东西，是其中最美好的东西”；应该少一些左拉那样的不合常情常理的“升华”性的作品。

另一方面，选本文化教给学生的是破碎的、非完整性的知识，这种知识缺乏文化与历史气氛，东一榔西一棒，使人在面对具体的社会时毫无定力，压根儿培养不出一点精神性的东西，这使学生越来越实用功利化。不难理解，从前上学的人虽然知识不多，但极其渴求新的感受，他们朝气蓬勃、越学越有劲，对所学内容如痴如醉，充满创新和独立意识；今天的学生知识虽多，“但对进一步的深造漠不关心，却在未来实际生活的意向上心事重重”。

所以不要怪今天的学生厌学、逃学，没有精神，缺少信仰。“我们怎么样，就怎么样教育和培养儿童。更确切地说，学校是我们社会‘我的综合表症’”。视域狭隘而又自以为是的教育专家们很该扪心自问一下：“教材编得如此差劲，我们自身的不足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是意识形态过于强化了，还是编者能力不足，对学生心理、思想完全无知？”

5. 章炳元的《鸟飞鱼跃的联想》。作者说海洋再阔也有边，鱼儿不能离海而登陆，所以鱼儿只能在水里跃，“海阔凭鱼跃”是有条件的。鸟儿需在大气里飞翔，而不能到真空中去，所谓“天高任鸟飞”同样不能无所节制。人的行为需要法律约束，而不可以无法无天、无拘无束。从这里作者得出结论说行动自由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一直到这里，作者的道理我都赞同，但他下面就开始偷换概念了：我们的思想也得有大框子，我们只能坚持而不可突破这个“大框子”。解放思想靠的是“破”，但“破”的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套在人们头上的精神枷锁，是迷信和一切违

反科学的东西，绝不是要去破除科学真理。作者错在哪里呢？错就错在将行动自由与思想自由混为一谈，由行动上应受法律、“框子”约束推导出思想上也应受“框子”约束。

行动上不自由，思想上完全自由，这已属现代常识，章炳元却一窍不通，还自以为握着“科学真理”地教导人！

如果人的思想上应该加“框子”，那么秦始皇当政时，这个“框子”就是“秦记”，一切不能超出“秦记”；其余的全得烧，有异端思想的人是“反革命”，那得杀头，因而焚书坑儒是最正义最合理的事。如果人的思想应该加“框子”，那么武曌当政时，这个“框子”就是她的旨意，任何违背了这个“框子”的人都可以斥为不是“科学真理”，从而强权就是“真理”，小民在这些“真理”面前只有顺从的份，稍有不同，就应该“请君入瓮”——将拥有不同见解的人装在大缸里，四周烧炭火，将他活活烧死！如果人的思想应该加上“框子”，那么几乎每个王朝都发动的“文字狱”全是应该的。进而，如果人的思想上应该加“框子”，那么章炳元生在宋朝会说赵匡胤思想是唯一的科学真理，生在清朝会说努尔哈赤思想是唯一的科学真理，生在民国会说孙文思想是唯一的科学真理，生在“文革”会说林彪江青思想是唯一的科学真理，生在1804年的法国会说拿破仑皇帝的思想是唯一的科学真理，生在1830年的美国会说奴隶主思想是唯一的科学真理……

可见，给思想加“框子”是要不得的，只有投机取巧者才会鼓吹这一点。而他所鼓吹的“框子”也就是当政者意识形态；一旦当政者意识形态改变，他会立即随之而变！

陈寅恪早就说过：“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

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唯此二者“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所以“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刘军宁主编，118页。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5月。）

胡适在《自由主义》一文中说：孙中山曾引一句外国成语道“社会主义有57种，不知哪一种是真的”。其实“自由主义”也可以有种种说法。许多人说要“彻底改革”即“革命”，我认为一百多年的历史已清楚地告诉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所以我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总之，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自己作主；第二个意义是民主、容忍——容忍反对党，保护异己；第三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一点一滴的求进步。

陈、胡对自由的把握十分精到，代表了现时代的开放精神。并且严格区分行动自由、思想自由的界限，认为行动自由受法律、宪法等规则的制约，而思想自由必须是绝对的，无条件、无章炳元所谓“不可突破的‘大框子’”的。因为谁是科学谁是真理我们暂时都不知道，人为地指定一种理论是“科学”、是“真理”的行为和专政君王的“圣旨”没有两样。舆论不自由、思想加框框是造成中国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梁启超在《思想解放》里说：欧洲现代文化，不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是从“自由批

评”产生出来的。没有言论的自由，就没有思想的解放。正是各种思想主张互相浚发、互相匡正，才使真理自然日明，世运自然日进的。倘若拿一个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无论其人为今人为古人，为凡人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好不好，总之是将别人的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

李大钊也特别反对以“危险”之名来禁锢思想言论自由，认为真正危险的思想只有在充分自由的舆论环境中才有可能遭到有效的淘汰。“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谈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章炳元的《鸟飞鱼跃的联想》中有许多荒谬的思想。他既给思想加框子，又反对不加框子的“思想自由”。这一结论是由行动无绝对自由推断出来的：他认为行动无绝对自由，则世上无绝对自由，则思想亦无绝对自由。因此错就错在将“行动”混同于“思想”。犯了偷换概念或概念不清的错误。这种文章当然不能入选在中学课本里！

□ 肖雪慧

遗忘和隔离的工具

去年《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有一篇揭露中学语文课问题的长文，读了怎么也忘不了。过后，不时地总要想起那些把文章意蕴往狭隘里讲的教参；憋足劲设计出来的又多又蠢，不把学生“考焦、考呆”决不罢休的试题；把学生的思想硬塞进一个死胡同的所谓标准答案，而对这些标准答案，越是大学问家越答不出来；把原本可以写出“铅笔在纸上快乐地蹭痒”如此生动句子的孩子训练成只会写八股文，只会写假话假感想假故事的作文……如此等等，荒谬绝伦，令人啼笑皆非，对孩子的坑害又令人惊愕万分。近日找来中学语文课本浏览，发现教参和考题中那种把人的精神变狭隘、把学生的思路圈进预定的狭窄小道的倾向，其实早已隐含在课文选择上了。而且，隐含在课文选择上的还不只是造成智力局限性的狭隘。

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中学阶段是打下终身学习基础和人格发展基础的阶段。要完成这样的奠基任务，语文课有着特别的重要性。语文课通过读写能力的训练使孩子走出口头视听文化的低级阶段，帮助孩子建立起阅读兴趣，为日后的精神生活作好准备；通过鲜明、生动、准确、有力的优质语言以及语言所承载的内容给孩子们提供有关真实世界的知识，打开一个广阔而深邃的人类精神世界，并让孩子们有机会去接触和认识善良、勇敢、豁

达豪放、热爱自由、追求真理、追求正义、尊重公理等人类品质，接触和认识人类一体、生命神圣、个体尊严、自由无价等观念，为个性发展储备必要的精神资源。

然而翻开一套近些年版本的厚厚六册全国统一初中语文课本，很难见到文字优美、内容丰富，可激起人阅读兴趣的文章。而且，似乎是有意剔除了使青少年精神自由、心灵丰沛的内容，课文中读不到人类精神的千姿百态，感受不到扑面而来的自由气息，没有个性启蒙，没有生命力的舒张和个体生命尊严的表露，没有揭示真相、直面真实的坦荡，尤其没有超越一国一族的眼界去看世界的大气。大量充斥于课本的是说教性内容。这类作品，语言拙劣、枯索如大报社论，发起议论来又观念陈腐，读着令人恍若隔世。仅此就够可悲的了，因为枯索和陈腐不是把学生的阅读兴趣埋葬于味同嚼蜡的“学习”之中，就是使学生在消极应付之余（如果应付了课文和考试后还有“之余”的话），从别的渠道去胡乱寻求精神食粮。更糟的是，还有一些课文歪曲历史、掩盖真相、粉饰太平。这些课文用谎言去欺骗孩子，用意识形态偏见去扭曲孩子。

第二册有篇题目为《谈骨气》的议论文，作者是文革初期含冤而死的吴晗。他这篇被选作课文的短文发表于 1961 年 3 月 4 日，正值全国性大饥荒时期。关于作者，课本只介绍了吴晗的籍贯和历史学家身份，只字未提他作为文革首批牺牲品这一事实。那场祸国殃民的十年动乱就在这蓄意遮掩中隐去了。关于写作背景，课本说是我国面临经济困难。一个精心挑选的“经济困难”中性词，就埋葬了一场导致数千万人死于饥荒的民族灾难的真相。课本介绍是如此，课文本身也是如此。虽说吴晗几年后在创作历史剧时曲折表达了一些真实思想而惨死于无情迫害，但《谈骨气》一文却既没有历史学家的求实精神，也缺乏思想者的真知

灼见。他叫青年克服困难与国家共渡难关，但避而不谈造成整个国家巨大经济困难的真实原因：好大喜功的专横意志、反科学的专断决策。当然更没有揭露应该为经济困难以及由此导致的全国性饥荒负责的人并未为自己的“失误”承担后果（我沿用了“失误”这一官方用语，但我知道，面对几千万亡灵，“失误”一说实在是太轻飘了，所以加上了引号），甚至没有跟人民一道共渡难关。最无辜的百姓承受了全部灾难性后果，他们饿殍遍野，累累白骨，还为那些以“割资本主义尾巴”为名搜走最后一点救命粮食，又以吹破天的牛皮去邀功请赏的官员铺平了官运亨通之路。吴晗掩盖了这一切，跟青年空谈骨气。然而，骨气是个体尊严的人体特征，离开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何谈骨气？整篇文章其实是变着说法要青年、当然也包括所有平民百姓在受蒙蔽的情况下，硬着头皮去承受大人物造下的孽。担了人家的后果，就美其名曰叫“骨气”，末了，还用“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胜利，我们一定能克服任何困难奋勇前进”这样吹胀了的气势给被驱赶去无辜承受苦难的人一种虚假的神圣感。这实在是残酷的愚弄。也许，当年的吴晗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还可能当时连他自己也不一定明了真相却囿于意识形态思维定势写了这篇文章。但这篇文章出现在90年代的中学课本中，就不能不说是欺骗性、愚民性的蒙昧主义教育思想在支配课文编选了。

蒙昧主义不只表现在这篇课文上。事实上，它作为一种精神、一种原则渗透在课文取舍上，渗透在不同的课文内容以及编选者加的课文提示中。说起课文取舍，不光是精心剔除了发散着自由气息的文字，整个六册语文课本中就见不到涉及近四十多年中发生的数次政治运动的篇章，似乎压根就没有发生过反右、大饥荒、文革……，课本成了横亘在孩子们与历史之间一堵无形的墙。而选中的文章中，魏巍的似乎特别受青睐，一而再、再而三

地被选入课文。他那篇《谁是最可爱的人》，我念初中时就已在语文课本中了，如今的初中生还在读它，看来是中学语文的“保留节目”。可这篇文章语言十分平庸，肯定算不得语文意义上的佳作。什么原因使它反复被选作课文呢？是它投合了某种既定的原则和标准。课文有一段可疑的背景提示：“1950 年 6 月 25 日，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朝战争……10 月 25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行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经这一“揭示”，二战后美、苏分别在朝鲜以三八线为界接受日军投降，朝鲜一分为二形成南北对峙局面的事实消失了：北朝鲜违背联合国协议打过三八线向南推进，联合国号召全体会员国共同阻止北朝鲜南进的事实消失了；美军在南朝鲜军队被北朝鲜击溃后向南方紧急驰援变成了“悍然侵朝”，跨过鸭绿江的志原军与联合国军作战则成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短短三言两语提示，隐匿着一种改写历史的意图。而充斥于魏巍文章中对美国军人和南朝鲜军人的仇恨称谓和大量基于意识形态偏狭立场的情绪化语句，营造了把历史真相搅浑、把人的头脑搅糊涂的气氛，正好投合了这种意图。不过，这还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文章主题。文章表面是歌颂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普通战士。不过，稍加注意就会发现，真正歌颂的是热爱领袖，听领袖的话。魏巍笔下的战士之所以可爱，主要是因为他从他们身上发现了这种领袖崇拜，不信，请看篇末那几句“画龙点睛”的议论。我不想评论当年在朝鲜战场的战士们的真实状况和情感，也不想评论这篇写于四十多年前的文章在当时起的作用。我要说的是，几十年的个人崇拜已经彻底吞食了每个中国人的自我和基于其上的公民精神，彻底摧毁了中国人民在本世纪上半叶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一点微弱的公民社会基础，个人崇拜把权力吞噬社会的危险推到了极致。我们这个为此付出了过于惨重代价的国家，现今正面临着在精神上立人，在体制上

以民主取代专制、以法治取代人治的双重迫切任务。中学语文却在反其道而行之，仍然把鼓吹领袖崇拜的文章当范本。学校是孕育和庇护人类生命种子的地方，但把跪拜着的精神状态冒充崇高，给孩子们心田中撒播的是什么种子呢？说是奴性，可能太难听，有些人虚弱的神经受不了，还是把它表述为消泯自我吧。不要个性觉醒，不要孩子们成长为个人——作为独立自信的主体而挺立的个人，诱使他们附着于某个异在于自己的巨大“自我”之上，靠着无条件地为这个遮蔽自己的偶像服务去获得某种价值感。相似的蒙昧主义观念同样反映在选作课文的魏巍的驳论文《个人与集体》中。但此处且不谈。对《谁是最可爱的人》还有几句话必须要说，这就是这篇课文连同它的背景提示，在对历史真相和普通个人自我意识的双重遮蔽之外，字里行间还透着偏狭的党派精神，透着宣扬国与国、民族与民族间仇恨的意味。如果说《谈骨气》那样的文章造成人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失忆从而使语文沦为遗忘工具的话，那么像《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样既双重遮蔽又鼓吹民族间仇恨的文章则使语文沦为隔离工具。

遗忘也好，隔离也罢，是通过谎言来实现的。课本中对历史事件或似是而非的说法或小心抹掉历史痕迹的作派，依据党派精神和意识形态偏见对文章进行的筛选，在事实上构成了一套系统的谎言。受谎言蒙骗的孩子将来如果想要朝前迈步，恐怕还不得不像16世纪法国作家拉伯雷笔下的高康大一样，先接受他那位人文主义教师的一付泻药，去经历一场彻底清洗掉别人塞进自己头脑中的谎言和废物的剧烈阵痛。

□ 温红彦

语文课，让孩子们抖起精神

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忧思

在中国，几乎每一位受过教育的人都上过语文课，而且都要花掉大约三分之一的在校时间去学习语文。语文课向来是我国中小学开设时间最长、所占课时最多的基础课程。

然而，就是这样一门最重要的课程，却成为让当今中小学生感到“不愉快”、甚至“厌倦”的东西。

诚然，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界在语文教育教学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新的改革措施频频出台，对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也进行了不断的改革。但是，由于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涉及面大，影响面广，种种惯性因素的作用又难于在短时期内消除，致使改革步履缓慢。

近些年来，社会各界对中小学语文现状的批评也因此不绝于耳。早在1978年，吕叔湘先生就在《人民日报》撰文，发出中小学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忧思，指出“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80年代后期，国家教委（现教育部）开始正视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委托地方上组织实施“全国初中三年级语文教学抽样调查”，结果是：学生阅读和写作的总体成绩均未达到及格线。一时间语文教育界哗然，批评不断升温。1997年，

由《北京文学》刊登的三篇署名文章引发的讨论再一次对中小学语文教学敲响警钟：语文教学已到了“束缚人、折磨人、摧残人”的地步。随后，《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等一些抨击时弊、倡导反思、重在建设的书籍纷纷问世。

前不久，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召开“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研讨会”，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近十家单位的数十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就我国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现状、语文教育改革特别是汉语言文学教育等问题展开深入研讨，发表了精辟的见解。

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一个明确的信息：是对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动真格的时候了！

为孩子的一生打好“底色”

谈起目前语文教学的弊端，清醒的教育工作者都能列出一长串，诸如语文已成为升学的工具，学生对语文学习不再产生内在需求；忽视母语的文化特性，导致学生对母语缺乏感情；阅读量少，语言贫乏；教学程式化，从解词、分段、概括段落大意，到归纳中心思想和写作方法，生硬刻板等等，不一而足。

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在哪里呢？专家们认为首先是教育观念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童庆炳先生说：必须从“人的建设”的高度定位语文教学，要通过语文教学挖掘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的感知力、情感力、想象力、理解力，因为这些是一切创新精神的基础。

以撰写《语文教育学导论》而闻名的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尚文先生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人际交往的工具，而且是人的生命中最美丽的花朵，培养一个人的语言能力就是培养人本身。他把语文教育同人文精神联系起来，认为现有的“工具性是语文学科的

基本属性”的观点是导致语文学科人文价值、人文底蕴流失的根本原因，是学生对语文课产生厌学情绪的根本原因。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说，教育观念的问题不仅是中小学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国家教育的大问题。应试教育的本质是急功近利，语文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它属于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教育的范畴，应该为孩子的一生打好“精神底色”。

语文课，如何让学生不厌倦

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到底怎么改？有关专家认为，语文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课程改革：首先要重新讨论制定课程标准，其次是要重新编选教材，第三是改革现存的教学过程，第四是改革对学生的评价标准。

关于教材编写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教材选文要根据儿童的特点设置教材，这样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欲望。应增加充满幻想和童趣的课文，开拓儿童的思维空间。小学侧重提高幻想能力，教材多选童话寓言、民间故事、古诗和通俗有趣的小故事等。中学主要是培养文学想象能力，教材应该以文学为主。教材要提供一些名篇佳作，让学生能够感知、体验比较高的精神境界。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郑敏教授建议提供一定数量的文言文原文，可以和译文对照，有助于使学生感受汉语言文字的魅力。

“在教材政策方面要真正实现一纲多本，甚至多纲多本”，这在近几年语文教育界呼声最高。关于教学参考资料，专家则认为最好取消教参，即使要发行教参，其内容和呈现方式也必须改革。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千篇一律，要鼓励教师根据自己的水平、学生的基础、文章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提出不同的教学要求。

既然高考这根指挥棒一时不能取消，那就应该把它用准用好。许多学者认为，抓住考试改革，就抓住了根本。高考应分层次分地区进行，采用多套试题，一方面有利于高考选拔功能的实施，同时也使学生可以有多次机会。

记得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语言老师韩麦尔对他的学生们说："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们，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都德是从培育民族精神、塑造民族灵魂的高度看待语言学习的，我们又何尝不该如此呢？单从这个层面出发，我们的语文教育改革也是势在必行的。

□ 朱健国

“中学语文”为何尊儒排墨?

——《墨子》札记之七

我的中学时代已远去30年，当年的中学语文早已掷到九霄云外。近年因为关注墨学的现代命运，忽然想看看墨子在“中学语文”中的影响，便找来正在通行的新版中学语文①翻读。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惊一跳，整整12册中学语文课本，竟没有一篇有关墨子墨学的文章，孔孟一再入选，庄子、荀子接踵登场，独独缺少墨学。老子虽然也未能入选，但其出世之思想已有庄子略可显示，算得半出场了。那么，中国古代几大思想流派之中，惟有墨子彻底落榜。作为曾和儒学一道“共为显学”的墨学，作为近代以来日益光大的墨学，作为中国古代唯一具有工具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科圣”墨子，为何竟在新中国中学语文中一字不露呢?

1997年8月至12月，中国书店出版了费孝通、任继愈、张岱年、蔡尚思等人主编的《墨子与当今世界》丛书（共10本)，从《墨学与思维方式的发展》、《墨学与新文化建设》、《墨学与新伦理道德》、《墨学与当代政治》、《墨学与当代教育》、《墨学与现代科技》、《墨学的当代价值》、《墨学与世界和平》、《墨学与当代军事》、《墨学与当代经济》十个方面系统阐述了墨学的现代实用

性。墨学专家杨向奎先生作总序云："墨子是我国也是世界上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并且是我国先秦时代伟大的思想家，他所创立的墨家学派是和儒学并称的'显学'，……我以为墨家在科学史上的贡献，可比于古代希腊许多学者的贡献②。"蔡尚思先生甚至认为："墨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价值是超过任何一家一派的③。"然而，专家们在大谈墨学如何重要如何独特时，竟没有注意到一个极为古怪的现象——蕴藏着丰富的现代思想能源的墨学，竟然被完全排斥在20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学语文之外！

个中其原因到底何在？

且让我们一步一步地探讨。

1.125篇文言文无墨子一句

中国大陆今日最新通行的中学语文课，一共12册，分为初一上、下册，初二上、下册，初三上、下册，高中第一册、高中第二册、高中第三册、高中第四册、高中第五册、高中第六册，分别由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一室、语文二室于1990年10月至1994年4月先后修订出版。

在12册中学语文中，共收有75位文言文作者的125篇文章，约占整个中学语文内容的三分之一。

这125篇文言文(含诗、词、曲)④，其75名作者的出场次序如下——

1.孔子　2.韩非子　3.孟浩然　4.王昌龄　5.杜甫　6.张志和　7.白居易　8.蒲松龄　9.陶渊明　10.李白　11.民歌　12.杨万里　13.王维　14.杜牧　15.苏轼　16.陆游　17.沈括　18.魏学伊　19.罗贯中　20.钱大昕　21.韩愈　22.刘基　23.彭端淑　24.周敦颐　25.王安石　26.曹操　27.李清照

28. 辛弃疾 29. 吴敬梓 30. 施耐庵 31. 孟子 32. 范仲淹 33. 欧阳修 34. 王勃 35. 马致远 36. 张养浩 37. 曹雪芹 38.《左传》 39. 司马迁 40. 袁枚 41. 诸葛亮 42. 柳宗元 43. 袁宏道 44. 王磐 45. 司马光 46.《战国策》 47. 崔铣 48. 李渔 49. 吴均 50. 荀况 51. 刘开 52. 龚自珍 53. 张溥 54. 梁启超 55. 林觉民 56. 吕氏春秋 57. 全祖望 58. 庄子 59. 关汉卿 60. 刘鹗 61. 冯梦龙 62. 文天祥 63. 方苞 64. 宋濂 65. 贾谊 66. 苏洵 67.《诗经》 68. 屈原 69. 黄宗羲 70. 洪亮吉 71. 归有光 72. 柳永 73. 姜夔 74. 睢景臣 75. 范晔

按出场次数(篇数)多少及出场先后,前26名的名次可这样排列——

1. 杜甫(5篇) 2. 司马迁(5) 3. 李白(4) 4. 苏轼(4) 5. 王安石(4) 6. 孟子(4) 7. 孔子(3) 8. 白居易(3) 9. 陶渊明(3) 10. 民歌(3) 11. 辛弃疾(3) 12. 韩非子(2) 13. 蒲松龄(2) 14. 杜牧(2) 15. 沈括(2) 16. 罗贯中(2) 17. 韩愈(2) 18. 施耐庵(2) 19. 欧阳修(2) 20. 曹雪斥(2) 21. 左传(2) 22. 袁枚(2) 23. 司马光(2) 24.《战国策》(2) 25. 贾谊(2) 26.《诗经》(2)。其余人均为一次一篇。

在这个出场阵营中,如果韩非算法家,庄子、陶渊明算是老庄道家,沈括归科技界,《战国策》和《左传》作者属派别不明的先秦文化人,那么,剩余的69人,可以全算是儒家学派,且儒家三代领袖孔子、孟子、荀子一个不缺。再从"中学语文"选文言文从孔子《论语》开场,更是体现了让儒学领袖先出场的礼仪,孔、孟、荀三大儒

圣文章共有8篇之多，且其余的110多篇文言文，皆是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儒家理想、儒家价值观。入选文章最多的杜甫和司马迁，虽不是儒学思想哲学家，但也是皈依孔孟的文学家、史学家；而《诗经》，虽然作者并非儒家，但既是孔子从3000多篇诗歌中筛选为305篇⑤，手定目选，其“思无邪”与“温柔敦厚”的风格也大都体现了儒家“远之事君，迩之事父”的眼光和价值观。即便是蒲松龄，其《聊斋志异》多谈神鬼、狐妖，与“子不语怪力鬼神”之孔教相悖，但究其从19岁考到60多岁的蹭蹬科场经历，甚至在71岁时还“援例得到一个毫无意义的岁贡生名义⑥”，足见其依然心在孔孟。据此，说大陆中学语文课本中的文言文教育，以儒学统领一切，以墨子一句不选而体现尊儒排墨，当是事实俱在，铁证如山。

2. 墨学比儒学接近现代世界

考察儒家与墨学各距社会主义理论的远近，“中学语文”强烈的尊儒排墨倾向就更令人费解。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新中国自成立之日起，便一直高举“五四”打倒孔家店的大旗，对一切新旧儒学，基本上持批判或冷漠态度，文革中甚至发展到“批林批孔”、烧毁一切以儒学为主的四旧书籍。改革开放，虽然允许重整国故，重开孔庙，重整儒学，允许新儒家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但是，主流意识形态依然坚持独尊“马”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治国之本。

时至今日，人皆明白，马克思经典学说离儒家远，靠墨子近。儒学主张以“仁”、“礼”为核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行有差别的“亲亲”宗法等级之爱，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却是追求没有阶级压迫的人人平等，人民大众当家作主。正宗儒家学说无不是站在统治者立场上说话，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却是民间立场，站在人民百姓一边说话，两者的基本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与儒家相反，墨学却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说颇多相近。早在本世纪初，梁启超就说，墨子是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五四运动在一面打倒孔家店，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一面大力张扬墨子墨学。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先后在第一卷第二号(1915年10月15日出版)、第五号(1916年1月出版)、第二卷第一号(1916年9月1日出版)连载署名易白沙的《述墨》，分别介绍“墨学之起源”、“墨子历史”、“墨经”、“墨经之文字”、“墨经之篇目”，将墨子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社会主义”思想资源，作为与马克思主义相呼应的古典社会主义启蒙思想。

自谭嗣同慨然以墨子自励：“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⑦！”梁启超呼吁“欲救今日之中国，舍墨子之忍苦痛何以哉！舍墨学之轻生死何以哉⑧！”20世纪以来，墨学始终作为新思想、新潮流、新改革者的同路思想辅政。胡适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第一次用系统的逻辑方法对墨辩作出了墨子名学的研究，认为“墨子的名学在世界名学史上应该占一种重要的位置⑨”；孙中山说：“古时候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⑩。”汤恩比说：“把普遍的爱作为义务的墨子学说，对现代世界来说，更是恰当的主张，因为现代世界在学术上已经统一，但是感情方面还没有统一。……墨子之道，的确比孔子之道，更能实践。……比孔子之道更适合现代人的实际情况⑪。”许多学者认为，墨子的十大主张：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其基本核心是爱民的平民政治观。“非命”是一种外在超越的呐喊，是劳动者的歌，直接冲击孔儒的“命定论”，说出了“赖勤者生，自强不息”的真理。“兼爱”是古典人道主义的旗帜，对儒家的“亲亲为大”的血统宗法制度具有强烈的冲击，提出了义爱为大的现代平等和非功利观念的价值观；“非攻”是酷爱和平、积极防御的现代和平策略，完全站在人民立场上；“节用”则是劳动大众的

俭仆价值观。“天志”是救民于专制之中的机智：当民主不能实行，帝王为所欲为时，用一个高于帝王的“天志”来曲折表达人民对统治者的制约，是一种过渡时期的办法。“明鬼”和“天志”异曲同工，是借鬼神之迷信而制约没有健全法制约束的贪人。总之，由于墨学常常站在百姓民间立场，墨学的许多理论与现代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颇有接近。其“兼相爱，交相利”的主旨，更是未来世纪的发展方向。

关于墨学与中国社会主义相近的具体处，蔡尚思先生认为有八个方面：

一、反宗法血缘关系的大公无私。这在中国思想史上只有墨子一家。他正和只论亲疏而不论是非的孔子相反，他主张亲疏人我不分的兼相爱交相利，这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主张只问有无道理的法治而反对只问有无关系的人治。这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与共产主义的将来都是极有意义的。墨家巨子腹黄享便坚持在法律面前亲疏平等，而以父杀子，大义灭亲。从孔子的主张父子有恶应当相隐，孟子主张，即在天子，如父亲犯法，子也应当背负其父而远逃。中国历代一直有所谓宗室、外戚、用人惟亲、走后门等恶习，如果尊墨非儒多点，也许社会可以少一些罪恶。

二、强调人力否定宿命的绝对正确。墨子认为贵贱、贫富、智愚、强弱等等均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命运。此与道家相反，儒家不同。连号称能破除迷信的王充也在内。

三、墨子强调人类必须加紧生产，努力工作，才能生存。这不仅在今天人口最多、较多的国家有意义，即在将来任何国家也都适用。

四、墨子强调节省不必要的消费。反对厚葬久丧，主张节用节私(反对多妻)，这对公开宣传美衣美食，讲究生活与大办生日、婚

事、丧事等等穷奢极欲的一种风气,也是非常对症下药的。

五、墨子主张有力相劳,有财相分,有道相教,这也是他的兼爱交利主义的具体表现之一,有其积极作用的一面。

六、墨子强调实行,反对空谈。主张言行一致,反对儒家说的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这在今日和后世都是至理名言。记得周恩来同志也强调'言必信,行必果'。

七、墨子独能以十日十夜,裂裳裹足从北方的鲁国跑到南方的楚都,这是何等的吃苦而伟大的精神,……同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与延安精神有点相近……

八、墨家的为人太多,自为太少,甚至只知道损己杀己去利人利天下的伟大精神,比古今所乐道的孟子理想的'与众同乐'、范仲淹理想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都高强得多,这才真正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自己服务。直到共产主义也还是适用的⑫。"

种种分析可见,不论是中国20世纪一百年的思想走向,还是五十年来新中国的活生生的现实,皆是远儒近墨。可为何在中国最广大最重要的教育教材——中学语文课本中,竟毫无墨子一字一句之介绍?

从逻辑上来说,人们怎么也难理解,以打倒孔家店起家的执政者,竟在自己的基本教育中暗暗大力推行儒学,排斥有所平民政治精神,有些"原始社会主义"的墨学。这真是20世纪一大怪事。

莫非,这一现象并非上层人士所致,而是中学语文课本的几个编者或出版社的私意导成?

3. 排墨违反"教学大纲"

"中学语文"初中课本的《说明》是这样说的……

这套教科书是根据《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中语文教学大纲》编写的。

编写本书的指导思想是:联系生活,扎实、活泼、有序的进行语言基本训练,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文字的能力;在训练的过程中传授知识,发展智力,进行思想教育。

为求多样化并显示阶段性,初中的学习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教学重点和编排方式各不相同。第一阶段(第一学期),认识学习语文与生活的关系,着重培养一般的语文能力,课文按照其反映的生活内容分类编排。第二阶段(第二、三、四学期),联系生活,着重培养记叙、说明、议论的能力,三种表达方式依次分作三个学期的训练重点,课文按照表达方式编排。第三阶段(第五、六学期),着重培养在生活中运用语文的能力,同时培养文学欣赏能力,课文按照文体分类编排。

语文基本训练是主体,三个阶段体现着互相承接、逐步递进的训练程序。第一阶段,先指导学生从整体上学习和把握运用语文的能力。第二阶段,进而分解为三种表达方式,使训练得到提高和加深。第三阶段,更进一步进行三种表达方式综合运用的训练,落实到实际运用上。这样,从综合(初步)到分解再到综合,由简及繁,由浅入深,符合学习的规律。

进行语文基本训练必须与生活密切联系。语文是交际工具,是用来反映生活并服务于生活的。联系生活进行基本训练,既"导流",又"开源",有利于学生生动活泼的、主动的学习,有利于学以致用和学文育人。本书的编写贯彻这个思想,三个阶段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都力求使语文训练与生活密切联系。第一阶段是初中学习语文的开始,特别加以强调⑬。

这一说明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中学语文是根据“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编写的,那么,是否“教学大纲”已制定了尊儒排墨的方针?其二,虽然我们未见“教学大纲”,但从这体现“教学大纲”“说明”来看,看不到“排墨”意向。倒是其力求“多样化”,并与“生活密切联系”的方针,让人想到,课本的实际内容,“多样化”为何只能在孔孟荀庄之间,而不能“多样化”到墨子?墨学与现代社会有诸多接近处,为何又不入选这“与生活密切联系”的墨学?可见中学语文课本并未认真遵循其《说明》。

再看“中学语文 ”高中课本,其《说明》则有这样的解释——

这套课本是根据国家教育委员会1990年制订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修订本)的基本要求,贯彻降低难度、减轻负担、提高质量的原则,在1987年版全日制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修订中我们考虑了如下几点。

1.在初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听说能力,使学生初步具有文学鉴赏能力和借助工具书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力。让学生扎扎实实地学习语文基础知识,认认真真地培养语文基本能力,生动活泼地发展智力。

2.重视思想品德教育和国情教育。思想品德教育和国情教育渗透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道德情操、健康的审美情趣和爱国主义精神,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

3.着重建立现代语文读写能力的训练序列。知识点和训练点少而精,求实效。纵向注意循序渐进的序列,横向注意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突出重点,由易到难,以简驭繁。课本体系要体现综合性、序列性、实用性,易教易学。在训练过程中注意培养学生

的自学能力。

4. 面向大多数学生，课本编得有适当的弹性，确保落实基本要求，又能够适应部分学生进一步提高的要求。

5. 以大纲规定的高中学段的66篇基本课文为主，尽量采用1987年版课本中原有课文，同时酌情调换部分课文，特别是增添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新课文⑭。

这一“说明”除了继续强调是根据“教学大纲”所编，还突出了“重视思想品德教育和国情教育”。那么，墨子的思想性与国粹性，难道大逊于儒学，以致在125篇文言文中一篇一句也不能占有？且听专家们的墨学评价——

张岱年先生在《墨子研究论丛》序中说：“墨家之学有胜过儒、道两家之处，主要在于对自然科学及名辩之学的研究⑮。”

匡亚明先生则更细致地阐述道：“中国古代文化历来重‘仁道’，轻‘天道’，只谈人生修养、处世之道，而对自然科学（天道）研究不够。这就未免失之偏颇。而自觉研究自然科学及其规律，战国时代的墨子是个代表。现在看来，墨子思想上、政治上，特别是在科技上、逻辑学上的主张和成就，是有价值的。像他提倡的‘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尚兼’、‘反别’、知行并重等，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十年规划、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有人说，一部《墨经》赶得上整个古希腊的思想家们，是有道理的。他的一些科学论断比希腊还要早。在力学、光学上的有些东西，现在我们还不如墨子讲得精辟。墨子应该好好宣传。被冷落了二千余年，实在是我们民族的不幸。”（同上）

杨向奎先生则具体指出墨子在科技上的几大发现：

（1）重力的发现。“现代力学以为‘凡改变物形之动止状态者

皆谓之力’。而墨经的‘形之所以奋也’,即改变物形之动止状态,亦即‘作用在物体上的力,使物体由静止变为运动。’‘奋’之意义,《广雅释诂》:‘奋,动也。’正合此意,而《经说》‘力,重之谓下’即由于引力作用而物下落,重力即现代物理学上的重力,墨子是引力学说之最早发现者,17世纪牛顿之发现引力,因苹果落地而受启发,并非小说家言,而《经说下》之‘引,无力也’,我以为是引力最佳定义。”

(2)平衡静力学的理论。“在《经下》有:‘负而不挠,说在胜’。《经说下》更有发挥,这是平衡静力学的理论。比墨子后200年左右,希腊数理学家阿基米德关于杠杆平衡及重心等问题的发明,与《墨子》两者相比较,内容完全相当,而墨子说法在先。《经说下》原文,读者可看高亨教授之《墨经校诠》,它与阿基米德理论,在文字也可以互作诠释。”

(3)数学上的贡献。

甲:0的发现。

“本来在《易经》上的二进位制中即已有‘0’即‘……’之中空,有了‘0’则数学上的许多问题,得以说明,因为‘0’与‘1’间尚有许多无理数,而莱伯尼兹以为‘0’生‘1’,‘0’不是‘Nothing’而‘1’是‘miverse’,当于道家之‘道生一’,这是哲学史上的大问题,而《易经》中的‘0’与‘1’的提出,也为当代计算机的二进位制建立了基础。

“墨子《经上》‘库易也’。《经说上》‘库,区穴若斯貌常’。‘库’与‘区穴’,从训诂学上说即‘0’,零的发现我们说过是数学史上的大事,在函数中建立直角坐标,坐标原点永远不变。故云:‘若斯貌常’亦即恒量,17世纪笛卡儿的发现在《墨经》中早已见到了。”

乙:切线的发现。

“《经上》:次,无问而不相撄也,《经说上》:‘次,无厚而后可’。‘次’即几何上的切线,‘撄’即相交,‘无闻’即相切。在几何上定义

切线为和圆周仅有一个共同点的直线。马克思在他的《数学手搞》内曾经指出:‘全部微分学本来产生于求任何一条曲线上任何一点的切线问题’。墨家的理论已经触及微分的边缘了。变数理论更是微分学的开始。‘庄子,天下篇’有名家的理论:‘一尺之棰,目取其半,万世不竭’。这可以数列的极限概念来说明,数列可以看作一个特殊的函数,当自变量所取的值限于整数时,函数值可依正整数的大小排列成前后有序的形式,而墨家并不同意这种‘取法’,以为那等于不取,正确的取法应自端点开始,这样,则P点(所取点)随即在变,而对应的值也在变,也就是‘一尺之棰’的长度N也在变,遂构成:N—f(P)的函数公式。当自变量P出现了某个极限制,而对应的N值变得无限小,但不是‘0’,所以结果是‘万世不竭’。在我的几篇研究《墨经》数理学的论文中,在训诂方面,在理论方面都有较详说明,如今不再详论了。

“墨家成就,当然不止于此,比如关于在弹性力学方面的成就实属空前,直到现在还具有无比的生命力,这可参考颜道岸先生的有关著作⑯。”

无须多引证,仅以上论述,已见墨子思想性与国粹性之高,即便不说超越了孔孟老庄之道,至少属于可与其并列的有特别价值之学说,可以和孔孟一起在“中学语文”中入选一二。墨子是既符合“教学大纲”所要求的多样化,又具有高度思想性、国粹性和现实生活的密切性。

也许,有人要说,“中学语文”不但要选择有知识、有思想、有特色的文章,还要兼顾有文采,以助于中学生提高写作水平和阅读能力。因为提高中学生的“语文阅读水平与写作能力”,更是中学语文的主要任务。

好,那我们再看看《墨子》是否兼有这种功用。在吴龙辉等译

注的《墨子白话今读》序言中，这样评价墨子的文采："从散文艺术的角度而言，《墨子》在先秦哲理散文中以质朴无文著称，这一特点极为显著。墨家主张尚质，反对尚文，他们著书立说所采用的是当时的口语，而不是儒家那种经过修辞的'文言'或'雅言'。这使得他们的文章有一种平易近人，娓娓道来的风格特色⑰。"

这当然不排斥墨子中有些文章，较难翻译，但是，从现存的五十三篇墨子中选取几篇几段入选中学语文，无论如何，总是可以做到的。

譬如《墨子》第17、18、19篇《非攻》(上中下)，就既具有独特的逻辑魅力，又具有生动的人物形象与情节趣味，更具有热爱和平、兼相爱的现代思维，当是入选中学语文的良好教材，为何不进行选取呢？如若直接入选有深奥之嫌，那么鲁迅先生1934年8月依据墨子《非攻》篇改成的小说《非攻》(鲁迅《故事新编》)；当是相极宜了——中学语文共选鲁迅杂文、小说16篇，换上一篇鲁迅改编的《非攻》，岂不是举手之劳？再不然，也可以从《墨子白话译文》中选几段也可吗。总之，让中学生们略知一点中国哲学史上的重镇墨子，应当是中学语文不可忽略的责任。

当我们从这中学语文的两种出版《说明》中，足见中学语文排斥墨子，违反了根据教育大纲而制定的编写方针，我们就会好奇，是什么人在主持中学语文的编写工作呢？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二室"高贵语文"《说明》(1990年11月)，曾介绍了高中语文几个版本编者情况：

"1983年版高级中学语文课本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编写的，编写者是潘仲茗、朱坤华。孙功炎、顾振彪。余澄清、李建国、郑醇甫参加了高三课本的编写工作。

"1987年版高级中学语文课本修订方案是由我室集体讨论而

定的，是由庄文中、王文英、姚富根、熊江平执笔编写的。在方案制订过程中吸取了广大师生的宝贵意见，特别是吸取了上海编写组、北京编写组、湖南编写组的宝贵意见。高一课本编写者是姚富根和上海编写组的于漪、卢元、方仁工、冯起德、步根海、唐晓云。责任编辑是姚富根。审定者是刘国正、庄文中。

"1990年版高级中学高一年级语文课本的修订者，本社的有庄文中、姚富根、王文英、熊江平、胡长江，社外的有赵育民、徐必成。责任编辑是姚富根。审定者是陈国雄、周正逵。"⑱

这里介绍具体编写者，是否是说中学语文的编辑得失全由出版社和几个编者文责自负？

如果说，一套影响一代青年的中学语文全国统一教材，就是如此全权委托这样一个出版社的几个编辑作主，这种方法未免太轻率了。人皆有偏见误区，由几个人决定几亿青年的语文学习范围，怎么可能不出大漏洞呢？这种重大教育工程，理应引进现代工程竞争机制，实行工程招标长与科学监理，否则难免让人口含天宪，任凭一己之好误导一代青年。

若部，这几个编者为何要违反"多样化"的"教育大纲"，违反中学语文兼收并蓄的编写方针排墨呢？是他们乃铁杆儒家，决心继承孟子批墨子"无君无父"之传统，还是其中别有隐情？我想，具体编者的好恶，当然可能局部影响一些文章的收入，但是熟知中国特色的人们应当知道，在"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传统下，中学语文课文编写，可能更多地受一种传统思维定势的影响。对于是否入选孔孟庄荀，是否排除墨家思想，是否文言文教材基本上沿用《古文观止》思路，多半有一种深层影响在左右，否则，听凭一个出版社和几个编者就能把墨家排斥在中学语文之外，排斥在中国每年上亿中学生的思想视野之外，那不是说明中国思想文化教育界

已经有了空前的大民主、大自由?

让我们再细究一下实际情形。

4. 排墨与极左思潮有关

深入研究种种迹象,中学语文排除墨子学说,与中国大半个世纪的极左思潮有关。

1990年修订新版"中学语文"时,已是中国改革开放12年了,邓小平理论已经形成体系,成为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总指南。但是,新版中学语文在选择政治领袖文章的比例上,却是严重违悖这一新形势、新需要的。

整个中学语文中入选的领袖政治人物(按出场顺序)有:毛泽东(初一上开始)、朱德(初三下)、江泽民(高一册)、恩格斯(高二册)、邓小平(高三册)、刘少奇(高四册)、孙中山(高五册),这其中除毛泽东入选13篇(几乎每册都选),其余每人只有一篇。而且,邓小平的文章《讲讲实事求是》,观点既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核心指导思想,文字又极为能俗平易,却要迟延到高三册才介绍。为什么样不能和毛泽东文章 一样,从初一就开始入选,让中学生更早一点从语文的角度了解邓小平理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既是邓小平理论直接具体指导,为何又只选邓小平一篇文章?邓小理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最新阐述,理当第一多选"邓选"才是,这样才既有思想性又有现实性。如果不便超越"第一代"领袖之"毛选",也总该二者入选篇数大体相当或差距不远才好,不要造成"毛富邓贫"。(详细目录可见附录)

再从文化名人入选来看,也基本上体现出一种几十年前的"左联文化"定论,体现了毛泽东的爱好:收入最多是鲁迅,共有15篇,按入选篇数与出场先后,依次则为:

1. 鲁迅　2. 马南屯　3. 吕叔湘　4. 朱自清　5. 老舍　6.

茅盾　7. 叶圣陶　8. 贺敬之　9. 魏巍　10. 唐弢　11. 竣青　12. 吴伯箫　13. 郭沫若　14. 艾青　15. 碧野　16. 臧克家　17. 秦牧　18. 柯岩　19. 孙犁　20. 余心言　21. 冰心　22. 萧乾　23. 刘绍棠　24. 袁行霈　25. 叶君健　26. 严文井　27. 袁珂　28. 罗广斌　29. 张洁　30. 杜鹏程　31. 新凤霞　32. 何为　33. 周立波　34. 杨朔　35. 彭荆风　36. 王力　37. 吴晗　38. 岑桑　39. 刘心武　40. 田间　41. 公刘　42. 茅以升　43. 华罗庚　44. 竺可桢　45. 周汝昌　46. 公木　47. 钱伟长　48. 胡绳　49. 贾平凹　50. 顾颉刚　51. 马铁丁　52. 王愿坚　53. 闻一多　54. 叶文玲　55. 郭小川　56. 沙叶新　57. 邹韬奋　58. 王润滋　59. 李健吾　60. 刘白羽　61. 穆青　62. 巴金　63. 夏衍　64. 孙犁　65. 徐迟　66. 于是之　67. 钱学森　68. 李四光　69. 郁达夫　70. 翦伯赞　71. 曹禺　72. 流沙河　73. 舒婷　74. 吴组湘　75. 朱光潜　76. 周立波。

而改革开放以来重新评价的文化名人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陈独秀、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沈从文、徐志摩、丰子恺等大师，均一概排斥在外。

如果排除了极左思潮，中学语文中已选的一些文化名人的作品，应当是调整的。比方魏巍，他的作品选了三篇，有二篇都是关于抗美援朝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与《依依惜别的深情》都是写志愿军的，从题材上说，便有雷同重复之嫌。那么多大师一篇都不能入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只选一篇，魏巍那并非文化精品的文字，有什么必要入选三篇呢？再从中学语文中入选了62篇非名人作品看，更是大可商量。作为几亿人的语文教材，还是要坚持以入选经过历史沉淀而公认的精品为好吧。即便是入选应用文，也该请吕叔湘、钱伟长一类的专家上阵为好。墨子的“兼相爱”思想，应当成为中学语文“兼收并蓄”百家争鸣的编辑方针。

改革开放的领袖人物和中华民族现代文化的优秀代表都不能正确入选，当然也就更不能客观地全面地反映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平民思想代表人物墨子。

这可能是墨子在新中国中学语文中落选的深层缘故。

据此极左思潮主持下的中学语文编辑走向，可以令人怀疑，也许“中学语文”之所以如此大肆尊儒排墨，是编者和编辑政策制定者认为，墨子的“兼相爱”有西方的超阶级之博爱嫌疑，我社会主义始终以“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为纲”，这与墨子的“兼爱”说大相径庭，倒是与孔儒的“别爱”宗法制相近；社会主义既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首先是爱本阶级之人，而后才能“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爱其它阶级。说到底，极左思潮的“社会主义”正是一种差别之爱，而非兼爱、博爱。而“交相利”的互利互惠之道，又有助于资产阶级，有碍于防止“和平演变”。在如此大是大非面前，墨学与现行政治有如此之别，当然是不宜入选了。而另一方面，墨子中的糟粕“尚同”论，又似乎为改革前的社会主义现实所吸纳太多。墨子“尚同”所倡导的“全国人民跟着皇帝走”，“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尚同，为政之本而治要也⑲”，不但在“文革”中实行得登峰造极，“文革”后也依然是一些地方铁的纪律和执政秘方。这种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弊端不谋而合的“尚同”，既是我们多年来“反右”、“大跃进”、“文革”的病状，亦是新时期依然难以割舍的肿瘤。这种传统，可做不可说，心照不宣为上。若一旦把根源露清楚，让人明白“封建主义以孝治天下，社会主义以‘同’治国家”，恐怕反而叫人联想许多，有碍于现有秩序。而况，墨子到底是中国最早的结社团体、最早开创邦派严格纪律，实行领袖“钜子”由上一代临终前指定接班人，一代指定一代的传统方法，这种封建宗法似的组织法和传位法，似也与现实密切联系，亦不便让人多知底细。现实社会排斥了墨学的民主精华，却大行其“尚

同”糟粕。或许就是这种种原因,使得“中学语文”编者彻底干净地排挤墨子?

墨翟自公元前的470年在山东小郲国(今山东滕州市)出世,历经90年人生(从李广星说,《墨学与当代教育》第105页,北京,中国书店出版,1997年12月),创立墨学,尔后“墨离为三”,在百家争鸣中,儒墨共显。不料墨子显学300多年后,被汉武帝独尊儒术所压,2000年来墨学一直处于不公正待遇之中。本来71篇《墨子》,在宋朝前后亡失了18篇,而今仅存53篇。好容易熬到20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大潮使得志士们又记起墨学中的相通部分,尝试中兴这中国的原始社会主义,然而却又不明不白地被压制半个世纪。纵然有一代又一代的伟人称道,结果却是依然处于重重暗压之中。

“梁启超说:‘墨子是劳动人民的大圣人。’鲁迅说墨子‘是中国的脊梁’。毛泽东说‘墨子是个劳动者,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只是个社会学家,而墨子不仅是社会科学家,而且还是自然科学家。在这两个方面,墨子都达到了当时世界上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被誉为‘古代人类智慧的最高代表’、‘科学圣人’和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学者⑳”。一个这般伟大的人物,这样可资扬长避短的国粹,能否在二十一世纪进入中国大陆的中学语文课本呢?

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

①《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语文》和《全日制高级中学课本,语文》,北京,人民教育出版中学语文一、二室编著,初中六册1994年4月第一版,1996年8月第6次印刷;高中六册1990年10月第一版,1997年4月第9次印刷。

②⑯杨向奎《墨子与当今世界》丛书序,《墨学与新文化建设》(北京,中国

书店出版,1997年10月)第1页。

③《墨学与当代教育》(北京,中国书店出版,1997年10月)第68页。

④详细篇目可见附录(1)。

⑤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转引自章培恒《中国文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页83。

⑥章培恒《中国文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下卷页443。

⑦、⑧、⑨秦彦士《墨学的当代价值》(北京,中国书店出版,1997年10月)页123、124。

⑩王思义、谢丹《兼爱非攻的墨家思想》(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5月)页21。

⑪王思义、谢丹《兼爱非攻的墨家思想》(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5月)页25。

⑫《墨子研究论丛》(一),转引自李广星《墨学与当代教育》(北京,中国书店出版,1997年10月)页68、69。

⑬九年制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语文》(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著,1995年4月第1版),页1。

⑭⑱《高级中学课本、语文》(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著,1990年10月第1版,1997年第9次印刷),页1、10。

⑮《墨子研究论丛》,转引自王思义、谢丹、《兼爱非攻的墨家思想》(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5月)第23页。

⑰吴龙辉《墨子白话今译》(北京,中国书店出版,1995年8月第4次印刷)页10。

⑲吴龙华等译注,《墨子,尚同》第63页,北京,中国书店出版,1992年10月。

⑳杨向奎《墨子与当今世界从书》序言,《墨子与新伦理道德》(北京,中国书店出版,1997年10月)第1页。

第四辑

只盼着能在人前把话讲

□ 陈晓怡　朱云丰

我们有话要说

——建中学生谈高中国文课本

时间:民国七十九年十二月六日上午十时
地点:建国中学三年二十六班教室
主持:《国文天地》副总编辑连文萍
出席:三年二十六班全体学生
列席:杨鸿铭老师

这是个消费者有权发表意见的时代,国立编译馆所编国文教科书,它的广大"消费"群众,长久以来习惯保持缄默,要不然就是意见无法真正"上达天听"。今天,政治更加民主,真理更加彰显,大家的视野也更加广阔,国文课本如果不求精进,绝对继续落伍。《国文天地》责无旁贷地展开会诊行动,实际进行沟通、思考,促请改革,让学生、老师和社会大众表达心声,共同期待更纯净、更开阔、更符合时代精神的崭新国文课本!

为了展开"会诊国文课本"的行动,我们首先选择了颇富盛名的建国中学,并且以高三的丙组学生作为了解和取样的对象,除了以面对面的座谈会进行实地沟通,让同学自由举手表达他们对"国文课本"的意见,并以问卷调查作为辅助。同学们恳切真言,有许多看法都值得大家参考。以下就请听听他们的心声——

国文课能给我什么?

曹永正:我认为上国文课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藉阅读别人的文章,获取其思想,再融化成自己的一套想法,使我们在人生的大道上,不论处在喜、怒、哀、乐或困难挫折中,都有勇气和能力去面对,不会惊慌失措。

沈家庆:我对国文有三点看法:

一、国文是哲学思想的入门。哲学常给人深不可测的感觉,然而接触过后却会发觉哲学可以作为我们生活言行的引导,因此"国文"可以对哲学作一简单的入门介绍。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青少年时期应该是充满"怀疑"精神,企图建立自己的价值观、思想体系的时候,可是从小我们就一直在接受"你要这样,你要那样"的教育模式,而中国人最大的毛病也就是一味崇古,缺乏个人思想。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要做价值的转换,从怀疑中肯定,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这必须先对哲学有所了解,而"国文"便具有带领的作用。

二、文学欣赏的入门。国文应该有系统的介绍文学的形式、源流、发展,同时对文章的结构和文学美感也必须重视,因为作者常利用文学结构,传达自己的感受、用意;而文学美感的体验也是每个文化人所应具有,高中生虽不必了解十分深入,但"国文"应可引导我们去接触这方面的领域,或许可以使有兴趣者能够继续探索文学的奥妙。这样的教育对文化的提升应该是有所帮助的。

三、归结到生活层面来谈,国文必须要有亲和力,在选材上应该配合青少年的心理、需求和兴趣,才不会和我们产生隔阂。

周孙元:我觉得"国文"是一种表达意见的工具,表达意见需要严密、合乎科学的文法结构,才不会在沟通时产生误解。像第四册《意念的表出》这一课就教我们如何表达意见,因此国文课应该多选一些讲究文法、语意精确的文章。

不要训练一群只会读书的驴子

曹永正:国文教育应该要帮助我们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但是目前的国文课并未达到这样的效果。这是因为我们的课本选材以儒家思想为主流,讲的不外是“忠孝节义”。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号称黄金时代的春秋战国,却是诸子尽出、百家争鸣,国文课本应该可以把各家思想都选进来,让我们去比较,选择合乎自己兴趣、需要的思想,没有必要预先设置好个模式,叫大家跟着走,这样不过是训练一群只会读书的驴子。

沈家庆:现在的课程缺乏整体系统性,比如“文化基本教材”,难道我们的文化只有孔子和孟子思想吗?编书者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文化的整体性,而只是叫我们去读那些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我觉得编者可以尝试把中国各家重要思想,取其精华,用白话文加以述评,并举例说明,使我们能以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得到对中国文化概括、整体的认识。

主席:不过,以现在这样薄薄的国文课本,可以达到你们那么多希望吗?是否应该另编辅助教材呢?

沈家庆:当然以目前的国文课本容量而言是不可能。但是我刚才提到的,国文是属于介绍层面。能够引导学生接触,并拓展视野。因此编者就必须以开阔的眼光帮我们照顾到全体,这就需要以一种科学性、系统性的编排设计,能让我们循序渐进地去吸收。

王文聪:刚才同学们都谈了很多的理想,希望能得到什么样资讯,但现在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联考制度根本无法使国文课本达到这样的理想,况且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国文有兴趣。所以我认为“国文”课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教我们怎样表达自己的意见,准确地运用语言文字,互相传达讯息,不致产生误导;接着才是扩及到口才的训练,我们的教育很少有让同学发表意见的机会,更缺乏一种逻

辑性的思考，这也都可以利用国文课来训练。另外就是前面同学所提到的，介绍中国各家思想，并且引导有兴趣的同学，将来还能自行深入研读，这似乎是比较符合目前联考制度下的“国文”。因此，既然联考制度必须要存在，我们就不能太过理想化，而是应该怎么样去配合它。

一本拼拼凑凑的剪贴簿？

李志伟：我觉得文字本身是一种工具，就像雕佛像，刀不是艺术，佛像才是；而现在国文课本的编者好像把国文当作剪贴簿，这里贴孔子，那里贴孟子，拼凑成一本课本，再叫我们去看、去背，根本体味不到文学艺术的美在哪里。

主席：但中国文化这么悠久，如何才能不使国文课本变成剪贴簿呢？

李志伟：我觉得那是因为编者根本没有把作者的精神融进去，因此课文里可以加入一些作者的话或编者的话，让我们真正能体会这篇文章的写作旨趣或编者选编的理由。

刘建宏：现在的国文课本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取材不均匀，中国历代文人这么多，好文章必然也不可胜数，我稍做统计发现，六册的国文课本，以民国的文章居多，占了30%，唐、宋各占10%，其他各代则都不足10%。在作者方面，唐宋八大家共选17篇，独独曾巩未被选入；民国以来的文章也占了9篇之多，这些文章大都是教我们要忠于国家，又如罗家伦则是叫我们去崇拜伟人。像这类文章占去太多篇幅，对我们学习国文实际上也没有任何帮助，应该予以删除或移到公民、三民主义课本比较合适。另外在体裁方面，论说文、记叙文各占了将近30%，但抒情文却仅有5篇，似乎太少了。我认为选材均匀，可以让同学都能在课本中找到喜好的文章。

陈冠铭:我觉得国文课本中充斥着太多失败主义的文章,例如《正气歌》,虽然写得正气凛然,却让人提不起精神去欣赏。而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这种消极意识,导致中国人大都存在一种心态,就是做不到的事就放弃,这样的心态在现今工商业社会是很不正确的。还有,主席说要将我们的意见转达给国立编译馆,但他们会接受吗?也许认为我们这些毛头小子说的话根本就不算数。

主席:也许你们不应该先存着"他们不会听我们意见"的心理,否则你们什么事都不必去做了,什么理想都没有了。

陈冠铭:我想这就是国文教育灌输给我们的消极意识。

萧必沛:国文课本选材以时代来分配,其实是很不合理的,以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而言,夏商周以前占了相当长的时间,那么课本有一半的篇幅都要选《尚书》、《诗经》的作品了。我理想中文言和白话的比例为60:40。选择的标准不以时代,而应该以文体、文风为准则,同样文体的文章不要选取过多,譬如祭文类,一篇也就够了。除了文体、文风,作者的分配也要均匀亦即作者要多样化。如苏轼的文章固然很棒,但也不需要选到4篇之多。另外我觉得应特别强调白话文,现代人虽时时都能读到白话文,但并无法了解什么是好的白话文,我觉得同学提议在每一篇课文后加上"编者的话"是很好的构想,可以告诉我们这篇文章精神所在,并且知道为什么要选用这篇文章的用意,就像题解一样。但是现在课本的题解却千篇一律,枯燥乏味,并未达到此效用。还有一点就是现代有一些知名作家,如王鼎钧、林清玄的文章受到很多人喜爱,又得到文艺奖的肯定,为什么未被选入课本?至于像简媜这样的年轻作家,似乎也不会受到编者的青睐,难道非得到五六十岁才有资格?

曾中亮:我认为国文课本根本不要选用文言文,只要选现代白话文。古文固然好,但为什么每个人都要会呢?当然古文确实蕴含我国文化精髓,但是国文课本可以用白话文来介绍古文,或在文

中引用古文精华的句子即可,这样一般人也比较容易产生兴趣,否则像我在念古文时,从来都只是为读书考试,而不会想到文化问题,这不是有些浪费吗?

主席:你对一样全然不了解的东西,如何产生兴趣?假设课本中没有一篇文言文,那么全国还会有多少人有兴趣念文言文?而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传承要如何?

曾中亮:我是觉得如果能有1/3的人去看文言文就够了,因为时代不同,古人只要念国文,我们还要念其他很多的东西。

谁在浪费国文课本的篇幅?

蔡子禾:国文课应该是教导我们行事的法则,譬如《论语》中孔子阐述了许多道理,但很少能引起同学共鸣,这是因为我们的教材,将孔子过分神化,就像蒋中正确实做过伟大的事业,但他们也是人,也有缺点,而现在的课本却太标榜圣贤,徒然引起我们的反感。

萧必沛:对于政治性的文章,我认为应该予以删除,因为占掉太多的白话文的篇幅。本来在国文课本的编辑宗旨里有“发扬爱国精神”一条,但事实上国文课本应该不是发扬爱国思想的地方,何况就文章风格、作者的多样化而言,这些政治文章取代表性即可,但现在的每一册课本竟然都选择了一至二篇,这无异是浪费国文课本的篇幅。

李宜泽:为什么要选政治性文章?我想这或许是编书者害怕“权威”的心理,他们可能也不希望选这类文章,只是迫于现实不得已。

刘光强:好像大家一提起这类文章就十分反感,我想反正这些文章很可能都他人代笔,不过是加上这些政治人物的名字,既然文章的性质还是偏向励志或激发爱国思想,读一读又何妨。

主席:你如何得知这些文章不是他们写的?这样的推论是否太过简单了?

刘光强:我凭直觉认为如此。

蔡子禾:我认为国文课本选爱国性的、讲伦理道德的文章是必要的,不一定要纯文学。真正的爱国精神和伦理道德的培养,应该是在国文课,而不是三民主义和公民,这两门课太教条了,国文却可以提供历史上真实的例子,藉由文章表现,很容易就融入我们的思想中。

曾怀萱:从国小国语到高中国文,如果要融入伦理道德,应该是在国小、国中阶段,那时正是接受一些伦理处世观念的最好时候;可是高中要衔接大学呀。我比较了一下,国中和高中国文没有多大差别,但高中到大学却是“大跃进”,跨入专业性的研究,所以我认为高中国文课本的层次应往上提升,不要再选那些政治教化的文章了。

再看国文课本的编辑委员,他们大概都有相当年纪了,所以写题解、注释都半文言、半白话,让人看了还是一头雾水。由年高德劭的人来编书,他们读的书比我多,我没意见;但题解、作者、注释可不可以给年轻一代的人来写?他们的文词思想较接近我们,较有利于被接受。

甘士欣:国文课本编辑要旨里所谓“激发爱国精神”,即使放在公民、三民主义里也很教条,倒不如把国文课本中的政治教化文章全部移过去,然后好好改进公民、三民主义课本的陈述和教学方式,到那里去进行思想教育,至于国文课本就留给真正的文学吧!

陈志彬:上国文课,老师的启发带领很重要,我上了12年的国文课,直到这学期才觉得有点入门,以前老师怎么教,我怎么听,现在老师则教我们要有自己的见解,每篇文章的作者有他的思想,我们也有我们的,应该保持自己独立思考空间去分析、批判。我认为

国文的选择标准应该是文章的好坏,政治人物的文章也有好的,好的就选,不好就不选,而不要从他的政治地位去考量。

王世晖:因为课本中政治性文章都是蒋中正、蒋经国、国父三个人写的,这给我们一个印象,好像他们只会写政治文章,所以一看到他们的名字,我们就会想又是那一套。我想他们既然称得上是一代伟人,就应该有其他表达他们思想、人格的地方,而我们现在选的这些文章很多都不合时宜,徒然导致反感,同时现在也不需要再灌输那些革命之类的思想了,更不需要在国文课时灌输。

反对不是最终目的

由这群勇敢畅述心声的大男孩口中,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他们将来可能往理、工、农、医等不同学科发展,甚至可能永远不会再拿起国文课本,但他们对国文仍抱定了希望,期待它会更好。

根据座谈会后收回的问卷显示,中学六年的国文教育,并未满足学生的需要,国文对他们来说,除了是联考提高分数的利器外,不过背背注释、课文、"了解古人的生活作息,熟记古人的姑嫂弟妇"而已,而统一制式的标准课本,不但限制了他们自我思想的空间,其中过于教条化的灌输学生忠党爱国思想的文章太多,也令他们感到疑惑——为什么这些不放到公民与道德或三民主义课本里去?

现代的学生强调自我的呈现,他们需要一个更加开阔的空间,从事自己的思考,小小薄薄的国文课本当然不会满足每一个人,但至少必然跟得上时代,至少必须尽量广泛收罗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和思想。在这次座谈和问卷调查中,我们也很可喜地发现,学生强调要更理智地看待问题,认为反对不是最终目的;我们由他们或振振有辞,或结结巴巴的表达当中,更听到不少令人叫绝、令人深思的意见。亲爱的国文老师们,亲爱的国文课本编辑委员们,现

在的国文课本究竟带给青年学子什么影响？是否帮助了中国文化的传承？是否有利于教学和吸收？……请大家共同思考。

国文课本小小排行榜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课文前五名：
《纵囚论》欧阳修　7 票
《赤壁赋》苏轼　5 票
《留侯论》苏轼　4 票
《哲学家皇帝》陈之藩　3 票
《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　3 票

最具启迪性的课文前五名：
《纵囚论》欧阳修　5 票
《留侯论》苏轼　4 票
《哲学家皇帝》陈之藩　4 票
《谏逐客书》李斯　3 票
《意念的表出》夏丏尊　3 票

最不喜欢的课文前五名：
《我们国家的立场和国民的精神》蒋中正　13 票
《一位平凡的伟人》蒋经国　10 票
《灵山秀水挹清芬》潘琦君　9 票
《革命哲学》蒋中正　8 票
《这一代青年的新希望》蒋经国　5 票

注：发出问卷 57 份，回收问卷 34 份

□ 王富仁　王　丽

只有真实的表达才有健康的人格

王丽：王先生，您觉得当前语文教育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王富仁：我认为从根本上说，还是一个教育观念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语文课要教给学生什么？我认为语文首先要教给学生说话写作的能力，即运用语言与外界交流的能力，如果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理解语文，语文就必须教给他怎样把自己的思想、感受、情绪等等，借助于语言这个载体来传达给对方。但我们现在的语文课不是这样，是大人教小孩说话：我教你说什么话，你就说什么话，而不考虑学生在这个年龄段要说什么话。比如文化大革命中，小学一年级第一堂课就让孩子学“毛主席万岁”这句话。实际上这句话是最难懂的，因为“毛主席”这个人虽然可以从电影和照片上见到，但“主席”是干什么的？“毛主席”为什么“万岁”？这么小的孩子根本不可能理解。他的心灵感受产生不出这样的语言来。这个语言载体没法负载他真实的感情。而语文教育的任务却是把这些话给强行移植到他心里去。我们现在流行的分析课文的那套模式，什么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点之类，也属于这种情形，因为它根本不是从学生自己对课文的理解出发。还有，我们的作文和一些教材的内容也与此相似。总之，我们整个语文教育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设计的。

王丽：您认为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弊病？

王富仁:最大的弊病就是脱离了学生的自我需要,脱离了他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理解和情感,造成学生自己真正想说的话找不到语言来表达,不想说的他却能说得出来,甚至可能说得头头是道,但往往是空话、套话、假话。这样一来,语言就不是作为负载自己真实思想感情的载体,而成了蒙蔽自己、覆盖自己的一层帷幕,把真实的自己挡在里头,使别人看到的不是自己。

王丽:而且这种"蒙蔽"是从孩子很小就开始的,他完全处在一种被动的、不能自主的情况下,一旦定型之后,他可能终生都无法自省,实际上也就永远丧失了自己的语言,这是最可怕的。

王富仁:所以我认为语文教学对儿童来说,必须从童话开始。童话的世界和儿童的精神世界有一种天然的契合。小学语文课本要多选童话寓言、民间故事和一些通俗有趣的小故事,先读给他们听,然后教会他们自己读,写放在读之后。可以先让他们自己讲,然后教给他们把自己能说的简单地写下来,把书面表达作为口头表达的继续,而不是把写当成与说无关的东西。

到了中学,就应该以文学为主。青少年的特点是感受丰富,是在不断地感受中形成对世界的看法。而文学作品是诉诸人的感情的。我们现在课本里非文学类的课文太多,说明性的课文太多。我说过这么一件事,一个很著名的语言学家,他拿了一件古物让学生描述,结果学生都写不清楚。我说这是正常的,因为学生看到的只是这个东西的外形,他没有感受,所以写不出来。比方说这是一个茶壶,如果要精确地描述这个茶壶的形状,必须是个制壶专家。语言学家认为在中学里应该训练这个描述说明的能力,这实际上不符合青少年的接受能力和认知特点。青少年的思维特征更是文学的、感性的,开始时理性思维能力较差。所以,在中学时代,不要过多地写议论文,而应该让他多去感受。感受多了,有了比较,有了区别,理性思考的需要就产生了。这时的理性是建立在活生生

的感性的基础上的,他的思想才有根,才是自己的思想。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中学时代是文学阅读的时代。

王丽:您自己在这方面一定很有体验吧?

王富仁:我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喜欢文学阅读。当时学校实行五分制,我给自己提出一个要求,每门课都要在四分以上,其他时间我都去看小说,读文学作品。到了高中毕业,西方文学史上提到的主要作品差不多都读过了。还读了几种中国文学史和一些古代著名诗人的选本,如陶渊明、李白、杜甫等等。高中时开始读哲学和文艺理论著作,如马克思的哲学著作,杨献珍的《什么是唯物主义》,俄罗斯的一些文艺理论著作,等等,还自己订了《文学评论》和《哲学研究》。那时的阅读对我以后的影响很大。

王丽:现在的问题是学生的时间都让上课、考试和作业占满了,根本没有时间来读书。

王富仁:这对学生的影响很大。别的先不说,就说现在的一些大学文科学生,他们在中学很少读文学作品,进了大学之后,好多作家的作品他都没读过,就先学文学史。先知道了这些作家和作品在文学史上有什么位置,以及他们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何在,然后再带着这个理性的框子来读作品。这样,他对作品的理解、想象就受了这些框框的限制。本来应该先读作品,对作品有所感受以后,再从理性上对其进行思考和观照。现在这个次序被颠倒了。我认为,我们现在文学创作的成就不高,文学评论的水平不高,跟这种教育模式有很大关系。

王丽:我有一个发现,中小学教育的缺陷对一个人造成的影响,在当时是不容易被发现的。只有当他慢慢长大,上了大学、甚至走上社会之后,才会逐渐暴露出来;越往后,可能暴露得越充分。这使我想到一句话:教育的效果是滞后的(包括好的和坏的),教育的观念在超前。所以,对中小学教育的一些问题,大学老师往往看

得更清楚，体会更深切。

王富仁：我还觉得中学课本中阴柔的、温良恭俭让的文章太多，充满阳刚之气的、能激发人的生命活力的、向生活挑战与跟命运抗争的文章很少。青少年原本是有旺盛的生命力的，他们对这类文章更容易接受，也更能从中获得感受世界、认识世界以及认识自我的能力。中国知识分子往往太疲弱，一遇到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就手足无措，缺乏创造力，我认为与此有很大关系。

王丽：在中小学作文评分标准中，往往有“思想健康”这么一条，我对这种提法一直抱有怀疑，您怎么看？

王富仁：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第一，他是无所谓“思想”的；第二，任何表达都是合理的，是不伴随实利目的的。所以不存在什么“健康”“不健康”的问题。这种提法实际上是幼稚的，不合理的，而且会起一种误导作用——就是误导虚伪，使孩子从小学会迎合别人，不会依照自己真实的感情来说话。这样的语文教育就会加强中国人总体的虚伪程度。反过来说，假如一个人在表达的时候，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才真正能培养出健全的人格。对于儿童，乃至对于成人，诚实是最重要的道德标准。而且只有在诚实表达的基础之上，才会使别人正确地理解自己，从而使自己与外部世界达成一种和谐和沟通。实际上，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犯的一些错误，随着自己生活经验的增加，会逐步得到纠正的，这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说真心话、不诚实。人虚伪了，就什么缺点错误也不易改正了。

王丽：听说您以前也当过中学语文老师？

王富仁：那是“文革”后期，我刚大学毕业。那时没有考试，我怎么教谁也不管我。一本教材我只挑几篇来讲，其他的念一下就完了。鲁迅的《祝福》我讲了两星期，一句一句地讲。我布置作文，一般不命题，学生爱写什么就写什么。体裁也不限，写小说、散文、

诗歌都可以。有的学生一篇作文整整写两个作文本,我也给他看。有的学生作文有些创意的,我就鼓励他再修改,下回布置作文就不用做了,只要把这篇改好就行。做得好的,我就让他们抄出来,登在壁报上。

王丽:要是现在就不可能那么自由了。

王富仁:是啊,幸亏我后来离开了中学,要不我真不知道怎么教。我想假如我现在还在中学,那我只好改行去教几何了。

王丽:您认为语文课应该怎么上?

王富仁:先得有一套更适用于阅读的好教材,多阅读,少分析,让学生自己去看,然后让他们谈谈感受。有的东西学生感受到了,但说不明白,像蒙着一层纸,老师就给他点拨一下,就像把窗户纸给捅破。学生感受不到的那个层次,你讲了也没用。我们的很多古诗,是先记住,后来才渐渐理解它们的思想情感内涵。其实很多现、当代文学作品也是如此,要理解鲁迅的《阿Q正传》,得用一生的时间,你能讲得清楚?

王丽:您觉得这次教育改革的前景如何?

王富仁:21世纪变动最大的就是教育。说到底,未来的竞争就是教育的竞争。这是个世界趋势。对国家教育部来说,这一点肯定能认识到的,所以改革势在必行。能下多大的决心,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通过舆论宣传引起公众注意,但不能很快进入实践过程。待到问题积累得更大了,能量蓄积到一定程度,人们才最后下决心真正进行改革。第二种可能,也就是最好的可能:通过我们的呼吁和全社会的参与,从现在起就开始着手,把它当做一件大事来抓,从教材入手,然后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适用新教材的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使之成为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正常体制。

□黄白兰

众说纷纭话语文

一次给同学上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一位同学把“特鸡鸣狗盗之雄耳”这句话译成“特别是学鸡打鸣、狗偷的英雄的大耳朵呀”(实际应为“只不过鸡鸣狗盗的头子罢了”),让人哭笑不得。——说到大学生的中文水平,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组的刘翠霄老师直摇头:“我们和学生会组织过一次消灭错别字的活动,给出几百个错别字,请一年级的同学把所有的错字都挑出来,能挑出一半的都很少。”据刘老师介绍,去年北师大对一年级新生进行了语文入学检测,原计划得分在80分以上的(满分100),可以免修大学语文,不料一千多名新生中,能达到这一标准的仅有六七人,无奈之下,学校只得决定,都要修大学语文。

大学生中文水平差,不独北师大。北方某大学社科系负责语文教学的某教师给记者讲了这么一件事:一位比较优秀的本科生留校做助教,为一位研究生导师整理书稿,书稿送到出版社没几天就被退了回来,原因很简单,出版社的编辑只粗粗浏览了一遍,便发现了一千多个明显的错别字,导师没办法,只好自己重新整理。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社科系的王维燕老师,代一个班的课,都要先做一个调查 ,摸一摸同学的底,每次她都失望地发现,没看过中国“四大名著”的同学很多。“让同学写个东西,病句、错别字先不

说，关键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写，往往就是列举一二三，内容特别干巴”。为此，她给大学生上课时大半时间是在补课，补汉语基础，补文学知识。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金锡谟副教授对此也连连叹息：现在中文基础课没人愿意上，但让同学写个学年或毕业论文，便毛病百出。文章结构事先给谈好，让学生去组织，但成文后至少要改三遍，没有章法不说，错别字、行文不通、用词不准确的现象到处都是。

金老师是个细心的人，他把同学们经常出现的一些错别字和语病都做了记录，我们在此随便摘录了几个：贯（灌）输、泛（贩）卖、论剧（据）、一望无银（垠）、破（迫）不及待、脱（蜕）化变质、贬（眨）眼之间、交赋（付）使用、适得其返（反）、坚（艰）苦奋斗……

华中理工大学去年对全校新生进行了首次中国语文水平达标测试。在这次稍高于中学语文水平程度的测试中，包括全校所有的95级本科生、专科生、研究生新生，达到及格线最多的是本科生，也仅有60%，最少的是博士生，才有30%的人达到了及格线。

知耻而后勇，如果能积极地去弥补不足，倒也罢了，可与外语备受重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大学里，从学校领导到老师、同学，中文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轻视和冷遇，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目前全国几乎没有一所大学明确将大学语文列为大学生的必修课（专业课、选修课除外），绝大多数学校没有对学生的大学语文水平提出明确的要求，一些理工科院校甚至连相关选修课也不开；某所以文理基础学科见长的综合性大学在讨论“211工程”中的重点学科时，部分校领导反对将文史哲列入其中。

某著名高校一位中文系二年级的同学告诉记者,他除了上课外,其他时间基本上是在学外语,其他同学和他差不多。北京某高校外语系一个班集体拒绝上大学语文,认为没用,竟获得了学校的认可。

北师大因为学生将来要从事教育工作的缘故,对学生的中文水平要求比较严,今年要求高考语文成绩在115以分以下者必须修大学语文,部分同学表示不满,外语系的几个同学直接找到任课教师要求免修。数学系的一名同学竟反问教师:要我们修语文,那其他系是不是也要修数学课?

北方某大学一年级同学认为,高校中语文课受轻视是很正常的事,他解释说:"一上学马上有一个紧箍咒:不过英语四级,不给学位。更要命的是,在毕业分配中,英语与计算机几乎成了找工作的两把'利剑',动不动就问外语过没过四六级,计算机水平如何,有谁会问你中文水平如何?在这种背景下,谁还会下功夫去学中文,加之学校也不要求,就更没人去关心了,因为毕竟是母语,一般事还能对付过去。"

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吴同瑞教授分析说,大学生中文水平不尽人意,最关键的是学校没有具体的要求和统一的考核,大学生入学后,中文教学根本没有列入计划。如果像外语一样,也来个四六级考试,不过关不给毕业证,可能就是另一种情况。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学中文系老师抱怨说,我们上课想给同学油印一本练习册的钱学校都不给,可外语考试,模拟一次又一次。学校都这样,学生能有学中文的积极性吗?

一些老师反映，由于大学语文作为基础公共课，难出“高精尖”的成果，再加上学校职称评定上的一刀切，已严重影响到了大学语文教师的稳定，从而直接影响到了学生语文水平的提高。某师范大学从事语文教学的老师曾有十余人，现只剩下两人，因上课时人手不够，只好找一些中文系在读博士生去对付。据了解，这种情况目前在各校非常普遍。

对于这种现状，这种心态，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倍感忧虑，他介绍说，在美国，一些华人教授关切地向他谈起了祖国大陆教育的缺陷：留学生 ABC(外语)很好，就是不知道长江黄河；XYZ(数理化)很好，就是不了解《史记》、《左传》。“目前大学生忽视的不仅仅是一门语文，而是整个文史哲，是一个人的综合人文素质，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杨校长激动地说。

曾有同学写信质问杨校长：外语不过四级不授予学位，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文章写得文理不通，错别字满篇，却可以照样毕业，照样拿学位，作何解释？杨校长把信拿到校务会上给大家看了，大家很快达成一致：今年对所有大学生新生，在入校后进行一次“中国语文水平达标测试”，及格者在大学可以免修语文课，未通过这一测试的，继续修大学语文，毕业时未能通过这一测试的，本科生不给毕业证，研究生不给学位。遗憾的是，能明确地把中文摆到如此地位的目前仅有华中理工大学。

□ 王惠兰

中学语文:不感兴趣

时间:1997 年 10 月 7 日

地点:北大附中

采访对象:副校长王铮,高二年级学生甲、乙、丙、丁

记者:你对目前教育改革的总体看法怎样?

王铮:方向是对的,但具体实施起来的问题较多。

记者:请谈谈你对教材的看法。

王铮:现在中学教材最大的问题就是陈旧和偏深。这些年教材虽然不断在变,甚至出了甲、乙、丙种,但这些都是形式上的,而实际上如果按照教材来要求学生,学生就考不上大学。因为高考的要求和教材要求相差太大。因此学生要考上大学,除了教材掌握好外,必须借助大量的参考书,这样,减轻学生负担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记者:目前教材的陈旧或偏深会给老师和学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王铮:总的来说会造成学校教育的影响越来越小,教育实质性的东西少。老师在校内天天搞基本功比赛,但学生却不一定需要教师们的这些成果。在某些方面,学生的知识和技能都远远超过了老师。教师还钻在教材里的时候,学生已走了很远。如教材没有的计算机课。有一位初一的同学,他给初二学生上计算机课讲得比老师好,极受欢迎。又如年初有关"克隆"问题的讨论,教材上不可能有,但学生极有兴趣,要求老师讲,但老师对这些课题的了解还不如学生,而学生自己的讨论却有相当水平。老师在许多问题上显得很无力。

记者(转向学生):能随便说你们的苦恼吗?

学生乙:不能按照自己想法学知识,也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学生丙:没什么说的,这个问题没意思,说了也白说。

记者:你们最高兴的事是什么?

学生甲、乙、丙:放假,出去玩,和好朋友在一起。

学生丁:按自己想法安排自己的一天。

记者:你们对所学的东西感兴趣吗?

学生乙、丙、丁:不感兴趣,但没办法。

记者:主要是什么问题

学生甲:教材很需要改革。知识陈旧,偏深,枯燥无味,死板教条。

学生乙、丙、丁:学的东西太多太杂,学来无用,有用的又没时间去学,新的东西少。

记者:你觉得该用什么样的教材?

学生甲:像百科全书类的。比如把所有的自然科学放到一类,把所有的社会科学放到一类。比如科学类的,不仅要有各科基础知识,凡是跟自然有关系的都作一点介绍,面要宽,但不深入研究,多方面了解问题。

学生丁:要把教材编得图文并茂,生动有趣。

学生乙:谁对哪类知识感兴趣,就再去做深入研究。

记者:假如你们以后做了父亲,会不会像现在父母要求你们一样要求自己的孩子。

学生丙:我想不会,因为现在读书受了这么多压力,遭了这么多痛苦,为分数为父母牺牲了自己很多东西,将来不会让这样的痛苦又原封不动地加在孩子头上。我们对这种痛苦体验太深了,不该让下一代再像我们这样。不过也说不准,经过了一个周期,说不

定这种生活隔膜了,这种痛苦淡化了,我们又会像现在父母要求我们一样去要求他们。

对于教材问题,各界人士看法不一。

《中国教育报》记者李建平认为:

教材问题是对于权威的教育出版社来说的,实际情况是不光是学校没有权利选择,省地市都没有这个权利,你不用我出版社出的中小学教材,我就不给你高中教材。你得不到,你怎么参加高考?四川的情况我挺清楚的,因为我采访过他们。为了保高考,四川最后只好妥协,自己辛辛苦苦编的教材也没用上。他们的小学音乐、美术教材编得很有特色,也还是不能用。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语文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张鸿苓认为:

中学语文教育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觉得就跟许多社会问题一样,就像一堆螃蟹挤在一起,弄也弄不开,理不出个头绪来。我是编过一套教材的,又是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我深感到教材问题的复杂性。现在咱们采取的是“一纲多本”的政策,这比过去的大一统要好得多,有一个竞争和互相吸收的可能,是由许多人来一起研究这个问题,而不是少数几个编辑来研究这个问题。

但是,这里边问题仍然很多。因为咱们是市场经济,教材是有利润的。某权威教育出版社说:“教材是我们的饭碗,决不能让人夺走,要使劲地倚住它。”所以,它一定要维持占全国教材的90%,其余的只能在10%里边去竞争了,能起什么作用?

北京市现在用的初中语文教材大部分是实验中学编的,按该权威出版社的说法,我们是地方保护主义。别的地方就顶不过。比如四川,他们自己编定了一套教材,最后跟这家出版社打官司,没打赢,结果四川那套教材一本都不能发行,还得向对方道歉。本

来上面说“一纲多本”,实际上没这个权。

至于基本篇目,我虽然讨厌它,但是我还不能取消它,要不我编的教材就没人要了。我不是反对基本篇目,比如说古今的一些名篇,的确能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问题是到底哪些文章可以作基本篇目,没有人去很好地研究它,所以基本篇目达不到基本篇目的作用。而研究是需要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谁来搞一笔钱来办这个事情?每次我们审委开会,最多一星期,有时还不到。我们一拿到教学大纲就赶紧找,哪怕找到的不怎么样,但是我们就这么点时间,匆匆忙忙就这么定了。

□ 黄白兰

马文奇老师的悲剧

1957年,他送走了他第一批学生。教第二批学生时,他对语文教材已了如指掌,他很想给学生们讲点新东西,于是他就反复思考教材中的每一篇课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做一些新的理解,在过去的备课笔记上又增添了新的内容,他的努力同样换来了学生们的成绩,马文奇老师感到前所未有的为人师的快乐。

这样送走几批学生后,马文奇老师已教了十多年书,他对中学语文教材已倒背如流,在学校里被称为"语文通",可他却深感苦恼,他即使想从教材里再挖点新东西讲给学生听已是力不从心,他觉得无论自己怎样冥思苦想又都转回到自己讲过的东西上。他感到束手无策,他觉得一遍又一遍地讲那些不知讲过多少篇的讲义,是愧做老师的。

他于是打报告给校领导。想讲一些教材以外的文章,这在当年无异于惊世骇俗,得到的答复是讲教材是老师的义务,至于讲其他是绝不允许的。他只好消了这个念头,照本宣科,老老实实地讲教材,虽然,从那时他就开始有些厌倦这本教材了。

马文奇老师惊世骇俗之举在文革中成了他不可饶恕的罪行,他要深刻反省讲教材以外的文章是出于什么思想动机,有什么反革命阴谋,是不是想趁机向学生们灌输毒草。

马文奇老师的回答是想让学生们多接触一些优秀的文学作

品。结果,这句话成了一条更大的罪状,马文奇老师因此被打折四根肋骨并被关进了监狱。

新时期以后,马文奇老师重返讲台,面对那一张张稚嫩的渴望知识的脸庞感慨万千,他重新整理备课笔记,虽然他累积起来的几米高的中学语文教学笔记在文革中皆被烧毁,但所有的笔记都藏在他头脑中,他重新开始了教书育人的辛勤工作。

从他第一次教书到他重返讲台再为人师时,时光一瞬间已流走了近30年,可他手中仍旧是当年那本教材。他虽然因为想讲点教材以外的文章而进了监狱,但他并没有“认真反思过”。他再次向校方提出,在讲好教材的前提下,他想给学生讲点儿教材以外的文章,因为这本教材他已经教了近30年,其陈旧感是不言而喻的。他感觉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他对这次提出有莫大的希望。

但校方领导对此却听而不闻,只是说,如果学生考不及格,影响了升学率,到那时,上至教委、下至学生家长都不会答应。

马文奇老师不明白,校领导只是开口闭口地提到教委和学生家长,为什么不真正考虑一下学生呢?他们的所学所用以后在社会上发挥什么作用,为什么没有人来关心一下呢?

马文奇只好按部就班地讲下去,看着那些学生,他有时真不忍心在这样教下去,可他没有一丝办法。他有时想,怎么就没有人来呼吁一下教材改革呢?他曾经呼吁过,但他人微言轻。

有一次开家长会,一个他不认识的学生家长激动地喊他老师。原来,这位学生家长是他50年代教过的学生。这位学生家长对老师师恩难忘,忆起当年的事情时感慨万千。马文奇告诉学生家长,孩子的语文不太好。学生家长也很苦恼,不经意说出的一句话让马文奇几个夜晚难以入眠。学生家长说:“马老师,怎么学的还是那本教材啊!我当年的学生笔记丢了,如果不丢,让孩子看看,一

定会考好的,这孩子就是记笔记不认真。”

一句不经意的话说出了多少天下父母的心声。

身为多年老师的马文奇觉得一下子被这句话刺痛了。如果50年代的一本语文笔记,可以帮助90年代的孩子考出好成绩,那我们到底在教给孩子们一些什么东西。

还有一次,马文奇课堂提问时,被学生问得哑口无言。学生回答不上来一篇文章的主题和段落大意,马文奇让他好好想想时,学生说:“老师,我特烦语言课,昨天,我爸爸说,他们那时就分段,找段落大意,找作品主题,现在怎么一点儿没改变呢?”

马文奇看看眼前稚气未脱的学生,觉得学生说的正是自己这么多年想说的,他看看学生,无奈地摇摇头,让学生坐下,一言不发地拿起粉笔把“教参”上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的答案抄在了黑板上,让学生们认真地抄在笔记上,然后背熟、记牢。

马文奇临退休前一直盼望着能看到语文教材的改革,但最后他是带着满腹的失望离开了他站了四十多年的讲台。他很想告诉学生语文不是这么学的,教材里的文章也很有限,他很想让学生多读点唐诗、宋词、元曲、《三国演义》、《红楼梦》,甚至老子、庄子,但他这些年只告诉学生要读好教材,要找对中心思想、概括好段落大意,注意加点字的解释等。他所期望的真正的语文教育在他大半生的教书生涯中却没有一点儿得以实现。

退休的马文奇望着已经上了初中的小孙子在台灯下写作业,而孙子的教科书竟然仍是当年他所用的教材,马文奇不禁掉下了眼泪。这眼泪不应该在90年代末的今天流下,今天毕竟是改革开放的年代啊!

□ 黄白兰

触目惊心的畸变

1997年12月3日,北京教育界、新闻界和文学界有关人士三十余人,就中小学语文教育问题举行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各界人士针对中小学语文教育触目惊心的畸变发言,中小学语文教育所暴露的种种弊端令各界人士忧思。

赵学谦(北京教育学院宣武分院教研员):跟其他学科比,语文教学问题最多,这大概没有人反对。现在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一致认为,语文教学占的课时最多,而效果最差,这个看法大概也没有不同意见。小学语文教学无效劳动占50%,有一次我在会上说这话时,下面的老师插话说:"不是50%,是3/4。"我教了25年的小学语文,是很苦恼的,为什么?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教。到现在,大多数的教法叫"问答法",就是老师问一句,学生说一句。

比如《刘胡兰》这篇课文。

老师一开始就问:"这篇文章是写谁的?"

学生举手说:"是写刘胡兰的。"

老师问:"你怎么知道?"

学生答:"题目就是刘胡兰。"

老师问:"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学生答:"1947年1月4日。"

老师问:"你怎么知道?"

学生答:"课文第一句就这么写的。"

就这样按着课文内容一句一句往下问,我不知道这样问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从自己25年的教学中得出结论:语文教学非改不可。但是怎么改?现在许多语文老师不会教语文。这个问题恐怕得从师范教育开始解决。因为一篇课文拿过来以后,老师不知道哪些应当讲,哪些不应当讲。我还举《刘胡兰》作例子。

老师问:"这个云周西村在什么地方?"

学生回答说,"在陕北"、"在延安",都说不清楚。老师也说不清楚。

老师最后说:"云周西村在革命根据地。"

课文里,敌人跟刘胡兰说:"你说出一个共产党员给你一百块钱。"

老师就问:"谁知道那时发什么钱?"

有的说发银元,有的说发铜板,也有的说:"那时候的钱中间有窟窿的"。

老师说:"反正那时候的钱比现在的钱值钱。"

这一节就这么随随便便地问下去了,像这样的教学可不是个别的。所以我说应该从师范教育开始,解决师资问题。

范守智(北京八中语文教研组长):作为语文学科,重视不重视文学因素和文学教育,我看这是语文教育纳入素质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些年来我感觉到,在中学语文教育里,越来越忽视文学素养的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越来越差。我记得在10年前,让咱们选几篇文章,往一些报刊杂志推荐,我觉得还能选得出来,一个班里还能选几篇。但是现在,要在咱们高三年级里边,选几篇好文章推荐出去,这就很难。另外,学生的思想、认识能力越来越浅,对社会生活的分析能力越来越差,这直接关系到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全面素质问题。

苏豫生(崇文区教研中心教研员):我教课多年,到了教研中心以后,听了大约一千多节语文课,平均每年一百来节课。我觉得语文课最主要的问题是把一篇生动的课文肢解为一堆知识拼盘,弄得学生对语文最没有兴趣。我曾经搞过一次调查,学生最喜欢哪些课,其中喜欢语文课的人特别少,这跟我们今天的语文教材和教学方法有关系。

可是我又觉得这个问题不是下面的老百姓能解决的。这当中有很多属于政府行为。比如教材的陈旧问题,现在中学语文大纲规定了101篇基本篇目,全国各地编教材都要包括这些篇目。你要是不把这101篇抠好了,就会影响学生中考。所以,老师要受教材束缚,还要受高考束缚。如果取消了基本篇目,那么全国各地编教材就可以解放一些。我现在听一些专家学者在讨论,说这个基本篇目究竟要不要,是值得探讨的,可这是一个只能由政府行为来解决的问题,不是任何一级教育领导机构能说了算的。政府应正视这个问题,从上自下地改革,这是最关键的事情。

郝一星(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中小学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其实很多人早就感觉到了,只是一直没有捅破。我们在谈素质教育时,往往是把它理解成在课堂之外去发展孩子的特长,比如吹拉弹唱、美术等。但是恰恰在学校,素质教育基本上让位于应试教育。理科搞题海战术,这个大家都知道,先不去说它。单说语文吧,小孩子的天真,好的感觉,硬是给磨成社会上大人孩子谁都会说的那些话,使社会语言非常单调。我认为这是对人的素质的一种严重的伤害。

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班全是男生组成,是一帮非常调皮的孩子。现在的人想象不出那时的孩子能多么闹。高中时来一位老师,她对我们这些十四五岁的孩子讲了《塔拉斯·布尔巴》的故事梗概,其中说列吉米特瑞拉兄弟那一段,非常精彩,当时所有的

孩子都不说话了,感觉到一种心灵的震撼,继而对教师由不尊重变成非常尊重。由一件事可以看出文学——还有语文教育中的文学,对人的素质的提高是非常起作用的。我们许多人都是在优秀作品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

我觉得应试教育在培养学生的“机智”方面,确实起了不少作用,比如如何作弊,如何投机取巧,尤其是那些判断题、选择题,把孩子搞得非常油滑,实际上这也是对素质教育的一种损害。

还有卷子上出的题目非常可笑。我的孩子拿回来的高考卷子,我就看不懂,我基本上做不及格。现在语文教学就跟数理化一样,非此即彼,答案只是一个,不能有第二个,实际上几个选择都可以,没有理由就选一项。我的孩子回来非常苦恼。我觉得,这也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问题。

袁志勇(北京教育学院宣武分院教师):今天一进来我就觉得惭愧,原来我也是文学迷,但现在已经堕落了,很久不读什么东西了。我从82年开始,教了10年中学,又调到宣武分院搞中小学语文教育研究。我刚刚接手一个北京市教委和北京市文物局联合举办的《我爱北京,我爱博物馆》的征文。参加的一共有18个区、县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他们把筛过一轮的稿子送到我这里,厚厚的一摞。我看过后觉得特别悲哀,这些作文有点像中国的足球,质量差,即使是高三的也一样。我曾经问一些作文比较好的同学,他们告诉我:“我的作文根本不是老师教的,我写作文全凭自己的感觉。”

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些学霸,以为自己如何,对于不同意见永远不去采纳接受,尽管他并不了解这些意见,他可以轻易地去否定,对我们年轻教师更是这样。

张明莲(北京25中语文教师):现在初中阶段要求掌握3775个字,学生会写、会用,是不是就算达标了呢!还有词语,只要会

用，也就可以了。但现在不是这样，还要考对整个词语的解释，而且是这个词语中加点的字的解释。我就觉得莫名其妙，因为一个字搁在里面是个意思，单提出来又是一个意思。我们就得告诉学生，你必须记住注释里头的第二个句子里的意思，因为他将来考试就考这个东西。我们学校的老师告诉学生，你对问题的回答也对，但你可要记住，一统考，你必须接着标准答案走。这么教法，老师自己也觉得挺没意思，所以现在55岁以上的老师都不愿意教了，因为这个应试教育太可怕了。

我们大家都觉得中学语文教育真是走进了一个死胡同。怎么转出去呢？好像挺难的，应该呼吁一下教育决策部门的领导者，赶快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再也耗不起了。

郑令中(崇文区教研中心教研员)：我在这里得替语文老师说几句话，都说语文课占的课时多，但是实际上，其他科目都要占学生很多的课外时间，而语文课则基本上不占什么课外时间。学生不花时间读课外书和文学作品，他们的语文素质肯定不高，而这些，不是上语文课就能解决的。

齐大荣(北京25中语文教师)：谈到教师素质问题，有的同志说语文教师本来就应当是个爱读书、多读书的人，这话没错。但是，现在教师的担子有多重？——课时多，有的要当班主任，整天守在学生旁边，回家要判作业，要做家务，管孩子，语文教师几乎没有时间和条件充实自己。这个问题，如果单方面指责语文教师，恐怕是不太公平的。

王国今(原汇文中学校长，现为文汇中学校长)：我干了40年的教育工作，我深深感觉到教育中的问题很多。比如现在提高素质教育，但是对学校来说，更重要的是怎么在各科的课堂教学中体现这个素质教育，笼统地提怎么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还是一句空话。

现在的应试教育对老师是一种束缚。真正有水平的教师，他们的能力发挥不出来。对学生的创造力也是一种扼制和束缚。这个问题语文教学中存在，其他各科教学中也存在，比如理科的教材编得太深。过去“文革”以前，物理课中的“有效数字”这部分内容高二年级才讲到，现在把它放到初中一年级来讲，结果连教研室的教研员，大学本科毕业的，有时候也搞错。现在的孩子负担重，就是要求不恰当。所以我觉得这个考试必须改革，教材必须重新修订。

娄然(汇文中学高三学生)：我从小学到高中，语文成绩一直比较好，但我上语文课从来不听，自己在那儿看课外书。自从上了高一以后，王丽老师教我们，她使我们体会到什么叫语文。语文不仅仅是会写字，会念一篇文章，更重要的是一种对生活的体验。她教我们怎么去关心社会，帮助自己周围的人，怎么用心去感受生活，去写文章。我开始慢慢地喜欢上语文课了。

到了高二，因为各种原因，王丽老师离开了我们。我和一些同学都沉浸在一种怀旧的情绪中。我对语文课又失去了兴趣。

我现在写作文，唯一能找到感觉的就是在随笔里。现在回头看高一高二的随笔，觉得自己一年一年地在进步。可是一写那种高考作文，我就写不好，有时才得了三类文。我买了一本历年高考作文选，我翻了几篇，就看不下去了，简直就像小学生的作文。我怀疑语文在高考上埋没了多少作文好的同学，真是难以数计。

□ 黄白兰

八股阴影下的语文教学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句话常用来形容权势的隆重。对广大的学生来说,老师的“权势”就有如此的威风;而对老师们来说,教材的“权势”也是如此。在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方面,倾听基层的意见,紧跟时代的步伐,制定出严谨而有生命力的学术政策来,是关系到下一代能否健康成长的关键之一。原子弹可以毁掉一个人的健康,但这毁不了这个人的文化修养,毁不了一个人的心。而语文教育却有可能做到这一点,把我们的下一代培养成傻瓜还是聪明人,就在我们今天的选择。

语文教学方面的问题,是整个中小学课堂教学存在问题的一个缩影,其他的课程同样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小儿 7 岁,在北京一所还不错的学校读小学二年级,天性不算愚钝,遇事还好问个“为什么”。但是,本学期他几次测验所出的“错误”,让我这个读了 4 年大学,又做了近 20 年文字工作的人疑惑不解。一次数学测验,有一道题是这样的:“10 除以 5,得多少?”小儿答曰:10 除以 5 得 2。

试卷发下来后,小儿的这一答案扣了 0.5 分。请教老师(试卷不由学校出,由学区统一出标准答案),告之曰:原因是没有按规定答题,正确答案应是“得 2”。好心的老师惋惜地告诉小儿,你这么

写是应该算对，但是，上边对试卷答案有严格要求，所以以后做除法，答题要从倒数第一个“逗号”开始，问什么，答什么，不要多写。

小儿记住了老师的教导。但因此又带来一次“失误”。

这次的试题是这样：“26除以4商几，余几？”小儿答曰：商6余2。

这次又被扣去0.5分。

我和孩子一起给试卷改错时，我问孩子，为什么不按老师说的“从倒数第一个逗号开始答”？他很困惑地说：“总不能不答商，只答余数呀！要不，你说怎么答？”

我明知孩子说的有理，但也猜不透出题者的要求，只好说：“别管这些，按老师的办法答，就写‘余2’，看看老师怎么改。”

第二天，我们改的题又被判为错题。向老师请教，老师也无可奈何地解释说，这次是试题出得不好，逗号不该放在“余几”处。老师好心地告诉小儿，以后考试再遇上这种题，就从头至尾地答，不会有错。

一会儿是要从逗号处开始答，一会儿是不能从逗号处开始答，小儿说：我不会答题了！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语文考试也如此。期末考试前，小儿在一次语文测试中又丢了5分。

试题是这样的：把每组词连成句子，写下来，再加标点符号。给的词是：发明蒸汽机瓦特是的

小儿的答案是：“是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尽管语句通顺，也符合要求，而且是个正确的强调句式，但小儿没得一分，标准答案是：“蒸汽机是瓦特发明的。”或“瓦特是发明蒸汽机的。”

我“完蛋了”！

1998年1月12日，全国高中学生奥林匹克化学竞赛在郑州大

学降下帷幕。133名参赛选手中,36人获得一等奖,58人获得二等奖,34人获得三等奖。承办此次竞赛活动的郑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院长唐明生说,参加竞赛的学生素质很高,考出了相当出色、相当不容易的成绩,尤其是理论分,50分以上的有12人(满分60),40分以上的有80人,低于25分的仅有14人。

但让唐老师遗憾的是,此次竞赛的实验成绩明显低于理论成绩,且悬殊极大。实验分超过30分的只有一个人(满分40),25分以上的仅20人,低于20分的占一多半,低于15分的有58人,平均分只有11分。还有一位考生得了零分。如果不是每人加5分,得0分的就有4个。

唐明生说,这暴露出中学教育的一大弊端:学生的应变能力和动手能力明显弱于理论学习能力。考虑到这些考生都是全国各省、自治区层层选拔、经过多次培训的顶尖学生,出现这一现象就更让人忧虑。

为这次竞赛出考题的郑州大学的杜宝石教授和何占航副教授认为,实验题并不难,考察的都是最基本的原理。很多考生成绩差,是因为今年的实验题第一次偏重考察学生的独自动手能力和综合应变能力。以往的奥林匹克化学竞赛实验题,都是让学生按指定的实验方案、步骤、条件,照方抓药式地演示一遍,考察的是学生操作的熟练程度。今年的考题只给了实验的主要操作过程、主要原理、有关数据、仪器设备,让考生根据所学理论,拟定实验方案,确定具体的温度、数量。很多考生一下子懵了。

有一名学生"从没见过这样的实验题",也没见过分析天平。监考老师把天平的用法教给他,但这位学生显然是失去了信心,无论老师如何劝,他都拒绝把实验做下去。还有一胖一瘦两位学生,在几个小时的实验中,胖者一直大汗淋漓,瘦者一直手抖个不停。

杜宝石教授10年来一直是河南省化学奥林匹克竞赛队的领

队。他说,中国学生参加国际奥赛以来,一直是理论分高于实验分,这次思路大调整,也是为了和国际奥赛惯例接轨,强化中国选手的综合应变能力。

杜宝石和何占航认为,化学实验特别强调个人的动手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有的原理看起来简单,但做起实验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比重"这个概念,初中生都知道。可对于不规则的东西,如体积特别大的石头,或像米粒一样小的东西,或是一种液体,如何精确地测量其比重,一年级大学生也未必知道。就像此次竞赛,等于给了郑州到北京的路线图,给了交通工具,至于如何走,在哪儿停,到哪儿加油,都要考生自己决定。遗憾的是,尽管大多灵敏考生都知道要路过安阳、石家庄,但有些考生在安阳就打起了转转,怎么也找不到正路了。

何占航说,素质教育需要在教材、教学、高考各个环节上下大功夫,目前是喊得多,做得少。比如高考,有人说它是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但如果运用得当,它也能往素质教育的路上引。我查了一下历年高考题的实验部分,考死记硬背的多,考如何做实验、灵活运用的少。于是,许多学校的实验课只是照方抓药,验证一下书本上的实验步骤。至于为何要加那么多物质?多了行不行?少了又怎么样?为何要保持那样的温度?绝大多数学生都不甚了解。这次竞赛之所以如此出题,就是想对这种状况有所改变,能对中学素质教育起一点引导作用。

□余　杰

“神童”与法西斯

《南方日报》名牌记者朱德付最近撰写了一则关于神童“制造商”的报道。湖北省公安县13岁的聂愿愿在1998年的高考中，以628分的高分考取华中理工大学。整个公安县考分超过600分的只有11人，聂愿愿只比第一名645分少17分。在该县考取华中理工大学的十几位考生中，聂愿愿成绩名列第二，一入校便获得该校二等奖学金。

聂愿愿受的是他父亲的家庭教育。他的父亲聂其文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外文系，临近毕业前，从武大肄业，转到湖北省荆州教育学院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公安县闸口中学当英语老师。由于性格孤僻，教学方法又不循规蹈矩，聂其文在学校和领导的关系很僵，领导把他从讲台上赶了下来。于是，他辞职到深圳、海南闯荡了一年，然后回到公安，开始在儿子身上实践自己的教育方法。他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教学计划，将12年的课程浓缩在4年内完成。他的方法突出一个“背”字，不仅要求儿子将语文、英语等课本背得滚瓜烂熟，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也要求一本一本地背诵。除了公式定理以外，还要背诵大量的例题。

聂愿愿高考成功以后，聂其文名声大振，立即受聘为湖北省艺术学院附中的校长。他对记者侃侃而谈，表示：“我想在教学方面实践一下自己的教学思想，从学前班到高中的13年，我准备用10

年完成。只要我能做这一点,我就比其他学校成功,因为我节省了3年时间。"聂其文的女儿刚刚12岁,也于4年以前退学回家,聂其文打算在她身上再做一次"神童"试验。"她今年已经学到高中课程,后年让她考大学。愿愿今年考大学时,周围的人百分之百地认为他考不上,考上以后,大家又说这是一个特例。当我的第二个孩子成功以后,我的教育方法才真正有说服力,那时我要把我的教育方法总结推广。"

记者来到华中理工大学,采访了聂愿愿。当问及父亲的教育方法时,孩子毫不迟疑地回答:"爸爸的方法不好。其实他并不想这样做,主要是家里太穷了,他又自认为有学问,就自己教我。他只是拿几本教材让我背,其他什么资料都没有。爸爸每天都让我做功课,我又不想做,他动不动就打我。我对他恨得要死,每天都当家里的那堵墙是爸爸,对着打,打得手上都起了老茧。"聂愿愿接着描述了自己平时的生活情况:"我刚进高中时成绩很差,副科知识知道得很少。长江有多长,从哪里发源,在哪里入海,我都不知道。我每天早上5点40分起床,晚上12点才睡觉。现在想起来都害怕。"

父亲洋洋得意,儿子惊恐不安;父亲打算推广自己的教学方法,儿子却对父亲所谓的"方法"恨之入骨。到底谁对谁错呢?社会上众说纷纭。

《羊城晚报》上刊登了广州广雅中学关于"神童"的讨论。学生、老师和家长各抒己见,其中不乏发人深省的观点。

孩子们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反对的,初一学生刘茵说:"我与聂愿愿同龄,都是13岁,比起他来,我真的觉得自己太幸福了,因为我的童年是在父母的呵护下度过的。我到过广州各种各样的游乐园玩耍。我对童年有许多美好的回忆,而聂愿愿没有,除了读书,除了爸爸的打骂,他什么都没有。他13岁就上大学了,我不羡

慕他。总有一天我会上大学的,而且上得比他快活。”而另一种则是支持的,初三的李志毅说:“聂愿愿能够成为神童,是因为有一点天生的聪明和更多的父亲严格的教育。可见,成功确实是来自百分之一的灵感和百分之九十九辛勤的汗水。”

同样,老师们也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老师朱其凤说:“聂父这样教育孩子,无疑是粗暴残忍的,扼杀了孩子本来应该拥有的东西,如童年的乐趣、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同学的友谊等等。可以说,他的生命是不完整的,很可悲的。”另一位老师周圣凤则说:“棍棒下逼出一个大学生,说明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关键在于有没有挖掘出来。”

而家长们一致都表示反对。家长宋群说:“聂父棍棒相压,无非是望子成龙,却令儿子磨刀杀父,这当然是可悲的。”家长裴国珍说:“把孩子关在家中棍棒施教,即使 13 岁考上大学,方法也不能推广。在学校老师虽然精心教,未必能够考上大学,但教育符合规律,培养出来的正常人是成功的。”

“神童”现象和“神童制造商”现象的背后,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聂其文在自己的事业上是一个失败者,他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便把希望寄托到子女的身上。子女成名也就是他自己成名。儿女的成功是他改变自己耻辱的生存的唯一希望。于是,他不惜用严酷的手段来造就“天才”。他的遭遇当然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也许他确实有自己的一套具有某些合理性的教学方法,但是却无法在僵化的现行教育制度下实施,因此被学校领导驱逐了。然而,他的处理办法难以让人苟同。他选择了走偏锋的方式,结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成功的背后却是子女心灵上莫大的痛苦。儿子和女儿付出了牺牲童年欢乐和幸福的沉重代价。小聂每天只有 5 小时又 40 分钟的睡眠,比起夏衍报告文学《包身工》里所描写的童工还要辛苦。他成了父亲的囚徒。

在实施自己的计划之前，聂其文有没有替子女本人考虑过？有没有想过子女本人的意愿？显然没有。子女在他心目中像是机器一样，他让机器以最快的速度运转起来，自己则像资本家一样收取最大的利润。他认为自己在爱子女，而子女对他却是满腔的“恨”，因为说到底聂其文是爱自己而不是爱子女。我想象着聂其文殴打儿子和女儿的情景，不寒而栗。我从中闻到了法西斯的味道。我反复读着小聂的话，他把父亲看作墙，把打墙假想成打父亲，居然打出了手上的老茧。这一细节更加令我直吸冷气。父子之间、父女之间，处于这种关系，难道是正常的吗？说不定某一天爆发激烈冲突，儿子真会奋起而反抗，后果不堪设想。

聂其文的“成功”从反面揭示了现代教育体制的缺陷所在。最无理的方法，却最有效，这是极具讽刺意义的。难怪学生和老师们中间都有不少是聂其文的支持者。就像上面那位学生李志毅所说的那样，“父亲的严格教育”是孩子们成功的最重要的条件，也像老师周圣凤的意见“人的潜能是无限的”。聂其文不是独辟蹊径，而是把现行教育弊端发展到了极端，这叫“以毒攻毒”。这一招肯定灵。他不让儿子接触广阔的现实世界，而把孩子关在房间里，强迫背诵教科书。“没有方法是最有效的方法”，聂其文抓住了现行教育体制的症结所在，然后下猛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儿子终于从高考中脱颖而出。他可以笑傲当年迫害他的领导了：三年河东，三年河西，看谁笑到了最后？我至少在应付高考制度方面比你们更有能力。领导自然是无言以对，而高考的命题者们更是无颜以对：连长江的概况都不知道的小聂，却能够在高考中取得优秀的成绩，难道不正说明高考的巨大局限性吗？高考选择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呢？高考的选拔标准是苍白无力的。

在这个只看成功与否的时代，聂其文成了英雄，成了“神童制造商”，成了教育大师。从社会上的反映看来，聂其文的教育方式

蛮有市场的——因为他“成功”了，因为他创造了“奇迹”。至于“成功”的后面有什么，“奇迹”的后面有什么，人们是不会关心的。这个时代，有太多的失败者和失意者，他们像聂其文一样把雪耻的希望寄托到孩子的身上，聂其文的方式是有效的，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根救命的稻草。即使是法西斯的方式，他们也觉得无可厚非：我们处在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上，“成功”是唯一的，手段则可以不加考虑。

在这样可怕的现状下，鲁迅先生早年说过的“我们怎样做父亲”的命题，不仅还没有过时，还更有针对性了。而且，这一命题还可以扩展成为“我们怎样做老师”、“我们怎样做教育者”。谁能够问心无愧地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呢？上至教育部长，下到一个民办教师或者一字不识的家长？

而我最担心的还是小聂的心理状态。在父亲的法西斯式的教育下，他的心理已经扭曲了。如何使自己的心理回到常态，对聂愿愿来说，是艰巨的工作和严峻的考验。如果他过不了这一关，他今后很难在人生路上有所作为。而且，心理不健全的天才是危险的。这样的天才我们已经有过好几个。前几年在美国枪杀几位科学家的博士卢刚，就是这样的天才。智慧超群，学问一流，但是心胸狭窄，易走极端，最后酿成震惊世界的惨剧。我当然不愿意看到再出现这样的悲剧。

教育的核心是“人”为本位。任何不把人当“人”的教育都是我所反对的教育——包括聂其文这位“神童制造商”的教育方式。

□ 邹静之

女儿的作业

过元旦时,女儿的语文作业,有一项是把综合练习作业本重抄一遍,从题到答案一字不落地抄,大概有一万来字。此为三项作业中的一项,女儿学会了熬夜,元旦那天写到凌晨3点。女儿六年级。

昨日看到一幅画,题目是《陪读》。儿子深夜在写作业,父亲在叠高的椅子上,发悬于梁,满地烟蒂,苦熬等孩子作业写完,是个好父亲。现在某些教师的能力已经深入到了家庭。听一朋友说,家中电视从不敢看,因曾遭过孩子老师批评,说孩子苦学,家长看电视,不是为父之道。这样的老师大概能使整个家庭都笼罩在苦读的氛围中。

我不是个好父亲,我先是没有头悬梁,陪女儿深夜写作业的精神;再有,她的作业,我也大多不会,陪也帮不上忙。我没想到语文的教法已经深入细致到字典词典内部中去了。女儿的作业要花很多时间来分析字,如:“瓮”是什么部首,它的第七划是点还是折,它的声母是什么,它的韵母是什么,它有多少义项……。这很像在抢辞学家的活,我不知道学得好的同学是否已经是半个文字学家了。也许我们需要全民族都成为文字学家,把一部部字典都装进心里。我曾对女儿说这没用,你学会查字典就够了,字典是工具,而你不必成为工具。女儿不听,她尊师敬道。

有一天，她问我“灰溜溜”怎么解释。我想了一会儿，问干吗解释这个词。她说是作业。我说这个词你会用吗？她说会，很快造了句子。我说这就可以了，关键是会用。解释“灰溜溜”这种词毫无必要，就像解释“馒头”这个词没有必要一样。女儿不屑，她认为我从没有学好过语文，连小学的问题都答不出来。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每个词是否都有再用语言来解释一遍的必要。如果不是，就该放孩子们出去玩玩。我想不到“灰溜溜”这类词，也要用书面语去说它一遍了，那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学的东西就太多了，我们确实不必在“灰溜溜”面前灰溜溜。

每临考试，回家的作业，大多是做卷子。卷子很长，女儿她们称其为“哈达卷”，挺准确，像一条长长的哈达，从桌子上拖了下去。她吃完晚饭就俯在上边写，一条“哈达”写完了还有一条。有时我路过她的房间，她的影子借台灯的光投在天花板上，那影子没有什么光彩。我从没有借这个影子想象出过什么杰出的人物来，没有爱因斯坦，也没有惠特曼。我的感觉是一个作坊里的小工在干她最厌烦的活。我曾看过她的数学作业，对格式和步骤要求十分严格，不厌其烦，明明可以综合列式子的，也要求分步；一个式子之后还要有语言阐述（干吗非要把简单的复杂化，他会做就证明他是明白、清楚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把聪明的孩子们当成白痴来教。他们其实非常灵动，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机敏得多，但我觉得那种教学好像就是非要压制住他们的活跃。很多时候这样的教学像是想验证一下谁更按部就班，谁更能掌握僵死的程式。

有一次，经我检查过的语文卷子错了很多，不仅是家人，我也开始对我的语文程度怀疑起来。有两条错误是这样的：题目要求，根据句子的意思写成语，有一条是“思想一致，共同努力”，女儿填“齐心协力”，老师判错；还有一条“刻画描摹得非常逼真”，女儿填“栩栩如生”，老师也判错。我仔细看了，不知错在哪里。女儿说第

一条应是“同心协力”,第二条应是“惟妙惟肖”。这真让人吃惊,我不知道“齐”与“同”在这儿有什么区别。按《新华字典》“齐”字第三个义项就是同时、同样、一起的意思,并举例用了“同心”一词。该用“同心协力”时,用“齐心协力”谁能说这是错了。女儿说:标准答案是“同心协力”,其他当然就错。真可怕,语文什么时候变得比数学还要精确了。中国语言之丰富,词汇之多,所谓同义词,近义词,相应的不止一条,怎么会就有一个答案呢。那第二条,我觉得题目的意思,栩栩如生甚至比惟妙惟肖更为准确,“妙”和“肖”与“如生”比,哪一个更与“逼真”这个词接近呢。关键争执还不在此,把对的说成错的,就不仅是误人了,实是害人了。还不止害一个人,而是害了一代人。实际也这样,我反复怎么说这两条都没有错,女儿也不信,她视老师为绝对权威,老师以标准答案为圣旨。女儿把她原来活跃、灵动的心收起来了。从她心里把那两个词赶出去了,她将接受别人给她的标准,来谨慎地使用词汇,她以后可能会像收音机一样地说话。那天,她按老师的要求把那错改了 10 遍。我那一刻心里只有一个词——残酷。

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

我不知道“挤眉弄眼”为什么只能算神态类的词,而就不能算是动作类的词,神态和动作清楚的界线在哪儿。我也想不通“意外的灾祸或事故”的意思只能是“三长两短”。我最想不通的是考学生这个有什么意义,把一个词归于神态,或把一个词归于动作,对他应用这个词有什么作用。除限制别人的想象外没一点儿好处。古语说“文无定法”,如果真有那么死的标准,谁能学会为“推敲”而推敲呢,诗人大概也不会再说“疑是银河落九天”这话了。

最奇怪的是,语文到这程度,女儿的作文反而越来越差。她的作文几乎成了一些儿童八股的翻版。我那曾写过“圆珠笔在纸上快乐地蹭痒”这样句子的女儿,开始为作文编造她的故事,她非常

熟悉表扬稿和思想汇报那类的文体。她的作文几乎是假话,假感想、假故事大全。她的同学几乎都写过扶老婆婆过街,给老师送伞,借同学橡皮那类的故事。她们快乐地共同编着一样的故事,然后套上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这样的格式,去到老师那儿领一个好分。她们老师说"天下文章一大抄,谁不抄谁是傻子"。(我在书店看到过《儿童作文经典》这类的书,摆了一架又一架,我不知道经典这词现在已经变得这么随便。这些书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你的写作能力,它向你提供些应付考试的,可以改头换面的模本。女儿说她们班的同学,写作文常找来相应的一篇,改个名字抄上去。)这类的书在我家附近的一间新华书店占了有几张柜台,买者踊跃。那些父母并不知道真写好作文的人,并不是看这些书看的。那天,我同时看到一个小女孩在柜台上认真地读《高老头》,问她为什么不买回家去读。她奇怪地看着我,说这样的书怎么可以买回家呢。我曾接触过一些大学生,他们看过的经典比我在"文革"当知青时还要少,他们不看巴尔扎克,也不看冯梦龙,他们不看金斯堡,也不看白居易。谈到希望,再也不敢想十几岁的人能写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样的句子来了。好像是文化提高了,好像是上学的儿童很多了,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模子里走出来的孩子。

"希望工程"是为了救助那些失学儿童的,而我发现很多上学的儿童他们极想失学。女儿说一想到作业就要发疯,她们厌恶把她们当做傻子来教。她们不想学那种一时有用(考试一时),一辈子没用的东西,她们讨厌那个把简单复杂化的教法。她们讨厌作业,讨厌考试,她们讨厌评分不公正和狭隘。她们厌学。

我也讨厌这样的学习法,我一直把家里深夜了还有一个在写作业的学生,当成是这个家庭的灾难(听朋友说,她高中的儿子,从没有 12 点前睡过觉,想想真可怕)。我真是对她的那些毫无意义

的作业深恶痛绝。我已经多次怂勇她不写那些东西,就是不写,那实在是对人的智力的污辱。

这是我在两年前写的一篇文章,现在女儿已经上初二了。她的作业量没有任何改变。我家住在六楼,她每天回家的脚步声非常沉重,我知道那声音一大部分来自那个书包。我曾经幻想过把一个快乐轻松的女儿放进家门,而把那个书包关在门外,但那样的日子从来没有一天来到过。很多有儿女还在上学的家长跟我说过,一家中最辛苦的是孩子,早上起得最早,晚上睡得最晚。但就是这样,别的科目我不敢说,就文学而言,我相信这些苦难的孩子们并没有学到什么。我的一个考上清华大学的外甥女,就基本没有写作能力,她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重点学校,她写作文就是为了应付考试,在她的文章中,我几乎从没有看到过真正的心里话。很多人已经把文学看成是一个附属的令人厌倦的东西了。这与使人生厌的语文教育是分不开的,我坚信如果按教科书中的方法来写作或欣赏文学作品。那将离文学越来越远。

□ 肖雪慧

教育与权利

——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50周年

一、教育:个人与文化之间“生动循环”的枢纽

人是依靠文化踏上成为人的道路。人降生伊始,带着与别的动物同样的生物本能,就生存能力而言丝毫不比其他动物优越,如果以身体的体质而论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不能自助与自卫的动物之一,尤其在未发育成熟的情况下,更是处处需要外力扶助。但与别的动物不同的是,人在生物本能之外还禀有多种潜能,这些潜能赋予人的自身状况以不确定性,人既可能因自身潜力处于沉睡状态而与兽类相差无几,也可能由于潜能的开启获得超越动物性生存状态的广阔发展可能性。人要使自己的生物本能成为人的生命力的表现,要摆脱软弱状态而能够自助,要开启潜能而得到发展,全都有赖于文化,或者更确切地说,有赖于文化与生物遗传特质之间的互动。人又是社会性动物,离开社会便不能生存,更不能成其为人。人要适应于社会生活,必须使自己完成社会化过程。任何人的社会化都依赖于接触文化、经由一定文化认同而实现。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

但是正如人的未完成性一样,文化作为人类生存方式也具有不确定性,并且只有处于运动过程才有生命力。文化的运动过程由文化的历史传承和文化的创造这两方面构成。在这个过程中,个人习得文化、受文化的影响,同时又可能参与文化的创造,因而个人兼有文化载体和潜在创造者的双重身份,而且,每个人的素质和活动又反过来影响着他们置身其中的那种文化的前途。文化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如德国教育家斯普朗格(1882—1963)所说,是一种“生动的循环”,这一循环的客观方面是文化的发展,主观方面是个人的形成。[①]然而无论是文化经由传承和创造而发展,还是使个人进入文化状态而成为人,都离不开一项关键性的人类活动——教育。

教育是人类文化的一种传递活动和催化活动。一方面,任何社会都要通过教育向个人传授一定价值观念、文化规则、生产技能和知识,把人引进文化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执行着文化传递的特殊功能。另一方面,各个时代又可以把新的时代需要和对未来的期望以及对人和世界的新认识灌注到教育中,通过教育形成人类文化的新因素,尤其重要的是通过教育可以培养出不仅承载文化而且有能力创造文化的个人,因而能不断增进文化积累。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又是文化的一种创新活动。由于这两方面的功能,教育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中介。

由于文化与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教育的文化功能同时也就是对人的意义。这种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教育是每个人生活的准备。通过向个人传递文化遗产,它帮助个人超越一己之囿去掌握前人的经验,分享人类世代积累的知识财富,获得独立生活的必要前提。另一方面,教育是形成人的素质使人成为人的必经之途。因为把人引入文化传统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个人实现生物遗传特质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唤起潜能,提高和革新自己受之于大自

然的禀赋的过程。经历这个过程,教育打开人性发展的道路,奠定人走向未来的基础。

对于教育的上述功能,至少是它的文化传承功能以及为个人适应社会生活作准备的功能,人类很早就意识到了。原始部落由有经验的人向下一代传授部落风俗、生活规则、劳动技能;希伯来人据说早在公元前715年就制订了学校计划,试图实施强迫义务教育,使每个儿童掌握法律规则,了解成年后要担负的责任和享有的权利;在希腊,梭伦法典规定双亲履行让子女受教育的职责;[②]中国还在象形文字时代就有学校存在,让统治集团的儿童学习阅读和书写并向他们传授规则、知识,一般家庭的儿童虽不能进学校,但也要由家长和周围的人教给他们有关劳动和行为准则的基本知识……

如果说人类早就注意到并且一直在努力实现的上述教育功能是教育活动的保守性方面,那么,教育的文化创造功能及其开发人性为个人发展奠基的功能则是变革性和解放性的。这后一方面功能也一直或多或少在发挥,否则就不会有文化的发展变迁和人的进化。只不过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或者没有为人们明确意识到而长期被忽略,或者由于某些社会原因而经常被压抑。但是随着近代人文主义运动的兴起,这一方面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到19世纪以后,把教育视为社会进步和人自身进化的主要手段已成为现代教育发展的趋向。关于这一点,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前主席埃德加·富尔在他提交的关于国际教育发展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教育是形成未来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可以说是对教育的完整功能及其19世纪以来教育发展走向的经典性表达。

二、受教育的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

教育的重要，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关于教育是“形成未来的主要因素”的见解也已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然而一些国家对这一见解的接受主要集中在教育对国家、社会前途的影响上。假如这样来提问：一个国家的教育处于匮乏状态，情况会怎么样？普遍的舆论总是立刻倾向于把关注焦点引向教育匮乏对国家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毋需进行专门研究便可列出许多：社会犯罪率高，人才资源缺乏，科技、经济落后或者发展缺乏后劲，国家无力接受现时代的各种挑战，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这类危机所具有的关于国家是否繁荣强盛的社会功利性质比较容易吸引人们注意力，我国近年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也主要集中在对这类或已显露出来或还处于隐伏状态的危机的忧虑上。然而教育匮乏对于人——作为国家强盛、社会进步的真实目的的人——意味着什么，对于人的一生意味着什么，则因其不那么具有社会功利性反倒常常被忽略。纵然，关系到国家、社会发展的功利性考虑是重要的，因为这是关系到人们生存发展不可少的前提。但是如果国家、社会对发展的关注不把人的命运作为一种具有超越自身目的的终极关怀，就极可能本末倒置地把人当作社会发展的单纯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取得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对人来说是福是祸也难以预料。因此，在考虑教育匮乏可能带来的种种后果时，必须在关注前述社会功利问题的同时又超越这一立场，回到作为社会终极目的的人身上，切实认识教育与人的生存发展的关系，认识教育作为个人生活的准备以及开发人性为未来奠基的极端重要性。

谈及于此，得先区分教育形式。事实上，教育包括非正规教育和学校正规教育两种。非正规教育是家长和其他亲近的成年人在生活过程中对儿童附带进行的、以传递生活及生产经验为基本内

容的教育。它通过口头传授、经验示范等简单方式来进行。人类早期教育主要是这种经验式教育。在社会流动小、社会习尚比较稳定、社会关系相对简单,生产技能和知识还不复杂且变化不明显的传统社会,这种方式也仍然很有效。但这种教育受个人经验和记忆的限制,它不能向下一代展示出历史上丰富的文化积累和广阔的人类生活场面。通过这种方式被引入文化的个体处在口头文化阶段,无法超越自己的生活范围去与更广泛的人类经验和智慧相接触。随着文化积累日益增加,人们的社会联系日益扩大和复杂,人的权利与义务也趋于复杂,社会生活赖以维持的规则远远超出口耳相传的传统习俗而提炼成为一些极具概括性的基本原则并通过较为详细、较为规范的成文法或其他规则体系来加以规定,生产技能更是日益超出经验性质而以对一定原理的理解为基础。这种情况下,经验传递式的教育便不能承担起使儿童将来能有效地应对社会生活的任务,更不能承担起为儿童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的任务。何况,经验传递完全受制于传授者的素质,现实生活大量事实提醒人们,如果家长或其他与儿童关系密切的成年人自身精神素质差,他们对儿童传授的"经验"很可能是反知识反道德的,或者说反文化的。这种经验传授将与教育的目的南辕北辙。学校是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和文化传播中心而出现的。如果学校具有充分独立性,一般说来,它体现着时代的文化发展水平,最大限度地掌握和积累着历代人们在认识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等方面所获得的知识;同时,学校作为专门的文化、教育机构,长期以来形成并发展着一些系统的方法,借助于这些方法可以在浩瀚的文化海洋中寻找和抽取出其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因素,使学生能够直接接触文化的精髓。知识内容和方法这两方面智力优势使学校教育有可能贯注着充分的理性精神。正因为如此,19 世纪以来学校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教育形式。在即将跨入 21 世纪之际谈教育对人生的影

响,当指通过学校来进行的正规教育。

任何人都置身于特定社会共同体的多种社会关系之中,要承担多种角色以及相应的种种责任,要遵守共同生活的若干规则,还要具备谋生和担负自身责任的能力。但是需要承担众多责任处理众多问题的人却具有任何别的动物都没有的特殊生物现象:任何人类个体在能够独立生存之前,要经过一定的发育时期,历经婴幼儿、童年、少年等若干阶段,生理上才能渐趋成熟,在成熟之前漫长的十几年中不能自立,需要家庭和社会的照顾。人类学家莫里斯把这称作“幼态持续”。[3]然而仅仅生理发育成熟并不能使个人作为一个能够承担自己社会角色和职责的社会成员有效地生活于社会之中,还必须在生理发育的同时在心理、知识、技能等方面作好准备。因此,人类个体的生理发育时期也应该是为成年后作为社会人而独立生活,独立履行职责的准备时期。这种准备必须通过教育来进行。首先,人们在儿童时代通过接受教育了解他们所处的社会共同体的传统习俗,宗教、道德及法律等规则,了解有关文明精神的基础知识,为文化认同准备条件;通过教育对社会关系、自己要担负的责任及基本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获得必要认识和一定程度的训练。这意味着,儿童接受教育,实际上是使自己的本能、冲动等受到文化的疏理,使自己的遗传特质受到文化的塑造,因而使自己受之于大自然的禀赋得以渗进精神文化因素而取得高于动物的表现形式;与此同时,儿童学习处理一些基本关系和履行一定职责,学习与人交往的能力,为将来成为有责任能力的人奠定基础。每个人正是通过这类学习和训练而完成自己的社会化并能够适应过社会生活的。对于现代社会的公民生活来说,上述准备更为重要,这是每个人得以表现良好的公民行为的基本条件。受教育过程中获得的其他知识和技能则是将来独立谋生的必要准备。因为,任何社会除了极少数人可以依靠祖辈福荫而勿需自己去谋

生以外，一无所能的人是很难生存的，尤其在知识密集化而且职业竞争异常激烈的现代社会更是如此。所以，无论是使儿童社会化还是使其获得独立生存手段，教育都是为儿童的未来准备基本生存条件。

人不仅要谋生存，而且要谋求发展；不仅要生活，而且要追求优质的生活。要实现这种高于生存的目标，更离不开教育。

对于人的发展和优质的生活来说，潜力的开启和尽可能充分实现、眼界的拓宽、精神世界和个性的丰富以及具有较广泛的选择机会和成功条件等，都是不可缺少的。人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获得知识、受到训练、掌握读写能力。学校的知识传授活动在人的精神上打开并且渐增与人类文化的接触点。读写能力使人走出口头视听文化的低级阶段，得以通过阅读超越个人有限生命的活动范围去接触和分享人类丰富的文化资源。这种接触和分享唤起人对更丰富更充实的生活的向往，使人进入美好而有益的体验，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当个人一旦获得精神的自由，便可以无止境地从人类文化积累中去寻找和汲取有益的因素来不断丰富和指导自己的内心。尤其是当人通过阅读进入广阔的精神世界后，可以去重温历史，了解多种文化，从中发现属于全人类的经验，理解把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纽带，认识到人类的共同命运。在世界日益一体化的进程中，这种对多种文化的广泛接触和对异质文化作同情理解的现代人气质，已成为健康个性的重要方面。学校的训练与自由的阅读还可以帮助个人形成一套认识、理解事物的合理的思维框架，帮助个人发展自己的判断力、反应力以及有效地组织自己的经验和综合大量信息的能力，确立起对世界的合理态度。这种能力和态度既是潜力发挥的条件也是形成良好个性的条件。总之，学校教育在以文化对个人进行熏陶时，也就在个人面前展开了无限广阔的人类精神活动的世界，为个人

打开了人性无限发展和深化的通道。

至于个人在获取知识和接受多种能力的系统训练过程中,潜力被唤醒了,才智得到了发展,这就使个人具备了成功地对世界作出反应的可能性以及发展自己更高适应能力的可能性,因而扩大了选择机会,奠定了将来在职业活动和其他活动中获得成功的基础。

可见,教育对个人一生的成败至为关键。

社会是个人生存发展的前提,但又并非什么外在于人的力量的产物或什么独立于人的存在,它就由个人构成。虽然在实践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总是被矛盾和冲突所困扰,但却有内在的统一性。这统一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个人与社会之间存在责任和义务的双向互动关系。由于个人成长的特殊性,这双向的责任、义务有着排序性。社会首先要对个人尽责,使个人获得必要能力,才有权要求个人对社会尽责。这一关系决定了,受教育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个人的这种权利也就是社会的义务。社会至少应该向每个未成年人提供最低限度的正规教育,让他们掌握将来履行各种基本职责参与社会生活所需的必要文化知识,并且在知识和智力上为将来正常生活和进一步受教育打下基础。现代心理学证明,大脑发育具有不可逆的特点。因此,儿童时期是心理成长,潜力开发和精神、智力发展的关键时期,耽误了这段时期的教育便永远无法弥补。

关于这一点,英国文学家笛福早在两百年前就以一种独特而震撼人心的方式提出了。1703年,当他因写作获罪入狱时,在致女王的一封信中这样谈到他的孩子:“七个孩子,如果我不能充实他们的钱包,至少也该让他们接受教育,充实他们的头脑。这笔债现在如果不还,以后就永远无法补救了。”[4]后来,圣西门更以一个触目惊心的典型事例——“阿韦龙野人”——为早年缺乏教育的后

果提供了有力证据。"阿韦龙野人"是一个长期流浪在法国南部森林地带无人照管的男孩,1799年被当地农民发现。尽管研究表明他具有并不劣于其他孩子的遗传禀赋,但无论怎样培训和训练,人性的基本特征和包括语言、理智在内的各种属于人的能力却再也无法形成。原因不仅在于他在发育时期与世隔绝,而且在于受教育的时间开始得太晚,发音和思维等器官长期没有得到利用,人的潜能被永远埋葬于童年期野兽般的生活状态中了。这个看似极端的事例实际上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完全缺乏教育,包括缺乏来自社会环境的非正规教育的真正后果:这个人类个体的一生停留在了"毛坯状态"而不能成长为个人。

包括"阿韦龙野人"在内的许多惨痛教训所显示的儿童期与整个一生的关系,表明个人不仅有受教育的权利,而且教育应从儿童期开始而不能延误。50年前,这一权利作为基本人权庄严载入了《世界人权宣言》。《宣言》第26条宣布:"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初级教育应属义务教育性质……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开放。"《宣言》所指初级教育正是应从幼儿开始的,对于智力、身体和个性的初期发展必不可少的最低度学校教育。它之所以属于基本人权,乃因为这是使人成为人的前提和走向未来的准备。

三、文盲:丧失了未来的人

如果说教育是为人的一生作准备,那么文盲,即没有得到受教育机会的人则在各方面都准备不足甚至完全缺乏准备。

首先,在现代生活条件下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文盲是不具备或者几乎不具备的。他们未能通过教育掌握作一个社会人所必要的文化知识,事实上处于文化传统之外,既不了解自己在社会生活中要担负的责任和必须掌握的行为准则,也不具备

对各种现象和问题的判断力。这种没有得到文化装备的蒙昧状态使他们主要受本能欲望支配。而在他们身上,本能欲望这种原始生命力从未经过精神的滋养、调和。往往具有不加节制不理会任何文明规范的性质,因此他们的行动很难达到规范要求,很难具备责任能力。特别应提出的是,每个人成年之前,在十四五岁前后要开始经历一个心理上的危险阶段——青春期。青少年在这个阶段上情感、欲求剧烈冲突,精神处于迷惘状态,需要家庭特别是学校的引导和关心才能安全渡过这段时期并对自我和世界达到一种比较成熟的认识。但是文盲直接从懵懂无知的状态进入燥动不安的青春期,完全得不到学校的引导,如果再加上家庭及社会环境的精神道德气氛恶劣(这个“如果”对于文盲所处的环境来说常常就是现实),他们只能在毫无帮助的情况下胡乱摸索或胡乱冲闯,不仅人格上不能成熟而且往往走入迷误,最终还不得不承受走入迷途的后果。

在谋生这个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上,文盲也缺乏准备。由于没有通过教育获得必要知识,除非先天禀赋特别优秀,文盲一般不具备职业能力,在职业竞争中没有择业的机会和前提,除了从事运用自身体力的非技术劳动,别无他途。自身劳动素质的不利状况其直接后果是,他们没有条件去获取物质好处因而大多生活在贫困中,而且几乎没有以自身能力改善处境的可能。

在精神发展上,停留于视听文化和口头文化阶段的文盲,没有条件去接触丰富的文化价值,他们既不具备文化认同的基础,因而难以溶入主流文化而成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成员,更缺乏对一切加以检查、过滤的智力上的活跃和精神上的自由,没有能力去审视、批判主流文化,因而更不可能成为蕴藏着极大创造力的文化异端。由于基本处于人类智慧和文化积累的进程之外,无法进入到一个较为广阔而自由的精神世界,视野狭小、智力迟钝、精神贫瘠、生命

力的表现贫乏，不可避免地成为文盲的基本特点。他们对整个文明的历史一无所知，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也一无所知，无法与其他人平等地分享文化资源；属于人的感觉和特性未能得到应有的开发，被关闭在各种丰富、有益的体验之外；没有较高的智力活动以及这种智力活动带来的高峰体验……总之，他们被置于文化与个人之间“生动的循环”之外了，不仅不可能对文化的发展有所贡献，而且由于潜力沉睡、人性贫弱因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个人的形成。

文盲在各方面都缺乏准备的状况，使他们在生活中一开始就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按说每个人在经历了发育时期的准备而步入成年以后，便是履行人生职责、展示自己实力和进一步发展的时期。但是没有通过教育为这一阶段作准备，文盲既不能有效地履行人生职责，更无实力可展示，也无进一步发展可言。他们无论从精神、人格还是物质、文化等方面都被排斥在发展之外，无法参与优质的生活，无法拥有一个丰满而有希望的未来。除了终身承受低劣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无力与他人平等分享文化资源以外，他们还要承受一种不公正：各项公民权对他们来说形同虚设。因为他们没有必要的知识和判断力去享受诸如选举与被选举权，思想、信仰、言论出版自由等基本权利。与种种不幸连带产生的还有法律问题。愚昧、屈辱、挫折、失败、贫穷、犯罪如形影相随。文盲处在社会边缘和生存线边缘，为无力感和绝望感所左右，容易产生仇恨心理和反社会倾向，他们的精神状态注定了他们的反抗方式往往是无理性的，伴随着暴力和犯罪，对己对人对社会都具极大破坏性。犯罪行为发生后，惩罚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任何社会要保持正常的生活条件都必须惩戒罪行。然而一个巨大的不公正却很少被法律考虑，尽管在较开明的社会可能会从伦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考虑到。这就是：同是破坏社会规范，受过教育的人与未受过教育

的人之间有一个重大区别:前者懂得避开的事情后者不懂,后者却并不能因此而减轻或免于惩罚。而且实际情况常常是:不利的社会处境使他们缺乏保护,往往受到更重的惩罚。结果,对于因无知而犯罪、而受惩罚的人来说,是使本来就很不利的处境更加恶劣。

总之,未受过教育的人的生活缺乏选择余地。要么安于不利处境,安于贫困,安于并不高出动物多少的生存条件,要么在无知、贫穷、犯罪、监狱的恶性循环中沉沦。无论在哪一情况下,他们都失去了未来。

四、消除文盲:我国最紧迫的社会任务

近代以来,世界文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文盲的生存状态却表明,他们在世界文明进程中不是一个掉队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有进入文明之中。这种文明发展进程加快与文盲生存状态的强烈反差使文盲越来越丧失谋生能力,更不用说谋求发展的希望。尽管现在谁也不会否认生存与发展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但是没有教育为人的一生作准备、为人的未来与发展奠基,遑论生存、遑论发展?缺乏教育的人不得不终其一身在贫困中挣扎,不得不在毫无改善境况希望的情况下度过一生。这种处于生存线边缘、既没有现在更没有未来的状况不能不说是对生存权、发展权的辛辣嘲讽。

一个国家,如果存在大批文盲,一方面大批人承受毫无希望的悲惨命运,另一方面是大量难以预料的社会危机。无论哪一方面,代价都极为惨重。当代不少人认为,文盲现象是最紧迫的社会罪恶性。这话不过分。其实对文盲现象的恶果人类并非近两百年才认识到。西欧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兴起过反文盲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如当时一幅油画的寓义所示,弗朗西斯一世打开朱比特教堂大门,使“盲人”(文盲)有接受光明的机会。19 世纪,欧美各国制

定了强迫义务教育法,发展起一套免费的初等教育体系。在19世纪末普及了义务教育,消灭了文盲阶层;本世纪中叶以来则更进一步向终身教育发展。我国也早在1909年由清政府在北京试行过强迫义务教育,1982年的宪法又规定了"普及初等义务教育",1986年通过的《义务教育法》更明确规定在全国实施九年义务教育。

应该说,我国义务教育在近几十年是有成效的。但由于缺乏财政上的有力保障,九年义务教育只在城市普及,在本来就是文盲聚居地的广大农村,儿童入学率很低,边远山区更是如此。教育欠债的结果是积成一支庞大的文盲半文盲队伍,而且这个队伍还在以每年数百万失学辍学儿童的速度递增。这种情况在近些年又由于下述原因而加剧。在一些人"把一切推向市场"的非理性鼓噪下以及弥漫于全社会的实利主义倾向的支配下,原本只适合在经济领域运作的市场经济规律超出自己的适用范围漫无节制地越界运行,甚至严重侵入非商业性、属于人的基本权利范畴的义务教育。许多公立学校把学生当财源,过去属象征性的而且可酌情免交的学杂费变成高额费用,这就在因财政拨款不足对普及义务教育造成的困难之上又增加了新的障碍。不仅农村贫困儿童失学辍学问题仍在,连原已普及义务教育的城市也因学杂费大增再加上名目繁多的摊派而面临名存实亡的危险。结果,原属无条件的、人人都应享受的受教育权利变成了需要用钱来换取因而也就只有一部分人可以享受到的权利。这种人为造成的社会不平等隐伏着导致社会分裂的巨大危险。因为,义务教育变成收费教育,对因交不起钱而被关闭在学校大门外的孩子来说,意味着判定他们被永远固定在不利地位上和一生的失败;意味着宣布一切光明、一切美好事物与他们无缘。相反,因无知而犯罪、受罚、被抛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却与他们结下不解之缘。大批文盲的存在在事实上使社会分裂为两个智力、处境、地位天壤之别的集团,彼此之间很难沟通;这种情

况再加上近年来日益严重的权力加巨富于数量上庞大的赤贫之间的对峙，已形成随时引发社会动荡或其他重大社会危机的结构性原因。

现今，人们已注意到文盲大批存在与社会动荡的关系，也日益看到文盲队伍已成为我国一个巨大犯罪源和种种不良行为的重要原因。但是，当人们因文盲而产生的社会问题气恼时，为了发生于文盲队伍中的堕落行为甚至骇人听闻的犯罪行为愤愤然时，不能不看到他们本身就是社会不公的不幸牺牲品。

杰斐逊在两百年前针对欧洲人对美国人曾经有过的野蛮生活的指责作过这样的回答："在被质问去表明我们的存在之前，要让我们进入存在状态。"这个回答震人心魄。但如今我国文盲的状态向社会发出的无声诘问更撼人心魄。别的不说，仅就这些年出现频度和强度空前高的爱国主义来说，倘以此号召于他们，他们的生存状态就在诘问："当我们因贫穷而被关闭在校门外时，当我们在那些过去还可以让穷孩子踏进去汲取知识的图书馆、博物馆外望馆兴叹时，当我们掏不起买路钱，连自己国土上的自然景物也被道道关卡阻隔而不能得见时，祖国在哪里?"这样的诘问，社会无以为答，也无由辩解。但它警示人们：消除文盲是最紧迫最重要的社会任务。根据《世界人权宣言》和我国宪法，目前至少有两件事刻不容缓。一是推进全民的、名副其实的九年义务教育，对《义务教育法》中关于"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以及为免除贫困家庭孩子入学的后顾之忧"国家设立助学金，帮助贫困学生就学"的神圣法规提供必要保障，以杜绝新文盲继续产生；二是实施扫盲。尽管人的大脑发育有不可逆性，但并未与世隔绝的低文化者仍有一定可塑性，通过扫盲这种补偿教育可以或多或少矫正因社会的失职而对这部人造成的不利。

人的生命短暂而无重复性，要有尊严有意义地渡过一生，教育

是一切基础的基础。

注:

①参见《现代教育思想精粹》第170~171页。

②参见(美)佛罗斯特著《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华夏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曹孚、腾水春等编《外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③参见莫里斯《裸猿》,百花文艺出版社中译本,第22~24页。

④转引自鲁宾斯坦《从莎士比亚到奥斯丁》,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第320页。

□ 张民生　陈尚君　徐梅　钟山　孙联
陈力宇　柳泽泉　项小仙

语文很重要

——语文教学讨论的热门话题

语文学科不仅是工具学科，而且对形成一个人的品格、培养一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今后终身教育的能力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所以我们今天集合在一起，指点语文教学，"激扬文字"，我想是有价值的。我们集合着语文教育界的同志，集合着家长、作家和同学，我们以一种共同的信念去推进语文教学的改革，对时代负责，对下一代负责。

教育的对象是学生，我们的教育是以学生发展为本，这是当前课程教材改革中必须树立的一个主题思想。我们所有学科教育的改革，都必须以学生发展为本。既然以学生发展为本，那么我们衡量教学改革成功与否的价值标准是：学生通过学习，兴趣是增长了还是减弱了，学生的能力是更强了还是尚未达到我们的目标。这比我们的考试和阶段性的评判更具有本质的意义与价值。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反映说对语文没有兴趣，这是很值得我们去严肃思考的。学生对自身某方面的发展没有愿望，那他怎么发展？学生对自身的发展有需求、有愿望，我们才能授之以知识和能力。兴趣是需求的第一步。要激发学习兴趣，很重要的是怎么去引导，给学生

以空间和时间,给教师以空间和时间,要加强课外阅读,推动课外阅读,这是语文教改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整个中小学生的教材改革是个系统工程,而语文教改则是一个子系统,但它不是物理学上的封闭系统,因为它与其他学科互有关联,有时也会触类旁通。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相比,无疑具有“中心”位置。因此我动员诸位,要把语文学科作为系统工程来全面地加以分析和研究,不单单是考试,不单单是教材,也不单单是教学,而是把这些方面联系起来,统筹研究,整体把握语文教学的总体改革。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什么事情最重要?教师最重要!即使是目前的状况下,也不是每个教师、每个学校的语文教学都是死气沉沉的,现在仍然有着改革的空间与时间,一些好教师,富有改革意识的教师正在进行教育教学的改革实践并取得不少成果。在进行宏观的改革实践与推进的时候,我们第一线教师具体改革的工作不能停步,而且应该大胆解放思想,大踏步地进行。在考试制度改革、教材改革、教学教改中,最富有生命力的、最具有独立性和创造性的是教学改革。在改革思想指引下,宏观与微观的改革要同时进行。

希望我们共同努力,以今天的研讨会为起点,共同去探索语文教学的改革。

让学生学会用自己的眼光去读书

复旦大学已连续3年招收文科基地班学生,办班的目的是培养文史哲方面的杰出人才,以作今后的骨干师资。初试语、数、外三门,均笔试,三分之一进入复试,以1:2比例差额录取。复试为面试,由文史哲三系七八名教师负责,主要考察学生的知识面和读书感觉。应该说,各中学推荐的都是尖子,经过严格的初试已作了

一番选择，但在面试中我们感到满意的优秀学生并不多，一般不超过 10 名。比较明显的情况是，学生在课程以外的阅读量太少，知识面仅限于规定的范围中，稍微超过一些就茫然无知。我们的提问采用随机的方式，包括古今中外、文史哲各方面，问得较多的程式是：你对文史哲哪方面更有兴趣？在有兴趣的方面看过哪些书，可否举你有兴趣或印象较深的一种谈谈看法？对回答较好的同学再穷追深问，看有多少潜力；对回答欠妥的，则逐渐浅出或改变话题，以看他有无别的所长。我们普遍感到，中学语文教育似乎过多地讲究作文技巧、字义辨析等方面，而对学生的课外阅读没有有效的鼓励和督促，同学知识面太窄，对许多在中学期间应该接触的中外文学名著接触太少，有的甚至全然不知，全无了解的兴趣，这对进一步深造是很不利的。

另一个感觉是，不少同学不会用自己的眼光去读书。问到对某一篇作品的感受，只会用语文老师所告诉的“通过……反映……表现……之类程式化归纳，缺乏自己独立的见解，缺少读书的感觉。文学是丰富多彩的，中外文学名著的不朽，就在于丰富而复杂的内涵。一百个人读《红楼梦》应该有一百种不同的感受。中学语文教育在强调语文规范的同时，也应突出体现文学不同于数、理、化公式结论的单一化、非此即彼的刻板模式，向同学说明文学如同生活一样地精彩，不要用单一的眼光看待一切，也不必要求同学对一篇作品都得出相同的结论。报上已讲得很多，从字义辨析、作文模式到名著理解，语文教育应鼓励学生有独到的体会和感受，千万不要像数学计算那样，只有这个数字才对，其他一律都错；只有老师讲授的主题才对，不出现某句话只能算错，等等。从中文教育来说，这样做是很不妥当的，甚至是荒唐的、误人子弟的。本系一些教师，在授课时最直接的体会是，在大学一年级中要彻底打破同学从中学带过来的单一思维模式，告诉他们要学好中文，首先就是要

学会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书,读出自己的感觉。

从我们最近几年的生源情况看,深感一些老牌重点中学语文教学质量在迅速滑坡,好几所市重点,我们给了较多的初试名额,或无一人进复试,或仅少数过关。唯一使我们感到惊喜的是上海市敬业中学。尽管我不知道这所中学用什么方式教学,但这次本校招办在看到一位同学家长的报送材料后,破例给了这所区重点中学3个名额,这3位女同学都通过了初试,在最后的录取成绩中,3位同学分占前3名。虽然已事过数月,3位同学的名字我都记得:陈洁的作文用笔老练而灵动,王晓青从容叙说对日本近现代作家和东欧各国作家的风格体会,虞翔对中外历史有着深切具体的了解。我们仅从三位同学身上,就看到了敬业中学的成功。

语文是"弹性"的艺术

拿来一篇文章,你能读懂它,理解它的大意。但一看试题,就只有瞠目结舌的份了。你能理解的它偏不考,就喜欢出一些冷僻的题目。

在考试时,还有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考卷上有些题目相当灵活,未必只能从一方面来加以分析,而批卷时又遵循按"点"给分原则,这样就引发出一系列问题:是否一定要以答案为准?不同于答案的回答一定是错的吗?我认为:语言是一门"弹性"艺术。同样一句话,对于不同时代背景、不同身份的人,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和影响,而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我们又怎能机械地认定只有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呢?倘若你能言之有理,又何尝不能是正确的呢?

应该让我们的孩子热爱母语

学生语文能力有所下降

我认为,目前的语文教育无论从教师、学生的能力角度还是文化角度来说,质量均有所下降。建国初期,初中毕业生的汉语水平远高于现在的高中或大学毕业生。据报纸登载,有的理工大学提出要设立语文课程对入学的学生进行母语再教育,这是宣布中小学12年母语教育的失败。

近年来随着电脑互联网络的惊人发展。很多非英语国家的有识之士已提出"保卫本国语言"这样一个沉重的命题。如果说近百年来人类社会工业化的发展是以牺牲生存环境为代价的话,我敢说,今后人类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必然是以牺牲人类文化为代价。如果再不采取有力措施改善语文教学,让我们的孩子热爱自己的母语,那么,汉语可能成为下个世纪中首当其冲的牺牲者。

造成目前语文教育现状的主要原因

一是政治和经济的原因。我国历史上是封建统治国家,建国以后又长期受极左思潮困扰,在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这一切必然作用于语文教育,使传授与学习的过程演化为绝对领导与绝对服从的过程,人文气息太少,学生的发展空间太少,语文教育已严重滞后于社会和经济发展。

二是认识上的原因。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观念的僵化在我国语文教学的教授、考评方面占统治地位。学生分析文章和写文

章成了练套路，背十几篇范文便能应付考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过五关斩六将跨入大学之门和走出大学校门的很多学子不能胜任简单文字工作的原因。

三是社会原因。语文教育改革是个多年老话题，学生、家长、老师、学校领导、政府部门人士都在呼吁改革，可是为什么这么难实行呢？很具决定性的一个原因是全社会的功利主义。学生要凭分数升学，教师要凭升学率评职称定待遇……现有的评判体系像天网一样罩住全社会。

语文教学如何改

一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目的与任务应重新定位。

语文教育与其他学科教育相比更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特点，应该以培养学生驾驭语言文字能力、提高文化兴趣及品位为目的。我主张三多一少，即让孩子多读、多说、多写，老师少讲。尤其是少讲词语解释、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等，语法知识点到为止即可。我的孩子念初二，我看了看他这几年的教科书，有些地方实在不敢恭维。如《凡卡》这一课，课本对“蘸”的解释是——“在液体、粉末或糊状的东西里沾一下就拿出来。”那么“沾”又作何解？课文里的一句是“蘸了蘸笔尖”，对于这样的大白话，初二学生会弄不懂吗？我们的教育应坚决地转到“用”这方面来。打一个比方，语文教学的任务是教会学生驾驶语言文字这辆汽车，让其掌握在各种道路上行驶的本领，是培养驾驶员。而不应花大量时间向学生解释汽车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它的各个零件是什么材料、什么形状、什么精度。否则折腾了12年，学生还是不会开车上路，还要让大学承担母语普及教育的责任，这显然是目标任务定错了位。

二是重新制定评判方法和标准。作为一项必须学习的内容，

考核评判是不可少的,问题是考什么,如何评判。语文教育的评判必须从破除唯一性标准开始,应该建立起“不错就可能正确”、“讲得通就是准确”、“言之成理即予认可”、“有创意才是优秀”这样一种评判观念和方法,给学生一片能够充分生长的土壤。

三是调整课程教材设置和改进教学方法。中小学教育共12年,应针对学生生长的不同阶段定不同的目标,课程设置内容应各有侧重。小学是打基础的阶段,应抓好实用性强的基础教育。学好普通话,会写毛笔字,会查工具书,对于经典作品应有较多的背诵量。初中是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学生的思维已非常活跃,接受外部事物非常敏锐,但又尚未思维定型。这阶段最忌讳老师用自己的套子套住学生,应该让学生在阅读中感受,在比较中品味。高中是12年语文教育的最后阶段,课文应加大时间跨度和地域宽度,以丰富学生的思想和文化积累。要加大文言文和哲理性作品的比重,同时要培养学生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能力,让学生学会多种应用文体的写作。

我想,如果我们的广大教育工作者每天想的不是我要灌输些什么给学生,而是我将如何让学生固有的天分充分发挥出来的话,那么,便会产生无数美妙的办法。

教育与科技是一个国家的持续发展之源,而教育是源中之源,真心希望这次有关语文教学改革的讨论能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对语文,有种与生俱来的喜爱。正因为喜爱,所以很小就做过“作家梦”,自我感觉良好地以为对“文学”还有那么点悟性。可语文成绩却与我的年龄成反比,似乎越大越不会用母语了,进高中后有几次还为是否能“通过”语文考试而担心。

我喜欢写文章，也喜欢读别人的文章，读到好文章，那种灵魂深处产生的悸动和共鸣，往往会使我有一种净化心灵的感觉。可是自从开始写议论文，那种味道就全都走样了。开始，我总是想寻求一点“个人文学风格”，使之尽可能地接近真实，贴近自我。可是无奈40分的作文却只能徘徊在22分上下。于是恍然醒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于是终究不得不“浪子回头”，回到条条框框，一、二、三、很快，作文分数就升到30分。

学语文，难焉？易焉？这样的学法，是好？是坏？普通一学生的我无力判断。但是，如果人们看到的文章都是同一家族的“克隆”品，毫无新意和趣味，这样的结局该不会是人们所乐意的吧！

学了12年语文，困惑却越来越多

作为一名文科大学生，喜爱文学是不容置疑的。但回顾刚刚走过的七年中学生活，在语文学习方面的困惑却实在不少。

首先是教材选编上的困惑。每个人都说我们是21世纪的一代，我们的课程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比如电脑。可我们的语文教材中现代文的范文大部分是四五十年代的作品。不可否认，好的文章是跨越时代的，是与人心灵直接相通的。可如果满屋子全都是旧东西，对于一个正是十几岁年龄的小孩子来说，未免有些太没劲了。引不起学生的兴趣，再好的文章读得也不用心，只是应付考试而已。

其次是课文讲读上的困惑，何谓“白话文”？明白如话也。明白如话的文章，还需要什么解释吗？当年鲁迅、胡适等前辈目光深远地提倡“白话文”，要是知道我们后代依然死抱课本，字字分析，呈新八股之势，恐怕是要哭笑不得的。

作为学生，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作者为什么要用这个词，为什么不用其他词？用另一个词好不好？面对它，学生第一反应

就是用另一个词不好,因为不是原作中有的词。再问他为什么?他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其实真的要改一个与原作不同的词又有何不可呢?文学的魅力之一就在于不同个性的作者面对同一题材会有不同的感受和不同的漂亮文字。

鲁迅先生喜欢“开门见山”,只因为他是鲁迅,这是鲁迅的风格。换了其他名家,也许就会峰回路转。不为什么,也没什么道理可讲。把时间留下来给学生多看看书,开拓一下视野,倒是真正能让学生体会到鲁迅老先生文字之犀利、品格之高尚的办法。

在我看来,语文教育主要应抓两点。

一是应用文的掌握。现在的考试作文以散文为主,但其实社会并不需要太多的作家,不需要太多的漂亮文章。尤其对于迈向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也许掌握各类实用的应用文体,能把文章写得流畅明白、简练完整,才是最重要的。

二是加强古文,尤其是古典诗词的教学。古典文学是中国独有的国粹,代表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情趣,也是全球华人的文化之根。在如今这个个性越来越模糊的网络时代,作为21世纪的中国人应该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更应该有独特的深厚的民族文化之根。

该是返朴归真的时候了

目前中小学语文教学的问题确实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有些问题我们语文教师明知道是问题,但不能不做,或违心地在做。比如说把语文课的工具性简单化、程式化,把生动的语文教学变成枯燥的纯技术训练。正因为高考的阅读分析题有是非题、选择题、填充题,我们不能不加以训练。高三的语文会考、高考模拟卷、综合练习卷有几十份,不做就不放心。不这样训练就感到对不起学生,对不起学生家长。如果说学生学业负担重,其实老师的精神负担、教学负担何尝不重!

由于当前语文教学问题的形成"非一日之寒",而且目前也不可能有"一贴灵"之类的妙方良药。我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疗治":

一、社会各界都能关心一下语文教育改革的讨论。目前这场"语文大讨论"是由《北京文学》而不是哪一家语文杂志引起的,文章发表后是由《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整版转载而不是哪一家教育报刊转载的。这说明教育界、语文界之外的社会人士首先敏感地强烈地呼吁语文教学非改革不可!语文教育,因其学科本身的特点,历来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这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如此。因为,母语教学离人们的生活最近,教学状况如何,会直接反映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来。

但是我认为,目前社会上对于母语和文科的轻视仍比较严重,或者说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已直接影响到中学的语文教育。一是反映在从50—60年代起的独重自然科学教育、贬低文科教育的影响依然存在,我国文科大学生的比例过低。二是由于不重视母语,大中学生的语文水平令人担忧。1995年某理工大学对该校3511名新入学的专科、本科、硕士和博士生作了一次中国语文水平测试。测试结果,总平均分仅为63.9分,其中,硕士生和博士生均不及格。三是社会招聘过于突出外语,母语几乎没有什么地位。这给青年学生造成只要学好外语,母语好不好无所谓的误导。专家预言:21世纪汉语将大行于世界。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给母语以应有的地位,这行吗?

二、语文,到底该怎么教?我认为要返朴归真。所谓返朴归真,首先是夯实基础,培养习惯。其次是注重应用,强调实践。最后是激发兴趣,引导得法。

语文教改应从教材做起

语文教改从何入手？我以为首先应从教材入手。以我们浙江省初中语文教材为例，我以为至少有两个弊端：一是古典文学偏难，二是汉语知识“弄玄”。

一、古典文学难在何处？

教材篇幅长，生字多，深奥难懂，是其一难。

整套教材设计的古汉语知识的练习，不仅有通假字、古今异义词、一词多义、词类活用(使动、意动用法)、省略句，还有介宾短语用法、判断句、提宾句、语气等十多个知识点，如此繁杂，是其二难。

教材中不少知识点属于超前的渗透，古文常识涉及之深广，学生望而却步，这是三难。

二、语法怎样“弄玄”？

全套教材由 35 个系列组成较为完整的语法体系，但却有烦琐之嫌。比如，五、六两册列举的病例就达 120 多个。如此浩繁，学生并非多多益善，反而越学越混乱，越迷糊。

我以为初中学生学点语法是必要的，但如果把属于语言学家们研究范畴的深层次的语法知识推销给学生，未免有故弄玄虚之嫌。

众所周知，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如此“玄”的语法知识，除了应付考试，还有何用处？

因此，笔者以为：语文教改，应从教材改起。



第五辑

语文，民族文化的根



□虞　翔　陈　洁　王晓青

我们这样学语文

课外阅读是金钥匙

兴趣是学习的最大动力。

有人说，语文是枯燥而又乏味的一门学科。尤其是作文，更是头痛之中的头痛。但是，注定的，语文将是陪伴我们12年的课程。置之于死地而后生般的苦中作乐也罢，机械操作也好，十年磨一剑，我们总归要想办法让自己学得愉快、轻松且又皆大欢喜，这样才能免受“煎熬”。

还算是幸运，在我念小学时，那份自以为是的伶牙俐齿让我爱上了朗诵，而朗诵又是同语文紧密相联的。抑扬顿挫跌宕起伏之间，那优美动听的文章由唇齿启合而悠悠传出，第一次让我领略到文字的意韵。初始，真的只是因为文字的音韵而沉醉于语文课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再仅仅迷惑于文字的幻化，却更想理解文字背后的深厚内涵。所以，便更加用心用力用情地学习语文。薄薄的课本已经不够，我把我的目光移到了课外。进入初中后，我的课外书籍也不再是童话的一统天下。还算是不错的成绩，让我有心有闲按照自己的心性多读几卷所谓的“闲书”。开卷有益，古有明训。在刚开始我的课外阅读时，我并不知道这对我的正经学业会有何帮助，只是为了兴趣。可突然有一天，我发觉自己的笔下不再青

涩，已经有了些许棱角，些许圆润。原来书海畅游之后，已有了沉淀。一次次地揣测作者心意，一回回地和书中人物共甘苦，不知不觉中，已被名家风范所折服。语文，不再是单纯的一门工具学科，而是一份消遣—— 一份心爱的消遣。虽然，语文教学中还有那么多的缺陷，比如，至今我对鲁迅的文章还是敬而远之，因为鲁迅先生的文章每每都是考查的重点，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标点符号也不会放过。实是考怕了。记得老舍先生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考而不死是为神》，可见，一切的症结归根结底都与考试的形式与内容有关。至少，我这么认为。非常羡慕古希腊的教学方法，他们的考试或是演讲，或是作诗一首，那么大的发挥余地，当然能激发人们的无限潜力。可如今的我们，无可奈何地只能接受这种客观性的试题，我也常常迷失于这许多似是而非的选择题中，幸好作文总能"救我一命"。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语文试题逼着我们拼命揣摩出题者的用意所在。没有思辨，没有创造，一切都有标准。或许，诗词早已远离，经典名著也已束之高阁。想来，这些精致优雅的人文宝库都是尘满面、鬓如霜了。难道，我们真的能够容忍纵使相逢应不识？那是无法想像的。语文，教会我们的应是做人的准则，并以此修养每个人的性情，而不应该只剩下疲于应付的试题。

作为一名即将离开中学的毕业生，庆幸之余，还想说，千万不要把学语文当成畏途，既然现行教育制度无法立时改变，我们只能随遇而安。只有寓教于乐，才能真正有所收获。而课外阅读，正是这样一把金钥匙：开启了它，也许，你就能看到一片不同的天地。

经历成长

在我小的时候，曾经也有过许多辉煌而灿烂的梦想。随着岁月的远逝，它们中有的已渐渐淡去，有的却已在我心中生根发芽，而且我相信，它们会在我的一生中蓬勃生长。

我不是一个文学神童,也没有3岁识字、5岁背唐诗的经历。而事实上,那时我令父母骄傲的是能背长长的乘法口诀,能做小学生的应用题。直到现在,爸爸还是固执地认为,“三岁看老”。我应该更适合从事理性与逻辑性更强的理科专业。

所幸的是,开通的父母从未强压过我什么。而我,也更愿像一颗自由的种子般随心所欲地长出个性的枝叶。在我想弹琴的时候就去学琴,想画画时就去学画,心血来潮时练上几个月的书法,或是背一个相机满世界地跑……尽管时至今日,我除了一堆年代久远的奖状外依旧一无所长,但童年时的多彩经历让我明白了自然,明白了艺术,更明白了美。虽然那只是许多幼稚而模糊的概念,然而当我今日尽情纵游于书海,或是忘情于笔墨时,这些往事和细节常常会闪现出来,令我恍然。

日子就在我的年少无忧中飘过,似乎每一天都会有新鲜的事发生,而最快乐的莫过于读了书认了字后,就可以连蒙带猜地读高过我一倍的大书柜里码得齐齐的厚书。在那里,我又得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完全不同于我所经历过的天地——原来除了Mozart的浪漫,梵高的激情,大自然的鸟语花香以外,时空的交错、文化的沉淀竟可以如此博大精深,让人流连忘返。我驾过李白的轻舟,骑过义山的青鸟,朝发于白帝,一夜越过了巴山,犹留几分豪气,“绣口一口就是半个盛唐”。我傻傻地保存全套安徒生的绿封面童话,再从琼瑶的《紫贝壳》一直读到林燕妮的《粉红色枕头》,最后所有的色彩统统幻成了丹燕的《十二色彩虹》。我随三毛将千山万水走遍,连风声中也呼啸过烂漫的吟唱;转过身来又脚步踉跄地追随着苏格拉底、康德的足迹,多么想拉住他们的飘飘衣袂,再聆听理性的天籁……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一改善变而任性的毛病,对这些文字倾注了长久的热情,仅仅是一本《红楼梦》,我就反复读了十多遍!我相信,是所有这些文字改变了我。由于它们,我由一

个平凡的少年变得有梦，由一个淘气的女孩变得安静；由于它们，我的作文突然有了灵气，有了灵魂。

由于书本里的每一个精彩的故事，我的生命也从此变得更加精彩起来。小学三年级时我开始参加学校广播站的工作，一干就一直干到了成为上广《青春太阳》的记者。到初中我做了班长，一年后入主学生会，接下来是区学联。而高中对我来说是最丰富的3年：我做了学生会的主席；我负责了文学社，编起了校刊；我开始为杂志社采访，给报社写稿，然后再一路“拼杀”去考学记团……而我想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少年时那只顶天立地的书柜。我感谢它让我在少年时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阅读让我明智，让我积累，也让我思索。而当我将自身的思考付诸文字时，底蕴的不足又反过来促使我读得更多，记得更多。就在这周而复始的过程中，我由一个不更事的孩子，成为一名准大学生。

在今天，我把我的经历写下来，我无意说教或是炫耀些什么，我只是想告诉大家，长大的日子里，不要太看重自己的每一个分数、每一篇文章，文章背后的那一部分生命体验才是最最珍贵的。无论画画、摄影或是阅读，那都是我们的生命触角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这个世界的价值，认识这个世界上的自己的价值。而只有有了这样的积累，我们的笔下才会有生命的喷薄。

窗外还下着雨，然而我的心中却自有一片灿烂星空，在它的照耀之下，我向我的琴谱、画板、相机和大块头书本鞠躬，感谢它们让我的成长岁月从此春意盎然。

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

我记得那是个平常的冬夜，风夹杂着冷气透过政法学院雕花的旧窗格呼呼地吹进来，灯光更晃得斑斑驳驳，连同粗砺黑板上的几个日文大字，都带着落寞的沧桑，无论字迹还是意味。

迷迷蒙蒙中有恍如隔世的感觉，膝上的字典告诉我，黑板上的日文字是“理想”的意思。先生打开了杯子，氤氲暖暖地在冰冷的空气中弥漫开来，原本模糊的概念此时更加模糊起来，和雾气后面先生的脸一样隐隐约约。“我们是没有理想的一代”，教室的墙上分明地刻着一行小字。

依稀记得，“理想”是小学时最爱的作文题目，因为驾轻就熟，两节课的时间一半用来和同桌的小男生划“三八”线或是下五子棋，另一半则是千篇一律的开头：“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个画家……”14岁前我都在少年宫学画，对那些没有生命的苹果和贝多芬的石膏像有着莫名的兴趣，心目中的偶像是梵高，只是因为喜欢向日葵灿烂的生命。那时我最常做的是捧一叠画纸，一张张地赋予它们灵动的画面。老师拍拍我的头，说好好学，你长大了应该考美院。老师说这话时是我最有成就感的时候。

上了中学就很少做到这样的作文题了，关于理想也再没有人演讲般地滔滔不绝，偶尔谈及也只是不屑地撇撇嘴角。可能是觉得幼稚或者无聊，更多的还是思考后的茫然，然而心中的向往却始终默默倔强着。那时善变的我对画画已没了激情，连画太阳都懒惰得想用圆规，应付交差的作文却很受老师赏识，所以自以为有成为作家的天赋，热爱生命或厌俗的小小说写过很多很多，《红楼梦》和纳兰性德都成了我的理想，我把所有的时间都交给了我的书柜。最令自己感动的是初三毕业时，我对着又哭又笑的好友指天发誓，说将来我要为你们所有的人写一本书。没有想过其它，心中只是觉得，清清朗朗的空气中，化学元素、英语字母和三角函数以外，一群16岁女孩的友谊会是最动人的文字。

有一段日子最喜欢的花是蔚蓝花，据说那是浪漫主义遥远理想的象征，所以我开始向往西藏。想象中的西藏是喜马拉雅的雪，是雅鲁藏布的水，是布达拉宫辉煌的城墙，是大昭寺里缭绕的香

烟，是朝圣路上磕长头的信徒，是广袤草原上翱翔的鹰，也是所有尘世嘈杂后我所归宿的一方净土。有人说这是因为骨子里浪漫主义的根源，我笑笑，并不否认。也许我本就是个理想主义者，自然、纯朴、神秘和不设防统统是我的追求。

现在呢？现在我想当个记者，那样我就可以满世界地跑，过动荡而有激情的生活，为伸张正义而激扬文字。有任务的时候会敬业地挑灯夜战，偷懒了便借采访的名义轰轰烈烈地去追星；或者在没有战争的平淡日子里跑去索马里，带的不是旅游护照而是受政府保护的战地记者证，老的时候我会静下心来，想着许多许多年前的年少轻狂，写下曾经沧海、曾经桑田的一笔……

离开了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许多人活得心力交瘁，却只为和最初梦想无法相比的东西。所以，当生命还是年轻精彩时，可以回肠荡气地做许多不合规则但的确诱人的梦。铃响的时候，我把空无一字的作文纸倒扣在桌上，从容地走出教室。我原谅了自己的荒唐，因为复杂的心情已远远无法用异国的文字来表述。想着墙上那行刀刻小字，我突然意识到没有理想竟是因为理想太多欲近还远，当年教室里刻字的人早已离去，只有我重复走过思考的轨迹。

走出政法学院时天竟飘起了微雪，空气中夹杂着奇怪的北方的干燥味，有些贪婪地吸了一口，我突然想起，北京的清华也是我的一个理想。

学好语文并不难

对于语文学习的失败者来说，我或许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例子。初中时，我是个既胆小又懒惰的学生。上课回答老师提问时呆若木鸡，回家后又不肯认真琢磨课本。以至于每次发语文卷子时，总觉得有一种压抑的感觉。转机是在高中，我莫名其妙地喜欢上了

看书。当时并没有想到要提高语文水平,只是纯粹的爱好而已。我看的书很杂,主要凭自己的兴趣;也说不出最喜欢哪个作家,只是特别钟情于近、现代的中、长篇小说和欧美的诗歌。我读的不一定都是经典书籍,对于有些名著,自己觉得理解上还有一些差距。在看了一定量的书以后,我脑子里就有了一些感悟。我觉得这一点对提高我的语文水平帮助很大。起码,我做阅读分析题时对作品的理解比以前到位了,写作文时所表达的思想也比原来深刻了。语文能力的提高可能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得以实现的。想想当初如果拼着命做习题、看作文选,也许未必能有多大进步,因为这些东西只能教给你解题和作文的技巧,而不能提高你的文化修养。我就不相信一个学生在做了几十篇文章的阅读分析题后文学修养能突然提高,也不相信一个读作文选长大的学生日后写的文章会达到相当的水准。因为你学别人的,总免不了要比别人差一截。只有自己站得高了,看得多了,退而求其次,才能写出点像样的东西来。

而且,我觉得语文是最需要倾注感情的一门学科。作为一门语言,它是活的、有生命的;作为我们的母语,它是亲切的。因此,如果你用理科的方式冷静地支解、分析它是不大会成功的,你得把情感融入其中。每当读到一篇好作品,或写出一篇好文章时,我便会有一种莫名的快感。是这种快感促使我很用功地学习语文,而并不单单是为了一个好分数。而培养这种感情的最好途径,就是大量阅读你所感兴趣的书。

归根结底,我认为广泛的阅读对学好语文很重要。当然光读还不够,还得多动动脑子。我认为一定的文学功底再加上一定的理解能力,语文应该是可以学好的。像我这种以前语文学得一塌糊涂的人,现在居然也能在这里写文章,可见学好语文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至于那些想在文学上有特殊造诣的同学,那就得有自

己独特的见解、深邃的思想和老到的文笔了。作为一般的中学生，只要记住，语文能力是看出来、想出来、写出来的，而不是像理科那样靠做题目做出来的。我想，这就够了。

要有点人情味

“无情未必真豪杰”，鲁迅如是说。这是70年前的箴言，流传至今而不被磨灭，定有可取之处。世纪末忙碌的生活节奏，常使人情变得淡漠，而淡漠之后，人们却不禁想起那份最古朴的感情——呼唤着“人情味”的归来。

科技革命一次一次地把人类推向文明。无可否认，现代而进步的机器电子文明使我们的生活愈加地舒适与便捷。有了电脑，不出家门而知天下事已不是神话。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失去了一次又一次的和他人交流沟通的机会。有了E—mail，有了特快专递，有了可视电话，世上已不复飞鸿与尺素的浪漫和温馨，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步步地扩大，扩大到已不是“一米线”礼貌的范畴。诚然，朱光潜先生告诉我们：距离产生美感。但，太过遥远，一切都不在视线内，一片空茫，何来美感？幢幢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新式公寓的封闭性，把芸芸众生划定在一定的范围，看似宽大舒适，其实，却失去了许多与旁人交流的机会。天天与邻居擦肩而过，却不知互相姓名，乃至当遭遇灾难如失窃、失火却因相互不熟而置若罔闻。人情淡漠至此，这所谓的“家”不过是些新一代的“鸽子笼”，不似四合院的温情，不如弄堂的亲切。

人，生来需要友谊，需要关怀，需要慰藉，需要交流，需要宣泄。物质文明并不代表一切。德莱塞的《欲望三部曲》早就揭示了人情淡漠与物欲横流的美国社会渐渐泯灭的过程。甚至是19世纪的巴尔扎克，也替我们描摹出一幅金钱维系一切人际关系的画面。我无法想象，我们真的会存活于艾略特笔下的《荒原》，也不想成为

加缪笔下的《局外人》。一切的人都带着面具:领导严肃,下级恭敬,邻居不识,兄弟不亲,朋友无谊……难道,真的让我忘记你的脸,只因人情好似云烟?幸好,现实还存一些温情。欧·亨利的《最后一片树叶》告诉了我们什么叫相濡以沫,而一个个文明小区的涌现,希望工程的浩大影响,以及中华骨髓库的建立……这一切,预示着“人情”的回归。

并不是只有田园阡陌、男耕女织才是人情的表现,现代的城市,虽然是由钢筋水泥堆筑成的,但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那么,人情就离我们不再遥远。

□ 韩星孩

我 与 语 文

一、我接受的语文教育

1971年，我出生于浙东一小山村。入学之前，我已认识亲人们和毛主席的名字，因为它们常被人叫在嘴里，写在墙上、生产队的记分册上、扁担上、信封上。我会写从一到十这十个汉字。我会唱《东方红》，每天早晨的有线广播都是以这首歌开始的。我会唱越剧《梁祝》中的“十八相送”一段。记得在入学前的一天下午，卧病在床的父亲在我的要求下又讲了一遍甘罗12岁拜相的故事后，他教我给宁波的亲戚写了一封信。当时识字的愿望很强，模糊的愿望是识字才会成为有本事的人才会做官，具体的有三个目的：一是能把我见到的每一样东西的名字写出来；二是能读出贴在村子里墙壁上的“打倒……”之类标语；三是想理解老太婆念的经文到底讲什么。

1978年至1982年我在有两个教师四个年级的村小就读。先是学aoe，这些字母让我觉得新鲜，学会了就可以与城里人也就是与电影、广播里的人一样科学地讲话。和上海糖、海军衫一样，普通话也是从大城市传来的，村里当过兵或经常去大城市的人的孩子叫父亲是叫爸爸，而我是叫爹的。以后，男人也不叫外场人、男子人，而是叫先生、老爷，女人也不叫内场人、老循人、内客人、堂

客，而是叫夫人、太太、女士。第一本语文书的扉页就是彩色的毛主席和华主席在高兴地聊天，我不知道他们在聊些什么，但他们的普通话肯定很标准。我看两位主席都还在上衣口袋上插着一枝钢笔，据说他们比我爷爷都还老，可看上去比我爷爷年轻多了，我好好学习，将来不像爷爷一辈子做农民，而应该像毛主席从农村到城里去，做一个工作同志，比如在供销社卖布，在医院打针。

拼音不难学，老师给每一个字母都编了一句歌，比如：张大嘴巴 aaa，小嘴圆圆 ooo，嘴巴扁扁 eee。再说，老师很漂亮，她比村里最好看的姑娘还要白嫩，很像城里人，所以，我当时最喜欢的人是她，有点看不起父母了，所以，对她的普通话也特别信任。

每一课都能学到新的词汇，看到新的图画。最喜欢的是“春天”，语文书上画的稻田和小燕子多么美啊，还有牛，跟生产队里的牛很像。从这幅画里我第一次感到了春天的美丽，我仿佛第一次闻到了春天的气息，从此，这世界上就有春天了。我很羡慕书里画的小孩，他们是真的花朵，而我们 9 位同年级的同学中，只有另外一个老师的女儿还有点像花朵，她与画上的小孩一样穿得很漂亮，尽管她常挂着鼻涕。

作文我很怕，它总是不能得满分，每一次写作文总觉得不踏实。幸亏我有一本作文选，每次抄那么一两句，有时也全抄上，凡全抄上的都会受到老师表扬。

比春天更美的应是“2000 年”，书上画着一个城里小男孩坐在火箭上飞向“2000”年。这个词意味着我不但将认得很多见过没见过的事物，还意味着我将拥有那已有的和将一定会有的东西。到那时，牛用不着犁田了，割稻与插秧都由书上画的那种机器来做，公路将一直造到家门口、山顶，东西都由拖拉机、卡车来拉，人都坐公共汽车，每人都有一辆自行车，大家都讲普通话，人们天天微笑。我们小孩子要努力学习，为实现“四化”而努力。我那时多么盼望

到2000年去生活，多么盼望它早一点到来啊！

五年级，我在乡中心小学读。那是个新建的学校，老师几十个，同学几百个，还有乒乓球桌、单杠、篮球场、国旗、高音喇叭、阅览室。同班同学也由8个（一个辍学了）变成50个，教我们班的老师由半个变成6个。其他都好，就是语文老师是个不会讲普通话的中年男子。我的毛笔字经常受到表扬，但我那篇1600字的作文却没受到表扬。那是一篇介绍新教学楼的作文，我一个教室一个教室仔细介绍过去，长得相当于我平时作文的四五倍，希望能被老师当范文念念，但只得了70分。

小学升初中考试，语文是78分，如果考了80分，那我就可以进重点中学了。从那时起，我开始害怕语文了，每一次语文考试总有点不踏实。但到中学后，我却更爱语文了，因为各门功课中数语文最有趣最丰富，加上我的语文老师又是个城里人，他说流利标准的普通话，他西装领带头发油，他会唱会跳会讲相声会做谜语会讲中外民间故事。与初中相比，小学语文仅是逗小孩子的，课文都那么短小，还老是配上插图，一点也不过瘾，而初中语文，我可以看懂两千多年前的孔子的话，我可以看到绍兴人鲁迅先生写的他小时候顽皮的故事。

从上中学的第一天起，我就按语文老师的要求开始记日记了。记日记的习惯，我就是从那一天开始的。现在翻看初中三年日记，一则珍惜我记下的那么多幼稚的想法，二则惊讶于我那时的记忆力和表达能力，我竟能把老师一节课讲的话，一场电影的详细故事，一次邻居家吵架的详细过程清楚地记下来。

在初中，我的语文成绩不是最好，但各门功课总分我总是数第一的多。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也不怎么鼓励我，只是叫我不要骄傲，一定要把中专或师范考上。但我想做童第周、鲁迅、茅以升、张海迪、甘罗、诸葛亮，我不想考中师，将来当小学老师。

我以优异的成绩上了高中，不过语文只考了72分。8年的读书让我觉得读书挺有意思也挺容易，再读二年就可以去读北京大学中文系，再过7年我就是个在北京、上海或国外的记者了。

可是，我变坏了。先是身体开始发育，让我吓了一大跳，然后开始强烈地单相思，我的日记也由叙事变成了抒情，由一天一页两页变成了一天半句话或十几页。我开始讨厌语文课了，我讨厌高中课文里的鲁迅，我认为真正的语文不在课本里，而是在《读者文摘》、《语文报》、《中学生阅读》、《随笔》、《诗歌报》里，在长篇小说里，在流行歌曲和电影里。当我第一次到校阅览室时我头晕了，我惊奇于这么多这么美的杂志，这些才是我喜欢和需要的，语文课本里很少有这么美的文字。从此，我的课外时间大多在阅览室里。我想，将来有钱我一定要订很多杂志。有一次，我用车费买了一本书，然后从县城走三十几里的路回家。

我也因此很快成为一个"不求上进"的坏学生，语文成绩有时全班第一有时全班最差，考得最差是因为我不喜欢的作文我一个字也不写，或写上几句打油诗。但我又不承认自己变坏了，我要与坏学生为伍，因为他们更有生活的能力，而我以前老是钻在书本里，生活得太少了。我要把弗洛伊德、萨特、卡夫卡、金观涛、屠格涅夫、川端康成、马尔克斯、北岛、徐志摩、金庸、席慕容、耶稣、佛陀、爱因斯坦、贝多芬、罗大佑、齐秦他们当作我的老师。不管上不上大学，我以后一定要当作家，会写诗会写小说会写哲学，以后的生活应该充满音乐、杂志和自由。

那时离2000年近多了，但我已不相信，把它当作国家的梦想和我童年的梦想，再说单是工业、农业、国际和科技的现代化也是不够的，我模糊地认识到，更紧迫更现实的应是工业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简单地说就是西化。我认识到自己的目的不在于独自一人离开农村去过并不合格的"城里生活"，而在于带领所有苦难的

农民进入城里生活——也不是已有的城里生活，而是要我们自己去重新创造的城市生活：富有、民主、有文艺修养。

我高考落榜了。我已不再是学生，11年的书和一腔爱国热血在乡村的阳光中显得多余，它们都在嘲讽我。我仿佛被谁重重地打了一顿，元气所存不多，也是在那时，我开始反省自己：如果我不变初衷，一直是个“好孩子”，那现在不是去教书就是去读大学了；但我不后悔，我终有一天会成为名作家，我感到我有这个潜质和毅力——因此，我在亲友的极度失望中和在乡邻的蔑视、嘲讽的目光中设计了许多自杀的办法而并没有实施。

但除了北大，我仍看不起别的大学，并且我自信能考上大学，又不屑于读大学，去复习班是因为在家里更无聊，也为了得到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以向乡邻证明我的能耐，但并不想去读大学。

复习班两年里，我已看不到高中时很多的西方文化，感到中国突然又沉闷了，有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的感觉。这两年我看了一些周作人、巴金、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的书，觉得自己阅读能力比以前强一点了，它们提供的美使我孤寂落魄的日子里有了些安慰，有了些向往。读着它们，有“找到了组织”的安全感，也觉得中国现代文学比当代文学美丽、有人性，更能鼓舞人、提高人。

1991年我进了浙师大历史系。第一志愿填师大是怕自己分数不高，以为师大取分低一些。填历史系是因为我对中文系不信任，我相信中文系不但培养不出优秀作家反而会扼杀有灵性的人，而历史知识对我的写作将非常有益。同时就我自己来说，我总喜欢把精力放在外行的事上去。比如李煜不认真当皇帝，整天搞艺术，明朝一个皇帝会做木工，这都让我喜欢，我也喜欢一个干农活的现代诗人，而不喜欢在作家协会上班的诗人。

我对大学有误解，原以为大学本科生应以自学为主，要研究问

题，要创造的，其实，读大学就是记笔记、背笔记和考笔记。这太令我失望。于是，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课外生活去：读喜欢读的书，喝酒聊天、唱摇滚乐、恋爱、点烛写诗、流浪实习、画画。钱不够用就去家要、做保姆、做舞厅售票员、做人体模特。我厌烦大学生活，常常想着退学。

一年级有古代汉语课，第一次考试我只得了28分，因为题目都是比较课文里的某篇与某篇的写作特色之类，而我根本不熟悉课文，空有文言阅读能力。图书馆里有大量文史哲艺书籍，参加文学社可以碰到高年级同学和外系教师，所以，我比高中期间更专业化地自学。

一个是视野开阔，到了大学我才知道海子，俨然一个兄弟、一个榜样，他的死亡简直是对我的鼓励，有找到领袖的感觉。

一个是阅读能力逐渐提高，到了大学才迷恋上高中时看不懂的《百年孤独》和《城堡》，前者像武侠小说一样好看，后者像音乐一样凄美、清晰。我发现马尔克斯是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老师。我发现卡夫卡像女性一样细腻、坚韧。我发现西川的老师是波德莱尔，《恶之花》非常高贵、圣洁，一种带有湿意的人性。我发现尼采主要不是疯子，而是一个很聪明很有才智很彻底很诚实的赤子。我发现鲁迅其实不古板，他很亲切，很幽默，他反传统，但他的底气与对西方文化阅读的眼光恰恰正来自于传统的核心部分，而当代人反传统已成为反文化本身了。我发现莎士比亚像卓别林像周星驰像契诃夫一样提供了活生生的生活。我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里的监狱有着天堂的品性，犯人有着天使的天真。我发现《尤利西斯》是教人静心的作品，教人理解从食堂到寝室的路是多么漫长。我发现《追忆似水年华》像生命历程中的感受的辞典，作者对生活越细腻地描写，作者自己就越虚幻，主人公经常出入的贵族沙龙如此摇摇欲坠，像一位行将消逝不复再有的时代贵

妇人。我发现《红楼梦》是言情小说。我发现安徒生的童话是诗歌和小说结合的典范,他像上帝一样仁慈、优美。人生如果错过这一切,将是多么可惜。我还发现中国当代文学非常繁荣,是创历史纪录的,滑坡的不是作者,而是读者,不是缺乏作品,而是缺乏阅读。许多人都说中国当代无大师无大作,我却认为莫言、苏童、韩少功、吕新、李杭育、海子、西川、于坚、俞心焦、钟鸣等是大师。莫言的《丰乳肥臀》的结构、风格和不少细节都是典型的马尔克斯式的,这未免令人失望,但形式上的失败掩盖不了它像大地一样丰润的饱满中国农民的世纪历史,我就像教徒读圣经一样地读它。其他作家在此不论。

一个是历史思考和个人职责更加明朗。中国的20世纪的各种变故是有着较强的必然性。人有命运,即你所处的各种事物的综合,国亦有道,长期的积淀和世界的动态存在,作为后人,只有哀叹,没有埋怨。而作为现实历史中的人,我的职责有两个:一个是继续建设自我的生命,在这个时代,文化在量上普及但在个体的质上有被稀释的可能,因此,能把自己培育成大师也是爱国的表现;另一个是尽自己微薄之力,根据我将来的职业特性,能够普及一些现代的法制、民主、艺术等意识,能够提高一小部分人的一点儿的素质是爱国的最具体的表现。

18年学生做下来,在语文方面,我自认为是异常成功的。前8年以课堂学习为主,后10年以自己阅读为主。前8年所习的最基础的语文知识和感受绝不能抹杀,记日记的习惯更是对我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因为日记记多了必然导致反省意识和个人历史意识确定。后10年的自修也是有基础的,高中同学中有几个出身书香人家,是他们给我最初的卡夫卡、马尔克思和贝多芬、安徒生,以及整个高中时期,相应的中国文化界的积极状态。大学的图书馆、电影院、各种专题讲座、几位热血师友都是我奋斗和学习的必要环

境。

具体地说，我对我的学生时代的语文教育回顾以后有以下几个认识：

1. 家庭和社区的人文环境很重要。农村缺乏文本文化，但并不缺乏文化。戏剧、对联、祭语、佛事、故事、谜语、聊天、吵架、影视歌、风俗、俗语、谚语，可以说比城市更丰富，如果老师加以研究并自觉地引导学生，对学生的学习兴趣、文化积淀都很有助益。

另外，如果每个乡镇都有图书馆，每个村都有阅览室，都将无形中提高民众的素质。而每个家庭都有书房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有些父母强压子女用心读书，但不给子女创造良好的家庭学习环境，结果可想而知。

2. 教材上，有趣味的东西欠多，无灵性的东西太多。教师对教材的处理上，有个性的太少，千篇一律教参云亦云的太多。要记的东西太多，自觉的语文活动太少。小学初中应改语文课为故事课、讲话课、书法课和古诗俗语课。不再设历史课和思想品德课。高中语文改为文化简史。大学的每一个系应仍把语文当作主课，因为许多作品都只有到大学才能基本上读懂，而以文学为核心的人文修养对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4. 废除作文课，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记日记。

5. 废除语文考试，废除传统的大学、高中招生制度，由各学校自拟招生办法，真正把学校放入文化教育市场。

以上各点认识基于“语文”应该培养有健康心灵和健全语文能力的国民，在各门功课中是最基础的，我相信，未来的基础科目是：语文、体育、外语和电子。以上认识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语文是感性的，而小学初中更应如此，而高中大学及大学后的自我教育中的语文是文化修养的核心。也是基于语文学习对学习习惯的依赖。

二、我当语文教师

如愿以偿，毕业后，我在一个像寺院一样安静美丽的海边学校教书，并且是职业中专，不像普通高中那样追求升学率。

但我当学生从适应到不适应，我当老师是否从不适应到适应呢？

我不大适应教材的选文，当代和古代的太少，有灵性和文化内涵的不够。这个可以处理，可以补充材料，可以把有些教材当反面材料，但这样不适应学生，更不适应同事和领导。我的学生喜欢我的幽默、亲切和丰富，但觉得我不像他们以前的语文老师，认为我上的不是正宗的语文课。我的同事上课基本以教参为依据，而我是以自己的认识为依据，他们重在知识点的落实，我重在学生感受和思维的培养，我试图让每一点语文知识都带有欢悦的气息，我试图让每一篇课文都使学生喜欢，让他们感到上面写的与他们自己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同事们说我"更适合给大学生上课"，领导说我上课不规范，"要注意"。

且看我对一些课文的处理。

上冰心的《笑》，我比较了冰心与我外婆、三毛与我妈妈。我外婆比冰心少 4 岁，可我外婆缠小脚（又讲了缠小脚始于李煜的善舞妃子宫娘，辛亥革命后渐渐消失），冰心的父亲是海军军官，曾参加过甲午海战，因此她的童年很健康，而我外婆的童年跟唐朝的乡下农家的女孩不同的就脚不同，其它应差不多，她未受过学校教育，后来冰心读大学，又留学美国，而我外婆一辈子未出过三门，我母亲也差不多，我姐姐只读过小学，她为了生男孩逃过计划生育，因此，我告诉同学们，冰心奶奶比我姐姐还年轻，还现代，我再告诉同学们，即使生活在现代社会，如果不接受良好的教育，那仍可能是一个古人。三毛和我母亲都生于 1942 年，三毛一直让我觉得是少

女,她的文章与人生都是幼稚的,而我母亲17岁嫁给我爹,20年后我父亲去世,留下4个孩子让她养,她为了养大我们又招进一个丈夫,然后又生了2个孩子,等我小弟20岁时,她将是65岁了。所以,阅读三毛远不如阅读我母亲获益多。

《笑》的主旨,教参上说是"抒发了作者追求美和'爱'的思想感情",我撇开了这一点,我说这是一个女大学生在一个雨夜里,孤独寂寞时的自我消遣之作,就像李清照《醉花阴重阳》里写的,无聊时看着蚊香一点一点燃去(瑞脑消金兽),拿自己与独自欣赏的黄花相比(人比黄花瘦),文章传递出的也是淡淡的伤感——伤感不是消极的,反而是高贵的,大多数艺术品都带有伤感气息,并且,文中的月光、雨夜都是积淀了人类很多伤感的意象,优美而阴郁。

《故乡的榕树》(黄河浪作),我讲了以下内容:

1. 故乡。故,旧也。故乡,即过去生活过的地方。说起"故乡",总让人有"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愁绪,总觉得那是个环境优美、温情脉脉的地方,而我并不喜欢我真实的故乡:脏乱、愚昧、冷漠,这使我想起鲁迅的《故乡》,那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者的粗糙,让人凉下心来的故乡。

按《圣经》上说,人的故乡是在伊甸园,人被驱逐出伊甸园就一直在异乡流浪,难怪《红楼梦》里说"错把异乡当故乡"。卡夫卡则认为,人是因缺乏耐心而离开了天堂,又是因为缺乏耐心而一直回不到天堂。人为什么被驱出伊甸园?因为吃了智慧果,有了智慧,有了文明的萌芽,因此,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还不是人,而是野兽。野兽是比人更像神仙。而植物又比动物更超脱,而最超脱的是无机物,因此,我们一直向往的神仙就是无机物。现代文明相对于封建文化可以说是兽性的部分恢复。

人们设计出天堂,并且说是我们曾经有的美好故乡,又是我们奋斗的目的地。人们都有对这儿不满,"生活在别处"的梦想,耶稣

的天堂、佛陀的西方极乐世界、道教的天上、莫尔的乌有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周作人的新村实验、毛泽东的“现代化”,都是属于这一情结,但幻想并不等于不影响现实,相反,为幻想而努力,正好组成了历史。我设计的天堂面积是 $4ikm^2(i=\sqrt{-1})$,希望同学们都来设计一个天堂。

2. 文中的榕树是在一个村庄的文化中心里,其它地方不知道,我们浙江农村里,每一个村庄也几乎都有一两株老樟树、老枫树。我再讲了风水、门前屋后植树的传统、农村的非文本文化。

3. 华侨的苦难历程和对中国抗日、改革开放的有力支持,包括讲到今年上半年的印尼华侨惨案(第一轮我没讲到,因为那还是1996年)。因此,尽管这篇文章的思乡之情又纯又浓,但不能代表华侨的普遍的思乡心理,它的普遍性在于对童年的怀恋,在于工业时代的人对乡野的怀恋,正如苏芮唱的《一样的月光》所显示的情感。

4. 写作手法上,修饰语的运用如给一幅素描填上细腻的色彩。我举了一个例子:

前面走来一个人。

前面走来一个女人。

前面走来一个老太婆。

前面走来一个满脸笑容的老太婆。

前面走来一个刚从镇上回来的满脸笑容的老太婆。

前面走来一个刚从镇上回来手里提着一篮红柿子的满脸笑容的老太婆。

《红楼梦》我是经常提到的,首先我告诉学生它不遥远,它就是一部写早恋的言情小说,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是早恋故事,因为朱丽叶死时还只有13岁。梁祝相恋时年龄不详,但是在读书时恋爱的,大不了。可见,早恋都没有好结果,同学们要把

精力放在学习上。每一阶段有每一阶段的中心任务，你们的中心任务就是学习，但不要认为对某个异性有好感是下流的。我支持异性间的交往，因为我在这么大时很向往异性，因为一个人的情感及其处理能力都要逐渐形成的，再说课文里也选了不少爱情故事，我们的文学和影视里更以爱情为中心的。我们不能撇开它，而应该探讨它。

我叫同学们先随便翻翻，不求甚解。我最初是从越剧《红楼梦》里知道故事梗概和宝黛形象的。但不识字的奶奶和识一些字的姑妈都反对我读《红楼梦》，她们认为这是一部没有好结果的书，人要看坏了，她们认为我从一个乖小孩变成一个爱留长发穿花衣服抽烟喝酒的问题少年就有《红楼梦》的罪责。现在想来，我有点惊讶于她们的深刻。我在高中时第一遍看它，印象最深的是贾瑞和林黛玉，最虚无和漫画化的是贾政和宝玉父子。贾瑞临死时手持风月宝鉴，他喜欢做的是他不应该做的，他应该做的又是他不喜欢做的。这种理智和情感的两难选择给我印象很深，使我开始体悟到人生和人性的局限。而林黛玉和我奶奶、普鲁斯特、鲁迅、晚年的杜甫一样，都患有肺病，都很善良，都很美丽，我觉得《红楼梦》中这么多人物数她最美丽也最亲切，像属于自己人，从此，我没有把她当作文字，而是当作与我有密切关系的一个美丽哀伤的亡灵。担心的是，我长得不帅，她将把我归入焦大行列。

后来经常翻阅它，逐渐惊异于林黛玉的诗才，像白居易一样的细腻，像李煜一样的哀婉，像海子一样的赤诚而脆弱。当南乡下雪了，我会翻到大观园的雪天。当南方桃花开了，我会翻到大观园的桃林和桃花诗会。

毕业后又认真通读一遍更发现，陈村写《鲜花和》并不是写日常生活的开创者，李杭育的《故事里有只兔子》比它早3年发表，张爱玲的作品比它早半个世纪，而《红楼梦》更是写日常生活的典范

之作，也因此，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辞典。我觉得它好像综合了鲁迅、巴金、卡夫卡、普鲁斯特和马尔克斯的思想和才华。

而从人物虚构的角度看，我进行了许多猜想。猜想一：林妹妹失恋后嗜酒成瘾，但零花钱每月有限，不够酒钱，她又爱面子不肯向人借钱、赊酒。她知宝玉必与表姐结婚，也算了，人总得活下去，所以心早已平静。宝玉结婚的日子，她一天天等着，不为别的，只为能免费地醉一次。结婚那天，她等着宝玉来请她去喝酒。但宝玉一则很忙，一则人们谣传他与林表妹的事，所以今后要避嫌，跟表妹毕竟是年轻无知时的一场美丽但脆弱的梦，跟表姐才是一辈子的生活。而林妹妹则想，叫我喝点酒这么点要求都不能满足，“宝玉，你好狠心哪”，气晕过去了，由于身边的丫头老妈们都去喝喜酒去了，没人去救她，一代才女不幸仙逝。猜想二：林妹妹并没有死，宝玉结婚后她流浪去了。10年后，宝玉因公事到了一县城，看见一个卖油条的妇女，背上背着一个小孩，地上爬着一个小孩，还在奶着一个小孩。宝玉之所以看到她是先看到她像算命先生一样挂起来的“宝玉油条”招牌。宝玉下轿过去，说：你这位大嫂怎么这么熟悉，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妇女早就注意到这位官人，听他这么一说更是脸色一变，但她马上又镇静下来，说：客官您看错了吧，天下相似的人多呢！宝玉也趁机回轿，回想年轻时的恋情恍如隔世残梦，他想：是曹雪芹给我的结局好呢，还是现实这样的好呢？他想到几百年后的韩星孩说过的一句话：不以悲剧结尾的爱情一般没名气，如果黛玉不仙逝，而是从俗而终，对宝玉来说才是真正的惨死。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保持高纯度的心灵还是得过且过，确实是一个矛盾，现实中有普遍的玉销香殒连同心性被污染。既然知道了两种选择都是不完美的，我也就将就一下了，至少还能安慰老祖宗他们，何况结婚是爱情的坟墓，如果表妹与我结婚，能保证她不变俗吗？俗又有何不好？我也不想搞清楚，反正我名气也闹

大了,他们自有自以为是的看法,我则难得糊涂算了。

总之,我处理教材有这么些思路。遥远的把它上亲切,复杂的把它上简单,无聊枯燥的把它上有趣,把自己的关于人生、文学、艺术、历史、社会的各种经历、感受随时粘合到课堂里来。追求个性和创造,每一课文的理解和讲解我都毫不拘于教参,而使学生主要不是面对知识,而是面对生命问题,以逐渐开发他们的审美能力、思维能力、法制意识、道德情操,特别是时时把他们引到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遗产上去,引到他们自己的生活中去。我的语文教育是大语文教育,有生活处都有语文,语文是学习各门功课的基础,又是陪伴人一生的修养核心。我也认为语文能力就是信息处理能力,但信息除了事务性信息,还有生命信息,而我更重视后者。

自然,我的作文教育也有特色。第一届学生我让他们写的有:《爷爷小住》、《我初中这三年》、《中专两个月》、《农忙假九天》、《我的寒假》、《我的妈妈》等,目的是让他们有话可说,并且注意对亲人历史的关注和对自我历史和现实的反省。我教他们写作文的第一句话就是:写作文就是随便写,乱写,别想着人家怎么写,自己以前怎么写,就像说话,把话说得条理清楚、信息准确,能够字句优雅、生动自然、幽默有趣则是更好。第二届学生,我基本上不做命题作文了,一个是每节课开始时演讲,一个是每周交一篇周记。改周记我首先是改错别字,发现错别字有在河里摸到鱼的感觉——我发现很多老师不大改错别字,特别是改差生的作文。评语则是与学生的单独对话。有许多学生不会写作文,但周记写得自然、朴素、真诚。

但我这样做也有压力。比如考试就出一道作文,并且规定写6段,每一段的内容我都有限制,结果学校说我不规范,考不出学生水平,有人私下说我外行,说我偷懒。我已得到鄞县教育局长的非正式的解聘警告,就与此有关,并且很有可能是对我正式解聘的

公开理由。

但好老师在学校里呆不住好像不是个别的,我真地很热爱中国,并且认为救国最根本的是通过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所以我也很热爱教育。《北京文学》掀起的反思中国语文教育的热潮说起来其实也就一两句话:问题很大,处理这问题难度很大,受牵制的因素太多。这些话,我也是早就想说的,所以,看到这些文章,我仿佛找到了我的教学实践的理论依据。同行们也都有组织地学了这些材料,普遍反映是:问题很清楚,但改变谈何容易,只能凭时间来改变,只能先凭良心来教书。我对改革开放以来的语文教育还是基本上肯定的,但问题又是明显的。就大局来说,我希望各相关部门,特别是中央的各相关部门,尽快、尽力地思考这一问题,亦即建设好新时代语文教育(其实不止语文教育)的基础设施:教材、考试制度等。而就各地方、各部门、各个人来说,可以利用政策的灵活性,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先行一步。我觉得,我的语文教育就是这样做的。

戊戌变法至今已逝百年,中国的现代化也已从被动、瞎子摸象阶段走过来了,未来的百年应是科学、民主、幸福的百年。我愿为此奉献毕生心血,但这样的环境使我不适应,使我有力无处使。我希望语文教育及其它环境的改善,以使大家的气力能凝聚成强大的整体。我不想适应现行的教育风格、教育内容和教育考核办法。

但是,我的学生毕业后的头等大事是就业是吃饭,而不是与古今中外的优秀灵魂取得联系,所以我说我的文学世界时只是希望他们能进入,但我又告诉他们:一个人也不会因文艺修养丰富而影响了就业机会,就业是一码子事,文艺修养是像空气一样的东西,更不可少。

我已经说清楚了一些问题了吗?我是独特的,但又不具有模仿和普及意义。我说出了我想说的,感受多,分析少,正如我跟学

生说的，不知道的就不说知道。

三、对网络时代的语文教学的猜想

写到第一章结尾的时候，一股北方强冷空气来到了我的学校，冬天已经来到了，而校报的文学版还正在研究秋天的景色和气质，而我的这篇文章也变得干燥起来。已经有两位同行看过上面的文字，他们说我写的不是论文，而是小说，我说，说它是小说不如说它是我关于语文生活的自传，因为这些不是我的虚构。但不妨虚构一下未来的语文生活，以达到避实就虚的目的。

虚构未来的几个起点是：

1. 北大一研究生问我：是否中国人都变成法国人就是一种进步？

2. 杂志上多次看到：几十年后，教室和校园都将消失，人们都在家里的电脑前学习。

3. 在中学教师的继续教育的课程中有现代技术课程，任课教师认为：未来的教室将是多媒体教室，并且这未来是几年后的事情。

4. 如果我在不久后有了孩子，我准备给他怎样的教育？

5. 时代在改变，我的就业有问题。

五个问题都是围绕着现代化这一主题。

第一个问题我是这样回答的：中国能有法国的民众素质及其相应的生活（包括政治生活）那是最好不过了，中国不会变成法国，但中国确实在分化，中国人中将有美国人、法国人、日本人和英国人，也将有黑人、印度人和印第安人。

当然，素质的不整齐是永恒的，而当这种不整齐到了较明显的状态时，我们再笼统谈教育就无效了，就像我们不能对小学生和大学生采取相同的教学手段。

接下来两个问题有点棘手，初见时不是让我狂呼，而是恐怖，因为科学宣言不再像读小学时一样，老是处于梦幻阶段，现在科学老是说得到就做得到，因此我没法想象未来的生活。也是北大那朋友安慰我说：网络没什么可怕，原始人发明石器也不亚于现代人发明网络。但所谓的多媒体教室是全封闭的，不像传统的教室那样自由，能见到窗外的花草，能听到窗外的鸟鸣，有风雨也有阳光。再说，我所见到的多媒体教育不是教育意识的现代化，而是用现代化的工具来上传统的课，真是“中体西用”。再说，孩子们已没有亲兄妹了，又没有具体的同学和老师，那太可怕了。所以，未来的校园生活将有巨大改变，但不会消失，尤其是对未成年人来说。还有，中国的落后地区连电脑也买不起，它们的未来比我们的未来要偏远一些。

现在的孩子比以前的孩子物质生活丰富，但连农村的孩子也离大自然越来越远，繁重的学习负担不是让他们太苦了就是让他们从小开始厌学、逃学。我如果有孩子，入学年龄之前不教他识字，让他在偏僻山村生长，适量地给他听些音乐、讲些故事，我会骗他，让一切存在物都具有生命，我不会告诉他世界的真实情况。可能的话，我不让我的孩子参加中小学一切考试，到入大学年龄，我让他自费读大学，也不必参加考试，就是在大学里生活上四五年。接下去他应该能独立生活了。

至于我自己，我可能当一个私塾先生，就像家庭教师之类，并且我相信，网络时代的家庭教育将是各种教育中占主导地位的。

冷空气已经过去了，我的心情也有所好转。我知道，我一方面会认真地去上好现实的每一堂课，另一方面，我相信革新我们的生活、社会风尚和语文教育已是大势所趋，急也急不来，愁也不用愁。在其职者谋其位，既不悲壮、也不无聊，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事。先烈们已流够了血，让我们能心平气和地工作在这改良的时代。

□王　丽　童庆炳

不要错过历史机遇

王丽：童庆炳先生，我想您已经看过1997年《北京文学》第11期和1998年第3期上的"世纪观察"中的几篇文章，对当前社会上有关语文教育改革的话题有所了解。您作为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又在北师大担任多年教学工作，对这个问题一定很有感想吧？

童庆炳：我看了你和几位同志的文章，觉得你们的文章提出了当前语文教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完全赞成你《手记》中的观点。我从1958年起留校在北师大教书一直到现在。我很早就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我们是师范大学，我在"文革"前、"文革"中和"文革"后每年都带学生去中学实习。80年代初我带学生实习的那所学校的教师有很多还是我大学时的同学。当时都是骨干教师。我和我的学生们都恭恭敬敬地听他们讲课。但听后很失望，觉得既不像文学课，也不像语言课，又不像政治课，整个一个大杂烩，四不像。而且完全是一种模式化，把一个活生生的有形象体系的、非常感人的文学作品给肢解了，学生听了味同嚼蜡。我后来也了解这些老师的苦衷，纯粹是为了应付高考，不得不讲成这样子。但我的学生们没有办法，还非得按着他们中学老师的指导来讲不可。

王丽：那您当时有没有想过用自己的观念去影响他们？

童庆炳：我当然试过啊。不过只是对个别的学生。比如说他

跟的那个指导老师不管了,好,那就我来管——我就乘隙而入了。我让学生按我的文学审美路子来讲课。比如初三课本上有一篇抒情散文,记得是老舍的《济南的冬天》,文字很优美、浅近、动人。我的一个女学生,她先用中学老师的那套模式讲了一遍,结果,学生一个个像小木偶似的,反应极为冷淡。后来我跟她一起分析失败的原因。我告诉她,这是一篇洋溢着细微情感的散文,审美性很强。我建议她重讲一遍,把这篇课文当做美育教材来讲。可以把散文分成由表到里三层。第一层是语音层,这篇散文虽不是诗,却有鲜明的节奏和优美的音韵,因此一定要朗诵好,因为音调本身对学生就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第二层是情景层,可通过师生对话的方式,让学生了解这篇散文写了什么景,又传达了什么情,情与景是如何交融在一起的,让学生领悟到其中的诗意;第三层是哲学意味层,要通过教师的启发,使学生从散文所描绘的情景世界中,去品味散文中更细微、更深刻的意味,不必作什么概括。那个学生就按照我的设计将课文重讲了一遍。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她用抑扬顿挫、充满情感的语调朗读这篇散文时,教室里突然安静下来,所有的学生都聚精会神地听她朗诵。可见,她的朗诵一下子就把学生带到作品所描述的美丽的艺术世界中去,使学生真正体会到这就是文学,品出了文学的味道。在这之后,学生一改原先小木偶的样子,纷纷举手发言,尽管他们说得不太好,但是他们有感受了。如果语文教育能朝这个路子一步步走下去,那么,学生的感受力就自然会慢慢提高。我后来很有感触,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语文教学和审美教育》,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

王丽:听您这么说,您是不是认为语文教育应该跟审美教育结合起来?我记得这个观点最早是王国维和蔡元培提出来的。他们都把美育作为教育的宗旨之一。

童庆炳:应该说,真正把审美教育提到这么高的角度去认识

的,是近代德国思想家、作家席勒。席勒针对工业化社会带来的人的单一化、片面化、残缺化,提出审美教育,以全面发展人的感性和理性。他认为感性的人只有经过审美教育变为审美的人,最终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面的人。王国维和蔡元培都是响应了他的学说。

王丽:一提到"审美教育"或"美育",有些人往往会以为就是帮助学生分辨美与丑,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童庆炳:我以为这仅仅是美育表层的任务。更深层次的美育是通过语文教学,培养学生敏锐的感知力、丰富的情感力、独特的想象力和深刻的理解力。这四者构成一个人的基本素质。而我们现在的学生在这四个方面都很不够,这样的人必然是缺乏创造力的。

王丽:您的这些见解和构想非常有价值,非常值得中学语文界思考和采纳。

童庆炳:我后来到处去讲,宣传我的观点。我在北京讲过,对象是全国各地来进修的中学教师,我就在那儿抨击现在语文教学的种种弊端,然后提出我的审美教育的构想。我还特地跑到天津去讲过几次。1997年我在北京教育学院讲时,是一批新教师,我就侧重从正面揭示。我认为文学作品是一种层次结构。这个说法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的是波兰现代美学家英伽登。他认为文学作品一共有五个层面,而不是像过去人们认为那样只有从内容到形式一种结构。第一个层面是语言层,第二个是语义层,第三个是视点层,第四个是表现的世界层,第五个是形而上性质层。比如说语言,不要孤立来讲,而应该侧重从语境来讲。语境是极为重要的。同样一个词,它本身是无所谓褒义或贬义的,如"闹"字,在一般情况下是中性的,但词组"闹肚子""闹事""闹鬼""闹别扭""闹人"……就都有点贬义了;而当你将它放在另一种组合中、语境中时,

如“红杏枝头春意闹”,这个“闹”字就变得富于诗意了,鲜活起来了。所以,有很多词语完全不必像现在的语文课那样去解释,不必规定得那样死,实际上放在语境中去理解,老师不讲,学生也就懂了。要讲就讲那些有双重或多重意味的词语。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真正培养学生的感知力、情感力、想象力,也才能培养学生掌握和运用语言的能力。

王丽:那您认为造成目前语文教学现状的根源在哪里呢?

童庆炳:目前整个语文教学的指导思想是完全过时了的,尤其是讲“主题思想——写作特点”这种模式,也就是内容与形式这种划分法的翻版。这种方法最早是从苏联搬过来的。苏联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那些文学理论和文学教学基本上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分析文学作品的。它将文学作品看成是一个主题,一个写作手法或叫写作特点。具体一点说,就是内容是主导的,形式从属于内容,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反映到语文教学上就成了主题思想和写作特点两大块。这两大块完全是游离的、没有关系的,好像写作特点是外面贴上去的。这当然很成问题。

王丽:这种划分法甚至也影响到作文教学。现在中学的作文,也包括高考作文评分,是把一篇作文分成四项:内容、语言、结构、书写来分别进行评分,而且每一项底下又分出“好、较好、中、较差、差”五个等级。

童庆炳:它把每一项都看成是一个孤立的东西,这怎么行呢?要是我是一位作文老师,我评分的标准可能是:作文的整体构思是不是有新意?是不是写出了真情实感?是不是富于想象力?所写的句子有没有不落旧套的?这几项只要有一项好,我就给高分。有可能整篇文字一般,但有一句鲜活的句子,比如“太阳甜甜的”,我会破例给高分,以表示对创造性的鼓励。总之,目前我们整个语文教育体系,根据我个人的了解,是由苏联专家在解放初到我国来

传授语文教学经验以后逐渐形成的。解放前根本不是这样,所以它跟我们传统的语文教学也是完全断裂的。记得当年苏联专家搞了个“红领巾教学法”,也叫“五段法”,并且在全国普及。反映在语文教学上,其实就是问答法,也就是按照“主题思想——写作特点”这个路子,把一篇课文分解成许多问题,支离破碎,跟作品内在形象毫无相关的问题。比如某一句话,本来只是叙述、传达某一个信息而已,但是他们为了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硬要生拉硬套地联系某一点,逼使学生回答出这一点来;上课时一个学生没答对,就再问一个,一直到有人答对——或者叫猜对了为止。有时甚至事先安排好让学生按这个路子来回答。用这样的教学法讲作品,就不是讲什么艺术形象,只要老师和学生对答如流,就算成功。我们当年上大学有两门课,一门叫语文教学法,一门叫文学教学法,都是按这套路子传授给我们的,其不合理和荒谬,我是到中年以后才醒悟过来。

王丽:真是害人匪浅呵,一直到今天还在害人呢。

童庆炳:不过,这种情形也曾经引起过不满。那是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而出现的,特别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时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认为语文课不像语文课,也不像语言课,不能照苏联专家这条路子走下去,于是搞了个实验,将语文教材分成两本,一本叫“文学”,一本叫“汉语”,但实验以失败告终。

王丽:为什么?

童庆炳:为什么?主要的原因还是认为冲淡了政治教育,没有突出政治。当然也有师资素质的原因,教师受自身水平限制,无法从文学的角度去理解分析一篇作品。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仍然认为语文是工具课。除了苏联专家之外,语言学家对语文教育介入太多,像张志公先生、吕叔湘先生这些语言学家,对中学语文教学影响非常大。结果造成这么一个现象:课文是文学作品,讲的时候

却要按照语言学的路子来讲，亦即按语法学、语音学、修辞学——也就是启功先生所说的“格朗马”（西洋语法）的角度来讲，把学生的用词造句都给规定得死死的。

王丽：您说得很有意思。您能举个例子吗？

童庆炳：我上大学时有一位汉语课老师。他是受人尊敬的老师，但他专门爱挑鲁迅文章的毛病，挑哪几个句子缺了什么成分，是病句，哪个句子用词不当等等，挑了一大堆。那是 1957 年以后的事，可没想到到了“文革”，说他诬蔑鲁迅，给他扣下帽子，成了“牛鬼蛇神”。

王丽：真是历史的嘲弄。可今天这种情况依然存在。我就曾经碰到过这种苦恼，课本中讲的语法修辞既枯燥无味，又很难说有什么真正的用处，跟文学更毫无关系，但你又不能不照本宣科，否则学生就无法对付考试。

童庆炳：是啊。它把一些有形象、有情感、有血肉的东西都放到他们那个框架里边，结果当然放不下，像胳膊腿一样伸到外边去，它就给你砍的砍，削的削，就跟削足适履一样。这是我说的第二个问题。还有第三个问题是教材问题。我认为教材应该选那些风流蕴藉的作品。“风流蕴藉”，这是我们古人对文学语言的要求。“风流”就是有诗意，“蕴藉”是指蕴含的内涵丰富深厚。它要求言外之意，景外之景，象外之象。这种风流蕴藉的篇章，语文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水平，不断地发掘，你有什么水平就讲到什么层次。现在中学语文教材里有些课文，语言本身不是文学语言，只不过是传达某种信息，缺乏信息外的意味，所以这里就有一个编选者的眼光问题。比如鲁迅的作品很多，为什么偏要选《“友邦惊诧”论》和《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些文章并不是鲁迅杂文中最好的，再说也不适合中学生学。我觉得选一个作家的作品，应该选他最好的。比如像李健吾，其实李健吾的文学评论非常精彩。他评钱

钟书的《围城》,虽然只有1000多字,但夹叙夹议,非常精彩,在《围城》评论方面还很少有人能够超过这1000多字的。如果要选李健吾的作品,那就应该选他的这篇评论而不应该选他的《雨中登泰山》。我们的名篇名作那么多,完全可以编出一本很好的教材来,关键是要有眼光,还有指导思想要改变。不能再依靠原来那一拨人,要换一批人,否则就没有希望。

王丽:这些问题,据说有关部门也觉察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已编出新的高一语文教材,但据参加审定工作的一位专家透露,指导思想上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童庆炳:这不奇怪。因为这些人很难打破自己原来的思维模式,还有他们的语言文学的功底就那么点儿,他就读过那么一些作品,你让他挑来挑去,还是一个篮子里的东西,怎么能有突破?我想说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当前中学语文教学跟大学文学课严重脱节。比如我们大学里讲文学理论、美学理论,这几年不断地吸收西方的东西,20年来有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但这些东西完全没有体现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我们师大的学生毕业后到中学去教书,不得不适应中学里那套陈旧的东西,感到无所适从。一些很有才华的人到中学里磨上几年就变得平庸了,还有一些人觉得中学里这样讲语文课,既没兴趣,又无意义,干脆就不教书,干别的去了。

王丽:这就造成优秀的人不当中学教师的可悲局面。

童庆炳:这种局面要是长期延续下去,就会造成一代又一代人素质的退化。现在教师队伍正处在更新换代的时期,年轻时接受苏联影响的教师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上来的是新一代骨干教师,靠他们推动改革是有可能的,如果教育部能够抓住这个历史机遇,那么,对子孙后代都是功德无量的事。

□ 孟繁华

中国的隐忧

无论是在公开还是私下的场合,我们都可以经常听到对中学教育的愤怒指责和抱怨,这些指责和抱怨已不是针对办学条件方面,也就是说,在大中城市,中学教育的基础条件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这是改革开放20年来中学教育方面最大的成绩。家长对中学教育的普遍不满,主要是针对教学思想和教学方式上,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与其他行业相比,中学教学思想和教育方式已经成为一个顽固不化的景观,它不仅没有前进,在某些方面甚至是严重倒退的。这一悲剧式的评价将会引起惯于夸夸其谈的某些方面的不满。但现实无情地告知我们,那些有关中学教育重大改革的承诺,竟像“戈多”一样迟迟不临,那些“成功”的经验也仅在传媒的报道中,而难以在教学实践中普通落实。

我不是专门从事中学教育的研究者,不可能全面了解中学教育的现状和它的未来。但作为一个中学生的家长,我深知自己的孩子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教育环境中。我常常将她的处境与自己“文革”前受到的中学教育相比较,让我沮丧的是,除了她的作业比我的中学时代成倍地增之外,我还没有发现中学教育有什么革命性的变化。中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已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但问题就是不能解决,没有人对这一现象负责。“素质教育”提出后已经有一段时间,但它仅仅流于一种口号或姿态,有的学校因此而添加

了“兴趣”课或课外活动小组,但在学业不减、课外作业依旧的情况下,它到底是增加了还是减轻了学生负担?“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是不错的,但如何把它变成可操作实行的,能在教学中普遍落实的具体方式,仍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些宏观思想的论证和落实是教育部门的事,于我作为一个学生家长来说,痛切感到的是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和心理是第一要义。中学教育是一个人接受教育的初始阶段,这一阶段对他们的人格和心理因素至关重要,一个人的“少年记忆”往往给人一生的影响,它是每个人最为长久的记忆。但遗憾的是,我们的中学教育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孩子是不断地以尊严作为代价支付的。教师对孩子尊严的剥夺诸如训斥、罚站、反复抄写课文、当众羞辱等等,几乎是平常的事情,没有人对这些“小事”提出异议,教师也不认为自己的作法有什么过分。但这些“小事”恰恰构成了孩子心理不断受挫的主要方面。有些孩子过于卑微,不敢当众表达自己,小小年纪就学会了谨慎从事,唯唯诺诺,瞻前顾后,他们甚至少有自己的想法。即便在自己家里,也不断重复老师是怎么说的,“老师说……”成了许多孩子的口头禅。难道这些孩子是真的认为老师说得正确吗?恐怕未必完全如此,这里面除了学生对老师的崇敬之外,是不是也含有对教师的恐惧症呢?

因此,要塑造孩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学校方面必须学会尊重孩子,教师必须学会维护孩子的自尊,以鼓励为主,以适当的批评方式纠正学生。学校的教育是培养人,是不断地使一个人成为更文明、有学识、有教养的人,而不是走出家庭就开始了不断遭受挫折、不断失败的心理经历。遗憾的是,我所接触到的中学生,他们普遍对教师没有好感,普遍感到压抑,他们盼望放假,盼望和同学在一起。我的孩子是个中学生,她往往过了放学时间才出

校门，问她为什么的时候，她说老师因为一个同学说话，就让全班同学背手坐着，什么时候一点声音也没有了，什么时候放学。这样背手坐着有时甚至20分钟后再让学生在走廊站好队放学。我怎么也不明白，这位老师为什么这样做？中学生好动的天性是不能改变的，这也正是他们的可爱之处，让学生像军队，像囚犯一样整齐划一真的有好处吗？学生的压抑感来自一种普遍的教育观念和方式，因此，这就涉及到：

第二，这种状况来源于恶性的循环。每一个人不是谁教会他生活的，而是他自己在生活中学会生活的。同样的道理，每一个中学教师不是谁教会他如何上课的，而是他在课堂上学会上课的。也就是说他的老师的教学方式、对待学生的态度，从根本上影响并使他学会了那套教学方法和对待学生的方式。可以说，中学教师从某种方面是中学生的一个缩影，他们在社会上受到其它方面的压力，谦恭而卑微，但面对学生时都充分地行使了权力，学生在这种权力的压抑下，也只能是卑微的。那么，当这些学生中以后也有人当了中学教师，他会不学习自己的老师吗？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社会的等级观念开始形成，小学、中学、大学教师，不同级别的领导，不同的职业，有了等级的区分，而不再是职业的区分。这种等级观念，使中学教师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低下的，这种地位难以树立起一个人内心的自信。一个处于各种权力和等级观念压抑下的人，是不能以正常的态度从事他的职业的。但从历史上来看，有许多文化大师都从事过中学工作，他们良好的修养和对教育事业的尊崇，使他们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我作为职业的文学研究工作者，除了熟悉叶圣陶先生的作品之外，我小学学习的语文课本就是他主持编写的。那些简洁、明快的课文至今仍给我深刻的印象。从另一个方面说，叶老先生并未因他曾是一个教师而影响了他的成就，甚至他的小学教师经历更加重了

人们对他的尊敬和怀念。当然，简单地指责中小学教师是不公正的，低下的社会地位并非是中小学教师自己造成的。这不仅与社会风气有关，同时也与国家在社会结构中对中小学教师地位作用的认识相关。所谓尊师重教，除了教师节那天大小传媒，各级领导关怀一下他们，我们还很难看到这种职业是如何被关注和重视的。

但这并不是作为教师的人不要求自己的全部理由。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一年的教师节，我的孩子所在班级的老师让每个学生做一个小礼物，一定是亲手做的，送给老师。这本是一件很好的活动，既强化了师生感情，又锻炼了孩子的动手能力。孩子回家后高高兴兴地，又极其认真地做了一件手工送给老师。但让孩子们感到震惊的是，他们第二天就在学校的垃圾箱里发现了他们全班送给老师的“礼物”，作为老师可能不经意地就把它扔掉了，但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他们还会认真地为老师做什么礼物吗？他们还会珍视他们与老师建立起来的感情吗？这些孩子之间议论纷纷，回到家里也十分委屈，他们显然感到了情感被亵渎。也就是这些小事，无形地影响着下一代。

第三，学校与家长的关系。过去，学校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家访”。老师每学期几乎都要到学生家里走一走，与家长沟通些情况，这是一个交流和对话的过程，不仅密切了学校和家长的感情，同时也使双方进一步了解了学生的情况和性格。但我的孩子老师从来没有过一次家访，她所在的学校还是北京市的区重点。学校只是每年开一次家长例会，抽象地讲一下班级情况，布置一下复习。然后就是要求家长应该做什么。我不理解的是这种“单向”要求的方式，为什么只是老师不断地向家长要求，而家长却不能在这种公开场合有表达的机会。单位、社会、居委会等等都可以向同一个人要求，因为你有不同的身份，学校也向家长单方面要求，这是一种什么风气！也许有人会说，并没有人不让你表达，你也可以

单独同老师交流,但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我们曾给老师写过一封信,反映学生作业太多的问题,但她的老师却非常粗暴地指责孩子“事多”,根本对反映的情况置之不理。

这些事情都极其琐碎,它不是什么大事情,但家长与学校的关系,不就是通过这些琐碎的小事建立起来的吗。我也不是说所有的老师都这样,但我所感受到的问题都让我对中学教育的认识和看法并不那么乐观。

第四,关于教材。中学教材的编写不仅朝着越来越艰深的方向发展,(就北京的中学教材而言)而且越来越多。从教材收费情况看到,一个初一的学生新学期发的书本有十五六种,有的教材一个学期也不用一次,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中学生用得着编这么多种教材吗? 主课教材,语文的政治性内容太刻板,它对塑造中学生观念的用意是十分清楚的。但就课文本身来说,它不见得是好文章。而且如前所述,对中学生更重要的,还是对其人格和心理健康的塑造,而不是意识形态观念的塑造。后者更多的是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通过识别获得的,而不是灌输的;前者,老师的行为方式和教学本身可能更为重要。数学教材,就北京市的实验来说,我认为是失败的。不仅学生接受起来困难,而且老师也感到有问题。

很多朋友谈起中学教育都忧心忡忡,这不仅仅因为我们的孩子是中学生,而是说,中国的基础教育状况的问题,如果被普遍感到了,那么,它就是一个真问题,遗憾的是,在这个时代,讨论真问题的气氛和真诚太少了,而那些大而无为的问题总是被反复提起,它不断重临起点,又似乎永远与具体问题无关,我们就是在这样的风气中随波逐流的,没有人对这一现象负责,包括小学教育的讨论和实践,它构成了今日中国最大的隐忧。

□谢　泳

30年代太原各中学国文试题

我偶然得到一本30年代太原中学师范各学校的《报考指南》，1932年4月出版，薄薄一册，太原兴业书局发行。我有一段时间很喜欢看过去的教科书，有中学的，也有小学的，我以为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最能体现在教科书中，尤其是有关人文学科方面的内容，教科书就是一个窗口，从这里我们能够发现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是如何改变人们的行为和习惯的。我把这册《报考指南》中的国文试题列表抄在下面，并略做分析：

校　名	试　题
山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 学校对于学生不外宽严二种究竟何者为善试各就所经历及意所推测切实言之 2. 民国十九年的我 3. 善人者不善人之师
山西省立第一女师范学校	1. 试言投考师范之意见 2. 学生爱国之职分何在试详言之
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	1. 个人与社会之关系 2. 论中国之前途
山西省立第一中学	3. 怎样做一个模范青年

进山中学	1. 试述各人求学之经过及升学之志趣 2. 我们为什么要求学该怎样研究才可成功试畅言之
山西公立女学校	1. 女子对家庭应负之责任 2. 劝友人投考公立女学校中学部信
成成中学校	1. 母校的回顾 2. 各述来省途中的情况及并垣的见闻 3. 拟来省后报告家长近况书 4. 各述求学的目的及读书的方法
太原平民中学	
山西省立并州中学校	1. 怎样才是个好公民 2. 善战者服上刑论 3. 我的环境与志愿
山西私立三晋中学校	1. 做人必先读书说 2. 人不学不如物说
新民中学校	1. 农民痛苦究当如何解除说 2. 欲御外患当先息内讧说
友仁中学校	1. 说求学之目的 2. 自述读书之经过
太谷铭贤中学校	1. 求学的目的
明原中学校	1. 用极短的词句形容夏天的景致 2. 用不但，而且，然而，联成一篇短小的文字 3. 来省投考的感想 4. 我理想中的新中国
阳兴中学校	1. 述山中公园之所见

这是太原当时15所中学的招生国文试题,除平民中学一所学校没有作文试题外,其余14所中学都是用作文这种形式来测试学生的国文程度的。从上表所列的这些作文试题可以看出当时的国文教学趋向,那时国文教学的主要目的最终要落实到作文上,在这一年度的国文考试中,除了少数几所中学有国文知识的试题外,多数中学是只用作文来考学生的。这些试题今天看来都是很普通的题目,但细加分析,我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就是这些作文题比较实际,很能结合当时学生的生活。从这些题目中,可以看出那时的中学国文教育注重国家和民族素质的提高,这些作文没有过于浓厚的意识形态的色彩,没有那种集团利益至上的痕迹。

□ 杨东平

应试教育:传统教育的复活与强化

世纪之交,制约中国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除了教育投入不足,“穷国办大教育”的现实、在计划经济体制上形成的陈旧过时的教育体制,还有由科举教育遗留下来的陈旧落后的传统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因而,教育现代化不仅意味着办学条件、教学设施、教师待遇等教育投入和教育“硬件”的建设,更意味着教育“软件”的更新转化。

从世纪初开始,在 20 世纪的大多数时间,传统教育一直是众矢之的,是被批判改造的主要对象。但这一脉络在 80 年代中断了,中国的基础教育发生了始料不及的畸变。随着 1977 年文革之后恢复中断了几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被长期压抑的全民族的教育热情迅速化为考试主义、学历主义的强大动力。我们几乎是未经选择地回到 50 年代。重新恢复重点学校制度、智育至上、考试至上和升学率导向,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层层设置的重点学校,使基础教育被纳入升学教育的狭窄轨道,置于炽烈的考试竞争的氛围。基础教育形成一种一边倒的、严整的制度安排——是一种以考试为中心、以升学为目的的教育,并且失去了任何制衡的力量。可以说,这是传统教育在当代大规模的复活和强化。到 90 年代,它被恰当地命名为“应试教育”。这一现实对中国社会和民族文化素质可能产生的多种影响,值得我们去认真辨析和深刻认识。

应试教育的严重后果,是背离了基础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宗旨,赋予基础教育所不应有的炽烈的竞争性和筛选功能,用层层考试的办法,选拔出一小批“优胜者”,从而使绝大多数学生成为教育的失败者,打击和挫伤他们的自尊心、进取心,乃至使他们失去学习的兴趣和动机。在炽烈的应试教育的氛围中,出于追求升学率、增加竞争、提高考试难度的需要,致使我国中小学课程的深度、难度已成各国之最,高于发达国家一两个年级。由于脱离了多数青年少年的实际认识能力,致使学生负担过重,厌学情绪严重,部分严重丧失信心而失学,是中小学生辍学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教育报》,1991 年 2 月 7 日)。据人民教育出版社调查,约有 80%的中学生学习理科教材有困难,中学厌学的达 30%,有的地区高达 60%(《上海教育》,1990 年第一、二期合刊)。在小学生中,经常流行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变形“儿歌”,如“太阳当空照/花儿朝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炸药包?/我去炸学校/老师不知道/拉开弦,赶快跑/轰隆一声学校没有了”。而青少年中发生的令人不可思议的乖戾残暴的犯罪事件也时有所闻。

调查显示,应试教育的现实的确影响了中小学生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据 1995 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结果表明,与 10 年前相比,学生的身高、体重等指标明显增长,部分常见病有所下降。但衡量学生体质、体能的几个主要指标如胸围、肺活量、耐力、柔韧度等则明显欠佳,如耐力素质呈下降趋势,各类年龄组的学生中 70%多耐力指标趋于下降,其中十三四岁下降幅度最大。柔韧性素质趋于下降,最为明显的是 8 岁、9 岁城市儿童。各类学生中有 87.55%肺活量呈下降趋势。与 1985 年相比,7 岁—18 岁年龄组平均下降 90 毫升,19 岁—22 岁年龄组平均下降 235 毫升。肥胖儿童的比例有所增加,城市男生的超体重及肥胖率高达 12.03%,近视率仍然为 76.74%。一些地方学生高考体检不合格及专业限制

的比例高达85%左右,其中大多因近视。学生心理健康的问题也十分突出。1998年夏季,广州市21886名参加高考的考生中,89%以上因体检未通过标准填报志愿时受到限制。76.26%的考生视力不达标,比1990年增加了15个百分点;30.46%的学生身高体重达不到要求。造成学生身体素质每况愈下的原因,主要是学习负担太重,睡眠不足,体育活动减少等。(《广州日报》1998年8月28日)

与严格的考试训练相适应,目前学校教育偏重智力教育,推崇能力主义,重视培养训练记忆、理解、概括、抽象等智力因素,重视逻辑思维能力,比较忽视情感、态度、意志、兴趣等非智力因素;重视知识的传授,而较忽视个性发展;通过严格而激烈的竞争保持较高的考试水准,却不利于创造性的培养。同时,它削弱了教育的人文属性,导致教育的人文内涵的流失。

应试教育的确影响了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只重智育和分数,较为忽视人格培养和道德发展,不仅是一种普遍的学校行为,也成为许多家庭教育的现实。据1995年零点调查公司参与的"世界公民文化与消费潮流调查",中国国民的价值观与其他国家明显不同。各国公众认为最重要的价值是讲究礼貌、责任感、宽容和尊重别人;而中国公众最重视的价值依次是:独立、学识和讲究礼貌;对责任感、宽容、尊重别人、与他人沟通等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其它国家。只有略多于50%的人认为教育孩子讲究礼貌是重要的;只有30%的中国人重视容忍和尊重别人,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光明日报》1995年10月6日)表明文明礼貌的养成在今天中国家庭中处于相当次要的位置,素以重视道德、礼貌、人伦关系著称的中国传统文明,经过长期的流失和演变,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造成80年代以来"应试教育"愈演愈烈,原因可能很多,如十

年教育中断造成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调、中国家长望子成龙与传统观念、独生子女家庭极高的教育期望值等等。

值得认识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对传统教育弊端的必要警惕几乎消失。在70年代末结束“文化大革命”，恢复和重建教育时，我们在“要不要教育”的问题上恢复了常识；但在要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是更好的这一问题上，未能建立起与时代相适应的新思维。对文革和“教育革命”灾难的深恶痛绝，怀旧情绪的严重反弹，使我们不由分说地重新回到50年代。这是教育界与经济界等其他领域很大的不同之处。事实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封建传统教育的批判之声销声匿迹。在恢复50年代教育的努力中，对智育至上、考试主义和师道尊严的不满和怀疑，似乎都是不合时宜的“四人帮”的论调和文革流毒。

比较一下在不同历史时期传统教育的不同处境，便可理解它在80年代的复活，在本世纪上半叶，对传统教育的改造，不仅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强烈冲击，同时有世界范围强劲的教育革新运动——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洗礼。多元文化的新格局对旧传统的消解、替代，活跃的民间教育组织成为当时推进教育的主力，陶行知等一大批教育改革家身体力行的改革实践，极大地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更新着人们的教育主张。中国的现代教育制度基本是在那时生长和形成的。

时至80年代，不仅来自民间社会的活力和批判力量已不存在，来自对毛泽东个人的声讨和压力也完全消失——两种制衡的力量都不复存在，而教育界的主流是重建和恢复秩序，在此过程中，并未引入更为现代的新的教育文化资源，从而站在更高的历史制高点上。于是70年代末全民族被压抑已久的教育热情突然释放出巨大的升学压力，传统教育于是得以复活，并酿成“应试教育”之大观。

自1997年,中小学在改革应试教育上有较大的动作,开始了实质性的改革。北京、上海、广东等均实行小学免试就近升入初中,初高中脱钩,重点中学停止举办初中。上海还实行高校招生采取与中学脱离的"社会化"方法,许多城市实行取消百分制、实行等级评分的试点。由于我国的应试教育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以高考制度、重点学校制度为中心的结构完备、功能强大的教育现实,只有在制度层面上的改革才能真正取得实效。近年来的改革就是通过改革初中升学制度、重点学校制度等一些带有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击中了应试教育的要害。最为关键的高考制度改革也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这次改革能够深入到什么程度、能否巩固和能在多大程度上奏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开展实质性的高考制度改革。

□张巨龄　何杰　陈先云　向全伦　程方平　陈锌等

语文教育，忧喜交加

不要把“孔乙己”搞得支离破碎

《北京青年报》两次刊出关于语文教学改革的专版文章，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它再次引起全社会都来关注语文教育事业，倘使因此而推动了这一事业迈向更高境界，则你们的此举将会福及子孙。作为一个致力于语文学习、教育和研究近40年的工作者，我向你们表示感谢。

我以为，素质教育对语文来说，就是要想方设法养成学生分析、认识、理解和表达思想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一种语文素质。现在考试，讲究出一种叫做“标准化”的试题，其中有一类选择题，是写出一段话，再列出对其内容的几种不同理解的结论，请学生去判断哪一种理解的结论正确。其实，严格地说，任何一种事物的理解，都没有什么“标准”的正确与不正确，更何况所列出的“不同”理解，又往往是相近或相容的呢？角度不同，思维方法不同，其结论就有可能相互参差。

比如，关于“孔乙己”人物外貌的教学吧，不少教师是一句一结论，一句一板书：左边写书中句子“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右边则注释“说明他是贫穷的知识分子”；左边再写“乱蓬蓬的花白胡子”右边又注释道“表现他的潦倒”。其实，孔乙己的

贫穷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不止由"穿长衫"和"站着"显示出来,单纯的"站着"和"穿长衫",也未必就表现那样的状况。同样,单纯的胡子"乱蓬蓬",也不一定就说明了"潦倒"。这样的板书,看起来也许整洁、清楚,但是,却把一个生动的活灵活现的典型的人物形象,搞得支离破碎。外貌的局部特征,脱离了形象的整体,这样的教学,是永远不会使学生学会正确的思维,学会正确的分析、认识、理解,并养成内在的语文素质的。

教学有法,而无定法。必须改变那种不管文章体裁,不管是论说文、说明文、一般记叙文,还是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千篇一律,以为此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学套路,而要因"文"制宜,因"体裁"制宜,因"学生的知识基础"制宜,启发学生的"悟"性,启发他们去琢磨到教师思维的过程。

由于考试制度、方式的指挥棒的牵制,拖累了改革的步伐,使教师们有心改革而不能,甚至不敢。所以,"中国语文教育非改不可"的症结和关键在于首先要进行教材内容和考试制度、方法的改革,将改革不成或步子慢的板子打在日夜辛劳的教学第一线的语文教师身上,是不公正,也是无法使语文教育改革奏效的。

我们的观念出了哪些偏差

语文教学究竟怎么了,为什么有这么多弊端?一些批评引起了社会反响,但却引起不少语文教师的反感,这又是为什么?

看来,我们的观念出现了偏差。

长期以来,语文教学观念出现了很严重的偏差,主要表现在:

一、忽视现在学生的思想实际,用陈旧的观念,特别是"左"的观念来指导教材编写和教育教学。分析作品时,许多要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这在20年前或许有现实意义,但在今天,这些观念就明显不合时宜,更不会被学生接受。

二、强调统一，忽视个性，尤其忽视学生的创造性。在教学中，没有考虑到学生是一个“有特点的人”，而是用标准答案限制学生，分析课文要得出共同结论，作文要有相同的套路，如此下去，只能培养出标准化的产品，而不是有个性的人才。

三、无视人的语言学习规律，把学生变成了语言知识的“研究员”、“解题机”。在对传统教育的长期批判中，语文教学丢掉了传统教学方法中诵读积累、熟读精思、评点批注等精华，又不重视让学生在运用语言过程中学习语言，而是将语文课变成语言知识研究课，让学生研究那些连专家都说不清的语言知识。比如在考试中大考“什么是‘作比较’”、“哪个是‘比喻’，哪个是‘拟人’，”要么拿一段文言文抽出里面所有的“而”字让你分析作用。总之，用名词术语吓唬学生，用繁琐试题难为学生，难怪学生最不喜欢学语文，因为语文教学“目中无人”。

四、就语言学语言，工具理性盛行，不重视语文课本应有的人文因素。语言是用来交流信息的，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思想、情感、文化因素，由于对“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这一要求过分强调，教学自觉不自觉地忽视情感熏陶和文化渗透。加上近年来社会风气的影响，学生的道德水准、情感水平下降，学生的人性在流失。

王丽女士只是提出了问题，如何解决问题却语焉不详且方法不当，再加上对问题的归因和所用的语调有些盛气凌人，便引起了不少教师的反感，可以说王丽们对语文教育的有些观念也出了偏差。

一、以偏概全，无视语文教学已有的改革成果，将语文教学说得一无是处。

自从70年代末吕淑湘先生提出语文教学“少慢差费”这一弊端以来，全国范围的语文教改方兴未艾，出现了诸如于漪、钱梦龙、魏书生等一批语文教育家，全国初中教材已成百花齐放之势，语文

教学观较20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不问事实，只凭一隅之见，就说语文教育界封闭保守，甚至以“误尽苍生”而攻击之，则未免有失偏颇。应该承认，最早认识到语文教学弊端的就是语文教育界自己，改革行动最坚决的也是语文教育界自己。

二、对语文教学问题的归因不对。

王丽们认为，现行考试制度是造成语文教学诸多问题的原因，这与宣传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否定考试的思潮是一致的。实际不然，以中国目前的国情，考试选择制度不可能取消。如果不转变观念，包括考试出题者的观念，即使取消考试这些问题也都会存在。至于考什么，怎么考，尽可探讨，但与考试选拔制度本身无涉。

三、提出的改革方法不可实行，也不应实行。

王丽们提出高考只考一篇作文，以此作为解决目前语文教学问题的方法。可是，在知识经济时代，阅读能力是一种独立的能力，它是吸收知识的前提，一个人在一生中阅读的机会要比写作的机会多得多，只考写作无疑忽视了学生今后生活的需要。而写作能力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人综合语文能力，对那些阅读能力强而写作能力稍差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况且作文评分误差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以一篇作文决定一个孩子的终生实在风险太大，操作起来也非常难。另外，如果只考一篇作文，在教育观念没有转变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出现上语言课就背范文的教学现象。

四、以专家或“知识精英”自居，认为一线老师封闭保守，实在伤害广大教师的感情。应当特别强调，没有语文教师们的参与，任何教改都是不可能改好的。

现在语文教学界已有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但很难推广，原因何在？恐怕和教师们教改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有关。如何让广大教师积极投入到教改中，政府部门就要做许多工作，给广大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让他们心情愉快地工

作,这就不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了。

语文教育真的是“一团糟”吗

不知什么时候起,对语文教育的批评变成了“声讨”:什么语文教育“祸国殃民”、“贻误苍生”;什么语文教学“束缚人、折磨人、摧残人”;什么“编教材要换一批人,否则就没有希望”等等,语文教育工作者和广大语文教师简直成了“过街老鼠”。正如某位批评者所说的“上下共讨之,全民共讨之”。想不到一些危言耸听的过激之词,一下子用在对语文教育的批评上。我国的中小学语文教育竟然被数落到如此地步,真有点让人心寒。

我不知道一些批评者对我国的中小学语文课程、语文教材或语文教学的发展状况究竟了解多少,也不知道是否仅凭儿孙们的作业、局部的调查结果、甚或那么一点点语文教学实践就断言我国的中小学语文教育“一团糟”。中学语文教育现状我了解不多,也就不敢妄言,但要说小学语文教学质量如何如何差,我是不敢苟同的。

国家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司为了科学地评估我国小学生的学习质量,于 1993 年 4 月到 1994 年 4 月在我国吉林、河北、陕西、江苏、湖南、云南、广东、四川等 8 个省,对近 5 万名小学生、近 6000 名教师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测试结果表明,“我国城乡小学校的语文教师,在当前较困难的办学条件下,在提高语文教学质量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测查的样本学校中,平均正确率在 90%以上的学校,四年级占 12.12%,六年级占 7.21%。这些小学的学生,语文知识与能力发展得全面,学生语文整体成绩较好”(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民教育目标监控项目《中国小学生学习质量研究报告》,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等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也许没有一种讨论所依据的事实能比这项对小

学语言教学质量的检测更具有准确性、权威性,更能说明问题。

不可否认,目前我国的中小学语文教育确实存在不少的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如,语文教育对学生的个性发展较为忽视,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较差、写作水平较低等等。但是,要想彻底地改变语文教育的现状,非一朝一夕之功,也不会有什么灵丹妙药。因此,我们不能"忧思语文教育"而将改革开放20年来语文教育说得一无是处,这样会伤害辛苦耕耘的语文教育工作者和广大语文教师的感情。

语文教学质量的滑坡,不是中国仅有的,目前世界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也存在着母语水平下降的现象。克林顿的教育十点计划第三条"使所有儿童能读书识字",就是鉴于目前40%的8岁美国儿童不能独立阅读提出的,他要求到1998年建立一支由100万自愿者组成的公民大军,到小学去帮助三年级以前的小学生识字。英国1996年的一项调查表明,近一半的小学、2/5的初中不符合标准,1/6的课程教学质量令人失望,其中应该包括母语教学的不合标准。可以说,母语水平的下降差不多是全球性的问题了。实际上,语文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其他学科中不是没有。我们不能把板子全都打在语文教育上。

这场语文的大讨论,对深化语文教育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对于中小学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弊端,我想,语文界是不会遮、不会捂的,是能够虚心、诚恳地接受社会批评的。同时,语文界也殷切地期望今后能听到更多、更好的富有建设性的建议,以使我国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尽快走出困境。

挤入无可奈何的教学困境

时间好像很久了,我在1979年离开中学语文教学的岗位时曾写过一篇题为《语文教学的危机》的文章,当时痛感语文教学的功

效极差极低，甚至赶不上过去3年私塾的效果。一晃20多年，语文教学虽进行了若干年多方位、多层次的改革，但关键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不仅课本编写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教师教学大多呆板生硬，最重要的是不切实际，偏离民众实际语言习惯和环境的偏难怪题充斥于各类考试和课程之中，种种压力都将教师和学生挤入无可奈何的教学困境，语文教学确实让人深深地担忧。

一次，我上初中的孩子问我如何划语法结构，我一看作业上多选的是20—30年代的一些作者那半文不白，略带晦涩，省略颇多的语句，脑袋立刻就大了。这些语言不仅与现实语言遥远，且不正规，就连高校汉语专业的学生也不必深究的问题，在初中语文课教学中居然成为日常的练习，目的是什么，令人费解。

在我接触的朋友中，不少人思路敏捷，开拓能力很强，但往往能说不能写，或善写不善说，对事物的分析思考及感悟也有局限。究其原因，亦是“瘸腿的”语文教学种下的瘸根。

活生生的语言怎么能用死气沉沉的方法去教，用僵化生硬的形式去考去评呢？

为什么我们只追求分数

对语文考试的非议，是历次讨论的热点。为了检测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老师的教学效果，考试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办法。在我国，它还担负着为高校选拔人才的重要功能。因此，考试成绩就成了评价学生、老师和学校的唯一标准。对于学生，分数意味着前途和家长的奖赏；对于任课教师，分数意味着自己的工作成效和在学校的地位；对于学校乃至某一地区的教育主管部门来说，分数就是政绩，分数就是声誉。因此，想尽办法提高学生的分数，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们的共同目标。如果分数能够反映学生的语文能力，追求高分就是天经地义的。可事实上，我们现在的这种考试方式，

是根本达不到这个目标的。

标准化考试以其“科学性”、“准确性”而在中学普遍推行。这种考试方式的确能够避免判卷时的一些主观因素的干扰而使分数显得相对精确。它的特点是答案的唯一性，而这正好与语文学科的特点相冲突。语文的魅力就在于它表意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对于一篇文章的理解，怎能做出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简单的答案？拿一个绝对排他的“标准答案”让学生选择，的的确确是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禁锢和摧折。

以《背影》为例，课后有这样一道选择题：揣摩下面句子的含义，选择理解正确的一项：“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A)表现父亲意志坚强。

(B)表现父亲体贴、劝慰儿子。

(C)表现父亲的乐观精神。

(D)暗示已经找到生活出路。

四个答案，除(D)有些牵强附会外，其他三种理解都是合理的，有根据的。但标准答案只有一个：(B)。这就意味着答案(A)、(C)是错误的，可我并没有发现它们错在何处。这个父亲难道不坚强？“天无绝人之路”难道体现不出一点乐观？一个本来有丰富内涵的句子被肢解得如此单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对付这种考试，对文章的深入理解、多角度思维反而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所以会有大学教授反不会做中学试题的奇异现象。研究命题者的意图，训练答题技巧，不断重复，就成了我们不得不采用的教育手段。

为了提高分数，许多老师对教材中与考试无关的内容从不涉及，只讲划定的所谓基本篇目。倘使学生问起，就以“考试不涉及，别管它”搪塞过去。于是，丰富而多彩的语文课就成了那几十篇

“基本篇目”，然后是没完没了的做题。这算什么语文教育?!

那么，要准确、全面地反映学生的语文能力，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考试方式呢？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考试应脱离教材，应体现灵活的原则。取消现在三大板块的命题模式(即选择、阅读、写作)，重新改造阅读和写作的命题方式，给学生以自由发挥的空间，作文的命题应多样而灵活。

圈外人难以品尝语文教师的苦衷

建国以来，语文教育始终处在教改的最前线，大动作的改革就有好几次。

大纲不但修订的次数多，而且力度大；教材变动巨大，某些部分甚至完全推翻重来，终于形成目前各地本土教材、特色教材竞相斗妍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相继办的杂志刊物专门探讨语文教育，其他课程还没有出现这种百家争鸣的形势；如果没有偏见，谁都会承认语文教师负担重，很辛苦，又都很负责，他们基本上都担当班主任是明证。语文老师的整体素质并不比其他课程的教师差，语文教师提出的“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已经被视为指导各科教学的重要的教学原则……所有这些成果，倾注了几代语文教育工作者多少心血和汗水啊！

中国的语言文学不同于外国的语言文学，没有现成的先进的汉语文教育理论可以“拿来”就用，所有的成绩，都是自己一点点努力研究、探索、实验的结果，个中苦楚，“圈外人”是品尝不到的。当一个人正在为崇高的理想风雨兼程奋力向前的时候，你对他说：“啊，你有太多太大的问题(可能的确如此)，我为你忧虑！”能起什么作用呢？如果语言教育工作者觉得自己时时处处被“忧心如焚”的目光审视着，芒刺在背却看不到出路，又会如何？

我们不赞成“忧思”，不但因为“忧思”容易使人看不到成绩，还

因为“忧思”容易使人看不到希望。

人们给予语文特别的关注,说明语文受到了特别的重视,改革起来就能得到广泛的支持和帮助,这是语文的福气,当然也是语文改革的有利条件之一;但是,改革更需要英雄主义的气概、乐观的精神,还有中肯的思考和建议。不是吗?

□ 北方朔

有感于一份必读书目

《文汇报》曾刊载过一份美国高中生的必读书目,看过之后真叫人吃惊。当我们的大学生们还在为今天是否还要读经典而辩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看看这份书目想必会受启发。

书目不长,照录如下:

《麦克白》、《哈姆雷特》、《坎特伯雷故事集》、《傲慢与偏见》、《伊利亚特》、《奥德赛》、《理想国》、《政治学》(亚里斯多德)、《共产党宣言》、《伊尼特》、《美国民主》(托克维尔)、《罪与罚》、《战争与和平》、《美国独立宣言》、《哈克弗利·费恩历险记》、《草叶集》、《麦田里的守望者》、《红字》、《愤怒的葡萄》、《圣经》等。

面对这样一份书目,无论胸中沸腾着多么旺盛的反美情结,谅都不至于简单地去说“不”的,因为透过书目,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对经典的深情,一种宽广的文化视野与兼收并蓄的气度。没有疑问,所选作品都是经过时间淘洗的真正经典,读过之后绝不会误人子弟。书目还体现了对高中生智力的充分尊重。若按我们的标准,这份书目所开之书肯定是太艰深了,未免不切实际。其实事情还有另一面,即中国中学生的数理化课程要比同龄的美国学生的课程难得多,但在人文科目方面,在是否让中学生通过经典感知世界与人生的广大与深邃之类问题上,却好像不再信赖他们的心智了,而是把他们当成不更事的孩子,生怕生活与世界的坚硬弄坏了

他们的肠胃。我们不难想象,在上面书目引导下,由人类优秀文化积累所滋养起来的中学生们,该有怎样的眼界。

有一份权威的书目本身还说明,那儿的大人们很把孩子们当一回事儿,很关怀中学生精神世界里的风景,并能有一种稳定的尺度去实现这种关怀。反观我们,似乎有太强烈的"时代感",生活里每当注入了一点新的成分,便油然地有了"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感受,于是急急地去寻找新的尺度,而缺少一种相对恒定,能叫我们长时间持守的基本规范。生活是浪潮,后浪来而前浪必消失,后浪永远握有对前浪随心所欲的处置权。在这种浪潮心态下,自然会发出"市场经济了,读经典还有何必要"这类孟浪的声音。

我们可否产生一份面向中学生乃至大众的必读书目?这个书目能否保证纯正的人文趣味而不迁就某些当下的欲望,使之真正反映人类的文化积累,真正能滋养现代人的灵魂?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优秀的东西在起作用,粗劣的东西就要来填充,等趣味已被调教得粗糙不堪时,"劣币驱除良币"的规律就会一再发生作用,到那时,真正的经典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这样一份书目肯定是相当难产的。1923年,清华的一批留学生即将出国,为了在短期内得到国学常识,他们请胡适、梁启超二人各自拟定一个有关国学的书目。胡适编撰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这个书目招致了梁任公直言不讳的批评,梁认为胡适所开书"挂漏太多"又"博而寡要"。他用了三日之力开列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及《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梁启超的兴动又招来了梁遇春的棒喝。梁遇春说:"梁启超先生开个书单,就说没有念过他所开的书的人不是中国人,那种办法完全是青天白日当街杀人刽子手的行为了。"他并将开书目的行为说成是"在我们的青年旁边想用快刀阔斧利取我们的头者大有人在。思想界的权

威无往而不用其权威来做他的文力统一。”我想，梁遇春一定是为了使文章俏皮才这么说的。博学的他不需要的东西，别人未必不需要。在当代中国，那些气喘吁吁地挣扎在升学的羊肠小道上的中学生们，要求指导他们阅读的呼声几乎没有断过，而迄今为止似乎还未得到知识界、大众传媒严肃而耐心的回应。我相信，知识界与大众传媒携起手来，让一份有价值的必读书目深入人心，是可行而且也有意义的举动。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已负盛名的高尔基写信给声名如日中天的罗曼·罗兰，恳请后者为儿童们写一本贝多芬传记。高尔基在信中沉痛地说：“我们成年人不久将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将留给我们的子孙的，是一份可怜的遗产，我们将留给他们十分忧郁的生活。这场荒谬的战争便是我们道德衰竭、文化没落的明证。让我们提醒后代人，人们并不总像我们现在这样软弱和恶劣；我们应当提醒他们，各民族都曾经有过——而且现在也有——伟大的人物，高尚的心灵！在残酷和野蛮猖獗的今天，尤其必须这样做。”这满含道义的声音洞穿了苦难，在地球的另一端得到了令人欣慰的回应，罗曼·罗兰慨然应允。这声音也应该在我们心中激起回响。

第六辑

救救语文



□ 孙绍振

炮轰全国统一高考体制

全国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那几天，被高中学生称之为“黑色的七月”，这是绝对准确的。对于家长来说，这些日子不但是黑色的，而且是操心的。哪一个家长没有在这种精神炼狱中忍受过煎熬？即使暂时没有应考的孩子的家庭也没有本钱幸灾乐祸，除非决心断子绝孙，每一个为人父母者或迟或早都在劫难逃。十余载的焦虑，四千多个日日夜夜的督促，几乎都是为了这一天。若说中国的家长为了这场考试付出了半条老命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孩子们的牺牲更大，整整的一代人，没有童年和少年，青春的欢乐被考试的痛苦、打击、恐惧、焦虑所淹没，父母的爱心变成了残忍，温情脉脉的关注变成了猫对老鼠的监督，时间之长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不论春夏秋冬，不论是春节、暑期，孩子才往电视机前一坐，背后就有绝望的喊叫。

美国人最羡慕中国尊重父母、教师的伟大传统，听说中国人曾把教师、父母和天、地、皇帝一起加以崇拜，在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前面焚香、顶礼，就感动得要命。这五千年的传统，虽然固若金汤，在国家亡给异族时，也没有瓦解，但是今日却为一纸考卷而消解了。人世间最亲密、丰富、复杂的亲子之情、师生之情被歪曲成一种最简单、最粗暴、最干巴、最没有感情的功利：不管多么伟大的价值准则，都集中到一个焦点——分数上去，有多少爱就有多少苛刻

和不近人情。母爱已经差不多变质了,慈母有时比之严父更为严酷苛刻;什么师道尊严,什么有教无类,一切都是假的,在中国,只有考卷上的分数才是真的。它不但可以争得挤进大学门槛的权利,而且可以为教师争得荣誉,为学校提高名次,为校长垫高禄位的台阶,为父母赢得邻居仰望的目光和他们翘起的下巴。

人们可以不理睬领导的讲话、红头文件、毛主席语录、世界杯足球赛事、甚至股票行情,却不能对考卷和它的标准答案,对ABCD的选择掉以轻心。孩子的每一笔,每一划,都不但意味着前途,而且意味着金钱。一笔之误、一分之差可能导致数万元的经济损失。

上亿家庭的命运都要由这张考卷来决定!

凝聚在这张考卷上的纵横交错的心灵电波,其间的血和泪、悲和愁是任何一个其他民族,包括美国的军事间谍卫星绝对无法破译的。

然而,中国人付出这样的代价,换得这样一张神圣的考卷,是义无反顾的:正是它,结束了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的闹剧。那种在最圣洁的名义下向最龌龊的舞弊屈服的回忆一去不返。肮脏的人事勾结,特权之路,不管在什么地方通行无阻,但是在这张考卷上却是此路不通。

1977年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的恢复,标志着平等竞争的开端。人们骄傲地想起: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代中坚就是从那时找到自我实现的坦途的。

然而,不过是20年的时间,好事和坏事互相转化的辩证法就在无情地起作用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在60年代相当偏激地表示深痛恶绝的偏题、怪题、难题与正常难度的考题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以学生为敌的倾向以语文考卷最为突出,有些甚至达到荒谬绝伦的程度。例如:有一道题是关于朱自清先生的《梅雨潭

的绿》的，题目要求考生指出作者的观察点。许多考生都选择了梅雨潭，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正确的答案是“梅雨潭边”。有一道题要求在许多元曲作家中选出元曲四大家。但是，这个问题连大学教授都说，在文献上有不同说法。长期如此，弄成了一个可悲的局面：中学教师辅导不了小学生，大学中文系教授做不好高考语文试题。据说，前几年，把高考语文考卷拿给全国著名的中学语文教学权威去做，也只能得到可怜巴巴的 70 多分。

这样不但把庄严的教学变成了儿戏，而且把人类的精神文明的承传化作了疯狂。这样的庄严的疯狂不能不越来越引起全国有识之士的忧虑。然而身居高位，重权在握的人士，对于来自全国各地的呼声，充耳不闻。据说有一次全国考生及格率很低，有人用扣帽子的办法发出不满：难道我们的新时期的中学生的水平就那么低？没有想到上面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只扔过来一句冷冰冰的话：我就没有打算让多少人及格！还有更为傲慢的：高考是一场淘汰制，不这样，你说如何淘汰？这无异说，尊口免开。呜呼，坐在考试中心办公室的交椅上并不是很大的政治家，但是，对付下面的意见却有大政治家威重泰山的风度。

到了 1998 年春夏之交，这种人神共愤的考试引起的不满突然爆发了出来。从《北京文艺》到《文艺报》，从《文汇报》到《羊城晚报》不约而同地发起了声讨。最有气魄的是《羊城晚报》，一连一个星期，头版头条，以通栏标题表示对于语文考卷的愤慨。第一天是：语文考卷，误尽苍生。第二天是：考倒鲁迅、巴金！一时间，语文试卷的刁钻、恶毒、阴险、愚昧几乎已经成了过街老鼠。消息灵通的读者后来知道，大众传媒从国家教委新任领导那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

大风吹到了国家教委考试中心的几顶乌纱帽上。当年的高考语文卷子就有了微调。取消了一些刁难怪恶的选择题，但是，距离

真正的改革还很遥远。

为了让改革真正彻底,我们不得不对考试本身进行系统认真的思考:

一切考试都意味着平等竞争。我国现行高考的特点是不断强化平等"理想化"的程度。经过几年的积累,不仅在考试制度上,而且在改卷的机制上防止一切主观性。改卷者可以机动处置,灵活掌握的题型逐年减少,而所谓"客观题",也就是并不需要改卷者有任何判断能力的题型逐渐占据了优势。这除了理想的追求以外,也有万不得已的苦衷。高考是全国性统一的,因而判题必需是全国一致的。要让北京、上海、广州的教师和穷乡僻壤,甚至天山、喜马拉雅山脚的教师按同样客观的标准评分就要有一种操作的方便。这种操作性要达到这样的程度:不论是评分者的水平低下,还是营私舞弊的意向,都难以使平等的准则走样。为了达到在960万平方公里幅员之内绝对平等,美国式的托幅考试,那种ABCD的选择题就成为压倒一切形式。而且结合中国国情,除了在单项选择中,设置了更为恶毒的陷阱,还创造出新花样:不定向的多项选择,存心把试题弄得更为诡谲。于是刁题、怪题、偏题、荒谬题应运而生。以学生为敌的流毒遍于域中,出了许多笑话之后,有关人士还是执迷不悟。其原因不仅仅在于他们官僚,而且还在于他们对于考试的功能,在理论上陷入迷误。

考试是一种人才选择机制,它在被普遍地运用着,并不是因为它绝对准确,而是因为比较简便。从根本上来说,人才的选择,最可靠的办法并不是考试,而是实践。没有一个国家的总统或者企业的董事长是用考试的办法来遴选的;也绝不能设想,在一场战役进行之前,用考试的办法来决定统帅。通常的做法是:在任命的过程中逐渐考核,这个方法本来最可靠,但是有致命的弱点:第一,在实践中考核花的时间太多;第二,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

件下实践,缺乏现成的可比性;第三,作为考核者的主观性;第四,结论只能在长期的实践以后得出,就是正确,也是事后诸葛亮。而选拔人才,尤其是在青年当中选拔高等学校的学生,却需要客观地预测,需要现成的可比性。而要可比,就得在同一时间、地点、条件下进行,这是不现实的。而考试则以假定的可比性,代替了现实的可比性,用同样的题目,限制在同时间里,以同样的标准来评分,最后,把客观的结果以量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中国目前实行的百分制量化方法是全世界最为细致的一种,比之俄国的五级记分制、美国的四级记分制表面上看要精确得多。但是,这真能成为我们自豪的本色吗?号称精明的美国人和俄国人为什么那么傻,难道就不懂得把人才分成一百个等级比之分成四个到五个等级要精密得多吗?

道理很简单。第一,现实对于人的需求是不拘一格的,无法用统一的标准加以等级化的区分;第二,人不是物,其才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根本不能用机械的标准加以量化。人的素质,就无法像称地瓜一样,锱铢计较。有谁能把汉高祖、项羽、韩信的才能用百分制计算出来呢?项羽、韩信打仗比刘邦强多了,但是,最后项羽失败了,韩信被刘邦捉住了。刘邦问韩信,你看看我这样的人能带多少兵?韩信倒是天才地作了量化,说,大概是十万吧。刘邦又问:那么你呢?韩信说:多多益善。刘邦就说了,既然你能带的兵比我多得多,为什么又被我抓住呢?韩信说,陛下不善将兵,而善将将。也就是不会打仗,但是很会用干部。如果要给这三个人打分,我想不要说古代军事家没有办法,就是当代的军事学院的教授,也无能为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分数打得越细,就越是荒谬。

通过考试,给人的素质打分数,是一种不得已的假定。而现实是不能假定的,真的要假定就不能不荒谬。如果红军不经过福建

上杭和湖北红安,没有后来的革命实践,谁知道陈丕显能当上海市长,韩先楚能当将军。如果今天的军事学院要到这两个县里去招考,谁知道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小学教员是当将军、政治局委员的料啊。

考卷是规格统一的,而人才是不拘一格的,从根本上来说,二者不相容。所以,中国的圣贤在人才选拔方面费了上千年的脑筋,至今还没有一个十分十美的方法。在人才最为活跃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没有什么考试。最流行、最先进的方法是自我推荐,或者推销。孔夫子、孟夫子、韩非子,乃至商鞅、李斯、苏秦、张仪,举凡大政治家、大学问家为了推销自己,不惜周游列国。当时信息流通不灵,不如此就不能像毛遂那样脱颖而出。但是这个方法最明显的缺点就是不能排除偶然性和自我吹嘘。光是他自己吹吹,就相信他有经世济国之才,就太危险了。汉朝就有一点改进,你一个人自己说了不算,要让大家来评议。这就是所谓举贤良方正的办法,从理论上来说,这比自我推销要严密得多。但是,走后门的问题来了。人情关系把这种方法的优越性彻底地扼杀了。于是就产生了腐败: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这种办法发展到最腐朽的时候,就干脆实行一种血统论,根据人的出身,把人分为三等九品。这就是有名的九品中正制。这当然是没有好结果的,到了隋朝就来了一种比较客观的办法——分科考试。这种公开的文官考试制度,曾经使西方人大为赞叹。的确,从理论上来说,这是最为客观的了,在考卷面前人人平等。但是,考试的规格化和人才不受通常规格限制的矛盾被制度的表面公平所掩盖了。因为,在实践过程中,人们所遇到的问题都是越出常规,是书本上所没有的。人才的可贵就在于创造,而创造就意味着对于规格的突破。规格化的结果就是,绝大多数状元,除文天祥以外,都在政治上或者文学上没有太大的出息。不管是王安石,还是曹雪芹,不管是李白,还是林

则徐，都不是状元。当规格化发展到极端，就产生了滑稽而野蛮的八股文程式。许多可笑的事就这样产生了，范进中举的喜剧，孔乙己的悲剧，不过是为艺术家表现出来的一个片断而已。弄到了1898年的维新运动的时候，科举考试就首当其冲了。即使变法失败了，后来科举还是给废除了。但是人才还是得选拔，因而考试并没有废除，只换了一种方式。在孙中山的五权宪法里，考试还是被赋于重大的意义。在西方的三权分立的机构以外，又加上了一个考试院。据说，当初的设想是，连县长都要经过考试才能任命。但是这个办法显然是空想。今天，孙中山没有解决的考试的规格化、程式化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就连毛泽东那样的权威发出多次警告也无补于事。最后导致毛泽东干脆把高考一塌刮子取消拉倒。

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的制度实际上是汉朝的推举制度延续，推举制度的人情化的腐败则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在人事信息发达的当代更加泛滥成灾。最后邓小平毅然取消了这种复古的产物，恢复了文革以前的全国统一的高考。然而这只是解决了竞争的平等参与问题，却没有解决考试规格化和人才不拘一格的矛盾。参考者的平等期望更加集中在学业成绩上，高考的量化更进一步畸形地细化。比之美国托福考试更为刁钻、恶毒、愚昧的多项选择题型应运而生。本来，托福的选择题型是对付非英语民族考英语的需要而产生的，照搬过来考本民族的学生就有一点可笑，至于把托福考试再拿来恶性繁化，就滑稽了。这一点只要看看英国人考外国留学生的方法和德国人考非德国语人士的方法不同于托福，就一目了然。

当然，不能过分地责怪我们的考试专家缺乏想象力，从客观上来说，也有情有可原之处。我们国家太大，要在全国范围内做到一点主观的斟酌余地都不留，就必须把答案简化到只剩下最简明的

ABCD 这样的程度。考题的弹性越是小,在全国范围内保证平等的竞争的系数才越大,腐朽的人情关系的可乘之机也就越小。

但是,事情走向了极端,也就走向了反面。本来是极端客观的考题造成了极端主观的不讲道理的专横。我们的高考机制对于改卷者的任意性有了一系列防范措施,但是对于出题者的任意性却是完全的空白。

许多考题出得莫名其妙,答案武断到荒谬绝伦,弄得语文考试比之八股文还僵化。不但以学生为敌,而且以教师为敌。当高考题目发下来的时候,常常没有一个语文教师有把握说出答案。

一个中学生告诉我,市里的质量检测结束以后,一位很有威信的教师照例给学生讲解试题。他仗着自己的资格老,懒得看标准答案,就一面讲一面问学生标准答案。学生用唱歌一样的声音作答。教师跟着解释为什么要作这样选择,而不是作另一种选择。机械重复使得一些思想活跃的学生觉得太不过瘾,就故意朗诵错误的选择,而教师就牵强附会地说明它是如何地正确。等到调皮鬼学生说明,真正的标准答案应该选择的是另一条。于是教师又口若悬河地证明为什么另一条的绝对正确性。全班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

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了设置陷阱,连出题者自己也跌入陷阱。一旦出卷者自己陷入谬误,而这种谬误又很轻易地化为标准答案,全国就没有任何人能够挽救。有这样一个事实:一位重点中学的权威教师,在调进高等学校的那一年,他的公子面临考大学。当他应儿子之求,为之做语文模拟卷子时,结果被认为错误百出。但是他当语文教研组长的时候,他有出题的权力,他就是标准答案。

高考考卷不但是一份考卷,而且是一根指挥棒。考试的猜谜性质迅速渗透到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中去。这样,堂而皇之的语文课就充满了一本正经的钻牛角尖,伤天害理的文字游戏。在等而

下之的各种东施效颦的习题集的洪水冲击之下,语文教学就逐渐变成了应付恶作剧的黑色幽默。

这不但贻误了青年,而且使教师的头脑僵化、智力退化。两代人的才智就在这样荒谬绝伦的考试中无形地消磨着。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改题者可能产生的腐朽上面,而却忽略了出题者的任意性所产生的荒唐。

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显然在于出题的任意性。减少虚假的客观性,增加考题的主观弹性正是眼下的当务之急。增加了弹性虽然也可能增加了改题者人情腐朽的可乘之机,但是,从减少了出题者的专制程度方面,我们仍然可以得到更大的补偿。

这样说,并非完全出于空想,把今年全国高考语文考卷和上海的考卷进行了对照以后,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在上海的语文考卷上,只有两种题型,一种是阅读理解,提供四篇文章(包括古文)的片断。还有一道就是作文,大作文和比较小型的作文,各一题。它似乎表明,不以刁难怪恶的选择题整学生,并非就意味着无法进行淘汰制的考试。

上海之所以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就是因为它缩小了应考者的范围。

这就给我们一点启示:考生的范围越是小,考题的弹性就越是大;相反,考生的范围越大,弹性限度就越小,越可能导致僵化。考试的范围如果缩小到不是面对全中国而是个别的人,刁钻古怪的多项选择题就完全失去了必要。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不管录用什么人,最后都要来一个面试的缘故。到了面对面的时候,就彻底地从考试的规格化中解放出来了。

这样并不是什么新发明,早在1977年我们恢复高考的时候,就是各省自行命题的。事实证明,它并没有降低录取的水平,77级毕业生的水平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这是世所公认的。

如果我们思想再解放一些，能不能设想：让各学校命题，多项选择就不必那么古怪了，标准答案也就没有那么僵化了。有了什么争议，就由出题者（或者命题小组）机动处理。这也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事实上我们现行的研究生入学和专业课程就是这样考的。

可不可以用会考的方法来解决中学生入大学的竞争问题呢？这在台湾已经实行很多年了。在德国，中学生只要通过一种叫做“阿比托”的考试，就意味着他可以申请进入他所选择的大学，如果该大学名额已满，他的成绩可以长期保留，直到他获得他所选择的大学接受他为止。如果再想远一点，解放前我国大学并没有全国统考，各校分别招考，不也培养出了像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那样的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吗？

现状和习惯把人的思想束缚得紧紧的，使得我们的眼光只能看到习惯了的东西。这么多年来，我们对于德国人、英国人的考试方法，对于我们自己的考试传统，几乎视而不见。当我们为被自己制造出来的怪题整得落花流水、头晕眼花的时候，也许并不应该用太刻薄的语言去责备出题的人。他们并不是疯子，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整人，是不是有什么力量在残酷地逼迫他们使他们身不由己呢？

当我们渴望从高考试题的怪圈中解放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更深入地设想一下：在多大程度上，这种残酷性来自于人类历史发展阶段性的局限，多大程度上又是来自于当事者对于考试制度的盲目迷信呢？

摆在面前的问题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所谓绝对客观、绝对公平竞争的空想。

从相对的、地区性的公平性出发，从乃至各单个学校范围内的公平性出发，表面上是缩小了公平性，而实际上却扩大了公平性。

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等于西欧乃至南美许多国家的大国里，不顾实际情况，陷于无限公平的空想是绝对有害的。要想从根本上改变高考命题的混乱，不能仅仅从试题本身改革，而要从束缚着试题的高考体制出发，作更深层次的解剖。当前最为迫切的任务就是及早废除全国性统一的高考体制。让高考从全国大一统的镣铐中解放出来。然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把出题权下放到各级学校。

这不是对于未来的幻想，我们如果有魄力付诸实施，除了危及教育部考试中心的一些先生们的饭碗，要承担为他们分流寻找出路的负担之外，不会对任何人有什么损害。相反，将对后代功德无限。

□ 黎　鸣

中国教育危机中的核心问题

当今世界早已从工业社会迈进后工业社会,用法国人和日本人的说法,是进入了信息社会。信息社会的最根本标志之一,即人类全面知识的增长速度急剧增加。相应于此,知识的传播、深入、辨识(真假)、广泛延拓(从人类的生理、心理、伦理到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到各种类别繁多的专业的科学学科)等等,也均以昔日人们难以想象的方式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

生活在当今开放的年代,只要稍微睁开眼睛看看世界,就不能不为中华民族社会迈步之慢而惊感危机,而中国的危机之中,最深远的危机又莫过于教育。

关于中国教育危机的现状,书中已有其他文章描述,媒体上也多有报导,这里就不赘述。我想谈的是我所认为的教育危机中更根本性的问题,或核心问题。

严格地说,中国缺乏教育理论。我想说的不是中国没有教育理论的研究,而是没有教育理论的需求。这是因为,在中国,教育机构长期以来不过是国家行政部门的附属,教育的管理被混同于行政的管理。教育为政治服务的明确提法,教育为升学、求职的全面的社会功能,严重地助长了教育的实用主义的短期性的社会行为。其结局是,学校教育丧失了应有的崇高的社会地位,而仅沦为片面的行政工具和谋生手段。当今的学校普遍地缺乏应有的对青

少年的情感教育、意志教育、美感美德教育，而只重片面的知识的灌输和政治教条的训诫。这实际上是使中国的现代教育倒退到中国传统科举教育的道路，甚至还不如传统的教育那样重视情感道德的传承。

中国传统的科举教育是什么？就是以中国的极权和人治的政治管理体制面对受教育者。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其教育的核心框架都是其社会管理的体制本身，管理就是教育。关于这一点，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曾有非常精辟的论断。他说，人类“青年期的主要教导者是政体以及由此而生的风俗习惯”。现代的人类之所以要设立具有相对独立于国家行政的社会地位的现代学校教育，其主旨即在于向社会的下一代提供比国家政体和风俗习惯更具超越性内容的社会教育，从而可以使他们有能力担负起进一步改造社会、推进文明的职责。

否定学校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从而使国家政体直接面对下一代的传统教育，在中国已有大量历史事实可以证明，是极为有害的。实际上已使受教育者普遍地、不同程度地染上了如下所述的三种人格通病。

（一）只认权势，缺乏信仰。用小说《三国演义》中的话说，即“各为其主”，用俗话说，即“有奶便是娘”。儒家学说的“入世”的实用主义更是强化了这种人格通病。纵观世界比较而论，西方人信仰神（上帝），中国人信仰（有权的）人。神是永恒的，信仰者可以终其信仰于一生；（有权的）人则有盛衰生死，信仰者必然会中途权宜变更，即俗话所说，“人往高处走”，“识世务者为俊杰”。如此“俊杰”一多，传统中国人自然难有真正的信仰。

（二）任性尚气，缺乏公德。传统中国人不谙法律，不识自由，以为“自由”便是自己有权，不让别人管，自己有权便可以滥施于人：暗室欺心，神鬼莫知，任性尚气，无法无天。在上可以气指颐

使,独往独来;在下可以昧着良心,无视公德。且不说上层的公款吃喝、官倒、纳贿诸端,即使当今的青年学子,能讲良心、重公德的,恐怕也未必多见。

(三)懒散、苟且,意志薄弱,缺乏毅力。传统中国学生四体不勤,轻视劳作,更难说有坚定的意志毅力去从事一项创造性的事业。须知,在传统的中国,标新立异、创造发明是难以安身立命的,甚至可能丧失身家性命。久而久之,自然会养成苟且偷安、得过且过、意志薄弱、缺乏毅力的人格通病。

上述三种人格通病是中国传统的极权的和人治的政治以及由它而生的风俗习惯直接面对受教育者的必然产物。靠大量具有上述人格通病的人们是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国家的。要改变这种教育格局,途径有两条:其一,从长远看,必须下定决心逐渐改造中国极权和人治的政体;其二,从近期看,必须给予学校教育以应有的相对独立于国家行政的崇高的社会地位。相对官道、利道而言,坚持师道尊严是必要的,师道的尊严是现实地集中地体现了真理、理性的尊严。

□ 葛兆光

从日本的高考试卷说起

我参加高考，是1977年的冬天，离现在已经有20年了，当年高考的严酷感觉已经渐渐淡了，留在记忆中，更多的倒是那个时候听说可以参加考试的兴奋，和拿到入学通知后的感慨。后来常常听到“黑色七月”的议论，并没有留心，考试对我来说毕竟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最多，也只是看到电视里可怜天下父母在考场栅栏外一脸焦急的样子时，吐一口长气，说上两句过来人“幸免于难”的废话。

近来对“考试”重新产生兴趣，倒不是因为身为高校教师要去考学生，而是因为在历史研究中越来越感受到，考试作为知识的学科化制度化的关键，对后来思想与学术的巨大影响。在现代社会中，由国家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包装起来的制度，使得每一个需要社会承认才能实现理想的人不得不经由考试来检验自己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常常一方面凭借这种正当性和合理性，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一方面使得拥有这种知识的人忘却他的个人主体意识，而成为主流社会中一员。福柯曾经冷冰冰地说，“学校变成了一种不断考试的机构”，考试已经不再是学生对学生的智力较量，而是个人与全体的比较，在强迫性的规训中，学生被权力纳入其许可的知识范围，而其所理解的知识也在他的心头建构了一种控制他的心灵和智慧的权力。对我来说，考试之于学术史来说特别重

要的是，当这种知识通过考试和此后的教育不断在人们精神与心智上皴染积淀后，它就成了将来学术研究的基础，使得学术也纳入了统一的框架，被切得方方正正，连一点棱角和毛刺都没有。

于是，一张试卷背后，就潜藏了当下社会的意志，也预设了将来学术的取向。我总觉得，当考试卷子把标准答案预设在白纸的背后，当考生自觉地按照未公布的标准答案拚命发掘自己的知识记忆，当走出考场的考生喜孜孜地为自己的答案符合标准而庆幸时，一千三百多年前唐太宗那句“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话，才会真正地成为现实。

我在日本看高考试卷，又产生了这种感觉。虽然日本的高考制度和中国不同，它虽然有一次国家统一的考试，但这一次考试之后，要进入各大学，却不是由国家统一的命题考试，于是学生可以多少解脱一些规定性的束缚，而各个学校没有统一的教科书，又使得试卷不可能像中国那样标准化，但是，即使如此，试卷中同样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性。

我随手收集了几份日本的考试卷子，一般说来，他们的国语（相当于我们的语文）试卷已经相当地灵活了，如滋贺大学教育学部的国语试卷只是三个大题，第一个选的是《芥川龙之介赏经纬》，也就是关于第一回芥川奖评奖记录，让学生读文章后回答几个关于比较特殊的词语的汉字写法、假名写法，几个比较复杂的句子大意，撮述其中个别问题的意义，最后让学生简要回答《芥川奖》评奖的性质，第二个题目与第一个大体类似，选了一篇《花月草纸》中的散文，第三个则选了一篇中国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中的文章，让学生把一些词句译成现代语，对一些句子作出解释，把一些古汉语词句注出现代假名。从这些试题中看出，日本高考大体上比较重视的是语言与文学方面的基础知识。

历史试题也差不多，知识性意味似乎比国语更浓重一些。比

如京都大学的日本史试题,第一大题中的第一个小题目就是一篇关于原始、古代政治与行政机构的文章,下面依次是几个问题:首先让学生从若干提供的词语中,选择出正确的“时代”、“文献”和“制度”名称来填空;其次就问文章中提到的“王墓”是“方形沟墓”“还是圆墓”,随葬品是铁制武器还是剑等青铜器。这份试卷的第一问是古代史,第二问是中世史,第三问是近世史,第四问是古代到近代的留学历史,似乎面面俱到,范围很宽;而京都大学的世界史(B)试卷也是题目相当多,从世界史中的日本,到古代世界的文化交通,从古代的货币与贸易,到世界史中的结社、组织、政党。而且每个问题中又有很多小问题,其中一题说,意大利从古代以来就是一个各种民族与文化交错的地方,希腊、罗马之外,伊斯兰文化也影响到西西里亚,使这里成为伊斯兰文化传播的一个据点,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人对意大利的文化抱着一种崇敬,因此,8 世纪后半到 19 世纪前半,有很多著名文学家都相继访问这里。下面,就提出若干问题,首先提供一幅古代意大利地图,要求考生指出在图上标出的殖民城市中,诞生过哪些著名的科学家;其次要求考生回答,在上述提到的希腊、西罗马、东罗马等等那些时代中,有哪些著名的建筑;在那些时代中有哪些曾经影响了欧洲文化的著名的伊斯兰神学家;在上面的文字中提到的 18——19 世纪中,哪些文学家曾经在意大利有什么样的文学活动。从试卷上看,日本高考涉及的范围很宽,问题也相当多,似乎更侧重于知识记忆的数量与准确。

似乎这种格式已经成了一个套数。当然偶尔有一些例外,像京都大学的国语试卷,没有古代汉语的试题,选的是三篇文章,一是池泽夏树《读书癖》,这是关于高田宏《木に会う》的读书心得,二是大西祝的《批评心》,这是一篇社会评论文章,三是三浦梅园的《梅园拾叶》,这是一篇文学性的散文,每篇文字后面有几个问题,

大凡都是词、句意思的解释，似乎并不很限制学生的思路。而京都教育大学的国语入试题，虽然大体格局与滋贺大学相当，也有一篇选自孟启《本事诗》的文字，但多了一个600字以内的作文《个性与协调》。京都大学的世界史(B)则除了一般的世界历史知识外，还更多了一些与地理、宗教、文学相关的历史问题，甚至还有一些运用图形测试的考题，如对古代钱币的时代和名称加以识别等等。

但是，就在这知识潮涌而来之中，有没有意识和观念的内容潜藏在其中？比如作文中的《个性与协调》，是否出题者的潜意识中针对的是日本年轻一代的性格变化？是否出题者不自觉地在试题中表达了社会对个性与协调之间冲突的忧虑？又比如把中国古诗文或日本汉文学作品作为日本国语试题的内容，是否有强调日本语言与古代汉语之间的关系，以及凸显古代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亲缘的意思？在外来语铺天盖地而来，日语中片假名拼音使得日语不太像日语的时代中，这种运用考试使考生记忆古代以来语言传统的做法，是否有运用权力维护传统话语的意思？特别是历史试题中，凡提到日俄战争、日清战争等等近代问题的场合，尽管问题都是知识性的，但其预设或前提却不能不涉及观念与意识，而像世界史试卷中第一问之C，关于岸信介推进由国家规划的民间经济合理化和重光葵不问是苏联强力推进的社会主义形态还是英美民主合法制度形态，与社会主义改善关系的那个题目，为什么要特别提到他们都曾经是东条内阁成员？在这种不免有暗示性的题目中，就不可能没有日本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意味在内。

中国的高考试卷也同样如此。我曾经反复看随身带的两份1997年的高考试卷，这是刊登在1997年7月10日及7月18日《中国青年报》上的语文试卷和历史试卷，始终觉得有些不那么好理解的问题在里面。

到底语文学习是为了什么，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也没有人真

的去回答的事情，我不太愿意相信那些已经经过了种种修饰和掩饰的官样文章，倒宁可从试卷里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试卷的出题方式和给出的标准答案，不仅在回答这一问题，而且在实际地引导着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与日本比较，中国的高考语文试卷颇有一些不同，在选现代的文章方面，日本的试卷常常选的是文学性的散文和哲学性的论文，可中国的试卷则多是报纸上的报道、社论。语文第一卷的第一题中，有这样几段文字：

这个经济协作区，具有大量的科技信息，较强的工业基础……

今年春季，这个省的沿海地区要完成3700万土方的河堤加高和河口截流改道工程，任务重，工程难，规模大。

为了全面推广利用菜籽饼或棉籽饼喂猪，加速发展养猪事业……

储蓄所吸收储蓄额的高低对国家流动资金的增长有重要的作用……

这个城市交通拥挤的状况日益严重，许多人认为，采取货车在规定时间内不准进入市区的措施，未尝不是一个缓解矛盾的办法。

并不只是文章的有趣还是无趣，这里其实潜含了对考生的一种相当不同的预设。如果说，日本的"国语"出题者心目中，标准国语是文学散文所表现出来的美文，那么中国的"语文"出题者心目中，标准语文是社论体或报纸体那种应用性文字。这里的合理性前提是社论或报道等报纸传媒的权威，而报纸的权威来自政治性权威。出题者心目中，似乎将来的学生要走入社会成为公职人员，期待学生从小就对社会的种种事情均有一定的知识，对社会知识有规范的表达能力，因而那种个人性的、趣味性的文学在"语文"中占的比重相对较少，而社会性的、应用性的公文在"语文"中占的比

重相对要大。在这样的预设中,语文不再是个人的文学体会与表现,而是一种政治与经济为中心的社会中使用的,语言文字的应用性技术。

历史试卷中的相当多的题目来自与现代政治相关的近代历史和现代历史,而相当多的题目的问题,与可以确凿记忆的史实、年代、文献、地理、人物无关,而是与历史观念纠缠在一起,也就是说,它不重在历史的叙述,而重在历史的解释。比如这样一个问题,“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功绩在于”什么,出题者给出了四个选择,一是“确立了‘民主’与‘科学’的主导地位”,二是“批判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三是“揭开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篇章”,四是“沉重打击了封建正统思想的权威”。据报载,正确的选择只有最后一项,这里显然包含了对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权威的解释,而解释只有拥有权威才是有排他性的,可是为什么只有“沉重打击……”一说可以成立而其他若干项都不能成立,显然这里并不是一个史实上的知识性问题而是解释上的观念性问题。此外如:“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是美国侵略中国新阶段的标志,这主要是因为该政策——有利于美国加快侵华步骤”、“甲午战争后,列强竞相对清政府贷款,是为了——扩大在华政治势力”、“日本明治维新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最突出的表现是——掌握政权的人是原属统治阶级的武士”、“下列历史事件,不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是——朝鲜义兵运动”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在代替学生作价值的判断和性质的解释。问题是,判断的标准和解释的依据常常是主流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偏偏是有时间和空间局限的,当时过境迁,它就不再是知识。

于是,考试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很多学生告诉我说,高考之后,全部忘光,于是可以把种种在几个月前还巴不得背得滚瓜烂熟的东西一起丢在脑后。一个在日本参加了考试的中国孩子也正在兴奋地收拾滑雪板,准备到长野去渡假,而很多日本的电车上都是

兴致勃勃的年轻学生在外出旅游。中国的高考生们在考试之后，无论中与不中，也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享受着难得的轻松和愉快，几个月甚至几年的紧张都成了记忆中的往事，那些并非知识的观念、解释以及规范化的答案在这里就统统烟消云散，被抛在了九霄云外。

可是我却明白，这种考试的影子是很难剥离于生命的。在很长时间中的学习如果都是为了这一次考试而来的，这个考生的知识结构就已经被缠绕在这一主干上了。他的语言风格也逐渐习惯于这种常用的语境了，甚至他的思维路数也会在这种惯性上自然运转，“久在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当他日后成为教师，他就会用这种知识、语言和思路来教育他的学生；当他是一个研究者，他就会用这种知识、语言和思路来处理他的研究对象。因为这种考试的权力既无形，又强大。唐代的一个考生朱庆余在参加考试之后，想打探一下考试的结果，就写了一首诗给主管官员张籍，诗里用刚到夫家的新媳妇来自比，说道：“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其实问的不仅仅是入时不入时，合符时尚只是在时尚潮流中得到认可而已，重要的是合不合夫婿的审美尺度，更要命的是这种化妆还要等待公婆的批准，这里的夫婿就是考试的出题者，而公婆则是出题者背后的“权力”。就算我们假定他们都很公正，他们就代表了时尚的尺度，也只是仿佛那个固执的成衣铺主人，只做一种尺码的时装却要求顾客一律高矮胖瘦。当千军万马只此一途，只能通过考试来改变命运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只好卑微地问一声“画眉深浅入时无”。

套用福柯的术语，话语拥有了权力，就成了权力的话语。我想，更麻烦的是它在人文学术研究中经久不散的影响，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相当不同的是它的个人性质，科学要求规范而人文追求个别。如果每一个考生都必须习惯于截长续短，把自己的思想、语

言、知识切割得整整齐齐,那么人文学科将成为什么样子?近来我常常批评教科书式的思路、语言与风格对学术论文的影响,其实追根到底,那个更令人不能不"学而时习之"的考试,以及考试所规定的那些刻板的答案,才是对未来的人文学术研究者的最厉害的制约,毕竟他要先经过这一次高考,才能进一步去领教那些教科书的"训导"。写到这里,我不由想到当年我们的先生魏建功,他曾经在1920年那个新思潮的时代中,代表着被考的大学生在《北大学生周刊》(第九号第三版)上说,"考试是一种最坏的制度,等于摧花的风,噬果的虫",可是当他也成为大学考人的先生时,却一样没有让学生不考试。

京都的二三月间,时晴时阴,有时虽然阳光明媚,却还飘着片片雪花,有时也会下些小雨,这时的风头如刀,仿佛能穿透大衣。我总想,如果中国的中学生将来会把黑色七月的酷热天气当做高考残酷的象征,那么,日本高校要考大学的学生,则一定把二三月的凛烈寒风和考试连在一起。寒暑不同,那么他们将来回忆起那一次决定命运的考试时,他们的记忆可能会不太一样,唯一"环球同此凉热"的,也许只有考试的同样的残酷。我来到著名的京都大学时,就正好遇到这一连串的考试,不免也发一通这种不切实际的感慨。

其实,我也知道,大学不能不考试,而考试又不能不如此,公平对于人是很重要的,而实现公正的衡量尺度又需要一种规范到甚至死板的标准,但是,为了人文学术的将来,我们又如何最低限度地消解这种考试的后遗症呢?现在回想起来,不能不佩服陈寅恪先生,他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所说的道理,和他给考生所出的"对对子"试题,也许倒真的有些预见性。

□ 朱宝元

大胆废除标准化考试

考试是控制、检测教育教学质量的手段之一。教育教学目的必定要通过考试手段反映出来。近10年来,标准化考试风靡语文教坛。大到升学考试,小到单元测验,从小学升初中到高中毕业考大学,无不采取这种考试方法。所谓“标准化”,一是说,试题是客观的,以避开解答中的主观成分;二是说,评定成绩是客观的,以避开评分中的主观成分。其积极效果主要表现在答案明确唯一,不受评卷人主观因素的影响,又可以用电脑操作评分,能比较准确地评出一份试卷的成绩,便于高一级学校按成绩择优录取新生。

实践证明,这种考试的后果是弊大于利。世界上最早实行标准化考试的美国教育界已对标准化考试提出了异议。大多数教育家认为,标准化考试采取单一正确的答案形式,而没有考虑到有的题目会有复合式答案和多种解答方式。一位教育家说:“标准化考试不管学生能否综合信息、解决问题和独立思考,只测量他们能识别什么。”一位大学教师说:“从采用标准化考试时起,包括优美文学作品的课就开始在美国的课堂上消失了,对于优美文学作品的欣赏让位于阅读技巧的强调。”另一位教育家认为,“标准化考试强调孤立的学习,而不强调把事实和思想综合为一个整体,把思考的速度看得比思考的深度更为重要。这种考试诱导教师把全部课程狭隘化了,过于强调应付考试的技巧。”结果,美国的中学生连一个

没有错误的短文都写不出来。因而美国36个教育和公民权利团体的联合组织呼吁:希望对标准化考试进行改革,而选用多种形式的考试去测量教育的效果。在我国,好几年前,通过标准化考试进入大学理科和医学院的学生,有的不会写实验报告,有的不会写病历,因而不得已增设了大学语文课。

我国不少教学工作者也对标准化考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赵建之认为标准化考试的弊端集中表现为"三重三轻":(1)重符号轻表达。标准化考试的题型无论是选择、判断、还是填空等,都把现成答案编成序号,让学生去圈正确答案,缺少文字表达,这样不利于对考生文字表达能力的考查和培养。(2)重结论轻过程。标准化考试片面追求对思维结果的再认识,而轻视对题解过程的重现。这既不利于发现考生解答题目过程中的错误,又容易使考生发散思维的火花被泯灭。(3)重识记轻思维。标准化考试重视对考生识记能力的考查,轻视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发挥。考生在现在的答案面前,只要下过死记硬背的功夫,就不愁答不出来。标准化考试对考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与发挥,都是不利的。标准化考试"三重三轻"的症结是"活"中有"死"。从题型上看,这种形式的考试命题死板,框框居多,用"死"的框框去套"活"的思维,导致学生头脑呆板和学习过程的僵化。

高佳俊说:"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思维、一种理论、一种方法和手段浸入到社会各个领域后,人们多是只看到它带来的成果,却无视同时造成的消极影响和危害。科学主义的飓风刮进语文教学领域,于是,大家争相设计各种教学程序的系列化、教学方式的模式化、考试命题的标准化。这些科学化手段固然解决了一些传统语文教学中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又是以牺牲学生的个性化特征为代价的。学生的思想情趣、爱好、想象、意志全都淹没在'标准化'的冰水之中,学生成了一台机器!"语文是一门"最辩证、最灵活的科

学,也是最复杂、最多样化的一种科学。”(马卡连柯语)语文教学要用教师的感情去促使学生个性化,促使学生与周围人的接近与合作,为学生将来步入现代社会作好精神准备,把学生当作机器人来训练,是缺乏人道主义的表现。因为标准化考试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两条绳索束缚了广大语文教师的手脚,以致本来应当充满活力的语文课变得索然无味,学生无法从课堂上享受到无穷的乐趣,想象力、创造力受到压抑,感情生活也变得十分枯燥。没有爱,没有人道主义,这是语文教育的失败。

由于标准化考试,旨在检测学生思想道德水平的试卷、试题,已经很难看到了。语文教学中的思想教育内容无形中便被阉割了,也就谈不上让学生的思想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净化和提高,更遑论如何使学生懂得做人的道理了。这无疑是标准化考题的又一重大缺陷。

当前有不少教师和学生可以说是随着高考这根指挥棒进行教和学的。怎么考就怎么教,怎么教就怎么学。近年来,围绕着高考这一指挥棒,中学生使用的各种形形色色的练习册,多得不可胜数的模拟考试题,无一不是对高考命题最蹩脚的摹仿,久而久之,学生们那种丰富多彩的、不同层次的思维,因为得不到教师的指导和帮助,而得不到良好的发展,甚至于变得呆板简单化了。

对标准化考试,胡格非的批评既中肯,提的方向也正确。他说:“语文水平的高低主要表现在(包括文言和白话)阅读与写作文上,而这两方面的水平实际上还反映了学生的认识水平与分析能力。所以语文高考只考能力不考知识。作一篇文、分析评论一段现代文、翻译或标点、注释一段文言就能考出真实水平,簿簿的两页就够了,留给学生以足够的思考时间。不必出什么选择题、是非题、填充题等,每考必厚厚的一本。只考能力还有一个好处,可以促进教材编写上的百花齐放。只要你能培养学生达到大纲规定的

读写水平,用哪本教材均无不可。这样可以让教师放开手脚大胆实践。”

这一段话实质上是对标准化试题的大胆否定。高考语文命题者值得三思,从国外到国内,从实践到理论,应该是改革标准化命题考试的时候了。

赵晓虎认为高考应增设论文考试。他说:“21 世纪国际间的竞争迫切需要善于思考和具有独立创造能力的人才。现行的高考制度对于记忆、模仿的考生来说比较有利,而对于具有创造能力而又疏于记忆、模仿的考生来说却不太有利。因此。‘高分低能’现象总是难以避免,而许多有发展潜力、创造精神突出的学生却得不到深造,人才浪费十分严重。针对这种现象,高考实行学力和论文分离考试。即统考成绩达线的考生还须接受各大学的论文考试,论文考试优胜者优先录取。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大学生素质,还可以给中小学教育以正确的引导,扭转目前中小学教育中只重分数的教学现状。”

□ 刘　颖

语文教学:世纪末的尴尬

中国的语文教学,最早大概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的著名教育家孔子的教学实践,他曾有"言语"一科的教学,其教材以《诗》为主。孔子曾云:"不学《诗》,无以言。"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君,可以怨。迩之事文,远之事群;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会见宾客的时候,往往便要"称《诗》以论其志。"可见,孔子时代的"言语"教学已经颇具现代语文教学的雏形了。如果以此算起,中国的语文教学也有近3000年的发展历史。时至今日,在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各门各类学科日益向广阔、纵深推进的现实背景下,语文教学却出现了发展方向的迷离,并且导致了其现实缺陷的日渐彰显,语文教学开始陷入了世纪末的尴尬。

困惑:图解语文

中国语文教学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后,基本具备了较完备的内容和形式,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语文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日臻完善和严密。但也勿庸置疑,伴随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发展,语文教学在方向把握和方法手段方面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其迷离性和陈旧感,从而形成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现实的缺陷和不足。当然,这些缺陷与不足的产生和存在也就成为了造成当今语

文教学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考察当前的语文教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语文教学的现实功利性增强,“应试教育”的色彩浓重。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人类生活与生产活动的产物,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同时,任何一门学科都是作为人类总体思想的一部分而为人类与社会提供服务的。换言之,任何一门学科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功利性的本质特征,对语文而言,也不例外。但如果过分强调功利,也会使学科走向庸俗化,从而堕入僵化的泥潭。语文教学现实功利性的增强,是当今中国语文教学最显著的特点。我们固然应该看到它在语文实用性推广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更应注意到其负面影响,注意到它产生困扰语文教学发展各种问题的根源性。

当前语文教学现实功利性的增强,集中体现在“分数教育”,或“应试教育”思想的泛滥。为了获得好的分数和升学率,集中于客观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其他方面的教育,这已成为语文教学,乃至其他学科教学中人所共知的现象。特别是在实行标准化考试以后,这种“应试教育”的思想也愈演愈烈,几乎成为了语文教学中的主导思想和原则。

究其实质,“应试教育”实际上是一种只重结果而忽视过程的教育思想,是一种简单地以考试分数的结果来衡量教学质量与成就,并以知识的盲目灌输来完成教学实践的低级教育指导原则。也正因这种“应试教育”直接关注语文教学现实实用的考察结果——考试分数,因而成为了语文教学功利色彩加重的醒目的标志和产物。当然,这里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考试,特别是按照系统的科学组织,具有统一的标准,并对误差作了严格控制的标准化考试,是一种建立在教育学、心理测量学和统计学基础之上的科学人才测评机制。这种人才测评机制作为一种教育成果的检验方

式，它会对教学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它绝不会从根本上引发“应试教育”这一教育思想的兴盛，而是语文教学功利性增强的发展趋势催化、衍生出了“应试教育”，并不断扩大其影响。

“应试教育”与其他教育思想对比的优劣这里姑且不论，单就其指导下出现书包越来越重，能力越来越低的高分低能现象已足以令人担忧了。可见，语文教学对其自身功利性质的过分关注已经造成了对人才培养全面性的偏离，可能导致语文步入迷途的端倪，这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现实问题。

（二）语文教学，特别是中小学语文教学中数量化与绝对化的概念日渐蔓延。

基于“应试教育”的指导，追求高分值的卷面效果，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出现数量化与绝对化的教学概念与理念，便不难令人理解了。的确，对客观知识的重复性的输入和对结论的绝对化，无疑是形成语文知识最大量的永久性储备和使问题简单化的最佳方式。凡是经历过这一阶段语文学科学习的人，现在去看看学生们的作业，都会惊异于以上两个现象的明显地突出存在。在今天，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做不对初中生的语文试题，文学硕士答不全小学生的词语组合，以及家长帮助孩子完成语文作业等等已经不再是新闻，而是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人们对此也渐渐见怪不怪，习已为然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全社会范围的潜意识性的对此加以默许与认同的心态也会逐渐常态化，这就会更加促进这些教学概念的深层推广。

在语文教学中引入数量化的教学概念与思想，本是古已有之的。清代孙洙的名句“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偷”早已成为了流行的教学口语，更有“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教学经验总结。的确，在量变引发质变的物质运动规律和哲学理念支配下，通过重复性的量化训练来达到对知识占有的固化，亦即通过量的积

累来提高对知识理解力的方法，本是语文教学中常见而又有效的一种方式。但这种方式是否适用于所有语文知识的教学与接受呢？根据哲学方法论的指导和对教学实践的观察，笔者认为数量化的教学方式适用于在一定的理解思维发展期内相对运动的，亦即其自身涵义有被理解变化度的语文知识的教学，通过反复的训练，可以促进接受者对其理解深度的递进；而对于那些相对固定的，例如字、词等的教学，则不适宜采取这种方式。如果不加考虑的运用这种教学方式，它只会是一种无意义的机械性质的重复。令人遗憾的是，当前的语文教学却将这种有其适用范围的教学方式人为地推散开来，在语文各方面内容的教学上统统采用数量化，在加重学生学业负担的同时，反而阻碍了其积极作用的有效发挥。

相对于数量化，在语文教学中突出绝对化的概念，更是有悖于语文教学的规律。语文这门学科是以汉语语言为基础和核心的，而语言作为人类思维的组成部分，又与人类思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思维的科学研究表明，作为人类所特有的复杂的精密脑力活动，思维是最难用绝对性来表达和把握的。同样，语言也是如此。因此，绝对化的教学概念应是语文教学中所尽力避免的，那种以教案的说法为唯一，以教师的答案为标准的语文只会消解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阻碍他们思维向多极化的健康发展。

（三）语文与文学的分野渐趋加重。

语文与文学的关系，长久以来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它们是相互交叉，广泛而又不是完全相融的两种体系；有人认为文学是语文的主体，是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有人认为文学是语文构成的一个方面，是语文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等等。本文无意对以上争论进行褒贬，也无意为其分辨是非。这些论述尽管各不相同，却有着一种共同的认识，即语文与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语文教学中必然包蕴着以语言文字为组织载体的文学教育，这也当是一种不争的

事实。因此,在语文教学中融入文学的赏析和创作是语文本质范围所决定的,也是必然要求的。然而实际的语文教学中却存在着这样的现象:把对文学作品的分析与把握作为类型化试题的解答方法试验对象,唯方法论和方法目的至上掩盖了文学本身之于教育对象的本质作用。教师不鼓励,甚至是反对学生从事纯文学性的课外阅读,人为地割裂了语文与文学的内在联系,从而使学生头脑中产生出将文学排斥于语文学习之外的错误意识,极大地降低了学生对文学认知和把握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大学中文系的新生没有读过几本文学著作,甚而不懂文学为何物便是最好的例证。这种教学方式扩大了语文与文学的分野,造成了二者表象上的相互对立,不利于学生文学修养和文学素质的培育,进而影响到中国文学整体受众认知水平的提高,这对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

上述提到的这些问题和现象的存在,当然不能代表整个当代语文教学的现状,也不能全面概括出语文教学缺陷与不足的全貌,但这些问题却是语文教学质量难以提高的主要症结所在。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单纯地将其归咎于教师、教材、学生,以及学校等任何一方,而应作整体性思考。产生上述问题,并使其在今天集中地显露,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的。

首先,进入80年代以来,在中国开放型社会构造开始形成的基础上,人们的思维重点由过去的精神领域转换到物质领域,务实、实用的心态成为了社会的普遍心态。在这种群体心态的支配下,各学科均把实用性作为教学的首要目的,力图贴近现实社会,以现学现用的方式显现其重要性并完成教学目的,语文教学也不例外。在实用性的社会意识推动下,语文教学开始走上了以功利为主的发展道路,强调语文的实际应用,并在其作为人才测评的一个类别的权威性方面,力图展现其为现实提供服务的一面,从而引

发了“应试教育”思想的滋生与蔓延。

其次，在科技发展融合化的背景下，各学科研究与教学相互渗透的趋势日渐明显和加深，在此影响下，语文教学也开始注重借鉴其他学科的教学方法和概念，而忽视其非物质性（一定程度上）的研究特点。特别是自然科学中量化与绝对化的思想被加以简单移植，运用到语文教学的实践中，造成了数量化与绝对化等教学理念的扩散。

第三，对上述问题的产生，还应将其放在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语文教学作为一门具体的人才培养学科，是整个社会教育系统中的一个构成部分，它必然会受到教育思想的制约和支配。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一直将培育理念化和理想化的人才作为自己的核心，在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始终处于：“规矩”与“方圆”的包围之中，缺乏利于个性发展的多元教育环境，这种教育也以制造顺从于整个社会“正常”运转的人才为己任，漠视个体的独特性。尽管在现代教育思想的冲击下，这种传统的教育思想已经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但其历史积淀的影响却又不能令人忽视。语文教学所着力培养社会实用性人才的现实目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这种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

总之，当前语文教学上存在的种种不利于语文教学进一步健康发展的现象，它们实质上都是片面地发挥和追求语文的某一特质，忽略语文其他属性的结果，从而造成了对语文事实上的图解。对此，将在后面的论述中加以更进一步的说明。

二、美的追求：语文教学的终极思考

基于以上这些问题和现象的现实存在，对语文教学的目的性进行重新的思考，就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了。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看清今天语文教学迷离的状态，从根本上纠正语文教学的发

展方向，从而为语文教学正确迈入下个世纪提供指导性意见。

语文教学的目的性根植于语文的特质之中，语文的特质在决定语文教学现实目的性的同时，也规定了其本质的目的性，而要谈及语文的特质，则必需弄清楚语文是什么的问题。

语文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很多，诸如语文是语言和文字；语文是语言和文学；语文是语言和文化；语文是语言和文章等等，不一而定。这些答案的共通之处在于，它们都把“语”解释为“语言”，分歧在于对“文”的解释。解释不同的人，都自有其一定的依据和理由，也正因语文内涵的丰富性和涵盖范围的广阔性，以及选择论据角度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解释。对此，叶圣陶先生在《答孙文才》一信中，对“语文”一词作了简要的说明：

口头为语，笔下为文，合成一词，就称“语文”。自此推想，似以语言文章为较切。文谓文字，似指一个个的字，不甚恰当。文谓文学，又不能包容文学以外之文章。

其后，叶圣陶先生在《答滕万林》一信中，再次对“语文”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

“语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因为读写之事，而苟思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将减损。……其后有人释为“语言”，“文字”，有人释为“语言”“文学”，皆非立此名之原意。第二种解释与原意为近，唯“文”字含义较“文学”为广，缘书面之“文”不尽属于“文学”也。课本中有文学作品，有非文学之各体文章，可以证之。

根据先生之意，可知“语文”即指“语言和文章”，也就是口头语和书面语，是最初立名的原意。根据语文的概念，当不难推断出其

特质，即其本质的属性来。口头语与书面语均是人类思考、沟通的工具，也是人类学习他种科学、文化知识的工具，是进行各项工作的工具。具体来说，作为听、说、读、写等人类生存、生活的基本技能的符号载体，语文首先是作为应用工具而存在的，工具性是语文的一个基本属性。其次，语文在应用中的另一显著特点是人类思维的最主要的表述载体，由语言的有机组合而形成的思维成果的展现，蕴含着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思想或感情。特别是优秀的语文篇章，可以扩充人们对人生、对社会、对生活、对文化的认识，提高人们的思维境界和判断是非的能力。此外，学习语文，必须掌握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逻辑等知识，同时还要认识文体、文化、社会等知识，通过知识的丰富积淀来提高听、说、读、写等技能的发展。由此可见，语文还具有思想性和知识性的属性。对于上述特质，张鸿苓和张锐在《中学语文教学》中作了更为详尽的论述。

值得注意之处还在于，语文在具有上述特质的同时，还具有艺术性的本质属性。毫无疑问，在口头语和书面语的表达之中，在力求表达清晰的基础上，还存在着表达的好不好，美不美的问题。在得体、动人的谈吐和精彩、漂亮的文章中，都有艺术加工的成分在内。在中、小学语文科的课文中，不少具备明显的艺术感染力和吸引力，要求学生认识和掌握一定的技巧与欣赏方法。此外，学生研读语文篇章，会受到思想感情、道德的感染和熏陶，并能提高他们对自然、对生活的审美能力。这些都说明了语文艺术性特质的客观存在。

语文所具有的这些特质构成了语文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性，因而必然要求在语文教学中突出这些特质，由此引申出语文教学的现实目的，同时，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构成了这些目的存在的必要性。

通过对听、说、读、写等基本技能的系统训练，使学生掌握运用

这些技能的本领和方法，使其在生活中能听、能说、能读、能写，也就是能充分利用口头语和书面语这个语文工具，准确而又熟练地学习、工作、沟通。从更广阔的范围讲，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依赖于人类自身的和谐相处。需要人类群体及个人进行频繁的交际，即思想、感情、观点、概念等的互相交流，这又是建立在语文基本技能的运用基础上的。因此，语文工具性的特质决定了语文教学的现实实用性和功用性，这是语文教学具体目的中的一个主要方面。另外，知识是技能的基础，二者具有联动的关系，它们需要取得相对的平衡，如此才能促进技能的相应发展。也就是说，知识储备量的多少决定着技能运用程度的高下。从这个意义上说，语文知识性的属性是与语文教学工具性紧密相连的，它强化了语文教学的实用目的性。

语文教学实用的现实目的，是语文教学的一个主要目的，但它并不能完全涵盖语文教学的目的性。语文在具有工具性、知识性特质的同时，还具有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属性。语文的思想性主要就在于通过对语文篇章的研读，学习者可以从中获取、认知作者所传达的思想情感，了解到他人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和态度，促进自我人生观念、世界观的发展与完善，形成个体的道德信念、公民意识、人生目的等。而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也需要出现个体精神价值体系的趋向，形成和弘扬正确的社会思想，这就赋予语文教学以提高学习者的思想修养，树立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的目的作用。语言的艺术性一方面要求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体现出艺术类，增强思维表达的感染力和号召力，促进思想、观念的更好表达，另一方面也是语言艺术进一步提高和发展的内在需要。语言艺术性的特质也决定了语文教学应该达到和完成提高学习者的艺术修养与艺术创造能力的目的。

语文的这些目的性的要求在语文教学的实践过程中，将它们

融汇起来，互相渗透，互相服务，互相促进，而不能偏重于某一方面的目的追求，而忽视其他方面。前文论述到的当前语文教学中存在的不足正是过分强调了语文教学的现实实用目的，却忽略，甚至是排斥了语文教学的其他目的，这本身就是从根本上割裂了语文特质的相对统一，造成了对语文的图解。这种图解使语文教学迷离了其原初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丧失了发展可持继性的基础，会越来越使语文教学走进唯工具论的庸俗学科范畴，最终导致其发展进程的停滞，甚至是倒退。

综合考察语文的特质，还应看到，这些特质的存在都是以人类社会发展所需要为前提和为基础的。如果将语文放在人类活动的整体中考察，不难推知，语文是人类活动的必要手段和活动成果的组成部分。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离不开对语文的运用，而语文本身又是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产物和结果，而且是有生命力和再发展性的成果。也就是说，语文是作为活动“活”的成果并伴随人类活动的发展而不断演进的，其自身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从属于整个人类活动目的的。

自从有了人，人类活动便开始了其围绕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创造而进行的运行模式，人类活动也正是体现在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创造过程中。对物质文化的创造追求，是满足作为生物性的人类不断改进自我生存状态的需求；对精神文化的创造追求，是满足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人类不断修正自我生存目标的需求。这两种需求的结合，便体现出人类对美好生活、美好社会的追求，即对美的追求。因此，人类活动从根本上是以追求美、创造美为目的的。作为人类精神成果的各类学科，在其各自领域内的研究是基于对美的创造，而教学则是基于对美的认识，达到实现对美的追求的物质意义上的能量储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文教学的终极目的在于使学习者认识和把握美、追求美、创造美。

对于世纪末的中国语文教学,必须认真领会和把握这一终极目的,从而在此基础上,正确调整自己的前进方向,弥补不足,以正确的姿态走进21世纪。

三、受众心理:语文教学的过渡载体

面对世纪末的语文教学现状,在重新认识和把握语文的现实以及终极目的性的基础上,必须加速教学方式的改革步伐,这既是语文教学发展的自身要求,也是一种共同的社会呼声。笔者不想对教学方式改革的具体内容进行过多的讨论,只想通过对语文教学实践过程的过渡载体——受众心理的分析,为教学方式改革提供一个考虑问题的角度和出发点,以期增加这种改革完善性与全面性。

学科教学作为一种具体的实践过程,实质上就是一种思想输入的过程,而输入结果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接受者的心理状态。因此,语文的教学实践就必须关注学习者的接受心理,特别要注意和把握以下几种心理状态和结构。

(一)自组织活动心理结构

"自组织活动"是为系统科学等学科共同揭示出来的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宇宙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它指的是一个系统在没有外部指令的前提下,其内部各个子系统(要素)之间能自行按照某种规则形成一定的结构和功能,并以其特定的方式朝某一方向发展的客观过程。对于任何一种非线性的开放系统,都可以从原来无序的状态中产生稳定有序的自组织结构。认知心理系统,作为一个非线性的开放系统,同样具有自组织性质,因而形成自组织活动性的认知心理。这也就是说,学习者先前自发获得的认知方法可以在这种心理系统的自组织活动的作用下固定化,构成此后学习的心理定势,自然影响正在进行的学习活动的实际内

容与方向。所以教师应注重这种学习过程中的认知心理,主动地调控这种心理的组织结构,以提高学习的效果。例如,在学习阅读中,学生往往对课文在学习一定程度后再去思考或解答"课后习题"。这种方法是基于自组织能力而自然形成的;如果指导其先看"课后习题",再阅读课文,这样就会给学习者自组织能力的心理结构带来积极的影响,从而使阅读效果增强。

(二)元认知心理结构

元认知心理结构即元认知监控心理结构,是人对认识活动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调节的心理能力与结构。即主体在进行认知活动的全过程中,将自己的认知活动作为意识的对象,不断地对其进行积极自觉的监视、控制和调节(包括信息的反馈、认知策略的选择等)。进而通过对自己意识的控制而相应地控制自己的思维和行为。学习行为作为一种认知活动,必然要受到这种心理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心理结构会制约人的学习行为。在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主动地将自己的学习过程作为认知的对象,促进元认知心理作用的有效发生,是提高学生学习能力的有效发生。对此,我国最早的教育文献《学记》中就有深遂的见解:"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故曰教学相长也。""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故教之者,长善而救其失也。"这里的"自反"、"自强"的教学相长思想和"长善救失"思想,实际上就说明了这种元认知心理结构的存在和其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

(三)模糊心理结构

"模糊"的概念和理论最早是由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电子工程系和电子学研究实验室的查德教授于1965年在《信息和控制》杂志(第八卷第三期)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模糊集》的文章中提

出来的。所谓“模糊集”,即指由模糊概念组成的集。文章指出,在现实物质世界中所遇到的客体,经常没有精确规定的界限。例如“轻”、“重”是一对模糊概念,它们之间外延不清,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这种模糊性是普遍的、绝对的,人们之所以能够大致把握物质世界的客体,就在于人类认知心理方面本身即具有和存在着模糊特性。人们在平常的说话,作文等情况中,都会遇到大量的模糊概念和现象,比如高、矮、漂亮、高兴、早晨、黄昏等,它们的界限都很模糊。有时,尽管人们使用不精确的表达,还是能够相互理解,达到交际的目的。可见,模糊心理结构是存在于人们认知心理中的。

模糊心理结构是人在认知中的心理不清晰性和不确定性。这种心理结构的存在,使在“人类的任何认识活动中,人们也就永远无法驱除模糊性这个‘幽灵’”。基于这样的认识,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开始产生新的变化:从绝对走向相对;从一面性(单义性)走向多面性(多义性);从实在走向模糊;从因果性(决定论)走向偶然性(概率论);从确定走向不确定;从可逆性走向不可逆性;从个体性走向系统性;从定域论走向‘场论’;从空间性走向时间性。”顺应这种发展趋势,语文教学应摆脱绝对性的桎梏,关注本学科领域中那些亦彼亦此的属于多值判断的非典型现象,主动迎合学生的模糊认知心理,在听、说、读、写等方面的知识传授和训练中,改变处处“以词解词”、“讲深讲透,面面俱到”等传统的教学方法,运用意会、感受、想象等手段,以适当“模糊化”的教学来提高教学效果。

(四)学习迁移心理结构

学习迁移心理结构,是人类很早就认识到的。这种心理结构也是人的自组织活动心理和元认知监控心理相互交叉而产生的由认知方法的接受向认知内容的接受转化的一种认知心理结构。也就是说,人们通过对某一种知识、技能的学习可以造成对另一种认

识、技能学习的影响,即平常所说的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在这种心理作用上,人们会根据以往的经验知识来对新学知识产生影响。根据影响的结果,可分为积极的正迁移(或迁移)、消极的负迁移(或干扰)和无影响的零迁移。随着对这种心理结构认识的深化,也相应地产生了众多关于学习迁移的理论。诸如早期官能心理学的"形式训练说";桑代克和伍德沃斯的"相同要素(或共同成份)说(1901)";贾德的概括说(或类化说)(1908);格式塔心理学派的"关系转换说"以及随后奥斯古德的"三维迁移模式"等等。在语文教学的实践中,教师如果正确运用上述迁移理论,指导学生自觉进行迁移性学习,形成"举一反三"的学习模式,是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的。

以上所提到的这几种心理结构,只是人们接受心理的部分组成成份,但它们在主体认知过程中却起着主导作用,因而也决定着主体知识吸收的程度。语文教学应针对这些心理结构的特点,设计和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和模式,从而实现知识、技能输送最大值的接受,促进教学效果的提高和增强。

四、思维开发:语文教学的必然延伸

语言与思维的切实关系,是个长期引起争论的问题。但毫无疑问,语言与思维是密切联系的,人们对此已有了如下的认同:1. 语言是表达思维的最成熟、最有效的途径。2. 语言并不等同于思维。思维可以有其他非语言的形式。3. 语言和思维的发展,是交叉影响,互相促进的。著名心理学家斯朗宾就曾指出:"语言是思维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无论语言或者言语都不能等同于思维。"语文与思维的关联,必然要反映到语文的教学实践中。然而,中国的语文教学长期以来受到"语言即思维"观念的影响而只承认语言思维,否定非语言思维,并且在语言思维中否定内部言语和外

部的差异，造成对二者关系的认识上的混乱。这种混乱使语文教学的视野仅仅局限在语言的外在形式和静态描述，单纯的知识传授、琐碎的语言分析、僵硬的灌输取代了生动活泼的思维训练。

语言与思维的内在联系，要求语文教学重视思维能力的开发和培养，特别要重视以下三个方面能力的开发、培养。

(一)逻辑思维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是能够超越眼前事物而进行抽象思考的能力，是人类所特有的思维能力，是进行推理、判断，解决问题的重要能力。语言以其复杂、高级、简练的信号性功能特征，具有能够反映抽象思维能力的作用，并且在抽象思维进行的过程中充当其必要条件。只有借助语言的思维，才能达到抽象逻辑思维。因此，在语文教学中注重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和训练，是极为必需的。

(二)形象思维能力

形象思维是较难以明确界定的一种思维能力，与抽象思维比较，它具有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它始终以客观实体为根据，始终不离感性材料，始终不舍具体形象。它是用形象来思维而区别于抽象思维的以概念、理论为思维载体的特征。

第二，形象思维常以想象(联想、幻想)为基础。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触物起情”即是对相关事物之间的联想，如见肃杀之景而起家国之叹，望禽鸟比翼而兴男女之感等，就是典型的形象思维。

第三，形象思维往往伴随着强烈的情感，特别是文学作品中的形象，诉诸于人们的直觉、感性，常会带来感情的震动。

形象思维的特点使其成为一种非语言性的思维，这似与语文教学无关。但形象思维却又和抽象思维密不可分，两者互相交织、补充、转化，语文教学要促进学生的整体思维发展，也应注重对形象思维能力的培育，促进二者的互相渗透。同时，语文艺术性的特

质要求提高学习者的艺术鉴赏水平,这也需要对形象思维能力加以训练和培养。

(三)创造思维能力

创造思维能力,是人类思维能力中最具独特性的,也是人类生存、发展最重要的一种思维能力。创造思维强调思维的散发、幅射与求异,要求思维探寻的多向性。创造思维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个人之于社会的价值,因而对它的训练,是人才教育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语文学科的教学尤其适宜配合训练学生的创造思维。语文学习本就应该是生活化的,充满创造力的;词汇日新月异,语句无限生成,语文运用在实际中灵活多变。因此,语文教学应结合自身的特点,加强对创造思维能力的训练,将创造思维的开发作为自己的重点。

人类社会即将步入下个世纪,社会发展需要更多全面的人才。作为社会教育一个门类的语文教学,肩负推广母语的正确使用,培育学生的综合能力和使学生树立对美的追求的人生信念等历史重任。在世纪末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正视语文教学的不足,自觉主动地加以调整和弥补,使语文教学走出世纪末的尴尬,开创更加适应人类社会的语文教学的新局面。

编后絮语

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帕斯卡尔

一

自 1998 年 4 月本人推出草原部落“黑马文丛”后，余杰、摩罗、孔庆东、朱健国、谢泳等“黑马”已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并且引起了全国媒体最大限度的关注，尤其是余杰和摩罗一跃成为名人。其实，这些“黑马”们并没有多么高深的思想，只不过是重复说了一下“五·四”时代胡适、陈独秀等巨人们说过的话而已。他们之所以受到读者如此厚爱，就是因为迄 90 年代以来，近 10 年了，几乎没有多少人去思考了，也没有多少人敢说真话了。敢于吃螃蟹的人，自然是勇士，勇士自然会赢得人们的尊重。其间，我和“黑马”们受到过种种意想不到的打击、压力和挫折，我们都挺过来了。对于读者善意或恶意的批评，我们都会虚心接受。我们永远记得毛主席的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余杰会努力，摩罗会努力…… 我们一直在努力。

最使人难忘的，是一些偏远地区的读者和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们。许多偏远地区的读者为了购得“黑马文丛”，省吃俭用，步行几十里到邮局汇款，其情其景历历在目。1998 年冬，在全国八大城市的“踏雪寻梅”活动中，许多大学生为了看上我们一眼，排几个小时的队，甚至许多女大学生打听到余杰的住处，早上 5:00 就堵在

门口;武汉风信子读书俱乐部的成员深夜都不愿离开我们的房间;厦门大学鼓浪文学社的社员则全程陪同我们;余杰家乡母校的小弟弟们则几千人围堵我们,让我们签名留念……这使我们受宠若惊,我们只不过是写了应该写的文章,说了应该说的话而已。中科院肖伦院士,年届九十高龄,见了我和余杰激动不已,握住余杰的手说:“久仰先生大名,你的书真是太好了,我们科学家都喜欢你写的书。”中科院原化学所所长胡亚东院士,则在春节过后专门给我写信拜年,表达对我推出“黑马文丛”的诚挚谢意…… 这些细节,真使人不得不说。绝非炫耀,而是发自内心的感动。

从此,策划精品书、推出文学新人,成为我的宿命,当一名民间出版家成为我的理想。

二

《世纪末的尴尬——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一书,经过近一年的辛勤耕耘,终于问世。这本书是我于1998年夏在呼和浩特徐无鬼(《哲人的蠢话》一书作者)阴山别墅坐客时提出的,后恰余杰、摩罗、鄢烈山诸兄来草原旅游,一拍即合,孔庆东是后来加盟的。这本书使我激动了整整半年,其间诸位弟兄又忙别的事了,这使我宛如热锅上的蚂蚁。后来在我的“威逼利诱”下,弟兄们还是支持了我,余杰写了文章,摩罗组了稿并采访了钱理群教授,孔庆东统了稿、写了编者的话,朱健国写了长文,总算可以交卷了。但不知能否与诸位读者产生共鸣?尽管我们都受恩泽于中学语文教育,否则我们写不出现在的文章;同时我们也受害于中学语文教育,否则写不出这么臭的文章。所以审视是必要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否则还接着读爸爸读过的课本吗?我一直认为,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一是体制二是文化,体制不能研究,只能在文化上做文章。

体制是前提，文化是基础，前提决定基础，基础推动前提。我无意责怪广大辛勤的园丁，我深深理解广大中学语文教师的苦衷，希望我们同心协力，共同提高我们的母语教学水平。

审视肯定有偏激之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广大读者有不同意见，欢迎来信来稿（北京1293信箱，贺雄飞收，邮编：102600），还可以出版，争论出真知；审视完中学语文，还可以审视中学政治、历史、数学，也欢迎来稿，还可以出版，疑问出真知。当然，本书的观点纯属学术上的探讨，至于怎么样改课本，那是国家教委的事。感谢本书所有的顾问和作者，广大中学语文教师会永远记得你们，为他们讨个说法。

三

“黑马文丛”推出的另一本书为《骄子的叹息——名牌大学才子才女心灵独白》，受“余杰现象”的启发，特委托《中国青年》的张杰老弟组稿，希望从其他大学中再挖掘出几个余杰来，结果我很失望，也许是下得功夫不够。总之，我觉得全国那么多名牌大学，出几个余杰岂不是小菜一碟。当然余杰并不是标准，只是一个小小坐标点而已。我总觉得，现时代的大学生无论从感悟力、知识面和思考的力度上，要大大超越于我们时代的大学生了，他们的叹息自然而然声声入耳。

无论如何，这盘大菜是端上桌了，可不可口，你们尝尝再说吧。

四

“黑马文丛”的另一本新书，是草原部落和万圣——东方工作室合作的结晶《历史的回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本书虽

无大的理论框架，但资料翔实立此存照，对了解我国光辉的民主历史大有裨益，可以充分感受到老一辈革命家的政治主张和精神追求。

鉴古知今、继往开来，我们的党伟大而光荣、英明而开明，我们的国家旭日东升。

五

想出版的书很多，但精力有限、条件有限、时代有限，只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能动性，在夹缝中成长吧。

“草原部落”知识分子文存系列，将推出《钱理群文选》、《朱学勤文选》、《徐友渔文选》、《秦晖文选》、《黎鸣文选》，“草原部落”名报名刊精品书系将推出《方法精华本》、《天涯精华本》、《百年潮精华本》、《南风窗精华本》、《博览群书精华本》，希望广大读者能够喜欢。

1999 年是跨世纪的一年，适逢国庆五十周年和“五·四”八十周年纪念，谨以上述书作为献礼，写下“草原部落”对中国未来的追求和奉献。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烦人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平庸

真诚希望广大读者的批评！

雄飞

1999 年春于北京黄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世纪末的尴尬/孔庆东等著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4
"草原部落"黑马文丛·贺雄飞主编
ISBN 7—81036—343—3/Z·40

Ⅰ.审…
Ⅱ.孔…
Ⅲ.审视—中学语文教育
Ⅳ.24

审视中学语文教育

责任编辑:黄洁玲
出版发行: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印　　刷:北京华文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4.5625
字　　数:350千
版　　次:199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81036—343—3/Z·40
定　　价:22.80元

